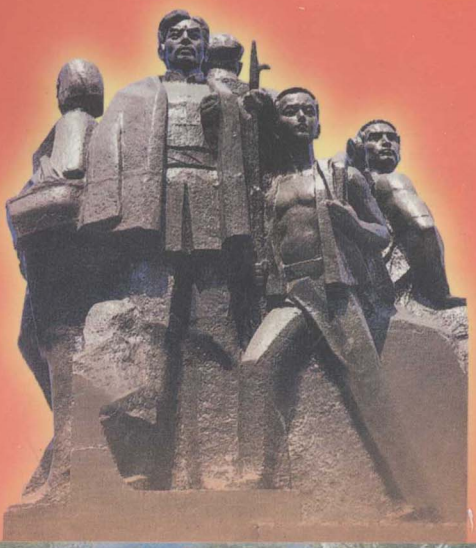
中央苏区历史研究

主编 孔永松 蒋伯英 马先富

中央苏区
党的建设史

杨小冬 罗长祥 陈世奎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 中央苏区历史研究

◆ 主编：孔永松　蒋伯英　马先富

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

杨小冬　罗长祥　陈世奎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杨小冬等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9

(中央苏区历史研究/孔永松等主编)

ISBN 7-5615-1535-9

Ⅰ.中… Ⅱ.杨… Ⅲ.中央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史-研究 Ⅳ.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7573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福建省龙岩印刷厂印刷

(地址:龙岩市九一北路 28 号 邮编:364000)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288 千字 印数:1—1500 册

定价:(全套 6 册)1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本书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
——“中央苏区历史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中央苏区历史研究
丛书编纂委员会

主　　任：赵觉荣
副 主 任：游宪生　陈秀榕
委　　员：苏振旺　詹书金
　　苏钟生　罗万盛
　　傅如通　林焕生

序 言

站在世纪之交，迎接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主编了“中央苏区历史研究”丛书，共有六种：即《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中央苏区军事史》、《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史》、《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

本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在中国南方的赣西南、闽西，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全国最大的一块苏维埃区域。它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因此称为“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是毛泽东思想的发祥地之一。这个期间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同时，又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及全苏区的时期。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斗争则取得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历史的发展是错综复杂、多层面和立体式的。对中央苏区的历史，不少学者花了毕生的精力，搜集了大量史料，写出了几千篇学术论文与成百种的专著。真可谓林林总总，硕果累累。我们当初是打算在此基础上作些集成研究并提出一此新的看法，因此，组织编写了这套丛书。现在，“丛书”即将出版了，看后又甚不满意，总觉得在“集成”与“创新”二方面都做得很不够，虽然“丛书”中的二三种在某些方面作了新的探索，但相对于整体而言，仍感到很自咎。该书面世后，尚祈方家不吝赐教！

中央苏区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瞿秋白、[redacted]、邓小平、张闻天等进行伟大革命实践的地方，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军、治国的人才，为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获得十分丰富成功的经验。以往在研究中央苏区历史的文章与专著中，对成功经验的研究可以说占绝大部分。但中央苏区时期也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实行全面"苏化"，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都造成许多恶果，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文章与专著很感不足。全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也很不够。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毛泽东在1939年总结"中央苏区"历史时说，我们党受共产国际和俄国人的影响，主要是民粹主义，就是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从封建经济也就是小农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影响。因为中国的革命是在广大农村进行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农民成份，党内极容易产生类似于俄国民粹主义的倾向。经过理论思维，他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1947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又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伟大理论概括。

毛泽东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态。他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经地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太少了，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仅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没收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就是没收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没收封建土地为

农民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有农民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毛泽东还认为，没有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中国革命胜利后，不能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路”，也不能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进入社会主义是将来的事，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毛泽东还提出了生产力问题，“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与民粹主义划清界线，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正如恩格斯所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产生是与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然包括“中央苏区”时期）“左”倾错误的教训有密切关系的。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

对历史要“温故知新”，祈望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有更多青年学者们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全新理论，去审视中央苏区时期先辈们创造的一切（包括正面的经验和负面的教训），

这样在读史或研究历史过程中，就会有所借鉴；有借鉴，就会有创新，就能更深刻地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价值。

不管经历如何，本世纪最后十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上出现了邓小平理论，由于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新的世纪里，社会主义必现勃勃生机。

孔永松

1999年于厦门大学北村松石斋

目　录

导言 …… (1)
第一章　赣西南、闽西党组织的建立、恢复和发展 …… (7)
第一节　赣西南、闽西党组织的建立 …… (7)
一、赣西党组织的创建及早期发展 …… (8)
二、赣南党组织的建立和早期发展 …… (10)
三、闽西党组织的创建和早期发展 …… (12)
第二节　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与赣西南闽西党组织被破坏 …… (15)
一、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赣西南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 (15)
二、反革命势力猖狂反扑，闽西党组织受到严重摧残 …… (17)
第三节　“八七”会议后地方党组织的恢复与武装斗争的开展 …… (21)
一、赣西南党组织的恢复与武装斗争的开展 …… (22)
二、闽西党组织的恢复与工农武装起义 …… (25)
第四节　早期地方党组织建设的经验教训 …… (28)
第二章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党的建设的逐步展开 …… (35)

第一节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 (35)
一、在落后的农村环境中建设党 …… (37)
二、在长期武装斗争条件下建设党 …… (41)
第二节　在确立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过程中对党的建设的特点和规律的进一步把握 …… (46)
一、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党的建设新道路的开辟 …… (46)
二、紧密结合武装斗争，切实加强党的建设 …… (48)
三、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过程中党的策略思想逐步走向成熟 …… (54)
第三节　在开创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党的建设的全面展开 …… (57)
一、深入发动群众，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 (57)
二、坚持调查研究，倡导党和红军良好的作风 …… (60)
三、在实践中“创造干部”，大量培养工农人才 …… (62)
四、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增强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 …… (67)
五、严格党内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 (73)

第三章　古田会议与毛泽东建党理论的初步形成 …… (76)
第一节　红军党内关于党的建设的认识与分歧 …… (76)
一、分歧的表象与实质 …… (76)
二、中共红四军“七大”对分歧的调和处理 …… (81)
三、红四军出击闽中、东江失利与党的建设的教训 …… (86)
第二节　古田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阐述 …… (90)
一、中央“九月来信”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排除了思想障碍 …… (90)
二、古田会议确立党的建设基本原则 …… (95)

第三节 《反对本本主义》的发表与党的思想路线的初步形成……（102）
一、《反对本本主义》发表的时代背景 ……（102）
二、《反对本本主义》是《寻乌调查》的思想升华 ……（105）
三、《反对本本主义》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原则 ……（107）
第四章 中央苏区的形成与"左"倾错误在苏区的推行……（112）
第一节 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推行及其对地主党组织的影响……（112）
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形成及其错误的建党理论 ……（112）
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对党的建设的危害 ……（116）
第二节 中共苏区的形成及其所辖赣西南和闽粤赣边特区党的组织状况……（123）
一、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和中央苏区的形成 ……（123）
二、中央苏区所辖赣西南和闽粤赣特区党的组织发展状况 ……（127）
第三节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131）
一、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构想和指示 ……（131）
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及其工作部署 ……（134）
第四节 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及其对党的建设的破坏……（139）
一、赣西南苏区的肃AB团与富田事变 ……（139）
二、闽西苏区肃社会民主党对党的建设的破坏 ……（143）
第五章 中央苏区的巩固，党的建设进一步展开 ……（150）
第一节 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150）

一、中共中央关于召开苏区党代表大会的构想和指示 …… (150)
二、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阐述 …… (155)
第二节 苏区中央局的健全及对党的建设的领导 …… (161)
一、苏区中央局领导职能的调整 …… (161)
二、苏区中央局机构的健全与领导成员的变动 …… (163)
三、苏区中央局对党的建设的领导 …… (165)
第三节 中央苏区所辖地方党组织的建设 …… (170)
一、中共江西省委 …… (170)
二、中共福建(闽粤赣)省委 …… (172)
三、中共闽赣省委 …… (175)
四、中共粤赣省委 …… (177)
五、中共赣南省委的建立 …… (178)
第四节 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党的组织的发展 …… (179)
一、党的基层组织设置情况 …… (179)
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主要做法 …… (181)
三、党员队伍建设 …… (188)
第六章 王明"左"倾错误对党的建设的危害 …… (193)
第一节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 (193)
一、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左"倾错误在苏区全面推行 …… (193)
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 (197)
第二节 "突击入党"和"唯成分论" …… (201)
一、突击发展党员,降低党员质量 …… (201)
二、发展党员搞"左"倾关门主义的"唯成分论" …… (205)

第三节　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 …… (210)
一、实行错误的党内斗争方针 …… (210)
二、实行“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 …… (214)
第四节　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民主集中制的破坏 …… (218)
一、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 …… (218)
二、实行独断专行的“家长制”领导和惩办主义 …… (222)
第七章　中央苏区时期党对红军、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 …… (227)
第一节　党是苏维埃运动的领导者 …… (227)
一、中国共产党是苏维埃区域的开辟创建者和领导者 …… (228)
二、党是苏区红军、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的领导者 … (230)
三、党是苏区各项建设事业的领导者 …… (233)
第二节　党对红军的领导 …… (237)
一、确立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 …… (237)
二、大力加强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 (241)
三、党在红军中建立了严密而健全的组织系统，为实现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 (245)
第三节　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 …… (248)
一、党是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 …… (248)
二、中共中央关于党政关系的构想 …… (252)
三、中央苏区党政关系的状况 …… (255)
第四节　党对群众组织的领导 …… (264)
一、党对群众组织实施领导的基本情况 …… (264)
二、党对共青团和妇女运动的领导 …… (268)
第八章　毛泽东等对党的建设的贡献 …… (273)
第一节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建党思想 …… (273)

一、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 (273)
二、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 …… (275)
三、认真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 (277)
四、注重加强以三大作风为核心的党风建设 …… (278)
五、正确开展党内斗争 …… (281)
第二节 周恩来对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贡献 …… (283)
一、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 …… (283)
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全面贯彻民主集制原则 …… (285)
三、正确开展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 …… (287)
四、提出了党对红军和政权及群众组织实行领导的
正确原则和方法 …… (289)
第三节 张闻天与中央苏区党的建设 …… (292)
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行新的领导方式 …… (293)
二、在实际斗争中逐步挣脱"左"的桎梏，深刻批判
极左主义 …… (297)
第四节 任弼时关于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论述 …… (301)
一、整顿和建立健全中央苏区各级地方党组织的
领导机构 …… (302)
二、创造新的工作方式与作风 …… (303)
三、注重加强党在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 …… (304)
第九章 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 …… (310)
第一节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 …… (310)
一、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310)
二、加强党内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理论水平 …… (313)
三、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实现党的思想政治领导 …… (317)
第二节 坚持民主集中制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 (324)
一、注意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

原则 …… (324)
二、反对极端民主化，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 (329)
三、严紧党的纪律，严格地执行纪律 …… (334)
第三节 密切联系群众讲究工作方法 …… (340)
一、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 …… (340)
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 (344)
三、深入调查研究，讲究工作方法 …… (349)
后记…… (355)

导言

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领导创建的全国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就是研究中央苏区这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

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建设历史是极富研究价值的。这首先是因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初步形成是在这个时期，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为其标志。第二，中央苏区时期既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的时期，也是对党的建设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的时期。这一时期，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由在城市发动工人罢工、起义到在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党的建设面临新情况、新形势，因而也呈现新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解决这些新情况，适应新形势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到了党的建设的特有规律。第三，中央苏区时期是党的建设取得初步成果的时期，同时也是“左”倾思想泛滥对党的建设造成严重损害的时期。这个时期党的建设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沉痛的教训，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然而，研究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难点尚不在于史料的搜索和科学利用，而在于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建设史既不同于全党意义上的党的建设史，又有别于地方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史，严格意义上说，它是介于两者之间或兼有双重意义的党的建设史。这就是说，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建设既有相对于中央来说

的地方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又有中共临时中央进驻苏区后以中央或苏区中央局名义进行的党的建设，还有虽然作为地方党的建设的做法和经验，但在实质上或在后来发展为全党意义上的党的建设的做法和经验。如古田会议所作的决议，虽然是针对红四军中党的建设（当然还有别的问题）的具体情况说的，但实质上揭示了我们党自身建设的规律和特点，因而成了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其思想在后来实质上是全党党的建设的思想。这就要求在研究中要注意区分界限，不能搅在一起。同时也要求要把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的研究视野放宽一点，放在党的建设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一方面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随后带来了全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建设面临新的环境；另一方面，以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仍在这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对中央苏区党的建设有深刻影响。只有从这两方面的结合上来考察中央苏区时期的党的建设，才能得出较为真实的结论。再者，既然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那么许多党的建设思想就是发端于此时或发展、成熟于此时的，这就要求在研究中要把观点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并且使重要观点不仅不遗漏，而且还有述评，这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大原则和总要求。要深入地研究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搜集反映这一时期的史料，并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是一个基本前提。学术界对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中央苏区史料的整理阶段，时间大体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80年代初。主要成果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闽西的春天》，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回忆中央苏区》等。此外，还整理出许多未公开出版的史料汇编。这些史料汇编和回忆录为研究中央苏区时期的党的建设情况奠定了基础。只是这

一段对史料尚未作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第二个阶段，就是在整个80年代，学术界对中央苏区党的建设问题开始有所研究，内容涉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一时期的党建思想和主张，有关决议和重要文献中的党建思想，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出版的一批著作，如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史》(蒋伯英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孔永松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戴向青等著)等，这些著作从史的角度，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史料的收集、综合、整理和开发，对与党的建设有关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文献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探讨，为我们研究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第三个阶段，从80年代末开始至今，以古田会议召开6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纪念为契机，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研究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史和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论文和专著。其代表作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毛泽东建党学说史》(张尉萍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道路》(蔡长水、叶梧西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史》(陈至立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等。《中央苏区党的建设》是首部较为系统、较为详细反映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专著。该书在搜集大量有关中央苏区党的建设方面的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主要方面展开了研究阐述，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客观地说，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研究还是较为全面的，内容涉及中央苏区时期的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建设、党的思想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党的作风建设等方面；人物涉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张

闻天等人建党的思想和主张；会议涉及中共红四军“七大”、“九大”，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党的建设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文献涉及《古田会议决议》、《反对本本主义》、《中央九月来信》等所阐发的党建理论；事件涉及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以及李立三、王明“左”倾错误对党的建设的影响等方面，有的研究还比较深刻。

尽管如此，以往对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研究还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研究，虽然面广量也不少，但缺乏系统性、逻辑性、全面性。在《中央苏区党的建设》问世之前，以中央苏区党的建设为专题研究对象的论著十分欠缺，往往是在谈别的问题时带出来的。如在论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人的生平和思想时涉及，在研究党史和党建史中涉及，在研究某一文献或会议时涉及，等等，这就暴露了这方面研究的缺陷。《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问世，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中央苏区党的建设被作为研究专题得以被重视。从总体上看，《中央苏区党的建设》是一本以专题研究的形式、以反映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为主、而以历史线索反映党的建设为辅的综合性专著。而从历史的线索专门反映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论著尚无，因此，我们在研究以上情况后，确定以党史发展的脉络为主线，系统地对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二，对中央苏区党的建设既然缺乏历史线索为主体的研究，势必会造成研究中的许多空白点和盲点。如对中央苏区与党的建设有关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献等研究得较多，而如红四军“八大”、中央“八月来信”、“寻乌调查”、“赣南会议”、苏区党政关系、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等与党建有关的事件或会议则被忽略。这是不利于把握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理论的来龙去脉的。

第三，对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研究，往往视野不宽，常常局限

于一事一议，尚未能完全站在全党的高度和时代的高度来审视中央苏区时期的党的建设。

鉴于上述情况，本书在吸收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在体系上以历史线索为主线，以重大事件、重大会议、重要名篇名著的发表为点，以全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为面，把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置于当时特定的全国大环境和背景中来考察，试图以崭新面貌，反映和揭示出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历程，认识和了解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全貌，主要的特点有三个方面：

第一，把握苏区党的建设发展变化的历史线索，揭示不同阶段党的建设的内在联系。研究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自然要以历史为主线，力求反映出中央苏区时期各个阶段党的自身建设状况，党的建设的主要成效和经验教训。本书在体系的布局安排上，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从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前当地党组织的发展状况到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后军队和地方党的建设的展开；从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建党思想初步形成到中央苏区的形成、巩固，党的建设的进一步展开，再到“左”倾错误对苏区党的建设的危害直至中央苏区的丧失。本书除了全面叙述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建设的大线索之外，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党的建设的具体状况也进行有联系的分析。同时，对苏区时期的有关党的建设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也展开评述。

第二，将苏区时期党的建设历史的考察置于党的整个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之中来进行分析，特别注意分析党的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对党的建设的影响。发生在中央苏区时期的与党的建设有关的一些重大事件，本书都作了介绍和评析。例如：中共红四军“七大”对党内分歧的调和处理；红四军出击闽中、东江失利与党的建设教训；中央“九月来信”和古田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中央苏区中央局的成立及其对党的建设的影响；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

大会有关党的建设的思想；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及其对党的建设的破坏；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对党的建设的影响；李立三、王明“左”倾错误对党的建设的危害等，本书都作了较为客观的阐述和分析。

第三，历史地看待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建设，对其基本状况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以期反映出苏区党的建设的真实概貌。关于中央苏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的历史评价问题，本书比较客观公正，既指出其存在的“左”的方面的主要错误，即在很大程度上贯彻了王明“左”倾错误主张，但也肯定了它对党的建设的某些积极作用，如在健全支部工作，加强党内教育上，提出了一些积极主动的思想。又如中央苏区的党政关系问题。本书肯定了党的领导作用，但对中央苏区党政关系的状况分析，注意把中央层和地方、基层区别开来，认为在中央苏区的最高党政领导机关党政职能关系是理顺得比较清楚的，贯彻了“党政分开”的原则；而地方和基层的党政关系则存在“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由党包办一切”的现象。本书还对地方、基层党政不分的状况探讨了原因，这种分析比较全面，有一定的新意。

第一章

赣西南、闽西党组织的建立、恢复和发展

第一节　赣西南、闽西党组织的建立

中央苏区全称中央苏维埃区域，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创建的最大一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中央苏区位于江西省西部、南部和福建省西部，历史上一般把这个地区称为赣西南、闽西。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赣西南和闽西包括：赣南的赣县、于都、信丰、兴国、会昌、安远、寻乌、龙南、定南、全南、宁都、瑞金、石城、大余、南康、上犹、崇义；赣西的吉安、泰和、吉水、永丰、安福、遂川、万安、永新、宁冈、莲花；闽西的长汀、上杭、永定、武平、连城、清流、宁化、归化（今明溪）、龙岩、漳平、宁洋（已撤销建制）。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这个区域中孕育诞生的，其中的一部分构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辖区。此外，赣东、赣中的一些县，闽南、闽北的一些县，也是中央苏区范围所及的县份。由于在中央苏区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红军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因而其区域范围随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时大时少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

赣西南和闽西具有明显的亚热带特色，温暖多雨，物产丰富，但都地处偏僻，境内崇山峻岭纵横，交通闭塞，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里的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劳苦工农素有反抗压迫的革命传统。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在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等多次大规模的革命风暴中，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悲壮的斗争。但是，由于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些斗争虽然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封建阶级的反动统治，但结果都遭到失败。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也波及到赣西南和闽西地区。一批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积极提倡民主和科学，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随着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在北京、上海、广州、福州、南昌、厦门等大中城市读书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回乡同工农群众结合，成立革命组织，传播马列主义。各种革命团体的创建和马列主义的传播，为赣西南和闽西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好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一、赣西党组织的创建及早期发展

赣西南最早的共产党员，是吉安青年知识分子罗石冰、曾延生等人。罗石冰、曾延生同是江西省立第七师范（简称“吉安师范”）的同学。为了追求革命真理，他俩于1921年下半年进入了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在该校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他们两人进步都很快，罗石冰于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延生也于1923年入了党。他俩入党后就以吉安师范为中心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发展党团组织。由于吉安师范是他们的母校，校长李松风又是靠拢革命的国民

党左派分子，经常和罗、曾保持密切联系，同时，考入吉安师范的学生大多数是农村劳动人民的子弟，从小便受到封建地主豪绅的压迫剥削，渴望接受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就为罗、曾在吉安师范传播马列主义，创建党团组织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此，他们不仅经常把一些党的刊物，如《向导》、《中国青年》等从上海寄到吉安师范，而且罗石冰还经常由上海秘密回到吉安，在吉安师范的先进知识分子中进行广泛深入的革命宣传和组织进步青年的革命团体。当时他们就成立了由吉安师范进步学生组织的吉安青年学会，出版《吉安青年》，开办吉安书店、平民夜校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教育，遂于 1922 年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吉安师范小组。以后又在阳明、六中、吉州等中学播下了革命种子，为吉安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后来，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革命影响，罗石冰、曾延生又利用时机，深入农村进行个别串连，宣传革命真理，培养建党建团对象；同时还在吉安县城中创办业余夜校，秘密组织工会，使马列主义迅速地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为党在吉安的成立作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3 年革命知识分子陈正人、梁一清、梁明哲等在吉安师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罗石冰的发起下，于同年 8 月秘密成立了中共吉安师范小组。随后又在阳明、吉州等中学吸收了革命知识青年陈国华、陈定华、谢贤仕和康晓等同志入党。这是赣西最早成立的党组织。

1924 年 2 月，共青团南昌地委派曾弘毅到吉安，5 月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吉安特别支部。同年春，罗石冰回到家乡，在吉安县塘东义仓“九小”吸收革命知识分子胡庭铨、李景云、郭家庆、刘书田等人入党，并于是年 11 月成立了中共延福支部。以后他们便以义仓“九小”为中心，积极扩大组织，秘密发展党员，使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党组织相继建立。1925 年“五卅”惨案后，党中央又派罗石冰回到吉安主持党的工作，成立了吉安区委会，罗石冰

任书记。在吉安区委的领导下，不仅在各地农村建立了许多基层党组织，而且在吉安城内也先后成立了以工人为主的党支部和以学生为主的党支部。这样，到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为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共吉安特支组织党员分赴赣西各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至1926年底，全赣西共有吉安、永丰、万安、泰和、莲花、永新、吉水、安福8个县建立了23个支部和4个中共小组。1927年初，中共吉安特支升为中共吉安地委，受中共江西区委领导，这进一步促进了赣西党组织的蓬勃发展，加强了党对赣西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前，赣西除新淦、峡江两县外，其余各县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共有23个支部和特别支部、1个区委、2个正式县委、1个临时县委和3个小组。

二、赣南党组织的建立和早期发展

赣南最先入党的是兴国籍的袁玉冰，他于1922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1926年，兴国县的陈奇涵、鄢日新，南康县的朱由铿、陈赞贤，寻乌县的古柏、刘维，信丰县的肖风鸣以及赣县的周勉、陈家纪等一批在广州黄埔军校及在武汉、梅县等地学习的先进青年，也先后加入共产党组织。这些赣南最早的党员不仅经常向家乡的先进青年寄送进步书刊，创办《寻乌杂志》等革命刊物，广泛传播马列主义，而且还积极组织学生会、农会、工会等革命群众团体，向广大进步青年和工农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培养建党建团对象，这就为赣南党、团组织建立奠定了初步的组织和思想的基础。

1926年6月，为了加强赣南党的工作，推动工农群众运动，迎接北伐军的到来，中共江西地委派朱由铿、曾天宇到赣南秘密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与此同时，在黄埔军校担任军事教官的共产党员陈奇涵，也接受党组织派遣，以国民党赣南、赣东特派员的公

开身份，率领黄埔军校学生肖韶、钟友千、肖以佐、陈奇洛、鄢日新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曾燕棠等共产党员回赣南、赣东一带开展工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6期毕业的20余名江西籍共产党员，也先后被派回到赣南等地工作。在北伐军中担任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陈赞贤，经中华全国总工会指派，前往赣州开展工人运动，而共产党员朱由铿此时也由南昌来到赣州开展学生运动。除此之外，赣南还有在一些外地工作和求学的共产党员，如寻乌的古柏、刘维，兴国的胡灿、谢云龙，南康的廖贵潭、蓝广孚，赣县的周勉、陈家纪，信丰的肖风鸣等，也都纷纷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斗争。同年8月，朱由铿、陈赞贤在赣州与在上海入党回乡进行革命活动的谢学琅取得联系，建立了中共赣州支部，朱由铿任书记，隶属中共江西地委领导。

1926年9月，北伐军攻占赣州城后，陈奇涵、肖韶等随军到达赣州，与中共赣州支部一起在赣州城内光孝寺召开党的会议，成立了中共赣州临时县委，肖韶为书记。10月上旬，经江西省委决定，赣州临时县委改为赣州特别支部，陈赞贤任书记，此后，赣南各县大多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梁郁华、赖传珠等成立了赣州县委；陈奇涵、鄢日新、胡灿等成立了兴国县委；廖贵潭、蓝广孚等成立了南康县支部；肖风鸣、黄维汉等成立了信丰县支部；丘倜、戴辉等成立了于都县支部；陈选雍、邓子恢、黄一凡等成立了崇义县支部；古柏、刘维、刘维锷等成立了寻乌县支部；韩耿等成立了大余县支部；上犹县也成立了支部；宁都、瑞金、安远等县也在1926年秋冬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1927年1月，中共赣州特支升为中共赣州地委，下辖7个支部、1个特支、1个中心支部。中共赣州地委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赣南各地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推动了工农革命运动的迅猛前进。赣南各县农会会员达到30余万人，开展了“减租减息”、“废除高利盘剥”的斗争。赣南重镇赣州，全市成立了56个基层工会和赣州市总工会，拥有会员18000余人、工人纠察队500多

人。在工人阶级的坚决斗争下，在大多数行业中都签订了以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劳动条件、保障职业为主要内容的劳资合同，因而博得了“一广州、二赣州”之誉。

三、闽西党组织的创建和早期发展

闽西党组织的建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开始在闽西大地传播。一部分进步知识青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和革命刊物，从而逐步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转而接受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些闽西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组织进步书社、读书会，更加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并积极创办进步刊物，建立平民学校，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当时闽西最早成立的进步书社是1921年春邓子恢、陈明等人在龙岩组织的奇山书社，购买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等许多进步书刊供社员阅读。以后还出版了《岩声》，这是闽西乃至福建全省传播马列主义时间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革命刊物。其他还有1925年9月进步知识青年罗大准、郭尚屏、雷之明、邱天绵等人组织的上杭青年读书会，出版了不定期的油刊刊物《幻灯》；1925年冬长汀进步知识青年谢秉琼、胡轶环、吴炳若等人发起成立汀雷社，并于翌年3月出版了《汀雷》。当时闽西各地还先后出现了《新龙岩季刊》、《曙汀》、《长汀月刊》、《莲钟月刊》、《改进》、《突击》、《虹痕》、《奋斗》、《赤花》、《雷鸣》等传播马列主义的进步刊物。此外，谢景德、林初元在龙岩适中，蓝维仁、蓝为龙在上杭庐丰，邓子恢、郭滴人在龙岩白土，张鼎承在永定金砂都创办了平民学校，对劳苦群众及其子女既传授文化知识，又宣传革命思想，启发了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这些活动为后来闽西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准备了干部力量。

192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组织，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导和推动下，闽西许多在外地求学或从事社会工作的先进知识青年在各地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先后在不同地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闽西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据不完全统计，就有五六十人。这些同志在外地加入共产党后，除少数继续留在外地，大多数受党组织的派遣，陆续回乡进行革命活动。他们直接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宣传马列主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城市，做工人运动工作，组织建立工会、领导工人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农村，做农民运动工作，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开展“二五”减租、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同时他们秘密发展党员，积极建立基层的党组织。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仅短短 3 个月就占领了福建全省，乘此有利时机，闽西各地党的组织便迅速建立发展起来。

闽西最早创建的党组织是永定支部。1926 年夏初，阮山、林心尧由厦门党组织派回家乡永定湖雷乡，在湖雷乡羊头村的万源楼，与赖秋实等组织建立了中共永定支部(亦称湖雷支部)，阮山任书记。同年 11 月，胡永东由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回乡，与厦门集美学校回乡的陈正、曾牧春等人在下洋公学建立了中共永定金丰支部，胡永东任书记。翌年 10 月，在永定已成立有湖雷、金丰、溪南、太平等支部，在此基础上，遂召开中共永定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永定县委，罗秋天任书记。

1926 年 12 月，温家福、雷三明分别从广州和海陆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回乡，相继发展了罗大准、吴梅林入党后，在上杭城关学坪里成立了中共上杭支部，书记是温家福。翌年 1 月，支部扩大后，改为林心尧任书记。1928 年 1 月，中共上杭临时县委在庐丰成立，同年 3 月，中共上杭县委正式成立，郭柏屏任书记。

1926 年 12 月，朱积垒从广州回乡后吸收了陈彩芹、朱赞相、

罗育才等十几个骨干分子入党，建立了中共平和支部，朱积垒任书记。次年9月，经省委批准，成立中共平和临时县委，朱积垒仍任书记。

1927年1月，中共龙岩县总支委员会成立。它是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陈庆隆、郭滴人、陈文韶等人于1926年11月回乡后组成的龙岩党小组的基础上发展建立的，陈庆隆任书记。同年11月，中共龙岩临时县委在后田衍新小学建立，罗怀盛任书记，郭滴人为组织部长，邓子恢为宣传部长。

1927年9月，中共长汀特别支部成立。它是南昌起义部队入汀后帮助组建的，书记是段奋夫。1928年6月成立中共长汀临时县委，书记仍为段奋夫。中共武平特别支部成立于1927年10月，它是在前一年10月城关建立党小组的基础上扩大发展的，书记钟武。翌年12月，中共武平临时县委建立，练文澜任书记。1927年冬，中共良坑党支部成立，书记俞炳荣。1928年6月，在庙前成立中共连城临时县委，书记官近玖，县委辖7个支部。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闽西各县的上述党组织，当时都属于1927年1月成立的闽南特委领导。以后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1928年7月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建立，从此闽西各县党组织有了自己的统一核心领导。闽西党组织的相继建立和发展，有力地加强了党对闽西革命斗争的领导，使闽西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迅速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闽西大地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局面。

第二节　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与赣西南闽西党组织被破坏

一、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赣西南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1927年春夏，正当北伐军胜利推进，工农革命运动在大江南北蓬勃发展的时候，混杂在革命阵营中的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背弃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人民，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而赣西南党组织首当其冲，遭到严重破坏。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占江西南昌后，蒋介石设总司令部于南昌。为实现其篡夺国民党中央领导权的阴谋，扼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他一方面于1929年1月盗用国民党中央名义向各省党部发出电报，称“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住南昌”，并亲赴武汉，逼国民党中央迁都南昌。在遭坚决拒绝后，才被迫表示承认中央关于国民政府迁武汉的决定。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封建买办势力的鼓励与支持下，他撕下革命伪装，悍然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举起屠刀。1927年3月6日，他指使其爪牙——驻赣州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国民党代表倪弼，派兵封闭赣州总工会，将原任中共赣州特支书记，后任赣州总工会委员长的陈赞贤诱捕至赣县公署。陈赞贤身中18弹，壮烈牺牲。赣州“三六惨案”，是蒋介石加紧反革命步伐的一个信号。此后，蒋介石更是凶相毕露，走一路，杀一路，从赣州沿江而下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一直杀到上海，无数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之中。在蒋介石赤裸裸地举起反革命屠刀后，赣西南各地反革命事件接踵而来。永丰县的反动头目刘儒揖、宋居仁等，在陈赞贤被杀害的

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纠集一批流氓打手，包围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县党部、县总工会和县农民协会，逮捕了共产党员袁振亚、钟兆祥等。莲花、遂川的土豪劣绅在蒋介石发动“清党”后，袭击了工会、农会组织，另组国民党县党部。遂川县党组织领导人肖万燮（后叛变）、罗风鸣、李正芸等人被捕。泰和县反动派也逮捕了共产党人康纯、翁德阶等。

1927 年 3 月 26 日，蒋介石到上海，开始精心策划反革命政变。4 月 11 日，蒋介石发出密令，“已克复各省，一致实行清党”。12 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上海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就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 年 5 月，蒋介石为了全力扑灭赣西南各地的革命火焰，又调刘士毅旅进驻赣西万安进行“清党”，调钱大钧率第十五、第二十两师部队到赣南各县“清党”。“清党军”到赣南后，按照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电令，于同年 6 月 21 日成立了“国民党赣南特别委员会”，接着成立了“国民党赣南清党委员会”。赣南各县也成立了“清党”机构。“清党军”和“清党委员会”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骨干，封闭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1927 年春后任中共赣州地委书记的张世瞻、朱由铿都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中共赣州地委于 1927 年 7 月间被迫停止活动，兴国、于都、宁都、上犹、大余、崇义、赣县、龙南、南康、信丰等县的党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下，有的被迫停止了活动，有的则转移到外地或农村，分散隐蔽，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在赣西，刘士毅旅的“清党军”也进驻了各县，疯狂捕杀中国共产党员和广大工农革命骨干，封闭工会、农会，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整个赣西白色恐怖密布笼罩。1927 年 7 月 15 日，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展开了疯狂的大屠杀。至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被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抛弃，第一次国共合

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终告失败。同年8月6日，国民党吉安警备司令朱世贵杀害了共产党员、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封闭了吉安的革命团体。共产党员李文林、赖经邦、曾炳春等，都分别撤离吉安，转移到东固、延福等农村山区，开展秘密活动，坚持革命斗争。在此前后，赣西各地的党组织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摧残，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逮捕杀害，工农革命运动走向低潮。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赣西南各地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奋起反击，英勇斗争。1927年7月中旬，赣西的永新、宁冈、莲花三县的农民自卫军，联合攻占了永新县城，解救了被囚禁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月29日，万安农军和工人武装在遂川工农群众的配合下，攻取遂川县城，救出了遂川反动派准备加以杀害的11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样，万安、莲花、遂川等县的工农革命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都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恢复了被反动派严重摧残的革命组织，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但是，由于反革命势力的暂时强大，加上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领导，推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放弃党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致使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革命归于失败，赣西南党组织和全国各地一样，受到严重的破坏，革命力量遭受极大的损失，革命形势由此陷入低潮。但革命的影响已深入人心，埋藏的炽烈革命火种终将爆发。

二、反革命势力猖狂反扑，闽西党组织受到严重摧残

1927年4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开展“清党”的决议。10天后，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此之后，蒋介石便指示福建国民党右派开展“清党”。闽西的土著军阀郭凤鸣、陈国辉等随即

致电蒋介石，表示“拥护清党”，愿统带所属听候驱驰，严惩逆党。他们的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先后在龙岩、永定、上杭制造了“四·一五”、“五·五”和“五·七”反革命事变，使闽西党组织遭受严重摧残。

1927年3月，龙岩地主豪绅官僚代表杜连茹、郑笔山、李跃云等相互勾结，组织了反共核心团体——三民实进会，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纠集右派分子等反动势力，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岩平宁政治监察署及国民党龙岩县党部相对抗。他们不但围殴国民党左派人士，反对农民减租减息的斗争，还派出郑笔山到南昌谒见蒋介石，当面接受其反革命指示。随后，他们召开了“拥蒋护党”大会，叫嚣“一致拥护蒋总司令”，惩办“跨党”分子，并向蒋介石发了通电。蒋介石闻讯后，十分高兴，特从南昌发电嘉慰。同年4月15日，以杜连茹为首的龙岩国民党右派分子、土豪劣绅纠集流氓、地痞、党棍，组织反革命示威游行，并企图攻打岩平宁政治监察署。接着杜连茹又指使手下流氓，利用回乡农民对政治监察署烧神砸庙的不满情绪，煽动不明真相的农民，包围捣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掌握的县党部和政治监察署。次日，他们又与龙岩国民党驻军罗步月、黄同波同谋，进行清党反共的罪恶活动，逮捕了陈国华、魏吾、廖昌泰、倪天长、谢国鑫、朱文昭6人，强行解散县城内的各级工会、各区区党部和农民协会，共产党员郭滴人、邓子恢、陈庆隆等13人遭通缉，白色恐怖顿时笼罩龙岩城。这就是龙岩“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在此情势下，由中共龙岩支部主持，政治监察署、县党部、县农协人员当即开会，决定所有人员立即撤离龙岩县城。中共龙岩支部撤往考塘村，组织共产党员转入农村坚持斗争。

在永定，国民党右派分子于5月5日召开所谓“永定县各界庆祝国府迁都南京恢复党权大会”，并发表大会宣言，宣布拥护“国民政府建都南京，铲除共产，肃清叛变分子”。随即在永定进行“清党”，通辑中共永定支部书记阮山、县农民协会负责人胡永东、赖玉

珊等。国民党永定县党部被捣毁，县工会、农会等革命群众团体以及左派控制的国民党区党部、区分部均被强行解散。反革命气焰一时甚嚣尘上。中共永定党组织由于及时得到中共闽南部委书记罗善培的指示，当即转入了地下活动，因而未受到大的损失。与此同时，被国民党右派控制的连城县党部于5月22日召开"拥蒋护党大会"，并发出代电，要求蒋介石"继续努力、贯彻初衷"，反共到底。漳平的国民党右派也于5月23日召开所谓"漳平各界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恢复党权大会"，宣布"拥蒋护党"反共，通缉拘押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在龙岩发生"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后，上杭的土豪劣绅邱信孚、国民党右派分子林履绥、詹忠胜、葛肖盘、郭兰、陈维纲、郭元光、黄清兰、邱秀光、温友文等加紧了反革命阴谋活动。邱信孚、邱秀光出巨款，勾结上杭驻军蓝玉田部参谋长刘炳坤、杭丰公安局长葛新铭向上杭革命势力发难。

1927年5月7日，刘炳坤趁驻军司令蓝玉田奉命率部进驻长汀，大权在握之机，悍然下令，从本日起任何组织不准集会，不准游行，准备"清党"。国民党上杭县党部自成立后，领导权一直掌握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手中，对刘炳坤的这一反动命令不予理睬，当日下午组织革命群众将邱信孚、林履绥等游街示众。当时，县总工会准备夺取杭丰公安局的枪支，武装工人纠察队，以应付事变。但却走漏了风声，计划不及实施，反革命势力便抢先下了毒手。晚10时，刘炳坤调动一个营的兵力和杭丰公安局全部警察，包围了汀属政治监察署、县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汀属八县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以及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机关、团体的驻地，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当场被抓走的有：县党部执委会委员张楷，干事张友明、蓝惠元、包喜孚、傅岩生；总工会常委周继英；县农民协会常委包究生等人。张楷被押到驻军司令部门前，就惨遭杀害。周继英、包究生被严刑拷打后，于翌日在县城南门码头同遭杀

害。国民党右派还残忍地将两人的头颅砍下，悬挂在南门城楼上示众三天。张友明、蓝惠元、傅岩生、包喜孚等人则被关进监狱。随后，汀属政治监察署、汀属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及国民党上杭县党部被封闭，县总工会、农民协会等团体被强行解散。当时，中共闽南部委书记罗善培正在县城北门刘国柱家召开中共上杭支部会议，会议当即决定，所有党员转入地下活动。汀属八县政治监察员、养成所所长谢秉琼和训育主任林心尧立即转移到武平，视局势发展再决定下一步行动。5月8日，反动军警得知消息往武平追捕，谢秉琼逃脱，林心尧被捕，随即被杀害。上杭"五·七"反革命事变后，长汀县党部亦为国民党右派分子所占据，党部书记刘光明被迫出逃，工会、农会和学生会等革命群众团体也被强行解散。一时之间，闽西大地白色恐怖笼罩，反动势力极度嚣张，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残酷屠杀，党组织受到严重摧残，革命陷入低潮。

但是，闽西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没有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在中共闽南特委的领导下，闽西的共产党员有计划地转移到广大农村，进行更加深入的隐蔽斗争。1927年4月底，龙岩的共产党员陈庆隆、郭滴人、张双铭等，深入西山、东山、湖邦、东肖、铜钵、大池、小池等地，团结原农会积极分子，组织秘密农会，抵抗反动派抓人罚款，开展"二五"减租斗争。与此同时，经过以连洛珊为主席的龙岩旅外救乡会的合法斗争，福建省党部接受连洛珊的推荐，派陈雪琴为龙岩县党部指导员，苏庆云为县党部常务委员，回龙岩改组被右派把持的国民党县党部。在上杭，林心尧牺牲几天后，谢秉琼到长汀，将上杭"五·七"反革命事变的情况告知蓝玉田，争取了蓝玉田的同情和支持。随即蓝玉田以调防为名，将捕杀林心尧的独立连全部缴械，处决了反动连长，紧接着，又将其参谋长刘炳坤驱逐出境。同时，中共上杭支部由蓝维仁负责，对党员积极分子的工作进行了安排。傅柏翠回蛟洋，蓝维仁、蓝为龙到庐丰，李立民去丰稔，陈涛到水西渡，深入农村，在农民中积极开展革命

宣传工作，组织农民协会，坚持革命斗争。在长汀，广州中山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吴炳若从广州回到家乡，以省立第七中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总之，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闽西党组织逐步认识到开展农民运动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在全国革命转入低潮时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进行艰苦细致的组织发动农民的工作，率领革命群众拿起武器，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的斗争，为迎接新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

第三节　“八七”会议后地方党组织的恢复与武装斗争的开展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反革命统治，实行白色恐怖，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由原来的6万多人骤减到1万多人。面对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和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下，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批判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同时，为了适应新的斗争环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定党的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并具体规定了党在秘密状态下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其基本要求是，实行“最大限度的集权”和“党内的民权主义”①。改正党在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建立“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页。

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①。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中共赣西南、闽西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迅速恢复了遭受严重破坏的地方党组织，并领导了英勇卓绝的革命武装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一、赣西南党组织的恢复与武装斗争的开展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江西省委于1927年9月制定了《秋收暴动煽动大纲》和《秋收暴动计划》，决定在全省各地组织秋收暴动。为便于加强对各地暴动的组织领导，10月间，江西省委对全省党组织按秘密工作的原则进行了整顿，决定将全省划分为赣西、赣南、赣东、赣北四个特区，分别建立特委。依照省委的决定，中共赣西、赣南特委随即分别在万安县城和赣州正式成立。赣西特委初由曾延生任代表，11月后改为袁孟冰任书记。赣南特委由汪群任书记。

赣西、赣南特委成立后，便立即着手整顿恢复各县的党组织。在赣西，经过努力，原有各县党组织都先后恢复。万安、吉安、遂川三个县成立了县委，泰和、宁冈、永丰三个县则建立了区委。在赣南，特委成立后不久，即指导建立了中共赣州县委，负责领导赣州城内和赣县农村党组织。1927年冬，南康成立了中共临时县委，信丰成立了中共区委。1928年1月，又建立了中共于都临时县委。2月，中共信丰县委正式成立。在此前后，兴国、崇义两县成立了中共特支，安远、宁都等县的党组织也恢复了活动。赣西南地方党组织的恢复，为党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27年12月，中共江西省委印发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铲除机会主义》的小册子，正式向各地党组织传达了“八七”会议的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30页。

精神，要求各地尽快举行年关暴动。与此同时，省委决定在赣西南和赣东北两个地区分别建立武装割据区域。赣西南武装割据区域，包括整个赣西、赣南和湘赣边界的部分地区。为了统一和加强对赣西南武装割据斗争的领导，江西省委于1928年1月10日召开常委临时会议，决定撤销原已建立的中共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委，还决定在特委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对赣西南所有的工农武装部队实行整编，统一指挥。根据省委的决定，中共赣西南特委于1928年1月上旬成立，王维宪任书记。2月王维宪去中央汇报工作后，改由江西省委常委宛希俨继任书记。赣西南特委下辖有5个正式县委、2个临时县委、4个区委和特区委、2个特支，另有4个县也有党的活动。

1928年2月，江西省委又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制定了《江西全省总暴动工作计划》，将全省划为西南、西北、东北、赣东、南路五个暴动区，以西南区为全省总暴动的爆发点，西北、东北为重要响应区域，再次为赣东、南路，目标是推翻江西反动统治，取得全省政权。遵照江西省委制定的暴动计划，在中共赣西、赣南特委和后来成立的赣西南特委及各县党组织的领导下，从1927年冬至1928年春，赣西南地区先后爆发了万安暴动，吉安东固、延福暴动，南康潭口暴动，赣县大埠暴动，信丰暴动，于都里仁、步前、桥头暴动，寻乌暴动等。这些工农武装暴动，虽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都先后失败了，但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坚定决心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斗志，并给国民党在赣西南的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在此期间，由于1928年1月万安暴动的失败，万安、泰和、遂川等县的党组织遭受严重摧残。为适应这一变化的形势，同年2月下旬中共江西省委决定撤销中共赣西南特委，在赣西南地区分别建立中共赣南特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吉安县委。1928年3月初，中共赣南特委在赣州恢复，曾延生任书记。正当赣南特委全力以赴领

导各县工农武装暴动之际，特委秘密机关被赣州国民党军独立第7师刘士毅部发觉，致使正在赣州指导工作的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原赣西南特委书记宛希俨和赣南特委领导人曾延生、陈俊魁、蒋兢英等12人被捕牺牲。南康、于都、信丰、赣县、寻乌等县的党组织领导人和广大党员也因暴动失败而被迫分散隐蔽，暂停活动。同年4月，江西省委又派汪群到赣州，恢复特委组织，并任中共赣南临时特委书记。赣南临时特委成立后，汪群即设法与南康、于都、信丰、兴国等县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帮助各县重新恢复遭严重破坏的党组织，积极开展革命斗争活动。不幸的是，同年10月赣南临时特委机关再次被国民党破坏，汪群被捕壮烈牺牲，赣南特委被迫再度停止活动。1928年底，赣南各县党组织领导人自动在于都县步前冈集合，商议恢复特委组织，推举杨柳春任书记。此时，赣南特委下辖于都、信丰、崇义、安远4个县委，兴国、南康唐江、大余县西华山矿区3个区委，以及于北特区委、兴万赣边特区委、大余县工委等组织。

在恢复中共赣南特委的同时，根据江西省委的决定，还新成立了湘赣边界特委和扩大了吉安县委。1928年4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正式成立，辖有宁冈、永新、遂川、莲花、酃县等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5月下旬，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特委委员、常委，毛泽东当选特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原已成立，从1928年3月起，依照省委指示，扩大管辖范围，领导吉安、吉水、乐安、永丰、新余、峡江、安福等县的党组织。同年5月，吉安县委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组织严重受损。6月，重新成立了中共赣西特委，管辖原吉安县委领导的党组织。

这样，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中共赣西南党的指导机关及各县的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后虽屡遭破坏，但又迅即重建成立，并领导开展了英勇卓绝的革命武装斗争，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在赣西南的反动统治。它一方面表明中共

赣西南党组织具有坚强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和建立“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有力地促进了赣西南党的建设。

二、闽西党组织的恢复与工农武装起义

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闽西党组织也受到摧残破坏，但由于领导的警惕性较高，作了应变的准备，因而各地党组织和大部分党员都巧妙地保存下来，并进行了一些巩固组织的工作。1927 年 8 月 1 日，周恩来、贺龙等领导北伐部队 3 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同年 9 至 10 月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闽西时，周恩来等又对闽西党组织的恢复和武装斗争开展作了重要指示，使闽西各县党组织很快先后恢复活动。1927 年 10 月，中共永定县委正式成立，罗秋天任书记。至 1928 年 7 月全县党组织发展到 5 个区委、2 个特委。11 月，中共龙岩临时县委建立，罗怀盛任书记。1929 年 2 月，龙岩召开全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龙岩县委，支部发展到 40 个。上杭县党组织恢复活动后，于 1928 年 1 月成立中共上杭临时县委，郭柏屏任书记，下辖 8 个支部。至 1929 年 4 月，上杭全县建立区委 4 个、支部 30 余个。长汀县继 1927 年 9 月成立中共支部后，1928 年 1 月建立中共长汀特支，1929 年 3 月又成立了中共长汀临时县委。连城于 1928 年 6 月成立了中共连城临时县委，书记官近玖，下辖 3 个支部，到 1929 年 3 月发展到 7 个支部。中共武平临时县委于 1928 年冬成立，由练文澜任书记，辖 6 个支部。平和县于 1927 年 10 月成立中共临时县委，朱积垒任书记，下辖 5 个支部。闽西各县党组织的恢复，有力地加强了党对闽西革命武装斗争的领导。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于同日对中共闽南临时特委（当时闽西各县党组织属于闽南特委领导）作了重要指示，

强调指出："我们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组织农民，如何武装农民，使他们能够自己起来用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① 同年12月，陈明受中央之命在厦门召集了闽南闽北临委和各县负责同志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陈明任书记。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和中共"八七"指示，制定了领导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夺取政权的总任务。在党的"八七"会议的号召和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直接领导下，闽西各县党组织坚决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福建省委的指示，掀起了闽西革命武装斗争的洪流。1928年3月，龙岩白土后田农民在以郭滴人、邓子恢为首的中共龙岩县委的领导下，举行武装暴动，揭开了闽西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打响了闽西也是福建工农武装起义的第一枪。紧接着，平和长乐暴动、上杭蛟洋暴动、永定湖雷与金峰暴动相继爆发，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闽西的反动统治，极大地鼓舞了闽西革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坚定信心和革命斗志。同时通过这些暴动，闽西党组织在各地建立了工农革命武装，并在永定暴动后进行了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各地武装暴动的领导，发展暴动后的革命形势，1928年7月，遵照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指示，中共永定、龙岩、上杭、平和四县县委推派代表，在永定溪南召开会议，成立闽西共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共闽西特委，由郭柏屏任书记，张鼎承任组织部长，邓子恢任宣传部长（1929年1月，邓子恢接任特委书记职务）。会议还宣布成立闽西暴动委员会，由福建省委代表王海萍任总指挥，张鼎承、邓子恢、傅柏翠任副总指挥，统一领导闽西地区的工农武装斗争。闽西暴动委员会成立后，即将闽西各县武装暴动后建立的游击队、赤卫队，统一整编为福建工农红军第

① 《中共中央致闽北闽南临委信》，1927年8月7日。转引自《闽西革命根据地史》，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19师，下辖55、56、57三个团。中共闽西特委和闽西暴动委员会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对各地武装暴动的统一领导，根据敌人不断进行“清剿”的形势，决定各处部队就地坚持斗争。

在积极领导各地武装斗争的同时，中共闽西特委还进行了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1928年8月，在邓子恢、张鼎承等领导下，溪南区召开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溪南区苏维埃政府，由廖德修任主席，接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分配土地的工作。在分田斗争中，邓子恢、张鼎承深入金砂进行调查研究搞分田试点。最后集中群众的意见，采取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以乡为单位，依原耕土地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进行分田。这样，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全区13个乡的分田工作，给近两万人口分到了土地。闽西特委进行的这一伟大实践，不仅坚决贯彻了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总方针，为后来闽西苏区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而且由于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分得了土地，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投身革命斗争的积极性，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日益提高，党的建设也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加上当时闽西党在暴动的组织领导上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暴动的目标偏向于攻打反动势力盘踞的城市，闽西各地的农民武装暴动先后失败，各县党组织被迫再次分散隐蔽，以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1928年11月，闽西特委机关在永定遭到敌人包围袭击，特委书记郭柏屏后叛变革命，堕落为国民党特务，特委机关遂秘密迁往上杭。1929年1月，根据福建省委的指示，邓子恢接任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书记，继续领导闽西革命人民坚持斗争，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综上所述，中共赣西南和闽西的党组织，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坚持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上级的指示，使组织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并领导了各地的工农武装暴动。这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反

动统治势力，提高了革命群众的阶级觉悟，鼓舞了斗争的勇气，而且经受了革命武装斗争的血与火的考验，得到了发展。到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时，赣西、赣南和闽西不仅成立了中共赣西、赣南和闽西特委，而且所辖各县几乎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者有党的活动。其中有10个县正式建立了县委，5个县建立了临时县委，4个县建立了区委，1个县建立了工委，4个县成立了特支，另外还建立了两个边界特委。因此，虽然由于当时整个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敌我力量悬殊和缺乏斗争经验，加上"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和干扰，使赣西南、闽西的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工农武装暴动屡遭破坏和挫折，但具有坚强战斗力和组织力的党组织在急风暴雨的群众革命斗争中还是愈战愈强，不断发展壮大。在暴动的基础上产生的游击队和正规红军，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战，从而使梅花形的游击区逐步发展为相互联结的大片割据区域，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这就揭开了赣西南和闽西地区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所有这一切，都为不久以后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开辟创建中央苏区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基础。

第四节 早期地方党组织建设的经验教训

（一）重视马列主义的传播及其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为创建中共赣西南、闽西地方组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因此，要创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除了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外，主观上还必须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从中国的具体国情来说，前者表现为反帝反封建历史重任的呼唤，后者表现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农群众的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客观规律，同样也是赣西南、闽西党组织孕育并建立的重要经验。

如前所述，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赣西南、闽西的人民也踊跃地投入了这一战斗的行列。一些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努力探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开展，一些来自赣西南、闽西地区而在外地求学或从事社会工作的先进知识青年，如赣西的罗石冰、曾延生，赣南的陈奇涵、鄢日新、肖风鸣、朱由铿、陈赞贤、古柏，闽西的邓子恢、陈明、罗大准、谢秉琼、郭滴人、张鼎丞、阮山等人，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接受了马列主义，树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组织。他们在入党后，受党组织派遣，纷纷回乡，大力传播 马列主义，出版了《吉安青年》、《万安青年》、《寻乌杂志》、《岩声》、《幻灯》、《汀雷》、《虹痕》、《奋斗》、《赤花》、《雷鸣》等革命刊物，广泛深入地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并积极组织读书会、学生会、农会、工会等革命群众团体和创办书社、平民夜校、公学等，一方面向广大进步青年和工农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使马列主义迅速地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发动和领导革命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斗争中锻炼和培养建党建团对象，这就为赣西南、闽西党组织的建立作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正是在此基础上，赣西南、闽西各地的党组织相继建立，以后又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帮助和大革命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得到迅速的发展。因此，重视马列主义的传播及其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乃是中共赣西南、闽西党组织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

（二）坚持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总方针，使党的建设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这是赣西南、闽西党组织建设的又一重要经验。

根据马列主义的建党原理，党的建设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党的政治路线所规定的目标。它不能脱离党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路

线，而必须围绕着如何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在实现党的政治路线过程中实行。大革命失败后遭受严重摧残破坏的赣西南、闽西党组织能够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就充分体现和证明了这一点。

如上所述，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批判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总方针，决定在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

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赣西南、闽西的党组织根据上级省委关于工农武装暴动的计划和部署，领导开展了英勇卓绝的革命武装斗争，并逐步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在赣西南，从1927年冬到1928春，先后爆发了万安暴动，吉安东固、延福暴动，南康潭口暴动，赣县大埠暴动，信丰暴动，于都里仁、步前、桥头暴动，寻乌暴动等；在闽西，从1928年3月起，相继举行了龙岩后田暴动、平和长乐暴动、上杭蛟洋暴动、永定湖雷与金峰暴动等。这些工农武装暴动，虽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都先后失败了，但这些暴动，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赣西南、闽西的反动统治，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坚持革命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使党组织经受了武装斗争的严峻考验而进一步增强了组织力和战斗力，而且在暴动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农革命武装，开展了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从而使各地党组织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和号召力日益提高，党的建设具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党组织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时，赣西南和闽西不仅成立了中共赣西、赣南和闽西特委，而且所辖各县几乎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者有党的活动。在积极领导各地武装斗争的过程中，赣西南、闽西的党组织还从革命斗争的挫折中总结了经验教训，对革命的发展道路作了各种方式的探索，工农革命武装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战，使梅花形的游击区逐步发展为相应联结的大片割据区域，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土

地革命，这就揭开了赣西南、闽西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为后来中央苏区的开创奠定了基础。因此，坚持武装战争和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总方针，使党的建设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也是赣西南、闽西党组织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

（三）密切联系群众，坚持革命斗争，在群众革命斗争中不断巩固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这是由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密切联系群众，是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是党的政治优势和力量源泉。赣西南、闽西党组织在领导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加强党的建设的过程中同样十分重视这一点。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赣西南、闽西白色恐怖笼罩，党组织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革命陷入低潮。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恢复发展党的组织，掀起新的革命高潮，赣西南、闽西党组织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上级省委的指示部署，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卓绝的革命武装斗争。在领导各地工农武装暴动的过程中，各地党组织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恢复发展党领导的工、农、青、妇等革命群众团体，建立工农革命武装，一些地方还开展了抗租抗捐抗税斗争，烧毁地主豪绅田契、债约，破仓分粮，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鼓舞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加强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对武装斗争的领导，这就不仅为各地的武装暴动作好了充分的组织准备，而且使党组织在工农武装暴动的急风暴雨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进一步增强了组织力和战斗力，组织也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促进和加强了党的建设。在各地武装暴动先后受挫后，党组织又及时领导工农革命武装转入农村，坚持游击战争，开辟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这不但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百折不挠的革命斗志，揭开

了这些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而且使党组织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苦群众之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大批工农战士、革命群众踊跃地加入党的队伍。因此，尽管各地武装暴动的失败，使党组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失，但党组织并没有因为敌人的残酷镇压而瘫痪瓦解，相反在坚持农村革命游击战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以至当1929年春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时，中共赣西、赣南和闽西特委所辖的各县几乎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者有党的活动。这充分说明，正是由于赣西南、闽西的党组织在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才使党随着群众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而日益巩固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党的建设。

（四）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和“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赣西南闽西各地的工农武装暴动先后受挫，党组织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失。

1927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这次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党内的“左”倾情绪，错误认定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断言中国革命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反对退却而要求继续进攻，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起义，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在农村的武装暴动中则鼓励杀尽地方豪绅和烧毁其房屋的“烧杀政策”等等。这就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并第一次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

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下，赣西南、闽西党组织在领导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中也曾一度出现了“玩弄暴动”的错误倾向。如1927年12月中共江西省委致赣西特委的信中就尖锐地指出：

"吉安县委对于暴动工作，可以说一点具体计划没有。"① "这种暴动工作，简直完全是冒险投机的儿戏，充满了机会主义的色彩。"② 而万安暴动，则"忽视群众力量而偏重于军事的投机"③，"没有精密的计划和正确的指导"④，"缺乏党的本身的宣传"⑤，"忽视土地革命的宣传"⑥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1928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也强调指出："过去在斗争策略上更有严重错误。这个错误是由于同志对暴动的意义没有切实了解，把暴动看得太随便太容易，常有玩弄暴动的倾向。"⑦各县党部受了这种影响，以为不做剧烈的斗争，便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所以也常常不顾实际情形，图谋以前误解的所谓暴动。⑧根据上级机关的指导，赣西南、闽西党组织在领导进行革命武装斗争中逐步克服了这种"玩弄暴动"的错误倾向，在各地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工农武装暴动，沉重地打击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②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③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④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⑤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⑥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⑦ 《目前政治状况及党的工作方针》，1928年2月10日。转引自《中共福建地方史》(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页。

⑧ 《目前政治状况及党的工作方针》，1928年2月10日。转引自《中共福建地方史》(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页。

了国民党在赣西南、闽西的反动统治，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然而，由于各地在暴动的组织领导上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对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实情未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加上囿于“城市中心论”之束缚，暴动的目标往往偏重于攻打反动势力盘踞的城市，一些地方还推行了“左”倾的“烧杀政策”等，致使各地的武装暴动在强敌的镇压下先后失败，党组织了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失。例如：在赣南，中共赣南特委从 1928 年 3 月到 10 月两度遭到国民党军队破坏，一些主要领导人被逮捕英勇牺牲。赣南特委领导的南康、于都、信丰、寻乌、赣县等县的党组织也受到敌人的疯狂反扑摧残，被迫分散隐蔽，一度暂时停止活动，以保存和积蓄力量。在赣西，1928 年 1 月上旬，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了万安工农武装暴动后，实行白色恐怖，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各地基层党组织与县委失去联系，万安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曾天宇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同年 5 月，中共吉安县委亦遭国民党破坏。在闽西，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于 1928 年 11 月在永定被敌人包围袭击，特委机关遂秘密迁往上杭。闽西各县的党组织也因暴动的失败受到了敌人的摧残破坏，不得不分散隐蔽，转入农村，坚持革命斗争。

由上所述可见，在大革命失败后，赣西南、闽西党组织在积极领导各地武装暴动中，由于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出现了“玩弄暴动”和坚持“城市中心论”的“左”倾错误，致使各地党组织在暴动先后受挫后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摧残破坏，给党的建设造成了损害。它充分说明，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对党的建设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为了保证党的建设的健康顺利发展，不仅必须使党的建设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而且必须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只有这样，党的组织才能不断巩固发展，党的建设才能日益前进。

第二章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党的建设的逐步展开

第一节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这一历史性的大转变中，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急先锋。1927年9月20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开始向井冈山进军，并于9月29日途经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进行了改编，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同时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10月，毛泽东率领的这支部队到达井冈山，在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的同时，也给红军党的建设带来了新的历史性课题，即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度里，在农村环境中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下党如何进行自身建设的特殊的复杂问题。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即清醒地认识到，“有很好的党”是工农

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之一，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在于党能发挥领导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①。

然而，在落后的农村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谈何容易！当时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② 毛泽东列举了当时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如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地方主义、流寇思想、逃跑主义等。由于这些思想的存在，毛泽东深有感触地意识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③ 然而，战争的环境并没有使这些问题得到及时解决，随着蒋介石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联合“会剿”的日益临近，加之红军经济给养面临严重困难，中共红四军前委在1929年1月4日召开的“柏露会议”上决定红四军大部出发赣南，企图“围魏救赵”，以解井冈之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在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和政治部主任陈毅的率领下，从井冈山的茨坪、小行洲誓师出发，经由遂川的大汾、左安向赣南方向出击，掀开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的新篇章。与此同时，在党的建设上未解决的特殊难题也伴随在转战赣南、闽西的全过程中，更由于活动领域的扩大，斗争的更加艰难、复杂，党的

①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②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③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建设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突出表现为以下两个问题的解决更加迫在眉睫：

一、在落后的农村环境中建设党

在落后农村环境中如何建设党，是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中加强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这种新形势虽说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遇到，但在转战赣南、闽西中又必然会有新的表现。在赣南、闽西的一年转战中，红四军党的建设面临了在农村环境下的一系列严峻考验和挑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党面临着巩固和发展地方党组织的考验。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不仅要靠红军的艰苦奋战，更要得到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红四军所到之处，凡是当地党的组织较健全且有开展活动的，红军开展工作就比较顺利。正如陈毅1929年9月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有党有群众的地方，我军有极大扶助，如运输救护扰敌侦探等，敌人处于孤立地位，与之作战比较有胜利的把握，即不幸失败亦有法收容”。[①]那么，地方党组织状况如何呢？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亲身经历了转战赣南、进军汀州又回师瑞金的艰难岁月后，在给中央的信中曾有这样一段总结：“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却袖手不去领导。”[②]红四军在4月1日回师瑞金后，“瑞金民众如火如荼地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可惜以前全无组织，一个同志都没有，无本地领导，

---

①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749页。

②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同上书，第673页。

组织工作仓猝，难做得好，特别是县城”。①

闽西地方党组织的情形也大体如此。1929年5月11日《中共闽西特委报告》指出：“闽西的党于一九二六年底在岩、永、杭开始组织，不久遇着清党，党务无形瓦解。一九二七年秋，各县才恢复起来。是年春，才开始吸收工农同志，而渐发展。次年，长汀、武平才成立党部。其余至今尚未组织”。概而言之，“闽西的党还很薄弱，而且很不普遍，尤其城市工作没有做好。”②

中共红四军前委在转战赣南、闽西中，既要搞好军队党的自身建设，又要根据赣南、闽西党组织的具体现状，抓紧发展和壮大地方党的组织，如果地方党组织和地方群众没有积极行动起来，那根据地的建设亦不可能巩固。这是摆在红四军前委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因此，中央指示“前委在红军经过区域应与地方党部有密切联络，一切地方政治问题应与地方党部开联席会议决定。如所经地区无党的组织时，前委应尽可能从发动群众中帮助建立地方党部组织。”③ 能否完成这一任务，对于中共红四军前委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地方党组织如何利用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的有利时机抓紧发展壮大自己，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2. 党面临着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考验。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赣南、闽西的群众基础较好。但是红四军所经之地，群众基础参差不齐，就是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发动群众起来斗争也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井冈

---

①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77页。

② 《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5月11日)，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1936年)，第48、49页。

③ 《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87～488页。

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红军的三大任务：(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1929年9月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也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有三项：一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是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是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这三项任务对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强调，"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他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与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①

在转战中能否发动群众，对于党是一个考验。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初期，由于一路急行军，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处境十分艰险。陈毅于1929年9月向中央汇报时指出，红四军"一月二十八日与赣军三团战于大庾，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猝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累积重迭于一线致失利，我军引退折回粤边南雄界，取闽粤赣边界转至吉安兴国一带，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事非常困难"。② 及至东固会师、汀州休整以至红四军再度入闽，由于这些地方群众基础较好，加之红四军有时间分兵发动群众，使每个士兵都认识到本地工农帮助之重要，密切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红四军才摆脱了被动、失利的局面。应该说，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四军正确地处理好与群众的关系，使党在农村复杂的环境中经受住了考验。

3. 党面临着加强无产阶级基础的考验。由于革命的重心由城

---

①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0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75页。

②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同上书，第754～755页。

市转到农村，更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① 这一具体国情，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这种状况必然会加深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这一矛盾显得更加突出。主要是在农村环境中，党员成份中农民占绝大多数。1929 年 6 月 17 日《江西省委通告》指出：“江西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至今还是十分薄弱，党员成份中工人同志仅仅百分之二，党的质量还是没有改变，非无产阶级的意识还在逐渐生长。”② 闽西党的组织也存在同样的问题，1930 年 2 月 28 日《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目前党内农民成份占大多数，农民意识支配了一切，工作散漫、组织松懈种种现象摆列眼前。”“地方主义、保守观念、封建思想、家庭观念、享乐主义、金钱主义、不拿枪等现象无奇不有。”③ 在这种情况下，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党，对于红四军前委和地方党组织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党的“六大”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特殊情况，提出了靠大量吸收产业工人入党的改造党的成份的思想。实践证明，这一思路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共红四军前委在转战赣南、闽西中既要贯彻党的“六大”精神，又根本无法按这一思路来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于是在实践中提出了通过加强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解决党员的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新思路，这一思路也同样适用于解决军队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倾向问题。1929 年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808 页。

② 《江西省委通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35 页。

③ 《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1930 年 2 月 28 日)，同上书，第 584、第 582 页。

9月28日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这一做法的正确性，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决不是幻想目前红军可以吸收广大工人成份来改变红军倾向的。"① 由于有了正确的办法，红四军前委面临的特殊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二、在长期武装斗争条件下建设党

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如何在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中在军队中建党的问题是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后的又一严峻考验。在武装斗争条件下建设党，中共红四军前委及其领导下的地方党组织面临许多新的问题。

1. 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

"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但要真正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却不是仅仅作出一个决议或整编一下就能解决的，而是要处理好军队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的关系。在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的整个过程中，党的建设的一条主线就是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如何使党指挥枪落在实处。问题的实质是要把军队建设成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还是要把军队变成行云流水般、走州过府式的旧式农民武装。1929年6月8日在上杭白砂举行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敏锐地指出红军有脱离中共领导的危险。自井冈山下山后，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一直延续下来，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军阀主义残余、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具有了广泛的基础。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有些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喜欢长官说了算的同志感到"党代表的权力太大"，甚至提出"军事领导政治"的主张和"司令部

① 《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83页。

对外”的口号。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有的同志认为巩固根据地是地方党组织的事，“军队只管打仗”，因而“对建立苏维埃、建立农民协会、建立游击队和农村中的党组织，不关心或不太关心，不积极做群众工作”。[①] 这表明，红四军党内对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如何建设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军队，在思想认识上还不尽一致，“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时常发生职权上的纠纷”[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确实是党的建设的新课题。

2. 军队党的组织与地方党的组织的关系问题

在武装斗争条件下建设党，不单纯是军队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也不单纯是地方党的自身建设问题，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有机统一。军队党组织要帮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扩大组织；地方党组织要支持军队党组织开展工作，实现任务。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党的建设面临新的课题，其中突出一点就是要正确处理军队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

1928 年 6 月 4 日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指示在军队中成立前委。中央“六月来信”指出：“关于前敌指导机关的组织，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③] 并指定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方党部的书记共 5 人为前委组成人员，而以毛泽东为书记。11 月 2 日，该信才送达在井冈山的毛泽东之手，红四军执行这个命令，由边界特委及军中同志共 30 余人召开特委扩大会，并于 11 月 6 日成立了由 9 人组成的前委会，同时四军成立前军委。“因此前委在当时指挥三个机关：一，前军委；

---

① 肖克：《伟大的建军纲领》，载《红旗》1979 年第 8 期。

②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70 页。

③ 《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1928 年 6 月 4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6 页。

二，边界特委；三，工农运动委员会。”[①] 至此，红四军党的组织设置及领导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得以充分体现。

在此以前的情形是，“四军未成立前毛部由湖南省委任命之前委指挥”，“在四军成立以后，军一级设军委受边界特委指挥，有一时期四军军委即为边界特军委，团设团委，营设营委，连设支部，排班设小组，军部设特支。队伍出发游击组织行动委员会，参加地方党部负责人组成之，同时公开可以命令指挥当地群众机关，行委成了一又是党又是群众机关的一种权力组织”。[②] 军队受特委指挥带来的一个不利局面就是“每每为地方主义所囿，不得不打硬仗，受不必须的损失。这时党在军队不能起领导作用，军权高于党权”。[③] 而根据中央“六月来信”成立的红四军前委，改变了此前四军受特委指挥的局面而由前委指挥边界特委，不仅如此，红四军所经之地的地方党组织亦受前委领导。由此带来的有利一面是“前委权力超过特委，军队脱离了地方主义的束缚”。[④] 但这种设置也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在此种情形之下发生了毛病，就是机关太多，人员分配不过，颇影响各级党部之活动”。[⑤] 特别是四军出发赣南后，更觉得

---

①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72 页。

②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72 页。

③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72 页。

④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 年 9 月 1 日)，同上书，第 773 页。

⑤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72 页。

军委前委发生重复。如何处理好军委和前委的关系，已成为红四军党内的一个敏感问题，以后的实践表明，红四军党内的许多分歧和争论都由此而发，仅就这一点而言，红四军党的建设就面临新的考验，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中共红四军前委要领导所在区域的地方党的工作，也存在一个如何正确有效领导的问题。既要支持和帮助地方党组织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又要防止包办代替。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中，有的地方党组织心存依赖思想，工作反而没有开展好。1929年8月1日《福建省委给永定县委并转特委前委的信》就指出："首先特委要建立起来。特委成立之初还有经常工作，及红军重入闽西后特委就不健全，甚至于经常工作都没有了。"① 在谈及过去历史时也指出："特委下组织工作，非常不充分，特委本身没有组织负责，我们要执行目前的任务，决不能专靠红军的武装，需要有党的严密组织，如果没有独立的组织工作，一切工作都不能进行。"② 因此，要处理好前委、军委、特委、地方党部之间的关系，就构成在武装斗争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和鲜明特色。

3. 军队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问题

红四军一二三纵队为四军骨干，截至1929年6月底统计，全军共5400人左右，党员有1400人，党员中产业工人成份极其低微。四军党内同样存在一些不正确的思想，主要表现为：

右倾的危险。这种右倾的危险的产生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如四军党的士兵基础薄弱，党员政治水平不高，改良主义的宣传影响，加之长期斗争的疲劳和每日生活之刻板，一些人日趋消极悲观，常

---

① 《福建省委给永定县委并转特委前委的信》(1929年8月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页。

② 《赣西南会议记录》(1930年10月1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0页。

常长吁短叹。

极端民主化倾向。四军是由国民革命军改造而来，在初期一般官兵同志皆十足地盲目服从上级，渐渐由党的在下层的发动，一般官兵同志渐渐能够讲话发表意见，由于引导不利而滋生极端民主化倾向，上级的命令未经下级讨论，下级便不执行或者说上级包办，说上级是家长制。军事机关的命令也常有托故不执行的毛病。

小团体主义思想。因四军是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的历史部队而组成，混编的办法始终未执行，因而历史的残余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脑中，军队党内小团体主义的色彩显得很浓重。

取消或缩小红军的观念。因政治的分析错误，认定反动政局是稳定的，当然会怀疑红军是否能够存在，又见大的部队斗争日趋激烈，则主张缩小红军，以为缩小了就可以缓和敌人的进攻。这些观念其骨子里面是无坚决斗争的勇气，四军党中有一部分具有这一类思想。[①] 由于军队党内存在上述非无产阶级思想，因而在坚持武装斗争的条件下，既要打仗消灭敌人，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使军队党的建设任务更加紧迫、更加繁重。毛泽东对红军党内存在的不正确思想是十分清醒的。1929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在《前委通告》第三期发表“党内通信”，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军内存在的 14 种不正确思想表现，分析了原因，提出了纠正办法。在落后的农村环境中如何建设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如何建设党，是转战赣南、闽西中遇到的党的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这两大问题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党的主要精力放在城市而被暂时掩盖起来。及至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走向井冈山进而向赣南、闽西挺进时，这两个问题也就是党的建设的特殊矛盾才暴露出来。可以肯定地说，1929 年毛泽东率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期间，党的

① 参见《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75～776 页。

建设都是围绕上述两大问题而展开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好党的建设所面临的这两个历史性课题。

第二节 在确立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过程中对党的建设的特点和规律的进一步把握

当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退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向赣南挺进时，其初衷是为了“围魏救赵”以解井冈山之围，也仅仅是军事上的战略之计。虽然“围魏救赵”没有达到目的，但1929年一年转战赣南、闽西的伟大实践却初步确立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并且诞生了光辉的建党建军思想，正确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所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而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无疑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形成和巩固。当然，这一切都并非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毛泽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原理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对于中国党的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有了进一步认识和把握的结果。

一、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党的建设新道路的开辟

在农村武装斗争条件下建党，不可避免地有大量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加入党组织。党内许多同志主张大量吸收工人，通过改善党的组织成份来改善党的质量。在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党中央就指出，党内工人太少，特别是在各级领导机关中，大多数干部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并且认为这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从陈独秀机会主义的策源地在于党的组织成份这一错误判断出发，认为必须举全党之力，“立刻用最坚决的方法，使领导干部

工人化，肃清其中的机会主义的分子”①、“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② 这种片面强调党员成份的错误建党方针，被党的“六大”所肯定。

“六大”提出要加强党的战斗化和无产阶级化，但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认为党应该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工人阶级，尤其是城市大工业和交通工人之上，强调要着重在大工厂中建立党的组织，积极征收工人党员，使领导机关工人化。六届二中全会更明确提出了“改善质量的主要条件在成份”的错误观点，并肯定了六次大会所指示的“党应以建立产业支部，健全地方的党部，发展工人群众组织为组织上主要任务，以达到党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化的战斗的党的目的”无疑的是正确的。③

“六大”的精神直到 1928 年冬才传达到井冈山。毛泽东对“六大”的路线是拥护的，在 1929 年 1 月 4 日召开的“柏露会议”上即传达和讨论了中共“六大”的各项决议；在转战赣南、闽西中，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宣传“六大”精神。应该说，1929 年上半年，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但以乡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渐趋明朗。与此同时，他关于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以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发展。这年 4 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指出：“六次大会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

---

① 《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1929 年 11 月 9—1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66 页。

② 《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1927 年 11 月 14 日)，同上书，第 471 页。

③ 《组织问题决议案》(1929 年 6 月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4 页。

分对的。”[①] 但同时也特别强调不应忽视党在农村的工作，认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②] 毛泽东指出：“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③] 同年7月，在毛泽东指导下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出不仅在工人中，而且在贫农中创造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要求“建立党的理论的基础，加紧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指出要“洗刷非无产阶级意识如地方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④] 到1929年底，毛泽东关于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观点就基本形成了，其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讲到这个问题。

二、紧密结合武装斗争，切实加强党的建设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

---

①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73页。

②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同上书，第674页。

③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同上书，第674页。

④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1929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0页。

胜利。”① 中国革命的这个特点，党在大革命时期是认识不够的。“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② 从此，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和基本形式。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历史特点，不能不给党的自身建设以深刻的影响，使党的建设与武装斗争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又一特色。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后来所总结的，“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的党的建设。”③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时，党的建设遇到的问题大部分是武装斗争条件下如何建党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在斗争实践中同样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1. 指出了武装斗争对党的建设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有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有了枪又确实可以造党。早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就深切体会到武装斗争对党的建设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全是在红军到达以后才恢复和建立起来的。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完全依赖军事斗争。军队打到哪里，工作就开展到哪里；军队打了胜仗，地方党组织就发展，军队打了败仗，地方党组织就受损失，甚至塌台。这反映了在中国条件下党的巩固和发展必须依赖于武装斗争这一客观规律。在这种条件下，脱离了武装斗争去搞党的建设是必然要失败的。党必须用最大的精力考虑武装斗争问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6月第2版，第61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6月第2版，第54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6月第2版，第609～610页。

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①

2. 提出了军队党组织必须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展的任务。

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驻井冈山后，就立即着手领导了各县党组织的重建工作，以后又成立了湘赣边界特委。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之一就是“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②1929 年 9 月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前委在红军经过区域应与地方党部有密切联络，一切地方政治问题应与地方党部开联席会议决定。如所经地区无党的组织时，前委应尽可能从发动群众斗争中帮助建立地方党部组织。”③ 事实上，在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闽西后，一直就是这样做的。红四军所经之地，都帮助建立地方党组织。毛泽东多次召集军队党和地方党的联席会议，指导地方党的工作，协调地方与军队的行动。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认为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是保证建设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等项工作能够胜利进行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红军就像播种机一样，走到哪里就把红色的种子撒在哪里，使革命在广大的农村蓬勃发展起来。毛泽东还要求党组织在红军帮助下建立之后，要逐渐减少对红军的依赖，能够完全自立，进而向红军输送干部。红四军转战赣南时，当地党的基础十分薄弱。1928 年 9、10 月间，中央曾给毛泽东、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长去信，指出“赣南没有广大群众的基础，没有较健全的党部组织”，并预言“到赣南是死路一条”④。红四军于 1929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6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51 页。

③ 《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 年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87～488 页。

④ 《中央给润之、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长的指示》(1928 年 9、10 月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73 页。

年4月1日到瑞金后，在赣南游击45天，毛泽东即发现当地党组织之欠缺与薄弱，“赣南党与群众的基础，以雩都、兴国及赣州东乡比较好，安远……宁都次之，瑞金刚在开始，石城广昌南丰等县无组织”①，红四军到达后，促使当地党组织有所发展，四军不仅没有死路一条，而且提出“一年夺取江西”的任务。四军1929年5月进驻闽西后，“一面整顿红军，一面帮助闽西党之改造”②，使闽西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长汀“过去可谓完全没有工作，此次红军入汀才开始开展”，“在红军影响之下有一日千里之势”，③“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两倍”。④ 这说明军队党组织对地方党组织的帮助是很大的。1930年3月的《前委通告》(第三号)指出：红军党的斗争经验，是比许多地方党部要丰富些进步些，因此，红军党的指导机关应该努力帮助地方党的组织，训练地方党的干部。在组织关系上，规定前委统一指挥军队党和所到之处的地方党组织；红军军委与地方特委同级，可以直接指导县委以下地方党组织；红军的纵队委与地方的县委同级，可以直接指导区委以下地方党组织，红军的支队委与地方的区委同级，可以直接指导地方的支部工作等。⑤ 这就从组织上创造了军队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条件。应该说，这方面的成效

① 《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6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82页。

②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同上书，第784页。

③ 《中共闽西特委报告——党和群众工作》(1929年5月11日)，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1936年)，第49页。

④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77页。

⑤ 《前委通告》(第3号)(1930年3月1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3～494页。

较大。

3. 规定了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的原则。

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离开了革命的政治任务，红军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革命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而不能把党看作是军队的附属品。毛泽东严肃批评了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的错误做法，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① 当时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由上层苏维埃公开指挥红军，党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党的领导尽可能通过党团路线来实现。实践证明，这种意见也是不适宜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军队是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党不仅要通过自己的路线、方针、决策去领导军队，而且要建立直接的指挥系统来指挥军队，更何况当时所处环境复杂，情况瞬息万变，军队不仅要执行党的战略意图，而且要能迅速地把党的决定变成战术行动，那种多层次、多环节的领导系统显然是不能适应斗争需要的。为了使军队有效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红军从创建之初便由中央任命的前委指挥。这样一种领导体制，毛泽东认为"十分适当，合于斗争的需要"，"超地方性质的红军，不但不宜受县委与特委的指挥，并不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② 陈毅在 1929 年 9 月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指出："红军的指挥，只能直接受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86 页。

②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 年 4 月 5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79 页。

命于党”，[①] 并认为这种指导方式是很便于斗争的。

4. 创造了军队中党的组织建设的经验。

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十分注重军队内部党的组织建设。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之时，军队党的组织系统为前委——军委（曾一度取消）——纵委——营委——支部——小组，党的机关，纵委前委均分设宣传、组织、青年三科，士委会各级设有党团。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连上成立支部的作用非常大，因每一连可以担任一方面的任务，一个支部恰可以应付这个任务，连支部的精神，在‘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上，四军党的基础在连支部上面，军队力量也寄托在上面。”[②] 毛泽东在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指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③] 周恩来很赞成毛泽东在军队中建党的这套办法，并把它介绍到其他地方的红军中去。周恩来在代表中央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据朱、毛处来人说，这样组织，感觉还好。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④]

---

①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73 页。

②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 年 9 月 1 日），同上书，第 774 页。

③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 年 12 月），同上书，第 811 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6 页。

三、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过程中党的策略思想逐步走向成熟

大革命失败后，惨重的教训使我们党拥有了自己的武装。而当我们党率领的武装力量在大城市发动的起义以及中心城市工人暴动失败后转向农村活动之时，就预示着一个新的革命道路正在孕育之中。

1929年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中国革命道路的渐渐明晰，党的策略思想逐步走向成熟。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种思想虽说并没有否定“城市中心论”（事实上当时也不可能）的暴力革命传统模式，但显然已向人们传递一种向“城市中心论”挑战的信息。1929年初，红四军转战赣南，目的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然后再回到井冈山。于是在下山前召开的“柏露会议”上，仍决定由彭德怀率领的五军继续守山。这种被称为“围魏救赵”的策略，当初并不表明毛泽东及四军前委要放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而只是在强敌跟踪的不利条件下实行的一种战术。

毛泽东是个十分务实的人，出发赣南以后所遇到的艰难局面以及随后不久的井冈山失守，使毛泽东放弃了重新返回井冈山的既定想法。红四军当初转战赣南既是为了“解井冈山之围”，也就没有入闽的打算，只是由于紧追不舍的赣军改变了毛泽东的主意，决定向福建境内的长汀县进发，再作打算。然而，历史给了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一个极好的机遇。毛泽东一到闽西，即发现这里的民众非常之好，“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在汀州组织了廿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

总工会也成立了”。[①] 闽西地方党组织和群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响应红四军入闽，这使毛泽东感到闽西的斗争“前途希望很大”，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发现闽西国民党的统治十分薄弱，“张贞陈国辉卢新铭入粤，闽西闽南空虚”，“故此时在闽西一带游击，是最好的机会”。[②] 根据蒋桂战争一触即发的客观形势，毛泽东于 1929 年 3 月 20 日在长汀县城“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在赣南、闽西创造工农武装割据的良好条件，并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③] 的新的策略思想。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在半年以前在井冈山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基础上，在总结红四军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的失败与胜利的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在农村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而进一步认识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道路，提出在全国有条件的省份大力创造小区域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显示其开始萌发中国革命首先占领农村而后及于城市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朝“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3 月 20 日的汀州前委扩大会议虽只短短一天，却在“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胜利”的战略思想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4 月 1 日，红四军在长汀活动 17 天后离开长汀重新入赣，占领瑞金，并会合了从井冈山突围而出的彭德怀部，准备立刻把在长汀决定的行动计划付诸实

①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 年 4 月 5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77 页。

② 《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81 页。

③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

施，首先开辟赣南割据区域。4月3日毛泽东收到了经由福建省委转来的中央“二月来信”。毛泽东随即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加以讨论，会议否定了中央要求红四军取消集团行动和指令朱德、毛泽东脱离部队速来中央的意见。毛泽东于4月5日代表前委复信中央，重申了半个月前给中央报告中的意见，认为江西、福建、浙江三省最有利于割据区域的建立与红军的发展，坚持红军在赣南、闽西20余县创造大范围农村割据的计划，并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乱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① 同在长汀3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相比，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朝“以农村包括城市”的转变又更进一步，主要表现为，不仅提出赣南、闽西，而且还兼及浙江西部，不仅是赣南要割据公开苏维埃政权，而且还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虽然毛泽东未明确表态要放弃城市中心论，但其先占农村后夺城市的思想已很显明，例如他在分析了赣北、赣西、赣南、赣东的形势之后，认为“已造成了向南昌包围之形势”，这就初步揭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客观规律，此后的实践便证明了这一规律的不可违背性。这一具有全局意义的伟大战略构想的初步提出，源于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的实践，不能不说是这一时期的一大成就。这表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特点和规律有了进一步认识和把握的同时，也对党的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把握，即党的建设必须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而服务，必须不断地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符合实际的策略思想。

①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76～677页。

第三节　在开创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党的建设的全面展开

1929年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的历程，是中央苏区开辟和创建的第一年，随着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军队党的建设和地方党的建设得到全面展开，地方党组织在斗争中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这时期的党建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深入发动群众，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赣南、闽西经受过大革命的洗礼，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党一刻也不能生存。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后，即沿途着手发动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成为党和红军的一项主要任务。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经由遂川的大汾、左安向赣南方向出击。沿途即向地方党组织散发中共"六大"决议，发布了毛泽东、朱德署名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布告以四言体的形式，通俗而又深刻地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各项方针政策。当时四军所经各地的群众基础各不一样，群众基础不好的地方，于军队的行军作战极为不利。红四军刚下山时，既无地方党组织的接应，群众也不知红军为什么人打仗。面对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而"当时一般群众不太愿意给我们带路，我们也不敢随便找人当向导"，[①] 为摆脱敌人的围追，红军不得不每日急行军90里以上，亦无时间去深

① 陈毅《略谈红四军游击赣南》《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入发动群众。2月10日的大柏地之战，因群众受反动宣传的影响都躲起来了。及至红四军在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师后，发动群众工作才有所深入。

3月14日红四军首次入闽，闽西各地党组织则抓住这一时机，发动群众准备暴动以响应红四军入闽。3月15日红四军在汀江畔的南寨河坝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向群众宣讲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是为穷人求解放的军队。毛泽东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人、农民自己的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极大地焕发出来了。红四军在长汀17天时间还进行短距离分兵发动群众，利用汀州的印刷条件，大量印制有关宣传材料，并派出大批宣传队到城乡各地张贴文告，书写标语，宣传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尽管红军宣传员的演讲技术并不好，但是"长汀的民众，听我们宣传员的演讲，非常高兴，欢呼的声音，常常打断演讲的进行"。①

4月1日，红四军回师赣南，在于都、兴国、宁都、瑞金以及赣县和广昌的一部分地区进行了为期45天的分兵发动群众工作，"每到一县，每到一地，把队伍分散往各乡，往一乡的队伍再分小支，这样集中分散的容易于争取群众对付敌人之计兼发展，不偏于一边"。②

5月中旬红军再度入闽。红四军沿途也是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支持。在红四军入闽影响下恢复的中共闽西特委也及时制定了

① 攻石：《朱毛到了汀州》(1929年4月20日)，载《红旗》第20期。

② 《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6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82页。

“发动广大群众创造闽西工农政权割据”①的总路线。1929年10月6日，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中明确提出：“党在闽西目前的任务是尽力发动广大的群众，扩大、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巩固并发展苏维埃区域……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推进革命高潮的到来。”② 在红四军的影响下，闽西各县群众纷纷起来斗争，基本上达到了发动群众的目的。

1929年9月，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专门有“红军与群众”一章，并把“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红军三项的基本任务之首项，指出“红军尤要加紧帮助发动群众斗争以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的得以解决”。③ 这封“九月来信”还对如何做好群众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概而言之有：(1)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如此才能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2)红军到地方不要只是找地方党部，应该与地方的群众组织工会农会开联席会，发生密切关系，在政治上，在宣传上，在斗争上都要与工农会协议共同去做，红军不要单独去干或者只是发命令。(3)如群众尚未组成工会及其他有利于革命的临时组织，则更应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提高群众对于自己组织的信仰与效能，增加群众组织的威信。(4)肃清反革命工作和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要经过群众组织来进行，才有群

①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1929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0页。

② 《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1929年10月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页。

③ 《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77页。

众意义。这些思想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如何发动群众、争取群众以及群众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有了较深的认识和总结，这方面的思想也构成了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特色。

二、坚持调查研究，倡导党和红军良好的作风

红四军下山后即采取“打圈子政策”，哪里条件适宜就在哪里发展。由于所经区域大都是第一次，面对人生地不熟的环境，要担负起红四军的政治任务，及时指导地方党的工作，就必须开展调查研究工作。1929年毛泽东率部转战赣南、闽西期间，十分重视红军的调查研究工作，曾多次组织大规模的调研活动。

1929年3月，毛泽东率部进军闽西长汀，为了深入发动群众，制定正确的政策和工作方针，毛泽东主持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在前委委员谭震林的协助下，会同长汀地方党组织，在红四军军部驻地“辛耕别墅”召开了社会上阅历丰富、具有代表性的六种人员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这六种人员是“老裁缝（他们到许多豪绅、地主、官僚、富商家里做过衣服，了解这些人的生活情况）、老佃农（他们明白豪绅地主土地占有和租利剥削情况）、老钱粮师爷（他们清楚钱粮捐税的收交情况）、老教书先生（他们懂得当地的人情风俗）、老衙役（他们知道豪绅地主同衙门勾结来往的底细）、流氓头（他们明了社会各种势力状况）。通过细致的调研，摸清了长汀的政治、经济状况及民情风俗，为制定正确的政策和行动方针提供了可靠的根据。针对长汀商人和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特点，红四军党部颁发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文告，阐明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党对商人及知识分子的政策，指出：“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民主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配他们相应的工作。”由于有了调查研究，提出的方针、政策符合实际，所以四军在长汀的17天就显得十分顺利，毛泽东对闽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月至5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在赣南分兵发动群众，同时也坚持调查研究。红四军在于都活动的一路，与于都党组织结合，在城乡广泛开展宣传，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工农群众的生活疾苦和斗争状况，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红四军一部在兴国分兵期间，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兴国县城的文昌宫起草和颁发了《兴国土地法》，根据实际情况，对《井冈山土地法》作了原则性的修改，将其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一政策性改变，使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改善，对于今后赣南、闽西农村土地革命的胜利开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没有调查研究就不会有正确的工作方针，这同样也体现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下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1929年5、6月间，红四军回师闽西，再一次掀起闽西革命的高潮，至7月前后，便形成了以上杭古田和龙岩大池、小池为中心区域的闽西革命根据地。为了全面总结闽西革命根据地创立的经验和确立未来的工作方针，红四军前委指示中共闽西特委于1929年7月11日召开中共闽西"一大"，毛泽东深知此会之重要，提前2天于7月9日从龙岩到达会议地点——上杭蛟洋。但随后毛泽东即发现会议的准备工作并不充分，出席会议的代表虽然对各自工作地区和部门的情况比较熟悉，但对整个闽西地区的社会经济、革命形势却缺乏全面了解。为了使大会能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也为了使到会代表掌握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毛泽东提议推迟一些日子召开，先让代表们花一星期时间作些调查研究。于是代表们认真总结1927年以来闽西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分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群众、政治组织、物价、洋货侵入与工农业破产等方面的专题，进行充分讨论，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同代表们一起，对闽西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热烈讨论和研究。代表们推举了5人为大会主席团，13人为决议起草委员会，采

取边调查研究边起草决议的方法，起草的政治、土地、组织、政权、宣传、工运、军运、妇女、共青团、济难会等项决议案，提交大会讨论。大会7月20日召开，由于准备较充分，因而取得积极的成果。可以说，中共闽西“一大”是以调查研究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次光辉典范。

三、在实践中“创造干部”，大量培养工农人才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期间，无论是中共红四军前委，还是地方党组织，都普遍感到在斗争中干部严重缺乏。除了要求上级派送干部外，更多的则是靠自己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干部”了。“创造干部”是当时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口号，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创造干部”一方面是由于在斗争中会造成干部伤亡，使干部人数减少，另一方面则是革命斗争的风起云涌，客观上需要很多的干部。1929年红四军转战赣南初期，红军行军遇到了“自有红军以来最大困难”，总计损失约200余枪、600人，“最大的损失，就是干部减员，最为可惜”。[①] 这种干部减员的情况在战争中是经常发生的。1929年6月1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因长期的斗争，损失太多，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现请中央在最近期内派遣中下级军官中下级政治工作人员各一百人，医生及造炸弹师各数名，高级军官高级政治人员各五人，在1个月内赶来。”[②] 红

① 《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页。

② 《红军第四军写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6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86页。

军中这种干部缺乏的情况在地方也很明显。

赣南、闽西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初期曾培养和造就了一些干部人才，但总量不多。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色区域的日益扩大，加上严酷的斗争环境，干部损失同样很大，各类干部人才都显得非常紧缺，尤其是能担负高、中级领导的干部，更是缺少。1929年8月21日《江西省委工作报告》指出："干部人材非常缺乏，现在青黄不接，在下级中没有提拔起来，也是过去没有注意提拔，所以现在人才的恐慌成一个大问题。"① 闽西党的干部紧缺的现状也多次反映在福建省委、闽西特委的有关文件中。1929年1月，闽西特委在《闽西报告的补充》中即指出"闽西干部分子太少，斗争起来应付甚为困难。""这次闽西斗争，局面是很大的，各方面都是很需要人才的，可是我们的干部太缺少了，致许多工作没有法应付，顾此失彼。"②

有鉴于此，中央自六大以后，就十分重视干部的培养与训练工作。1929年3月27日中央在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中就说："目前江西干部人才，异常缺乏，这是很可虑的。但是江西并不是没有干部，而是有许多干部人才多是在下面没有引进上来，所以你们以后要坚决的从党员中找支书，从支书中去找区委工作人，从县委中去找特委工作人。总之，从党员中下级党部中去找干部人才。"③

根据中央的多次指示与决议，中央苏区党组织下决心自己"创

---

① 《江西省委工作报告》(1929年8月2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页。

② 《闽西报告的补充——今后斗争的前途》(1929年1月30日)，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1936年)，第44、第46页。

③ 《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

造干部”，以适应革命斗争迅速发展的需要。赣南、闽西党组织在“创造干部”方面经历了一个由认识到创造干部的重要性到尚不明了创造干部的方法进而在实践中探索出创造干部的方法的过程。刚开始，由于不懂得创造干部的方法，甚至不明白自己创造干部的责任而只望上级派人，以致新的干部不能创造出来，旧的干部不敷分配，发生工作的堆积和人材缺乏的恐慌。1929年5月10日中共福建省委致信闽西特委，指出：“应该坚决的从当地制造干部”。在斗争实践中，提出了“创造干部”的思想，认识到创造干部的重要性，初步摸索出创造干部的方法，并在今后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其主要方法有：

1. 注重现实表现，按一定条件选拔干部

中共赣西南特委当时提拔干部的条件是3条：“第一注意其阶级的出身，及其阶级意识的浓厚，不反土地革命者而积极拥护土地革命者；第二工作的积极能艰苦耐劳者；第三有活动力量者”。中共福建省委要求闽西特委从当地制造干部时“应该选择最积极、勇敢、觉悟的分子加以特别训练”，“寻找曾经参加过斗争而是很积极的工农干部”。[①] 中共苏区有一大批干部就是这样脱颖而出走上领导岗位的。如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代部长胡海，粤赣省苏政府主席钟世斌，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省苏政府副主席王孚善，江西省苏政府主席刘启耀等，都是从贫苦农民出身，由于在斗争中表现突出而得以提拔重用的。

2. 注重实践锻炼，在斗争中考验、提高干部

中央苏区党组织十分注意帮助各级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在实际斗争中增长才干。对于培养的干部和已提拔的干部注重在实践中压担子，分配相关的工作加以考验。1930年2月28日中

① 《中共福建省委致闽西特委信》(1929年5月10日)，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上)》第213～214页。

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在谈及如何“创造干部”的方法时，其中就有一条“调活动分子到指导机关参加实际工作”，“特别召集活动分子开讨论会，讨论通告，政治分析及工作方法等”。[①] 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也指出，对于所提拔的新干部，“在初提拔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他们工作能力与兴趣，分配以适当工作，提高他的工作能力，逐渐提到上级指导机关来工作”。[②] 此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中央到省、县党政领导机关，都建立了巡视制度。巡视员在巡视工作过程中，必须代表领导机关检查指导下级的工作，独立自主地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担任巡视员参加巡视工作，是干部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中央苏区各级党的组织很注意将一些新提拔的具有培养前途的下级机关干部，安排去当省、县以至中央一级的巡视员，让他们接触实际，增长知识和才干。

3. 注重教育培训，大规模地培养干部

注重教育和培训是创造干部的很好的方法。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就指出，“对于所提拔的新干部，党必须带有很大的教育性质，时常给予个别的特殊教育”。[③] 为了加紧创造干部，中央苏区党组织还举办各种类型的训练班。1929 年 2 月 7 日《中央通告第二十九号》在谈及如何使党员军事化时指出：“在游击战区中党

---

① 《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1930 年 2 月 28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85 页。

② 《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之二：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1931 年 11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43 页。

③ 《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之二：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1931 年 11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43 页。

宜设立军事训练班，创造一些工农军事人才。”① 毛泽东同志在赣南、闽西期间，也经常举办各种短训班。例如1929年“四月分兵”在兴国调研时，毛泽东即举办由党团员活动分子40余人参加的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学员学习一个星期后，即回到各地农村，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像这样的训练班，在中央苏区时期是经常有的，它带有时间短、见效快、针对性强、灵活性大等特点。因而无论战争如何残酷，工作如何紧张，都可以经常举办。

闽西党组织在总结“创造干部”的方法时，也强调“开办专门人才训练班”、“县委机关以上要组织直属支部加紧训练”② 的重要性，在龙岩、上杭开办了岩平宁宣传人员养成所和汀属八县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培养工农运动骨干160余名。1929年夏秋，中共闽西特委举办了两期训练班培训县区干部。

1930年以后，中央苏区陆续创办了干部学校对干部进行正规教育。这些学校包括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江西、福建两省也办好培训干部的专门学校，使干部培训走上规范化的轨道。军事干部的教育培训也抓得很紧。中央苏区初创时期红四军、红五军及后来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都办有红军随营学校或教导队、教导营，在斗争实践中培养红军初级指挥人员。红四军还采用上政治课的办法，训练后备政治工作人员，根据学习对象和使用性质的不同，将上政治课分为普通、特别和干部三班。1930年初，四军在龙岩创办了闽西红军学校，后改为福建红军学校，同年5月，又改名为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年底改称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该校一年中招生2期

① 《中央通告第二十九号——关于党员军事化》(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② 《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1930年2月2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5页。

共1000人，每期学习4个月毕业。1931年冬，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与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红三军团随营学校合并，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于1932年夏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从开办至1933年秋共招生6期，培养各级红军军政干部6000余人。193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分编扩大为5所学校，即红军大学、红军彭杨步兵学校、红军公略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地方游击队干部学校。除以上5所红军学校外，1931年12月5日瑞金洋溪还成立了红军无线电学校，1932年2月创办了红军军医学校。

据统计，上述红军学校自1931年冬到1934年秋，先后共为红军部队培养各级各类军事人才1万余人。他们中除为革命牺牲者外，绝大多数后来成为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人员。

此外，中央根据地开创时期关于“创造干部”的思想，还包括注意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和群团干部。

四、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增强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

红四军未到赣南、闽西之前，当地的党组织和党员数量都较少，不能适应斗争发展的需要。就是为数不多的党组织，也存在许多问题，致使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以后，在红四军前委的指导和帮助下，采取建立、恢复、改组、巩固、发展等途径，建立、健全了赣南、闽西的地方党的组织，取得了显著成效，是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成果。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点燃了赣南、闽西的革命火种，当地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党员人数也迅速增加。红军中的党组织积极帮助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凡是因革命低潮使党组织解散或形存实亡的，则尽快恢复活动；凡条件较好，战斗力较强的则加以巩固和充实领导班子成员；凡战斗力不强，不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党组织就加以改组；对于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则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的地方组织。

1.红四军转战赣南,赣南党组织的发展壮大

1929年4、5月间红四军在于都、兴国、宁都3县分兵发动群众,帮助这些县委建立了一些基层党组织。4月上旬,红四军前委在于都县城召开了前委和赣南特委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详细制定了"一年争取江西"的实施计划。接着,前委在于都县城召开于都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改组了中共于都县委。中旬,红四军前委派李春华到兴国任县委书记。5月初,帮助宁都县建立了中共临时县委。同年,中共赣南特委召开了第2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了中共赣南特委执委委员11人,常委5人,选举肖韶任书记。整个赣南这时成立县委的有于都、兴国、信丰、寻乌、安远5个县;成立临时县委的有宁都、赣县;另外,还有中共于北特区委,中共兴万赣边区委和中共南康唐江特区委、中共大余县工委。全赣南此时有党员约3000人。

1930年2月7日至9日在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陂头联席会议上,为加强对赣西、赣南革命斗争的统一领导,决定将中共赣西、赣南和湘赣边特委合并,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委。3月22日至29日,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吉安富田召开,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赣西南特委执委17人,候补执委11人,刘士奇当选为特委书记。

接着,在中共赣西南特委之下,成立了中共东路、西路、北路、中路和赣南东河、西河等5路行委组织。

中共东路行委设宁都,金万邦、胡珍先后为行委书记,辖永丰、宁都、吉安、南丰等县委和广昌甘竹区委。中共西路行委以永新为中心,辖永新、莲花、宁冈、遂川、茶陵、雩县等县委和吉安县西区党组织,周高潮为行委书记。中共北路行委辖吉安县儒行、坊廊、延福区委和吉水县金滩、同水、仁登、埠田等区委,以及分宜、袁州、峡江、安福等县党组织,郭承禄为行委书记。中共中路行委辖万安、泰和县委和吉安河东的儒林、富田、东固、纯化、小东区委,吉水的水

南、白沙、中鹄区委，毛泽潭为行委书记。中共东河行委，以于都为中心，辖兴国、于都、瑞金、赣县、寻乌、安远、会昌等县委和于北特区委、安于会赣边界特区委，先后以黎日晖、丛允中为行委书记。中共西河行委以南康、信丰为中心，辖信丰、南康、南雄、崇义、上崇等县委和西华山区委，罗寿男为行委书记。

中共中路行委在成立不久后即撤销，其所辖各县、区党组织由中共赣西南特委直辖。赣南的东河、西河两行委也于同年8月间合并为中共南路行委。

"二七"会议在组织问题上作出的决策，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共赣西南特委的成立，使赣西、赣南各县党的组织，有了统一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整个赣西南的革命斗争，在红四军前委和赣西南特委的统一领导下，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至1930年秋，赣西南苏区人口已有400万以上，苏区范围扩大到赣西南、湘赣边和广东南雄及其34个县，占领14座县城，"由南丰到永新，由寻乌到峡江，横断江西半壁；由赣州到吉(水)峡，围绕赣江流域纵横数千里"①。党的组织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共赣西南特委已辖有吉安、泰和、吉水、安福、万安、永新、莲花、袁州、分宜、峡江、永丰、乐安、南丰、宁都、兴国、赣县、于都、崇义、上崇、瑞金、遂川、寻乌、安远、信丰、南康、南雄、新余等县委和临时县委、14个区委、2个特区委，共有党员35000余人。

2. 红四军挺进闽西，闽西党组织的发展壮大

闽西地方党组织在红四军入闽前较薄弱。据1929年5月11日《中共闽西特委报告》载，闽西的党于1926年底在龙岩、永定、上杭开始组织，不久遇着清党，党务无形瓦解。1927年各县才恢复起来并有所发展。1928年长汀、武平才成立党部，其余各县尚无组

① 《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页。

织。据这份报告统计，永定“区委四个，支部三十余个，同志三百余人”，龙岩有“支部六十余，党员六百余人”，上杭有“区委三个，支部三十余个，党员三百余人”，武平“支部八个，党员七十余人”，长汀“过去可谓完全没有工作，此次红军入汀才开始发展”。① 可见，当时闽西各县党员在1929年5月以前只有1300人左右。

由于红四军入闽的推动和影响，地方党组织发展很快。

红四军1929年3月进入长汀，随即发现这里民众非常好，可惜“汀属党部太弱”，毛泽东在3月20日写给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中建议“福建省委须立即派遣一闽西特委来汀州指导汀属八邑工作”，“目前主要的工作是扩大党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建设政权机关及闽西红军，望省委以大力注意此间。”② 中共福建省委坚决支持红四军前委关于去赣南、闽西20余县建立割据区域的战略决策，决定闽西的工作以上杭、长汀、龙岩、永定四县为中心，并于1929年3月恢复了中共闽西临时特委，邓子恢为书记。在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的指导、帮助下，长汀“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二倍”③，龙岩在红四军入闽的影响下，“一个月就增加党员三四百人。”④至1929年7月，闽西各县党组织有了空前发展，在6个县的范围内，中共党员在短短几个月内增加3倍，达到3000余人。而在

---

① 《中共闽西特委报告——党和群众的工作》(1929年5月11日)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6年)，第48～49页。

② 《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③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77页。

④ 参见《中央苏区党的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当时，福建全省党员总数不过3700多人。这就是说，闽西根据地的党员占全省总数的4/5以上。

1929年7月20日至29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在上杭县蛟洋文昌阁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并通过了5个决议案，选出了中共闽西特委委员15人，常委5人，选举邓子恢为特委书记。通过这次大会，闽西党组织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30年5月，据龙岩、上杭、永定、长汀、连城、武平、漳平等县不完全统计，共有中共区委53个，支部546个，特支19个，党员7756人。

3. 赣南、闽西党组织的组织力、战斗力得到增强

赣南、闽西党组织在红四军到来之前，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影响了地方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战斗力的发挥。红四军到来以后，这些问题就逐步得到解决了。

如个人唱独脚戏问题。中共闽西特委指出，在中共闽西"一大"前最普遍的现象是少讨论，"一切都不是党的领导，只是个人意识的指挥"。[①] 1929年8月22日《闽西工作报告》也指出："前委未到闽西以前，各级党部普遍的毛病就是不开会，一切事情都是由少数同志个人意见，不经集体的讨论。""只等经过前委的指导，且严肃批评以后，才把不开会的错误纠正过来了。一些如县委一级有问题都提到在会议席上解决。"[②]

又如支部不能发挥作用问题。1929年6月17日《江西省委通告》指出："许多地方的支部，还只是上级党部勉强做作起来的面粉

---

① 《中共闽西特委给省委的报告——关于党务问题》(1929年12月1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0页。

② 《闽西工作报告》(1929年8月22日)。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6年)，第110页。

菩萨，不但不能自动的活动工作，而且不能自动的生存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在群众中活动，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① “有许多同志入党几个月的没有编支部，一切行动绝对自由，也不知道党是什么。”这种情况，“经过一番整理，现在比较好了一些”。② 赣南、闽西党组织还提出“一切工作为支部，一切同志为支部”的主张，要求每个同志都必须在支部生活中为党工作，在党内担任一定的工作，使大家都来关心支部工作。

再如党内教育训练不充分问题。许多地方党组织普遍感到“党内教育训练工作十分缺乏，党员对于党的各种策略的决定，只是盲目的不服从，或则完全不信任，认为是高调，始终没有切实的讨论，以求得充分之了解，因此党内水平线异常低落”。③ 这种党内教育不够的现状，在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以后有所改变。据1929年8月闽西特委工作报告，“党的训练班，专待说四军未来闽西之前没有办，至四军入闽后得前委的帮助，县委与区委两级才普遍办起党员干部训练班，以训练区委与支部负责同志”。④

此外，地方党组织还存在一些别的问题，如人才培养问题、党团关系问题、发展党员问题、上下级之间互通情况问题以及加强上级对下级的巡视检查等问题，随着红四军的到来，都程度不同地有所改进，有所变化，地方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得到加强。

---

① 《江西省委通告》(1929年6月1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5页。

② 《闽西工作报告》(1929年8月22日)，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1936年)，第112页。

③ 《江西省委通告》(1929年6月1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6页。

④ 《闽西工作报告》(1929年8月22日)，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1936年)，第110～111页。

五、严格党内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党内经常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克服党内各种不正确倾向的重要措施。1929年春以前，无论是红四军党内，还是在赣南、闽西地方党组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都不浓厚。特别是在地方党组织中，较普遍存在支部生活不能正常开展，支部会议较少召开等现象，因而使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渠道不通，气氛不浓。1929年夏以后，红四军党内对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对于如何搞好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总结出了一些方法，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1929年7月13日红四军第三纵队政治部编印的《党员训练大纲》中。《党员训练大纲》设立专节论述"怎样批评同志"这一问题，主要思想有：

1. 指出了批评的作用

认为批评可以使同志之间互相知道自己的错误从而有助于随时纠正；因为要互相批评，也可以养成同志间互相观察互相监督的习惯；即使有些同志不接受批评，然而对不接受批评的同志进行批评，也可以防止个人的不正确思想波及到全体；批评还可以使同志间消除意见和误会，从而心情愉快地一道工作。

2. 明确了批评的方法

批评要讲究方法才能得到效果，达到目的。这种方法有：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根据事实来批评，亦即反对无原则的和不讲事实根据的批评；为了能使批评有事实有根据，必须在平时注意观察同志的言行举止；批评要考虑到对方能否接受，不是任意说了就算了；批评时要善于指出错误的原因以便同志纠正；如果被批评者不接受批评，要说明理由，如果多数人认为必定有错，即被批评的一方则须接受，这就是批评中使用的"团体批评"的方法。

3. 阐述了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应有的正确态度

对于批评者来说，批评同志时要态度诚恳、言词和蔼，批评别

人是为了让别人做得更好，因而必须坚决摒弃攻击、谩骂；批评不是报复，更不能吹毛求疵，把问题扩大化、复杂化；批评也不是攻击，不是鄙笑，因而不能冷嘲热讽。对于被批评者来说，首先要认识到别人批评自己是为了自己好，是出于好意，不要有抵触情绪；其次要虚心接受批评，不要表面上接受而实际上却依然如故；再者，当受到严重批评时，更须猛省自己错误之深切，切不可因此而怀恨在心。所谓接受批评，一方面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则须猛力纠正。

4. 概括了批评的范围

批评的范围是多方面的，举凡工作方面、纪律方面、行动方面、说话方面、态度方面、性格方面、思想方面、看书方面、嗜好方面等等，只要存在问题，都可以提出批评。

上述内容，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比较早的系统、完整地对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出的条文规定。这一规定的形成，说明在红四军党内生活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逐步趋于正常。

1929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红四军“九大”进一步发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关思想，认为在党内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这种认识比原来又提高了一步，已经触及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实质上的作用和意义。尤其是“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的思想的提出，进一步规范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轨道，表明了我们党已经可以得心应手地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加强党的建设了。

据曾参加过中央苏区斗争的党员回忆，当时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很盛，尤其是在红军内部及基层党组织中更是这样。我们从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中亦可看出，当时党的组织向上级领导机关报告自己的工作时，从不隐瞒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有些比较严重的错误缺点，都能如实向上级报告，作出自我批评。同志之

间有什么缺点也能毫无保留地指出，有不同意见和看法都能摆到桌面上来。这种优良的作风是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成果和显著特征。

第三章

古田会议与毛泽东建党理论的初步形成

第一节 红军党内关于党的建设的认识与分歧

红军党内关于党的建设的认识与分歧以及党的建设认识的统一和分歧的最终解决，是1929年一年中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期间党的建设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的解决，最终导致了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的诞生。可以说，1929年党的建设问题上诸多问题分歧、矛盾、斗争的过程，正是毛泽东建党理论初步形成的客观历史背景。没有分歧、没有斗争，就不会有统一的思想和认识，也就不会有“古田会议”和毛泽东建党理论的初步形成。

一、分歧的表象与实质

红四军党内关于党的建设问题上的分歧，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党内存在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是造成1928年红四军“八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仅如此，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还将产生军队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严重地妨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红四军党内关于党的建设上的分歧必然也反映在四军的高层领导之中，核心人物是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四军军长兼四军军委书记朱德、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和一度担任四军军委书记的刘安恭。分歧的表象最初反映在要不要设置红四军军委这一岗位。围绕这一岗位的设置，红四军高层领导中间有不同的看法并产生观点相左的争论。

1928年11月6日，根据中央6月4日给毛泽东、朱德的指示信，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下设军委和职工运动委员会，朱德为军委书记。无论是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还是朱德的军委书记，都是中央直接点名决定的。前委和军委的隶属关系与职责，有所分工，两个机构的主要领导人又都是前委委员。红四军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途中，为应付恶劣环境，减少领导层次，便于当机立断指挥军事，乃于1929年2月初在赣南项山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会，由前委统一指挥；3月攻占汀州后，又取消由毛泽东兼任的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前身为职工运动委员会），改建为红四军政治部，作为前委领导下的党的工作机关。

本来，机构的设置与变更是服从和服务于政治任务的需要的，上述变更既是适应环境的需要，也就无可厚非，无论是毛泽东、朱德、陈毅都能服从大局，在所在岗位相安其职。5月上旬当红四军转战到达赣南宁都时，刘安恭受中央派遣来到四军工作，四军随即委以政治部主任之职。5月23日红军首占龙岩之后，因工作发展，红军数量大增，前委兼顾不过来，于是决定组织军委，由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这一情况毛泽东在6月1日给中央的信中作了交待，但同时也指出"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①]。

① 《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6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党内现发生些毛病”，应该是红四军党内分歧的明朗化。这种分歧的明朗化与刘安恭的工作思路和工作作风有密切关系。刘安恭早年留学德国，1924 年回国后参加过南昌起义，随后又赴苏联学习军事。担任军委书记之职后，对于红军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缺乏了解的他，却对于红四军的领导体制与战略战术很不以为然，希图以苏联红军的模式来改造红军。因此，他刚当上军委书记没几天，就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作出决定：前委只能讨论红军行动的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刘安恭的这一草率决定使一段时间以来若隐若现的军队建设的原则分歧明朗化。

显然，以下级党委限制上级党委的决定，不仅有悖于组织原则，而且必然引起党内混乱，致使军中最高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的工作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于 5 月 25 日占领永定之后立即在湖雷召开前委会议来讨论前委与临时军委的关系问题。出乎毛泽东意料的是，湖雷会议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湖雷会议不但没有解决毛泽东想要解决的问题，反而使分歧进一步白热化、公开化。

会上有一些人对毛泽东主持下的前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甚至指责前委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因此主张把临时军委恢复为正式的军委。显然，批评的矛头指向毛泽东，并希图用恢复军委来削弱毛泽东的权力。归根到底，是要以突出军事削弱前敌委员会的职权。①

但是毛泽东的拥护者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认为赣南、闽西苏区尚在发展之中，地方工作还没有完全展开，领导工作的重心仍在军队，而军队的指挥必须集中机敏，只有在前委直接领导下才有利于红军的行动，重新恢复军委只能使机构重叠，徒增困难，进而批评

① 参见《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版，第 98～99 页。

主张恢复军委者为"分权主义"。①

很显然，对立的争论已突破是否要设立军委的表面层，触及到红军建军原则的深层次问题，即党如何领导军队，如何使军队发挥最有效的作用问题。事实上，这些分歧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暴露。大部分来自农民和旧军队的红军指战员，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农民意识和旧军队陈腐意识的影响，有些人热衷于流动游击和走州过府，甚至宁愿接受军官的权威，也不愿受共产党的约束；宁可回到自己的家园去保卫自己的土地，也不愿去开拓更加广阔的红色区域。这些错误意识，导致了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倾向的发展。由于分歧由来已久且又涉及高层人物，湖雷会议上出现的论争没有达成共识，分歧在继续演化。

然而，毛泽东显然是很自信能解决这一分歧的，所以他在6月1日给中央的信中并没有详细汇报争论的情况，而以"正在改进中"一句话轻轻带过。一周后，红四军在第二次攻占龙岩之后移师上杭白砂。毛泽东于6月8日两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并试图解决争论的问题。但从湖雷会议之后的各种议论来看，毛泽东意识到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坚持单纯军事观点与削弱中共在军内权力的思想还有相当市场。鉴于分歧如此严重且争论双方又各不让步，身处窘境而又倍受指责的毛泽东于是向会议提出了一份辞职的书面意见。这份意见书有4点：第一，前委和军委发生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第二，根本的分歧在前委和军委之间。第三，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即有人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第四，有些人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作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发生根本问题，由此影响到四军全党，

① 参见《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98～99页。

工作完全做不起来。基于以上四点，毛泽东郑重提出，他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①

白砂会议传阅了毛泽东的意见书。早在5月18日瑞金前委扩大会议上因散布悲观论调而受到毛泽东批评的林彪却转而支持毛泽东，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毛泽东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不仅如此，林彪还在会议上公开指责朱德想成立军委以脱离前委的羁绊和管束，林彪此举使这场争论更加复杂化，并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与发展了上层的矛盾。最后，白砂会议以举手表决形式作出裁决，结果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多数，作出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事实上，刘安恭的发难以及是否要设置军委的争论仅仅是深层次思想分歧爆发的导火索。虽然临时军委决定取消，组织人事安排作了变更，但也只是稍微控制了争论的升温，争论的根本问题依然存在。

6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较为系统地概括和归纳了红四军党内争论和分歧的主要内容，涉及以下14个方面：(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对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对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湖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范化问题；(十一)四军的军事技术问题；(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

在毛泽东看来，争论的焦点以军委是否存在而表现出来，但在上述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最实质的问题就是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问题。毛泽东的观点是鲜明的，他认为在当前军事环境之下，全军权力集中于前委有利于行军作战，增设军委只是一个重叠的形式主义机构，徒增麻烦。那些指责"前委管的太多"的说法，无非是

① 江华：《关于红军建设的一场争论》，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分权主义"的一个借口，这与共产党及红军的组织是不相容的。因此，毛泽东强调"党管一切"，主张一切权力归支部，党员个人必须完全服从党的组织。

然而，作为一军之长的朱德，也有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党管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在党内不能有自由这三点主张不以为然；对于取消军委也有不同意见。自从1929年2月取消军委后，军中党的一切工作自然就集中于前委，而毛泽东一身兼任前委书记、军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相形之下，军长的权力就很有限了。因此，在刘安恭到达四军后，他支持刘安恭担任政治部主任，并赞成恢复由刘安恭出任书记的军委。但朱德并不否认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他所不同意者，是把党对军队的领导绝对到包办一切，以至连一颗子弹也须由党来支配的程度，他希望在军队内部允许在党的领导前提之下有更多的民主和自由。出于这些考虑，他于6月15日在新泉也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提出要打破家长制和包办制，主张在军内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和朱德分别给林彪的信，同时在《前委通讯》第三期上全文刊载。争论并没有结束。

二、中共红四军"七大"对分歧的调和处理

自永定湖雷和上杭白砂会议以后，四军党内的分歧已完全公开化和明朗化，有关争论的内容、实质及主要人物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然而白砂会议对存在问题的解决是十分表面的，只解决了标，并没有解决本。要解决这种对立的分歧，关键是要统一思想，解决深层次的思想认识问题。

1929年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随后成立了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红四军前委决定利用这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一方面稍作休整，另一方面准备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据当时担任这次大会筹备工作的红四军政治部秘书

长江华回忆，召开红四军“七大”的目的是要“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创建发展农村根据地的伟大革命斗争任务”①。江华还认为，召开这个会议是完全必要的，是红四军领导人共同研究决定的，不是任何个人所为，而且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和愿望是好的，是想统一思想，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

通过召开代表大会的方式来解决分歧、统一思想，应该说这种决策是十分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红四军领导人急于解决分歧的迫切心情与愿望，初衷的确是好的。然而在分歧那样深刻，党内是非观念还相当模糊的情况下，这次大会召开的条件显然并不成熟。会议既要统一思想、解决分歧，会前就必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就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导向，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是非评判标准。当这些条件并不具备时，大会预期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

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伦明堂（今龙岩一中内）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党代表和士兵代表等。由于会议没有一个明确的导向，前委领导人之间及军事干部同政治干部之间平时已经有过的争论原封不动地在大会上再次引起激烈的争论。大会一开始，便相对集中地形成以下争论“热点”：

第一，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自1927年9月底的“三湾改编”后，党的组织成为军队的领导核心，党代表是领导核心的负责人，党的前敌委员会是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但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有些带有旧军队意识的习惯势力干部，感到“党代表的权力太大”，“前委包办代替了军委的工作”等②；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则仍

① 江华：《关于红军建设的一场争论》，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② 《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7—1930.4）。

然坚持“党管一切，党管理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据江华回忆，“会上对军队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以及政治部对外还是司令部对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① 可以想象，这个问题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

第二，关于军队内部民主制度问题。有的同志认为，自上而下的民主，结果还是党代表最后集中，实际上是“家长制”，因此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事无大小都要先交下级讨论，然后上级再作决议。

第三，关于反对军阀主义残余问题。红四军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了克服旧军队的管理与教育方法，充分发挥士兵的积极性，在部队连以上单位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拥有很大权力，如检查一切缴获、审查账目、监督干部、署名出布告，等等。一部分主张“军队以服从为天职”的同志便对士兵委员会意见很大，提出取消士兵委员会的要求。有相当一部分干部从维护所谓军风军纪出发，认为“不打不骂是带不好军队的”，“城隍庙里的鼓三天不打就上灰尘”，甚至主张枪毙逃兵等等。②

第四，关于建设根据地问题。有些同志主张以红四军全部力量巩固闽西革命根据地，协助闽西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红色政权。但也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巩固根据地是地方党组织的事，“军队只管打仗”，因而“对建立苏维埃、建立农民协会、建立游击队和农村中的党组织，不关心或不太关心，不积极做群众工作。”③

---

① 江华：《对赣南分兵、红四军“七大”等几个历史问题的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2 页。

② 赖毅：《关于古田会议的一点回忆》，载 1960 年 12 月 28 日《解放军报》。

③ 肖克：《伟大的建军纲领》，载《红旗》杂志 1979 年第 8 期。

整个大会是在折衷和调和的主基调下召开和结束的。首先从会议的主持人来看，由于毛泽东和朱德是这场争论的主要人物，所以会前由介入争论不深的陈毅暂行代理前委书记，负责筹备和主持大会的召开。作为大会的主持者，陈毅力图不偏不倚，息事宁人。其次，从大会的争论和发言来看，争论没有导向且毫无拘束，不仅毛泽东和朱德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与会代表也即席发言，拥护毛泽东者有之，赞成朱德者亦有之。第三，最能说明折衷和调和基调的，便是大会通过的由陈毅起草的决议案。

决议首先对过去的政策和重大争论作出回答，其中最主要的是要不要根据地和如何建立与巩固发展根据地，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牵涉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流寇思想”以及单纯军事观点问题。决议对井冈山时期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军的某些制度作了基本肯定的结论，指出 1928 年 7 月红军大队开往湘南，有“农民意识的回家观念，避免边界斗争的逃跑主义，是不对的”。认为红四军的党组织所确立的武装地方红军，在军内建立宣传兵制度和士兵委员会也是正确与必要的。决议对于毛泽东的某些基本观点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认为“毛同志所指出的偏于军事观点，不注意地方的武装，湖南军事行动之错误……及其他腐败思想，这些都是对的，的确有些同志犯这个错误毛病”。

这个决议对于近两个月来争论焦点的军委设置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设立军委的意见，认为这确系机关重叠，没有必要。决议还指出，“规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这是临时军委的错误”，有人认为党代替群众组织的说法，“完全不是事实”；说前委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失于武断、不合事实”；所谓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则“纯属偏见”。①

无疑，上述结论都是红四军“七大”的功绩，对于以后红四军的

①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版，第 102 页。

发展以至后来形成古田会议决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个决议由于站在折衷与调和的角度，不免存有另外一个消极的倾向，主要的方面是对于“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的极端民主化观念以及流寇主义思想都没有予以批评；对于其他一些争论的问题也采取了折衷平衡、息事宁人的态度。尤其是毛泽东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大多数代表接受，因而未能在决议中作出明确的回答。

此外，大会还对毛泽东和朱德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大会对毛泽东和朱德都作了批评，认为作为全军主要负责人，他们两人对于党内发生的争论负有责任，有同等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因此，“毛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至于朱、毛去留问题，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作决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员。[①] 在大会最后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毛泽东未能当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前委委员有毛泽东、朱德、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高静山、朱云卿等13人。从大会通过的决议和毛泽东受严重警告并被选掉前委书记的结果来看，中共红四军“七大”是一次并不成功的会议，大会虽然澄清了一些是非，但主要的问题却没有解决，甚至某些分歧还有所深化。只是人事上的重大变动以及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军，暂时停止了长期以来在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党内的思想分歧也暂时被搁置起来。

---

① 转引自张国琦：《毛泽东与朱德在一九二九年》，载《东方纪事》1989年第3期。

三、红四军出击闽中、东江失利与党的建设的教训

1929年10月18日，朱德代表前委在上杭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指出“党内争论问题，自七次大会后，即告结束”。那么，争论结束后的红四军党内状况和军事状况如何呢？

1929年7月上旬，蒋介石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对闽西苏区和红四军实行“会剿”的气氛十分紧张。红四军前委于7月8日作出决定：红军四个纵队分别开赴闽西各县，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赤色区域，打破国民党三省“会剿”。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全国红军的会议，指定红四军须派一人前往出席。由于毛泽东重病在身，前委确定由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的职务由朱德代理。朱德一人独立指挥红四军对付国民党军的三省“会剿”。

7月29日，红四军前委在上杭蛟洋召开紧急会议再次商讨击破“会剿”的良策。会上，“有人主张集中兵力在闽西奋斗，有人主张打出去，结果前委以为在闽西是没有多大的办法的，遂决定打出去”。[①] 其中以第四纵队留在闽西一带发动群众，在群众包围中应敌，以第一、二、三纵队出击闽中，后因第一纵队未赶上，于是朱德率领第二、三纵队于8月3日开始了出击闽中的行程。8月5日，红四军主力进占宁洋，8日攻下漳平，尔后向大田、德化、永春前进，并计划渡过乌龙江，向浙、赣、皖边界游击。由于闽中一带缺乏党和群众基础，红军得不到群众的帮助，加上山高路险，又值盛夏疾病流行，给部队造成很大困难。当红军进至永春福鼎山时，碰上土匪阻击，红军损失300余人，枪100余支。这时红四军前委收到闽西特委来信，告知闽中一带山河险阻，防守不便，又无群众基础，

① 《红军第四军状况》(1929.7—1930.4)，《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9页。

如红四军“过了乌龙江则敌消息灵通，运输便利，更有受大军包围危险”，建议“前委再调四军回闽西”。红四军前委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重返闽西。9月6日重占龙岩，顺利返回到闽西。而留在闽西的第一、四纵队，在群众大力配合下，则捍卫了闽西革命根据地。随着二、三纵队与一、四纵队在上杭白砂的会合，宣告了蒋介石一手经营的第一次三省“会剿”的破产。

然而，红四军出击闽中的损失本是可以避免的。而之所以不能避免则是由于极端民主化和单纯军事观点没有解决。7月上旬原定在闽西分兵与就地打破三省“会剿”的军事行动计划，到下旬却因为有人主张打出去而变更，于是选择向缺乏党和群众斗争基础的闽中出击，这应是极端民主化思想干扰了原定计划之执行的缘故。红四军出击闽中后又曾一度决定渡过乌龙江远出赣浙皖边界游击，则更带有冒险成份，这应该说是单纯军事观点在军事行动上的反映和表现。

为了解决红四军在“七大”以后滋长起来的错误观念，也为了总结红四军出击闽中失利的教训，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单纯军事观点错误思想，朱德于1928年9月下旬在上杭县太忠庙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继续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上失去领导中心，会议争论不休，“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①] “当时的前委什么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样干就怎样。前委事先对于选举没有丝毫意见，结果选出来的八届前委，又是同从前一样”，而且更甚的实行所谓“自下而上的民主制”，“一开会就得争论半天”，“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党代表的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有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前委还认为这样才是无产

① 《红军第四军状况》(1929.7—1930.4)，《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4页。

阶级的办法”。①

目睹这种局面，红军内许多同志很不满意，许多党支部联名写信，纷纷要求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领导工作。朱德也深感只身一人应付不来，因而在此期间亦致信毛泽东，请他返回主持前委工作。

在朱德等红四军其他领导人的一再要求下，毛泽东从永定金峰大山的牛牯地来到了上杭城内，回到了红四军。由于形势的变化，在上杭南门一座叫“临江楼”的小楼里没住上几天的毛泽东再一次与红四军分手。1929年10月13日，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长谢汉秋专程由厦门赶到上杭，带来了中共中央和福建省委给红四军发来的最新文件，指示“红军全部即到东江游击，向潮梅发展”。② 前委决定遵照中央和福建省委的指示，于一周后率领全军出击东江。此时毛泽东刚刚可以下床行走，难于随军。因此前委确定毛泽东留在闽西继续养病。有了出击闽中的教训，此次又出击东江，朱德感到压力很大，责任更重。10月18日，朱德离开上杭前，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红四军的行动，并说：“陈毅同志仍未回来，毛同志久病，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负责同志更是困难”，希望中央派广东省委的重要干部前来指导。③ 10月20日，红四军一、二、三纵队分别从武平、永定、上杭出发，向东江进军。

在红四军出击东江的整个军事行动中，以在梅县损失最大。而梅县的失利又同红四军党内的极端民主化不无关系。出击东江最初几天，红四军气势很壮，打了几个胜仗。“我们计划各纵队分散在东江各地发动群众，大家都说分散易于各个被击破，讨论结果觉得

① 《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7—1930.4)。

② 《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出席全国劳动会议及闽西红军行动问题的报告》(1929年10月8日)，中央博物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下)，第339页。

③ 《四军前委关于开往潮梅一带游击的报告》(1929年10月18日)。

还是集中行动的好；同时探知梅县只有郭思远教导团，大家一致决定反攻梅县”，[①] 然而恰恰就是“大家都说好”的主张却使红四军在攻打梅县时损失约200余人，枪数十支。红四军反攻梅县失败后，遂折由太平、石上进入江西寻乌、安远境内，11月13日退入闽西，进入武平县境，11月18日在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红四军又回到了上杭。

红四军出击东江，不仅军事上失利，“这次到东江从梅县出来，精锐损失不少，一纵队缩编为两个支队；二纵队收编的俘虏动摇而沿途逃跑，也缩编为两个支队；三纵队缩编为一个大队。合计损失一千多人”[②]。而且根本就没有达到使闽西、东江连成一片的目的。失利的原因一方面是前委盲目地执行党中央和福建省委的主观主义命令，缺乏明确的军事计划和作战目标，另一方面也由于“四军八、九、十三个月中，前委机关不健全，毛同志去地方养病，陈毅同志去中央，前委只剩朱德同志一人，因此应付不开，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③]。因此，红四军出击东江与出击闽中一样，乃是由于对敌我军事形势估计错误而进行的一次单纯军事行动，也是红四军党内单纯军事观点这一错误思想的表现。

从出击闽中失利到中共红四军“八大”的召开，再到出击东江失败回到闽西，给广大红四军指战员以深刻的启发，他们在实践中总结了经验教训，逐步认识到忽视党的正确领导的严重后果，对极端民主化和单纯军事观点给党和红军带来的损失也有了切身的感受和体会，红四军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分歧的解决已初现曙光，只

---

① 《红军第四军状况》(1929.7—1930.4)《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0～501页。

② 《红军第四军状况》(1929.7—1930.4)《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1页。

③ 《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7—1930.4)。

待时机了。

第二节 古田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阐述

一、中央“九月来信”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排除了思想障碍

1929年7月下旬，陈毅奉命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且出席中央军事联席会议。8月底陈毅抵达上海。事实上，还在陈毅到达上海之前，中央在收到红四军“七大”的决议及其他有关文件之后，便觉察到了红四军领导层内发生分歧的严重性，即于8月1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红四军问题。中央决定不等陈毅到达，先由周恩来起草一份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于8月21日写成。[①] 中央的这份“八月来信”，意在解决红四军急需解决的问题，至于全面的答复，准备等陈毅到达后，听取汇报再行讨论。

“八月来信”特别肯定红四军在全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红四军不仅对于闽西有极大影响，而且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比对闽西的影响更大，因此保证这支队伍的实力与扩大，“便于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保全与扩大”。中央给红四军规定了目前的任务，首先是“游击区域的发展，农民武装的加强，红军的扩大，而土地革命的深入更是根本任务”。

中央“八月来信”所要急于答复的问题，是要使红四军的领导明白当前的任务是对敌斗争，而不是党内纠纷。这表明，当时中央还没有认识到红四军党内争论的那些问题已到了白热化和不解决就不能担负起红军的政治任务的严重程度。尽管如此，中央从红四

① “八月来信”全文刊于《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

军“七大”决议和毛泽东、朱德、刘安恭等人发表的意见中，已经能够判明是非。因此，中央从加强对敌斗争、平息党内论争的角度，着重批评了红四军“七大”，也批评了论争各方。但从这些批评中，中央的观点和倾向是明显的。

中央“八月来信”指出：“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润之、玉阶（即朱德）同志亦特别重视个人的争论。尤其重要的是各方面都主张扩大军事中的党内民主化，玉阶主张固然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便是润之的答复也还不能对于军队中之党的支部工作，尤其是在目前转战千里之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有一明确的答复。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的回答他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需，而同时又没有将‘党管一切’之不妥当的涵义与解释，给以恰当的批评。这些都证明你们在一切组织路线上还欠缺正确的认识与了解。……在大敌当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你们应指出红军中党的生活之正确路线，号召全体同志消灭一切纠纷，一致地拥护此正确路线，向着敌人奋斗。”在这段话的后面，中央还特别强调红四军前委必须遵照中央这一指示精神，“整饬自己的队伍，正确自己的路线，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向着敌人作艰苦的战斗”。可见，中央同样十分重视端正红军的政治方向，反对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对于红四军党内论争的几个主要问题，中央“八月来信”提出了明确的意见，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主要内容有以下4点：

第一，认为红四军前委关于“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的意见非常正确，武装农民是扩大红军的前提，必须坚持这一路线，“不容许有丝毫动摇”。

第二，认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是要把红军引向流寇土匪的道路。

第三，认为目前游击状况之下，前委之下不须另设军委，待将来苏维埃政权确立之后，再在革命政权机关之下另设军委以指挥

军事。

第四，在当前战争环境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不能认为因此便没有党内民主化，也不能因此而认为可以恢复家长制。中央认为，所谓集权制，就是民主集中制，是在集体领导组织中的集权，绝不是个人的集权。当然，作为书记，所负责任更多一些，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是“家长制”。中央“八月来信”同时也指出，“党管一切”的口号，是个涵义不明确的概念，容易引起误解。

中央“八月来信”明显地赞同了毛泽东的观点，批评了红四军“七大”暴露出来的那些非无产阶级思想。

8月底，陈毅到达上海，随即向中央的政治局常委李立三作了口头汇报，并于8月29日出席了专门听取他报告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陈毅在上海期间，根据中央的要求，写出了《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等5份报告。陈毅在这些长达数万字的书面材料中，更加准确全面地汇报了红四军自1928年4月成立以来的全部情况。中共中央从陈毅的口头和书面报告中，第一次完整地获得了关于红四军及南方各省社会政治状况的材料。

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由李立三和中央军委书记兼军事部长周恩来以及陈毅三人组成的委员会，研究有关红四军的问题。后来又由周恩来委托陈毅，代中央起草第二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按照周恩来的思路，结合四军的实际状况，陈毅写出了初稿，经过周恩来修改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于1929年9月28日签发。

这封后来被称为“九月来信”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在历史的又一个重要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的一些重要内容，与8月21日的中央“八月来信”精神大体一致，但又

阐述得更加系统和深刻。特别是对于前一时期红四军党内论争的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作了更加具体的答复。关于红四军的任务，“九月来信”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①] 这就表明中央把红四军的影响再次提高到全国的高度，也表明中央对于红军与农村苏维埃区域的建立与发展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中央“九月来信”除了对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等分别作出指示外，还专门对“红军中党的工作”作出如下指示：

1. 党的组织系统可保存现在状况，前委委员不要过 9 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在军队中采取秘密形式，党的机关设在政治部内，党的机关的人员不要过多，要尽量利用群众组织中的人做事。

2. 党的工作路线。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

3. 集权制问题。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

4. 团的小组。连支部设 C. Y 小组属于连委管理。纵委前委中

---

① 《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 年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77 页。

设青年工作科，表面归政治部，计划并指导C.Y小组如何在群众中做青年工作。前委更须帮助所到地区的C.Y工作。

5.组织上的争论问题。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不通，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目前前委指挥军部、政治部，这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是作经过支部去工作的解释，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

6.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落，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7.成立边界特委问题。在几省边界工作可以联系，能够指挥时，可以成立特委，目前则尚不需要。如今后工作发展，前委即可负责特委的责任，届时再报告中央指定名单，或开边界各县代表会议选定。

8.前委在红军经过区域与地方党部有密切联络，一切地方政治问题应与地方党部开联席会议决定。如所经地区无党的组织时，前委应尽可能从发动群众斗争中帮助建立地方党部组织。①

"九月来信"指示前委和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大家团结一致，加紧对敌斗争，实现红军所担负的任务。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中央"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

① 《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1980年12月第1版，第40～42页。

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取得的成绩，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指示红四军前委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并分析了这些不正确倾向的危害，提出了纠正的方法。这就为解决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排除了思想障碍。

二、古田会议确立党的建设基本原则

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离开上海前往广东去寻找正在东江地区活动的红四军。10月22日，陈毅在广东松源见到朱德，回到了前委机关。陈毅在当天就向朱德和前委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详细报告中央指示的全部精神。朱德、陈毅以及前委的其他成员一致赞同中央“九月来信”的意见，决定在完成东江作战任务之后在全军加以贯彻。

11月23日，出击东江的红四军返回闽西后再次占领长汀。此前，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交在上杭的毛泽东，请他重返红军主持前委工作。红四军进抵长汀的第四天，毛泽东也由上杭蛟洋到达长汀，与朱德、陈毅等会合。毛泽东到达长汀当天，随即召开前委会议。重新回到红四军的毛泽东，即着手全面整顿红四军，准备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全面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

11月28日，毛泽东给中央和李立三分别致信。在给中央的信中，毛泽东说：“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的指示，在前委工作。”有了中央“九月来信”，毛泽东对于纠正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信心十足。在给中央的信中，毛泽东接着指出：“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回，中央的意

思已完全达到。”①

为了开好红四军“九大”，前委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红四军首先在连城新泉进行了10天的政治军事整训，同时在党内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在新泉期间，毛泽东、陈毅接连几天召开支队长、大队长调查会，还深入连队召开战士座谈会，到附近农村召开群众座谈会，找干部、战士个别谈话，仔细调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与此同时，朱德领导了全军的军事训练。通过训练，士气高昂，军威大振。

这时，敌人加紧对闽西的“会剿”。12月5日，卢新铭率领4个营进占汀州，赣敌之六十九团也于同时抵汀。为此，前委又率领部队开赴上杭县古田镇，继续为召开红四军“九大”作准备。

在古田，毛泽东、陈毅在新泉调查的基础上，召开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发扬民主，大胆地揭露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共同分析研究各种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危害和克服办法。会后，各单位又召开党支部会议，传达联席会议内容，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作初步检查，带动党员干部弄清思想，提高觉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接着，前委又召开各大队支部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联席会议，分组讨论和起草各种提案。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各提案小组经过十多天讨论，不仅对各种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取得了一致认识，而且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写出了各个提案的草案。在这基础上，毛泽东起草了长达3万字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完成了大会的准备工作。

经过充分准备，12月28日至30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曙光小学（原廖氏宗祠）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20多人。大会先由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毛泽东、朱德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古田会议一扫以往红四军“七大”、“八

① 《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11月28日）。

大”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大会主旨十分明确，就是要通过这个会议作出一个决议，确立正确的建党建军的根本方向。因此，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就成了大会讨论的主要内容。

由于会前准备十分充分，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共分 8 个部分：(1)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即《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2)党的组织问题；(3)党内教育问题；(4)红军宣传工作问题；(5)士兵政治训练问题；(6)废止肉刑问题；(7)优待伤病兵问题；(8)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

《古田会议决议》有着丰富的党的建设思想，是我党早期党的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虽然它是针对红军中党的建设的具体问题说的，但实质上揭示了我们党自身建设的规律和特点，从而奠定了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基础，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1.《决议》突出了党的思想建设，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原则及措施，从而指明了在中国具体条件下建设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根本道路。

《决议》一开头就明确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①] 这就把党的思想建设同执行党的路线紧密联系起来了。

决议对从思想上建党着重强调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思想上建党，必须抓住党内的主要矛盾。决议列举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八种表现：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

①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 年 12 月)，《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5 页。

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这些错误思想就其性质来说，有的属于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有的则是流氓无产阶级意识，如流寇思想；但从总体上看，绝大部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固有思想的表现。因此，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是红四军党内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就抓住了红四军党内存在问题的关键。

古田会议正是从这一实际出发，在决议中充分揭露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论述其危害，分析其根源，并指出纠正的方法。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在思想意识上，必须克服个人主义。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都是个人主义的直接表现。个人主义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极端民主化；见之于组织生活方面就是非组织观点；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则是绝对平均主义。可见，个人主义是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主要表现和核心。因此，必须加强教育，认识个人主义在党内存在的根源及其对革命的危害，从思想上进行纠正。

在思想方法上，必须克服主观主义。当时，在红四军某些党员中存在着浓厚的主观主义，这对于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因此，反对主观主义是党内思想斗争的最本质的问题，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古田会议还对当时突出存在的否认党的领导的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和纠正。决议指出，把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军事领导政治，把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都是错误的。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治，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决议明确指出，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这就使广大指战员懂得了红军的

性质和任务，增强了党的观念和服从党的领导的自觉性。

第二，从思想上建党，必须加强党内教育。古田会议决议强调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① 所以，古田会议把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把"党内教育问题"作为独立的一部分写进了决议中。

决议针对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的不同表现，提出了党内教育的要求和目的。例如：针对主观主义，提出要对党员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以便使党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针对个人主义，提出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认识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针对极端民主化现象，强调教育党员认识极端民主化思想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在党内的反映。为了加强党内教育，决议还规定了十项教材（如政治分析、组织常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等）和十八项教育方法（如读党报、训练班、个别谈访、批评、小组会、支部大会、活动分子大会、政治讨论会等）。决议还规定了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的教材十九种和教育的方法七项二十八条。这就使党内教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从而有助于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第三，从思想上建党，必须正确开展党内批评。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之所以存在和发展，除了缺乏党内教育外，党的领导机关乃至广大党员对这些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斗争，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有鉴于此，古田会议决议着重指出，要正确

①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 年 12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16 页。

使用党内批评这一有力武器。首先，党内批评的目的是为增强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其次，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再次，批评要严格区别组织内和组织外，对党委和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要在党外或会下乱说。

2.《决议》提出了党的组织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严重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的执行非常之大。"① 为此，大会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根据会议精神和有关规定，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其主要思想有：

第一，坚持党员标准，严格入党手续。对此，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发展党员要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伕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这样发展党员，既能使战斗部队保持足够的骨干力量，又使党的组织遍及全军各个单位。决议还批评了过去"党员加入太随便"的毛病，指出以后新分子入党必须合乎5个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且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等，严禁把不够条件的人随便拉入党内。对于那些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赌博等屡戒不改的党员，不论干部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此外，决议还指出，吸收新党员一定要经过必要的手续，介绍人要审查被介绍人是否确实符合入党条件，介绍人对所介绍的人应负相当责任，支委要派人向将要入党的人谈话，考查其是否具备入党条件。

第二，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党的各级组织是各级战斗指挥

①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811页。

部。古田会议决议重申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党的小组采取党员干部与一般党员，知识分子党员和劳动分子党员混合编制的方法，并有计划地将各种出身不同能力不同的党员混合编组，以利取长补短，更好地发挥每个党员的作用。

第三，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一方面，党内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党员享受到应有的民主权利。为此，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遇有重大问题，要召开各种党的会议，充分听取党员的意见。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另一方面，又要有高度的集中，坚决反对极端民主化。党作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必须坚决执行，反对任何消极和怠工。

第四，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当时，红四军党内有些党员还未充分认识到党的组织纪律的重要性，因此还存在非组织观点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针对这种状况，决议重申：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古田会议还强调，遵守党的纪律和执行党的决议，绝不是提倡盲从。决议指出，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这就是说，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决不能单纯地做留声机、传声筒，而是要主动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 11 人组成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这就从组织上加强了党的领导，保证了决议的贯彻执行。总之，古田会议是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期间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所确立的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对全党的建设

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古田会议所阐述的党的建设的有关原理在此后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党的建设理论。

随着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结束了自红四军“七大”以来前委对全军在政治上失去领导核心的历史，红四军党内长期以来的论争到此时也打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会议结束后，红四军从纵队党委到大队党支部和班的党小组，都按照会议决议对照检查了各自单位存在的问题，对于违背决议的现象，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纠正。全军上下形成了一种反不良倾向的热潮。

古田会议很快得到中央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邓小平在担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后，于 1929 年 12 月，发出了《红七军前委通告》，要求各级党部要“以最大力量来注意党的组织问题”。党中央很快肯定了红七军的做法，指出红七军“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这是对的”。[①] 1930 年 5 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上指出：红四军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取得成效，已经“存在于群众拥护之中”，“执行了六次大会的政治路线，深入了土地革命，发动了广大工农群众”。由于有了正确的建军、建党路线的指导，各地红军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提高，组织上日益巩固，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

第三节 《反对本本主义》的发表与党的思想路线的初步形成

一、《反对本本主义》发表的时代背景

古田会议后，为了粉碎闽、粤、赣敌人的三省“会剿”，红四军前

①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军事学术》1984 年第 1 期。

委决定红军离开闽西向赣南出击，首先打乱敌人包围闽西的军事部署，然后相机消灭敌人，发展革命根据地。1930年1月下旬，离开闽西的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和毛泽东率领的第二纵队在宁都东韶会师。此时，蒋阎军阀混战爆发在即。红四军前委决定利用军阀混战之机，部署争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计划，命令第一纵队直取乐安，第二纵队沿途分兵打土豪直至滕田，第三纵队攻占永丰，第四纵队在宁都扩大红色区域。

在此后的日子里，毛泽东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分析和估量，坚定不移地实施他的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战略，按照既定的部署，以实现江西全省首先胜利的计划。正当毛泽东雄心勃勃、信心十足地实施他的既定战略和计划时，一股教条主义乌云正向中央苏区弥漫而来，毛泽东在他的工作中已经能够强烈感受到这股教条主义的气息。

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党内存在着浓厚的教条主义思想。一部分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新的"左"倾思潮正在酝酿之中。中共六大结束后两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随着局势的好转，党内"左"的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这种"左"倾思想的抬头，客观上是由于蒋桂战争的爆发，中苏之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使中共中央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在1929年内接连写来四封信，都强调要"反右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0月26日的信。它断言："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的开展着并且日益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战争等等）。"并且认为："盲动主义的错误，已经大致纠正过来。"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表示：

"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并表态，必须如国际所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任务。

自中共六大结束后回到上海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奉为经典，对于毛泽东执著执行的"以乡村为中心"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方式显然不满。在李立三看来，那种不敢向中心城市进攻，不赞同以城市为中心而主张在农村实行苏维埃运动的观点，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周恩来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之后，独揽大权的李立三，头脑更加发热起来，挥舞着共产国际给予他的"反右倾"的大棒，打击在党内持不同意见者。

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的陂头村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会议确定当前红军的三项主要任务是：(一)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是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二)深入土地革命；(三)扩大工农武装。会议认为，这三个任务的实现，"将使南方各省反动势力次第消灭于红旗之下，广大群众团聚在红旗的周围，成为推动全国革命的一大动力。"① 在此之后，毛泽东指挥之下的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遵照这一方针展开了大规模的分兵游击。

显然，"二七"会议的精神与李立三主张的以城市为中心夺取武汉的思路背道而驰。1930年4月3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指出"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在这封指示信中，中央以强硬的语言批评红四军前委"造成粤闽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和"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的观念是极端错误的"割据政策"和"保守观念"，是"失

① 《前委通告第1号》(1930年2月1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页。

败主义的表现”。中央在信中指示四军前委“立即纠正这一错误”，并要求毛泽东去上海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务须执行中央这一决定”。①

正在赣南的毛泽东，面对一个时期以来中共中央来信中不断显露出来的那些空洞说教式的理论，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党内弥漫着过分崇尚苏联经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作为一个前线指挥员和一个局部地区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无权对中央和李立三说三道四，他只能用深入的工作和一次又一次实际的调查取来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以启发党内同志，影响党的政策。受中央来信中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想的影响，红军党内也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这使得毛泽东不得不大声呼吁：“注重调查，反对瞎说。”

二、《反对本本主义》是《寻乌调查》的思想升华

如果说《寻乌调查》是摆事实，那么《反对本本主义》就是讲道理了。《反对本本主义》中的许多思想是毛泽东在多次调查特别是寻乌调查的基础上有感而发并加以提炼出来的，其中关于调查的方法和技术论述，相当部分就是寻乌调查的方法和技术。

1929年3月下旬，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南下粤赣边境，先克南康、大余，后越梅岭关占领粤北山城南雄，然后再北返赣南，连克信丰、会昌，于5月初进抵寻乌。

寻乌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是江西赣州、广东梅县之间的商品、物资集散地。这里商业比较发达，土地革命也已开展，土地革命

① 《中央关于红军的当前任务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30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8～60页。

中的一些矛盾问题特别是富农问题也有所暴露。在这样一个地方开展调查，较有代表性，也较典型。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红军离开了山头，跑向了平地，但不少人身子已下山，而思想却仍在山上，只注意调查农村而不注意调查城镇，对城镇贫民、商业资产阶级和中国富农的策略还很模糊。毛泽东说，这个时期，自己对于中国的富农问题还没有全部的了解，对于商业状况完全是门外汉，如果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客观的形势和强烈的主观愿望，使毛泽东下决心选择寻乌进行调查。

在长达十几天的调查中，毛泽东采取的调查方法，主要是召开调查会。毛泽东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先认识了郭友梅、范大明两位老先生，详细了解了寻乌城的有关情况。接着连续召开两场调查会。第一场调查会有 11 人参加，参加的对象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而且是熟悉情况的。这场调查会，毛泽东不仅对寻乌城 20 个行业 131 家大小商店的历史、现状及其主人的政治态度，逐个询问，而且对全县 7 个区 21 户大地主、111 户中地主的剥削形式、剥削手段及其压迫群众、反对革命的劣行表现，也逐户问得明明白白。这次调查会共开了十多天。第二次调查会，参加对象更为广泛，有 50 多人。毛泽东在上次调查会的基础上，把一些没有把握或不够清楚或似懂非懂的问题，一个一个提出来，让大家议论，而毛泽东则详细作记录。

这次寻乌调查，收获是巨大的。毛泽东从调查会上了解了全城 2700 多人中间上百名各种代表性人物的状况。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生动刻画了地主、富农、盐商、传教士、屠夫、政府官吏、清朝遗老的种种形象，特别仔细地描述了贫苦农民饱受剥削欺凌，以至卖儿为生的凄凉景象。

不仅如此，寻乌调查还具有超越其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政治影

响。寻乌调查是一次问计于民、求计于实的伟大行动，是对不了解情况而又瞎说一通的教条主义的反叛。毛泽东在随后挥笔而就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以自己特有的注重调查的方式，抵制了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想的瞎指挥。在毛泽东看来，没有调查的人，连发言的资格都没有，不了解中国具体情况的人，就无权对中国革命指手划脚。在那个年代，毛泽东的言论堪称是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

寻乌调查一洗党内某些人关起门来冥思苦索地“想方法”、“打主意”的习气，在党内倡导了清新的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从寻乌调查对毛泽东制定政策的影响来看，毛泽东力图通过事实来说话，绝不把理论强加于事实之上，因而他并没有完全依照中央的指令行事，甚至越来越明显地感到他与“左”倾教条主义者之间的那道鸿沟。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对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认识更加深刻、更趋成熟；对于那些只懂得照搬外国经验和按上级指令办事、脱离革命具体实践的“本本主义”更加深恶痛绝。

寻乌调查直接促成了《寻乌调查》的续篇《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的发表，《反对本本主义》是寻乌调查的思想升华。从这个意义上说，寻乌调查绝不是一次毫无目的、可有可无的一般性调查，它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初步形成的催产剂。随着寻乌调查的结束，一个新的思想路线就瓜熟蒂落了。

三、《反对本本主义》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原则

1930 年 5 月，毛泽东在寻乌进行大规模社会调查之后，根据亲身体验写了《调查工作》一文。这篇著作除了当年由闽西党组织印刷出版过几次以外，一直没有在别的地方发表，而且闽西出版的这些本子，也由于历经战乱，连毛泽东本人也未曾留下一本。1957 年 2 月，上杭县茶地农民赖茂基将珍藏的《调查工作》献出。直到

1961年1月，毛泽东才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找到他这份视为珍宝的著作。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印发给他在广州召集的一次会议，并在说明中指出："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①]1964年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文章所揭示的思想，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党思想理论建设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反对本本主义》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原则，主要有：

1. 文章在党内率先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认为："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②] 既然是瞎说一顿，那么，停止其发言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毛泽东甚至认为，共产党员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简直就是共产党员的耻辱。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实质上是坚持物质第一、实践第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这就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提供了哲学基础。毛泽东的这一思想随后又有了新的发展。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2. 毛泽东提出了"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观点，并且批评了解决问题上不经调查的"蠢人"、"懦夫"的做法。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

---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5页。

②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有关引文出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48～58页。

调查和解决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是‘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然而恰恰是在这一问题上，党内的一些“蠢人”、“懦夫”却不是这种态度。蠢人是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而这是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的。懦夫遇到困难问题则叹气、只会恼火，只会请求调动工作回避矛盾。毛泽东认为，只要迈开双脚，到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习孔夫子“每事问”，则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这就是“实践出真知”的观点，是建构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一块基石。

3. 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发现了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现象，这就是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有马克思主义“本本”武装的人反而成了革命叛徒呢？毛泽东在文章中毫不留情地揭开了有些人人为制造假马克思主义的面纱。

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概言之，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二要在结合实际上下功夫。马克思主义只有和实际相结合，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放之四海而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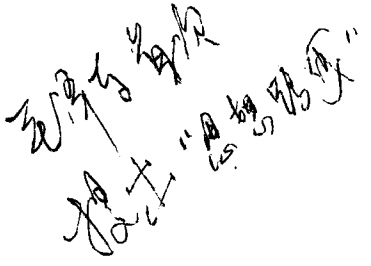
准。毛泽东所揭示的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正是确立思想路线的灵魂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正确的思想路线就难以确立。

4. 毛泽东认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才能防止一切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出现。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时发现一个规律，即“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毛泽东的这一发现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普遍的规律，即思想路线出偏差了，政治路线没有不出错误的。思想路线决定政治路线，有什么样的思想路线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要使思想路线正确，就必须洗刷唯心精神，而要洗刷唯心精神，就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

5. 毛泽东在党内公开亮出旗帜，主张“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实际上隐含着对党内教条主义者照抄照搬外国经验，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挑战。毛泽东从完成中国革命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出发，指出“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而“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生产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毛泽东正是分析了上述逻辑因果关系，即完成政治任务要有正确的策略，而正确的策略又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入了解，从而坦陈己见，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联想到中央来信中多次指责毛泽东的观点是“农民意识”、“保守主义”、“狭隘经验论”、“机会主义”等等事实，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加以回击。毛泽东指出：“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

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并且认为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而不是保守、僵化的路线。

总之，《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教育了党内许多同志，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批评了在党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的态度，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原则，从而标志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形成。



第四章

中央苏区的形成与“左”倾错误在苏区的推行

第一节 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推行及其对地方党组织的影响

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形成及其错误的建党理论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因此，在党的六大路线的指导下，经过全党的共同努力，到1930年，革命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全国党员人数增加到7万多人，产业支部发展到229个。工农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14个军7万多人，另有地方武装3万多人，并形成了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同年5月，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又展开中原大战，客观形势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非常有利。

但是，随着革命力量的增长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内“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再度抬头。1930年1月，中央政治局作出《接受国际1929年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认为中国“确已进到深刻的全

国危机的时期"①，党在这个时期的根本之主要任务是"争取革命运动里的领导作用与党的真正布尔塞维克化"②。因此，为保证党的主要任务的实现，党必须积极地领导群众斗争，组织群众斗争，推动群众斗争日益进到更高的阶段，同时在斗争中，要坚决地、勇敢地吸引无产阶级的积极的斗争分子，充实自己的队伍，引进斗争的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并不断地、无情地与党内党外政治上思想上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同年2月，党中央又发出第70号通告，强调指出，党在当前的中心策略是"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③，并且提出："只有坚决的执行这些中心策略，坚决的在这一集中进攻的总路线下加强党的主观力量，革命才能争取到全国的胜利，首先争到一省或几省的胜利。"④ 这些决议和通告，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形成提供了依据。

当时，在党中央主持工作的是向忠发、周恩来和李立三。1930年4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代表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而向忠发因为缺乏领导能力，党内实际工作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的李立三负责。5月15日，李立三发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一文，就党的战略总方针等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左"倾错误观点。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错误地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因此，“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① 根据这一总方针，决议要求全党“从现在起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并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② 同时决议还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错误地认定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③ 而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据此规定了一系列“左”倾政策，如没收民族工商业、消灭富农和建立集体农庄等。所以，这个决议案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任务、道路和性质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这就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为了推行这一“左”倾冒险主义，李立三在这个决议案中还提出了其“左”倾错误的建党理论。他认为，在实施党目前的战略总方针中，“党的组织力量的不够（特别在城市中），是革命的主要弱点”。④ 其具体表现，“首先是工人中发展的缓慢，无产阶级的基础未能迅速的扩大起来，新的工人化的干部引进得非常之少，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98～99页。

支部生活不健全，不能在群众中实现核心的领导作用。"[①] 其次是党在组织上"还表现着一种小资产阶级浪漫性的危险，不能有组织的、有规律的去进行工作，督促工作，常常表现着寒热症的状态"。[②] 他进而武断地认定，造成党的组织力量不足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支部执行反右倾的斗争异常不够，许多地方反右倾简直还没有传达到支部中去，以致许多动摇的右倾分子尚占据着支部的领导地位，妨碍着一切策略的执行"[③]。为此，决议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坚决执行反右倾的斗争"[④]，"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特别是尾巴主义的倾向斗争。"[⑤] 因此，过分地片面强调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和指导机关的工人化，并以加紧党内"反右倾斗争"来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政策，这就是李立三"左"倾建党理论的基本观点。它一方面说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内"左"倾领导对如何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不懂得决定党的性质的主要因素是党的指导思想和纲领路线，关键在于用什么思想教育和武装党员，而并非党内工人成分的多寡或指导机关的工人化；另一方面也表明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对当时党内严重存在的"左"倾情绪和党的组织力量不足的主要原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98～99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98～99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98～99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98～99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因没有深刻的认识，以致错误地认定右倾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并实行了“左”的党内斗争方针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这是李立三为强制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的组织保证和必然结果。

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对党的建设的危害

在这次会后不久，李立三等就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主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提出“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口号。这一冒险计划一开始就遭到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但都被李立三扣上“右倾”等帽子，横遭排斥和打击。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因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主张，被调出中央机关，到上海任沪东区委书记，不久被捕牺牲。江苏省委常委、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不同意李立三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被当作“右倾”典型受到批判，还被扣上“机会主义路线”和“取消派暗探”等帽子，撤销了其职务。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坚持“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方针，也被李立三斥之为“农民意识”、“保守观念”、“狭隘的游击战略”、“一贯的游击思想”、“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受到无理的打击。周恩来当时正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会议，因为不同意《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认为当时全国性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进攻中心城市的条件尚未成熟，主张应当经过充分的准备再搞城市武装暴动，就被李立三指责为“政治上组织上右倾，要负严重的政治责任”。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左”倾冒险计划的执行，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内“左”倾领导，在1930年7月于上海召开了党的全国组织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是全国中心省区和重要地方的同志，红军无人参加。会议听取了《关于支部的报告与总结》、《党的组织任务报告》、《组织任务的总结》和《政治报告讨论结论》，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集中体现了全国组织会

议的精神。会议期间，还发布了中央通告第84、85号和中央通知第147、148号。这次会议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对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形式作出了重要改变。其主要精神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1. 要求党的组织建设为贯彻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策略服务。具体如下：第一，"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为此首先要坚决与阻碍党的发展的一切右倾观念斗争，"向产业工人开门"，"大批吸收工人中积极分子入党"。① 第二，"严紧党的组织，强调党的纪律"。为此就必须"加紧党内斗争，对于暗藏在党内的取消派等，应在斗争中坚决排除出党"。② 第三，实行"党员军事化与党的组织军事化"。为此，"不仅是每个党员要受军事训练，尤其是生活的军事化，党的组织在武装暴动时，完全要军事化"。③ 具体措施就是打乱党团组织系统，合并成立统一的行动委员会，并组织赤色先锋队。第四，"引进新干部与加强党的教育"。为此，"党应积极从工人中引进新的干部到指导机关，这是党的组织上一个最中心的任务"。④ 而加强党员的教育，"这是准备夺取政权的党，武装自己的最基本的工作。"⑤ 第五，"发展产业支部健全支部生活"。这是"将来决定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59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9月，第165页。

胜负最中心的力量”。[①] 第六,“健全地方党部”。“这是执行地方暴动的主观条件之一。”[②]

2. 在城市和各产业部门,组织同盟罢工委员会。这个机构“是一个群众系统,同时集中党的力量”,[③] 目的是适应总同盟罢工。

3.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革命委员会。这个机构采取党政军合一的形式,实行绝对的、强有力的集中领导,以加紧执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实际任务。

由上所述可见,党的全国组织会议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它根据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全国暴动计划,将党的组织系统全面纳入军事化的高度集权轨道,打乱了党、政、军、团、工会的组织系统和日常工作,极大地削弱了党的有效领导,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混乱。这就使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得到全面的推行,也给中央苏区党的建设造成严重的恶果。

1930 年 7 月初,党中央派代表来到闽西,传达党中央有关决议,开始在闽西贯彻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方针,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同年 7 月中旬在龙岩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代表王海萍在大会开幕式的致词中错误地认为:目前的政治形势,一方面是统治阶级急剧地走向崩溃;另一方面是工农罢工、暴动、兵变的平衡发展,必然要配合起来形成中国革命高潮。并进而提出闽西党的总任务是“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扩大斗争到广东去,首先夺取闽、粤、桂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60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61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4 页。

三省政权，争取全国革命胜利"。[①] 当闽西党政军负责人邓子恢、张鼎承等根据闽西苏区实际，提出应先集中力量消灭当地民团反动武装，巩固苏区，然后逐步向漳州、厦门等附近的大中城市发展的正确意见时，却遭到无理的压制，并被扣上"新右倾"的帽子，给予断然否定。

这样，中共闽西"二大"最后接受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主张，通过了《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决议案对全国和闽西的革命形势都作了不切合实际的错误估量，认为全国"工农兵斗争飞快的发展，普遍而且平衡，现在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了门前"，[②] 甚至断言"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可能，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是世界革命大爆发的开始"。[③] 并把福建省委代表致词中给闽西党规定的总任务完全搬进政治决议案中，并上升为"闽西党的政治路线"。在这个所谓的"政治总路线"的指导下，不顾主客观条件的要求，强调要"打破群众苟安心理"、"保守观念"，"猛烈的扩大红军"，还混淆不同阶段的革命性质，强调进行反富农的斗争，提出了"反富农路线"的口号。因此，经过闽西党的"二大"，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得以在闽西苏区贯彻推行。

1930 年 8 月上旬，闽西特委根据党中央和中共闽西"二大"的有关决议，把闽西苏区的各级党、团、工会组织合并统一组成为闽西总行动委员会，使根据地的各项日常工作陷于停顿，出现了混乱的现象。与此同时，由于错误地反对所谓"富农路线"，一方面把一

---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5 月第 1 版，第 274 页。

②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5 月第 1 版，第 208 页。

③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08 页。

些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共产党员，其中有些是很好的领导骨干清除出了党，损害了核心力量；另一方面则公开地征收党员，致使不少阶级异己分子和动摇不定的投机分子混入党内，严重地损害了党组织的纯洁性。而且闽西总行委还超越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发动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到处砸菩萨、烧祖宗神牌，引起群众的反感和不满，造成党组织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总之，由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闽西苏区的贯彻推行，削弱了党的领导，破坏了党的组织，降低了党员队伍的质量，并打乱了各级党、团、工会组织日常工作，脱离了广大群众，这就给闽西党的建设造成严重的危害。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不但给闽西苏区党的建设造成极大的危害，同时也对赣西南苏区党的建设带来严重的恶果。1930 年 8 月，正当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恶性发展的时候，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赣西南特委代表李文林主持召开了中共赣西南特委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传达贯彻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精神，其主要表现是：

1. 根据李立三"左"倾中央的错误指示，严厉批评赣西南党组织政治路线的错误，并改变了组织领导。这次会议依照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完全否定了以刘士奇为书记的赣西南特委所实行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所取得的成绩，指责赣西南特委过去犯了"政治路线的错误"和所谓"农民意识特别浓厚，保守观念，武装不集中等错误"①，提出"目前党内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是：打倒反国际派，抓住客观的良好条件，采取扩大进攻的策略路线，拿下吉安、赣州，进攻九江、南昌，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师武

① 《赣西南朱昌偕报告》，1930 年版。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59 页。

汉，争取全国革命胜利"。[①] 同时会议还强调要转变农民意识的保守割据观念，驱逐地主分子，肃清富农路线机会主义，淘汰中农领导。特委书记刘士奇对李立三"左"倾中央对赣西南工作的批评，不以为然，"一点不肯接受"，坚持说"过去的斗争是对的"，"中央指示不对"。[②] 在这些正确意见和主张遭到无理的压制批评后，刘士奇以退出会场的行动予以抵制，因而受到一些拥护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同志的严厉指责，被扣上了"消极反抗中央省上的正确政治路线，曲解党的民主集中制，用政治手腕反对引进工农干部，取消城市工作，CY 工作"[③]等大帽子。会议最后决定撤销刘士奇特委书记的职务，将其一切政治活动及任务完全停止，报告中央审查。并改组赣西南特委，以曾山、王怀、郭承禄、萧道德、李文林五人为常委，郭贞、陈婉如为候补常委，曾山为书记。这就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赣西南苏区的贯彻推行提供了组织保证。

2. 根据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政策，对党组织的发展以及军事斗争、土地革命等作了"左"的工作部署。这次会议根据"左"倾中央和省委的有关决议，部署要在 3 个月内把共产党员由 3 万发展到 15 万，而且一再强调要把所谓"富农分子"、"动摇分子"清除出党(事实上到 1930 年 10 月，清除了 1000 多人)。这种极"左"做法，一方面打击了相当一部分在赣西南传播马列主义、点燃革命火种有重要贡献而出身不好的党的骨干分子，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计划在 3 个月内发展 12 万党员，这就势必

---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48 页。

② 《赣西南朱昌偕报告》，1930 年版。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60 页。

③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49 页。

形成拉夫凑数式的发展党员，降低了党员质量。在军事斗争上，会议提出了一切工作都向九江、南昌布置，“一切工作向北猛进”[①]的口号，以此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这就在战略方向上体现了李立三“左”倾指导的中心思想。同时会议在经济上强调发展集体经济，准备建立集体农场，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这就极大地影响和干挠了赣西南苏区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给干部群众的思想造成了混乱。

因此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召开，把赣西南苏区的各项工作从原来正确的轨道上纳入了“左”倾错误的轨道，打击了党的骨干，影响了党的组织力战斗力，给赣西南党的建设带来了严重恶果。

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根据中央的指示，将赣西南党、团特委合并成立江西省总行动委员会，由李文林任书记。江西省行委在成立后，积极推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不顾敌强我弱的实情，强令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农民武装盲目冒险地进行第8次攻吉安，第5次攻赣州，这“对苏区的巩固发展，发生了最不好的影响，一方面集中武装，中心城市攻不下，原有的苏区又不能抵抗地主武装的侵扰，结果苏区被破坏，红色城市失掉，群众受着地主武装的摧残，增加群众失败情绪”。[②]因此，江西省行委的成立，不仅打乱了党团的正常组织系统和日常的工作，削弱了党的有效领导，而且由于贯彻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政策，给赣西南苏区党的建设、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等各项工作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所以，虽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的时间只有3

---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8页。

②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419页。

个多月(从1930年6月到9月),但党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省委以下机关被破坏的就更多,红军在进攻大中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而中央苏区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贯彻推行,则极大地削弱了党的领导,破坏了党的组织,降低了党员队伍的质量,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并严重地损害了苏区红军的有生力量,影响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使中央苏区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日益缩小。这样,直到1930年9月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经过瞿秋白、周恩来等的努力,才初步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第二节　中央苏区的形成及其所辖赣西南和闽粤赣边特区党的组织状况

一、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和中央苏区的形成

从1929年春蒋桂战争起,到1930年秋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止,是国民党新军阀激烈混战的两年。在这两年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使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均有了一些较大的发展。其中尤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和赣南、闽西根据地发展最快。全国10万红军中红一方面军占4万,全国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也以赣南、闽西根据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所以在1930年10月中原大战刚刚结束,蒋介石便正式宣布对各苏区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并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作为其反革命"围剿"的重点。

从1930年10月下旬开始,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在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的指挥下,对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蒋介石亲自为这次"围剿"制定了"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追猛打"的作战方针。具体战略是:三路大军,由北向

南，从江西吉安至福建建宁一线，分成8个纵队，3个作战区，在吉安、泰和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形成一个大半圆形包围圈，企图把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举消灭在东固地区。面对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当时中国共产党通过1930年9月的六届三中全会已批判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瞿秋白、周恩来领导下的党中央，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特别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已有相当之重视；而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下，更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为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0月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敌强我弱和湘敌强、赣敌弱的实际情况，决定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向根据地中部退却，寻找战机，等敌军疲惫后，在运动中加以歼灭。国民党军深入革命根据地后，果然因为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暴露出弱点来。12月底，国民党"围剿"军第18师师长、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率师部和两个旅进入龙冈地区的狭窄山路，突然遭到预先设伏的红军的猛烈袭击，经过一天激战，全歼敌军9000余人，活捉了张辉瓒。龙冈战役胜利结束后，红军又乘胜东击，在东韶歼灭国民党军谭道源师一半，其他敌人闻风溃逃。这样，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正确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在5天之内连打两个胜仗，歼敌一个半师，俘敌10000余人，缴枪13000余支，取得了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辉煌胜利。

在此之后，红军又挥师向乐安、永丰、南丰、宜黄、建宁、黎川、宁化之线以南以西地区进攻，摧毁地主武装土围子，解放几十万群众，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使根据地党组织经受了战争的严峻考验而愈益坚强和日益发展。翌年1月，根据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了全国苏区党的最高机构——中共苏区中央局，进一步加强了对苏区武装斗争及其他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所有这一切，就为红军胜利粉碎蒋介石新的反革命"围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31年4月，蒋介石不甘心于第一次"围剿"的失败，又纠集20万兵力，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700里战线的敌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苏区中央局举行多次会议研究对策，经过激烈充分的争论，一致接受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坚决反对"分兵退敌"和退出江西到四川建立新的根据地的逃跑主义主张，决定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依据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然后由西向东横扫，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根据这一正确的作战方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自1931年5月16日至31日，半个月内连打5次胜仗，横扫700里，从赣江之畔直达福建建宁，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毁坏敌人工事四五百里，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取得了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此之后，从6月上旬到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和闽西新红12军遵照总前委的指示，向赣东南和闽西北地区进行战略进攻和分兵，使中央根据地迅速扩大发展，同时在发动群众、消灭地方反动武装、筹集经费、分配土地、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和发展地方党组织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中共苏区中央局遂决定将1月间成立的中共赣西南特区委撤销，另外成立中共赣东、赣南、永吉泰3个特委，直属苏区中央局领导，并决定在赣江西岸和湘东南地区另外成立中共湘赣省委。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对根据地党组织的指导，促进了地方党组织的建设。所有这些，就为红军再次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作好了准备。

这次反"围剿"战争刚结束，蒋介石便在6月间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聘请德、日、英军事顾问，调集军队30万人，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时，红军主力远在闽西，且未得到休

整和补充，但为了消灭来犯之敌，昼夜兼行，回师赣南，集中兴国。根据毛泽东、朱德制定的作战计划，红军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8月6日晚，红军一部从兴国插进敌后，乘夜通过了敌军之空隙地带，转到莲塘，歼敌上官云相的47师。接着，又在良村歼敌赫梦麟的54师。随后，红军于8月11日包围了宁都黄陂之敌，歼灭毛炳文师一部。敌军主力急忙调头东进，猛扑黄陂，企图与红军主力决战。红军运用声东击西的战术，穿越敌军重兵之间的大山，回师兴国休整，以逸待劳。等敌方发觉时，红军已休整半个月，而敌军饥疲沮丧，无能为力，只好下令退却。红军又乘胜追击，在兴国高兴圩、老营盘歼敌蒋鼎文师一个旅、击溃蔡延锴第60师，在方石岭全歼韩德勤一个师。这样，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下，从1931年7月初至9月中旬，历时两个月，红军五战五捷，先后击溃敌军7个师歼敌7个师，17个团，毙伤俘敌4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还有许多机枪、迫击炮等，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随着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南、闽西及周围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赣南、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江西瑞金为中心，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苏区，主力红军也发展到5万人。在中央苏区内，建立了江西、福建两省苏维埃政府和县、区、乡的红色政权，普遍分配了土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号召力日益提高，组织也得到了加强和发展。这是中央苏区的全盛时期。与此同时，闽浙赣、湘赣、鄂豫皖、湘西等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重大胜利，使这些地方的红军和根据地获得很大发展。当时全国苏维埃区域扩大到约16万平方公里，拥有1000多万人口，建立了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和第二、六军团。在此基础上，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毛泽东任主席。至此，在赣南、闽

西两块根据地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央苏区，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央革命政权，它是后来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雏形。

二、中央苏区所辖赣西南和闽粤赣特区党的组织发展状况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成立当天即发布《中央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务》。《通告》中提出："苏区党的组织问题，除坚决执行三中全会的决议案外，并依据全国苏区设立六个特区委。至于区域宽广，指导不便，可在特区委之下设区分委，指导某几县工作。"根据苏区中央局的这一指示，中央苏区所辖赣西南特区和闽粤赣边特区，分别成立了党的特区委及其下辖的组织。

1. 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及其所辖组织

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的第三天，即1931年1月17日，就在赣西吉安县富田成立了中共赣西南临时特区委（后改为赣西南特区委），由陈毅、曾山、陈正人、朱昌偕、杨成英5人组成常委会，陈毅任书记，直属苏区中央局领导。特区委下设东路、南路、北路、西路和西河5个分委。

中共东路分委驻地宁都，由谢唯俊任书记，领导永丰、乐安、宁都、南丰、广昌、石城等县委和宜黄县工委；中共南路分委驻地赣县白鹭，罗寿男任书记，领导兴国、于都、赣县、万安等县委和于北区委；中共北路分委驻地檀溪、田心，书记王豪，管辖范围为吉水、安福、峡江、新余、分宜等县委和吉安之延福、儒行、坊廊区委以及宜春的东南区、宜南区等区委；中共西路分委驻地吉安县永阳，书记刘其凡，领导永新、泰和、宁冈、遂川等县委和吉安县的西区、固江区委；中共西河分委驻地信丰县周坪，后移驻上犹营前，由陈致中任书记，领导信丰、安远、上犹、崇义、南康等县委和赣州市委以及西华山、唐江特区委。这样，到1931年5月，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共

辖有25个县委、1个县工委、11个区委和1个市委。由于当时中共江西省行委已被撤销，省委尚未成立，所以赣西南特区委实际上等于江西省委，对江西苏区的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的开展、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等各项工作起着指导的作用。

1931年6月初，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国民党军被迫从根据地退出，但却在赣州至吉安、峡江一线驻有重兵截断了赣江东、西两岸苏区的联系，致使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已不能对其所辖的北路、西路和西河分委实施正常领导。鉴于这种情况，中共苏区中央局遂决定对赣西南苏区党组织实行调整，撤销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及其所属各路分委，新成立中共赣东、赣南、赣西3个特委，直接受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这个决定作出不久，中共中央在5月间作出的《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传达到中央苏区。按该决议案要求，原赣西南特区委应改设为江西省委，另在湘东南苏区设立湘东南省。中共苏区中央局经认真分析，认为根据上述情况变化，目前成立中共江西省委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决定将赣江以西苏区与湘东南苏区合并，设立湘赣省，成立中共湘赣省委和苏维埃政府。而在赣东赣南苏区则分别成立中共赣东、赣南和永吉泰特委，直属苏区中央局领导，待条件成熟时，再在这3个特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江西省委。

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这一决定，中共赣东、赣南、永吉泰特委均于1931年6月中旬成立。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特委下辖宁都、广昌、乐安、宜黄、南丰、瑞金等县委和石城县工作团(10月该县也成立了中共县委组织)。特委机关原驻宁都县黄陂山堂村，同年8月移驻瑞金；中共赣南特委书记陈毅，特委原定下辖兴国、万安、赣县、于都、信丰、上犹、崇义、安远、会昌、寻乌、南雄、南康等县委，后因上述后8个县的党组织或分别划归中共湘赣省委、闽粤赣边特委领导，或与赣南特委联系中断，所以中共赣南特委实际只辖有兴国、万安、赣县、于都4个县委和中共于北区委。特委机

关先设在兴国县城，8月移驻于都县城，而后又迁回兴国县城；中共永吉泰特委书记毛泽覃，下辖永丰、泰和、吉安等县委及吉水县河东苏区的水南、白沙、中鹄区委。特委机关原驻吉安县东固，后曾迁至樟树下、齐汾和泰和县的桥市庙背。1931年9月中旬，中央苏区取得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同年11月上旬成立了中共江西省委，统一领导江西苏区的革命斗争，赣东、赣南、永吉泰3个特委随即撤销。

2. 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及其所辖组织

1930年10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将闽西、广东东江地区和赣南部分县苏区合并，划为闽粤赣边特区。随即派出中央委员邓发前往该地区组建党政军领导机关。11月初，邓发到达东江苏区大南山，主持召开了东江地区党代表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和中央关于建立发展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决定撤销中共东江特委，成立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特委下设西南、西北两个分委，负责领导原东江特委所辖区域内各县的党组织。西南分委领导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潮阳、普宁、惠来等县的党组织；西北分委下辖寻乌、蕉岭、平远、龙川、大埔、饶平、丰顺、梅县、五华、兴宁等县党组织。

1931年11月下旬，邓发由东江苏区进入闽西苏区，随即于12月上旬在永定虎岗主持召开了闽西地区党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由邓发任书记。边区特委成立后，原中共闽西特委撤销，其所辖的永定、杭武、龙岩、汀连、汀东、连城、平和7个县委和汀州市委，都直接划属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领导。

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成立后，开始受中共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双重领导，1931年4月方正式划由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由于当时东江、闽西、赣南三个苏区尚未能贯通联成一片，中共中央遂于1931年4月致信边区特委，一方面正式决定将闽粤赣边特区划归中央苏区，另一方面又提出在目前情况下，闽粤赣边特区可暂

不与江西中央苏区连成一片，但要互相呼应和支持，等条件成熟后再行合并。同时决定东江地区的西南、西北两个分委仍划属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不久，中共东江特委又重新设立，直接指导原辖区内的西南、西北两个分委及其下属各县党组织。这样，中共闽粤赣边特区委实际上等于原来的中共闽西特委，领导的区域主要是闽西苏区各县及广东的饶平、大埔等部分苏区，在此期间，为打通闽西苏区与赣南苏区的联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于1931年6月下旬还成立了中共闽粤赣边界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中共红12军、35军军委，中共闽粤赣边特委和汀州、连城、石城、瑞金等县党组织，由总前委组织部长周以栗任书记。同年8月初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这个组织即被撤销。

1931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于5月间发出的《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中共闽粤赣边特区委改为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初由邓发任书记，后因其在8月底调任中央局成员，由卢德光继任书记。1931年9月中旬，中央苏区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使江西中央苏区与闽西贯通了联系，连成一片，闽粤赣边区正式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由于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仅形成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中央苏区党的建设。这不但表现在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这一全国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并建立了苏区中央局领导下的赣西南特区委和闽粤赣边特区委及其所辖的各县党组织，从而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而且使苏区党通过三次反"围剿"战争积累了宝贵的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逐步形成了一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这就进一步发展了党对武装斗争这一革命法宝的深刻认识和掌握运用，为我党正确贯彻执行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总方针，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

一、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构想和指示

早在1930年夏天，随着全国各地苏维埃区域的建立与巩固，党中央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越来越认为必须建立一块中央苏维埃区域，成立苏区党的最高机构——中共苏区中央局，以统一指导全国各地苏维埃区域的斗争。这对于加强党对全国苏区的统一领导和各苏区红军的行动，无疑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当时党中央处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者的统治下，他们奉十月革命模式为金科玉律，极力鼓吹坚持"城市中心论"，而对各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村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的实际情况熟视无睹，认识不清，因而就把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与夺取中心城市联系在一起，总想以大城市为中心建立中央政权，成立苏区党的最高机构，来实现他们全国总暴动的冒险计划。因此在1930年8月底，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在湘鄂赣三省成立苏区中央局给长江局的信》中，就明确指示："中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中，成立苏维埃区域的中央局，以指导所有的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当着有些区还没有联成一片时，则由长江局、南方局或省委暂管。"① 与此同时，这封信还指示红军在占领长沙后，立即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革命委员会(还是中央临时政权)"，一个月内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政府"。② 显而易见，当时李立三"左"倾中央的意图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也要设在长沙城内。中央最初决定派关向应前往

① 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6页。

② 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6页。

红一方面军组建中央局，但当关向应行抵长沙附近时，正值红一方面军在进行第二次攻打长沙战役，战区阻隔，无法通过，使他未能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取得联系，只好返回武汉，这次组建苏区中央局的任务因此而未完成。同年9月初，中共中央在给长江局的信中又再次强调指出："在工作上长江局的工作已居于全国工作第一位，而苏维埃区域中央局工作更应成为中心之中心。"① 并指派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立即动身前往组织苏区中央局"。当周以栗动身时，红一方面军已撤围长沙向江西境内退去。周以栗紧赶慢赶，在袁州追上红一方面军。他原来肩负的使命是说服红一方面军按中央指示再开回去打长沙，打下长沙即在长沙城内成立中央政权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但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他转而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支持红军打吉安。随后红一方面军就投入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因而成立苏区中央局的事未再提起。由上可见，党中央最初关于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构想和指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但另一方面由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者坚持"城市中心论"，总想把苏区中央局放在大城市而无视党的工作重心已移向农村的实情，因而在实践中也就无法顺利实现这一任务。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9月28日，全会通过《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提出："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的办法，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当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权建立起来后，苏区中央局应经过党团在政权中起领导作用。苏区各特委凡能与苏区中央局发生直接关系的地方，都应

① 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6页。

隶属其指挥。"[①] 这个决议，把建立苏区中央局的目的意义以及它和将要建立的临时中央政府的关系都讲清楚了。

六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党中央即指定周恩来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鉴于周恩来正在上海党中央任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一时不能到职，遂又决定暂由项英代理中央局书记职务。同年10月底，党中央派项英前往红一方面军中主持建立苏区中央局。与此同时，中央在给长江局转一三两集团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信中又提出："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同志(按：即指项英同志)未到达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委员名单另附。军事指挥必须统一，依中央上次通知，仍以朱德同志为一三两集团军总司令，当其他部队与中央局发生作战联系时，亦归一三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中央军委暂不组织，候江钧到后再成立。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中到中央局。"[②] 1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其中又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成立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环绕着它的首先是赣东北与湘鄂边两个苏区根据地，再则，鄂东北与闽粤赣两个苏区也很重要。"[③] "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④] 由上所述可见，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与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11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03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2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页。

李立三"左"倾中央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改变了将中央局和中央政权设在中心城市的错误主张,而提出将苏区党的中央局和中央政权放置在苏维埃的坚固区域即乡村中。这说明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虽然从总体上仍未能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主张"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的发展方向"①,但却已清楚地认识到"长沙南昌尤其是武汉在敌人今日严密的防守与帝国主义直接的帮助之下,决不是轻易可取得胜利的"。② 因此,"对各个苏维埃区域来说,除去主要的向着共同的中心发展外,它还应四向发展,以扩展它的范围,以推广苏维埃运动。"③ "在向外发展的过程中,当然决不是'单靠红军打天下',主要的工作还是要建筑在发动当地农民执行土地革命,发动游击战争与生长红军的基础上;这样,苏维埃的疆域才能日益扩大,红军才能日加发展,而敌人的统治才能日加削弱,同时敌人它在中心城市的统治也就要日加动摇起来。"④ 所以,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对敌强我弱的特点和巩固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及发展壮大农村红军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使党中央关于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构想大大前进了一步。

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及其工作部署

受中共中央之命,原来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中央政治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436页。

局委员项英，于1930年底经闽西到达江西宁都，与红一方面军总部会合。他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接着开始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项英亦随军行动，以致苏区中央局未及成立，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决定，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月15日在赣南宁都县黄陂附近的小布正式宣告成立。随即发布了《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务》。通告指出："中央为加强对苏区的领导和工作的指导起见，在中央之下设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在政治上、组织上同南方局、长江局一样受中央政治局的领导），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工作。将来苏维埃区扩大区域，仍归苏区中央局管理。现在决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鄂边特一人，CY中央一人组织之。现已正式成立，开始工作。以后全国各苏区及红军党部（总前委取消）应直接受苏区中央局指导。但目前许多苏区尚未与中央区连接起来，因指导不便，暂受各地最高党部指导，将来一打通之后，则全归苏区中央局指导。"① 因此，这份通告根据中央精神，对苏区中央局的人选、组成以及它管辖的范围都作了明确规定，这就使各苏区的地方和军队的党部从此有了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结束了过去各苏区各行其是，不利于革命事业大发展的局面。从这时起，中共苏区中央局既是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实际上也是中央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通告根据六届三中全会的有关决议精神，还提出了建立苏维埃区域的三个条件，即："(1)土地革命的发展，加上已有广大群众基础，或是已有这个条件能很快发展起来的区域；(2)这个地方有

① 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305页。

强大的红军组织;(3)这个区域便利向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发展。"① 根据上述三个条件,"决定全国苏维埃区域,划分为六个:(一)赣西南特区与湘鄂赣特区为苏维埃中心区,中央临时政府建立在此区;(二)湘鄂边苏维埃特区,包括鄂西、湘西北;(三)鄂豫皖特区,包括鄂东北、豫东北、皖西;(四)赣闽皖边特区,包括赣东、闽北、皖赣边;(五)闽粤赣特区,包括闽西、广东东北、赣东南一部分;(六)广西左右江苏维埃特区。"② 通告明确规定上述六个苏区的特委,均归苏区中央局领导。而随后成立的鄂豫皖分局、湘鄂西分局,均是苏区中央局的分局,仅是由于交通不便,联络困难,而直接归上海党中央领导。通告关于建立苏维埃区域条件的论述和全国苏区的划分,表明我党遵照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开始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桎梏,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给予高度的重视,这无疑有利于苏区党的进一步发展。

通告不仅阐明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的意义、职权和作用,决定全国苏区的划分,而且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提出了各苏维埃区域党组织今后的主要政治任务和各项具体工作计划。其主要内容如下:1. 坚决执行土地革命,平均分配土地,建立苏区的广大群众基础;2. 建立和改造各级苏维埃机关,发动广大群众来积极参加选举,使苏维埃政府真正成为工农劳动群众自己的政权;3. 立即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统一全国红军指挥,并积极扩大红军;4. 发展广大群众组织,主要是建立苏区工会、贫农团、反帝大同盟和互济会等,以加强群众斗争的力量和发展;5. 加强肃反工作,并加紧反对富农斗争;6. 积极扩大苏区,使各苏

① 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05 页。

② 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94～195 页。

区互相连接，打成一片，发展的总方向是南昌、长沙、武汉；7. 加强苏区党的组织建设，可在特区委之下设分区委，指导几县的工作，县区的组织，也可因为革命斗争的便利，改编组织范围或合并、撤销行委组织，立即恢复原有党与团的组织系统和工作；8. 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粉碎敌人进攻，巩固发展苏区，举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央临时政府。通告对苏区党组织今后主要政治任务和各项具体工作计划的阐述，虽然还不可避免地存在"左"的方面，如过分强调肃反工作，提出加紧反富农的斗争，认为苏区发展的总方向是向着南昌、长沙、武汉发展，但其基本主张是正确的，尤其是对苏区党组织的建设，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这就促进了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的进一步加强。

在宣告建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同时，还建立了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中央军委下设总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总政治部，毛泽东任主任；总参谋部，叶剑英任参谋长（尚未到职）。各苏区的红军统归这个军委领导，从而使各苏区红军结束了各自为战的局面，有利于统一部署和统一指挥，有利于互相支援和战争经验的传播，为各苏区红军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根据党中央决定，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成立后，原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必须取消，但因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初成立时组织机构很不健全，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经常随军流动，无法开展日常工作。因此，实际上红一方面总前委并未立即取消，依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起主导作用。至于通过苏区中央局直接指导全国各苏区的工作，在当时条件下也还无法做到。

苏区中央局成立后，机关随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在宁都小布，同年 2 月移驻宁都黄陂山堂，4 月又移驻宁都青塘。当时周恩来因在中央有重要工作，一时不能来苏区，中央局书记由项英代任；任弼时、余飞亦未能来苏区；河西（赣江西）交通阻隔，故湘赣边特委也不能来人。所以苏区中央局初成立时，在苏区的中央局成员只有项

英、毛泽东、朱德、曾山四人。因战争情况紧张，朱德负责红军总司令部工作，毛泽东负责中央局军委总政治部工作，都只能参加中央局的会议，而不能常驻中央局工作，曾山则连会议也不能来参加。组织部、宣传部在名义上是成立了，可是无人负责，也等于空名。这样苏区中央局成立初期，在组织上是很不健全的，实际只项英一人在中央局。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利于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及其他各项工作的。1931 年 3 月 18 日至 21 日，为贯彻共产国际 1930 年 10 月来信精神和传达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朱德外，还有红军每军 2 人、赣西南特区 2 人、各分委 1 人、共青团中央局 1 人、湘东南苏区和平浏苏区代表各 1 人，共 40 余人。会议经过讨论，一致接受国际来信对于中国革命的指示，坚决反对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的所谓“调和路线”。因中央局委员太少，扩大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提议，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为中央局委员，会后报中央政治局请求批准，未得批准前这四位同志先行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

在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建立后，为统一对各苏区青年运动的组织领导，于 1931 年 2 月成立了少共苏区中央局，顾作霖任书记，张爱萍任秘书长，陆定一任宣传部长、曾镜冰任儿童局书记。同年秋，为统一对各苏区工人斗争的组织领导，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梁广任主任，刘少奇任委员长(1932 年秋)，陈寿昌任党团书记，倪志侠任秘书长。青年和工人统一组织的建立，加强了党对青年和工人运动的领导，这就进一步促进了苏区党的建设。

第四节　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及其对党的建设的破坏

一、赣西南苏区的肃AB团与"富田事变"

1930年春到1931年冬，在赣西南、闽西苏区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即赣西南苏区的肃AB团、闽西苏区的肃社会民主党事件。我党在这一时期之所以会犯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有其主客观的原因。

客观上的原因在于当时共产国际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支配下，一再强调"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危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以及清党、肃反运动，并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加紧反对"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等，这就成为我党"左"倾领导人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大张旗鼓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全面发展肃反运动的理论依据。

主观上的原因在于当时我党正处于同国民党分裂时期，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对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残酷镇压和屠杀，并连续向赣西南、闽西苏区发动反革命军事"围剿"，而在苏区内部一些被打倒的地主豪绅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不甘心失败，仍在猖獗活动，破坏苏维埃政权，造谣惑众，有的甚至混进党政军内。加上当时党内军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居多，他们在思想方法上最容易表现为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绝对化；在政治上常常表现出极端的革命性，从而导致"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在组织上则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和过火的党内斗争。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与党内斗争交织在一

起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党内的一些“左”倾领导人，便极力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一“左”的党内斗争方针，并将它与错误的肃反结合起来，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矛盾，致使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日益发展，愈演愈烈。

由于上述主客观原因，赣西南苏区从1930年春开始，开展了所谓反AB团的运动，并最终酿成了富田事变。AB团是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授意陈果夫指使国民党右派段锡朋、程天放等人为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夺取江西省国民党省党部和各级地方党部控制权，在1927年1月秘密组织的反革命组织。1927年4月，共产党人袁玉冰、方志敏领导南昌的革命群众给予严重打击，该反革命组织即行解体。改组派是一个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打着反对蒋介石的旗号，目的在于夺取国民党最高统治权的反共政治投机集团，1928年至1930年间，先后在南京、上海、北京叫嚷过一阵。但在蒋介石收拾下，1930年后已作鸟兽散。第三党是由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等组织起来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不赞同我党的政治主张和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更反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主要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影响。1931年夏邓演达被蒋介石逮捕并遭杀害后，这个组织也趋于瓦解。因此，在苏区内部开展正确的肃反运动是必要的，但决不应扩大化，否认中间阶级的存在，搞打倒一切，更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的矛盾，把正常的党内思想路线斗争，同错误的肃反结合起来，造成党内革命队伍内人人自危，惶恐不安，严重摧残革命的有生力量。然而，当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内“左”倾领导却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改组派是工农革命运动的死对头、要加紧反对社会民主党等指示精神，严厉批评江西省委对AB团“没有引起党严重的注意”，要求江西省委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地扩大反AB团

大同盟、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①] 在"左"倾中央这些错误的指示下，中共赣西南特委错误地认为 AB 团已混入赤色政权，于 1930 年春在赣西苏区开始进行以抓 AB 团为中心的肃反运动。

这场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了逼供信的错误，然后又根据逼供的材料，错误地判断 AB 团有着庞大严密的组织系统，"已普遍了江西，同时散布到全国范围"。[②] 当时在赣西南苏区居于领导地位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轻信了这些逼供出来的假材料，主观地认定赣西南党、团、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机关"多数为 AB 团所充塞"，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③]，并得到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的认同。随后，红一方面总前委又错误地指派个人品质不好的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负责肃反工作，在红 20 军、江西省行委以及赣西南特委大抓 AB 团分子，先后扣押拘捕了李文林、段良弼、李伯芳、金万邦、周勉、谢汉昌等当地党政军重要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红 20 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而遭逮捕，对这种乱抓 AB 团的做法极为不满和愤慨，便不顾党的纪律和革命大局，于 1930 年 12 月带领部队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富田)，缴了警卫连的枪械，释放了近百名在肃 AB 团中被捕的人员，这就是在赣西南苏区发生的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随后，他们把红 20 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脱离总前委的领导，并非法成立"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还伪造毛泽东给古柏

① 《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1929 年 11 月 13 日。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04 页。

② 赣西南特委《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1930 年 9 月 24 日。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05 页。

③ 《毛泽东同志给中央信》，1930 年 10 月 14 日。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06 页。

的信，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他们的这些行动不仅严重地违反了党的严格纪律，而且在强敌压境的紧张形势下对革命事业十分不利，因而是极其错误的。

1931年1月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后，一方面指出富田事变是“分裂革命势力”、“分裂红军”的“反党行为”①，决定开除发动富田事变的首领段良弼等五人的党籍，另一方面指出富田事变不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批评了“过去反AB团取消派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②，宣布开除李韶九的党籍，对参加富田事变其余的人，只要“承认参加富田事变的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等条件之下，应允许他们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③由于苏区中央局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对富田事变作了正确处理，不仅纠正了肃AB团运动中的错误，而且缓和了激化的矛盾，促使富田事变主要领导者“向党承认自己的错误请党教育”④，而红20军也被动员回到赣江以东。

但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却否定了苏区中央局处理富田事变的正确意见，决定撤销原苏区中央局，重新派出中央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和全权调查与处理富田事变。1931年4月中央代表团到达赣西南苏区后，根据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

① 《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1月16日。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② 《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1月16日。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0页。

③ 《苏区中央局通告第十一号》，1931年2月29日。同上书，第311页。

④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7页。

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①，批评了项英主持的苏区中央局"解决富田事变底路线完全是错误的"，是"调和路线"②，并撤销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从而使本来正在纠正的"左"倾错误又发展起来，肃AB团的斗争进一步蔓延和升级。其结果是赣西南苏区的干部90%以上被打成AB团分子，有的被错误处置，有的被监禁或停止工作；红20军大部分排以上干部遭逮捕或杀害，造成"党内因此发生恐慌，同志间互相猜疑不安，甚至影响指导机关"，红军中非战斗减员达1/10以上，地方上没有人敢当干部。这就严重地削弱了赣西南苏区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给党的建设带来极大的损害。

面对如此严重的恶果，使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对肃反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有了一定认识，遂于1931年8月发出《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提出反对肃反中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指示，使赣西南苏区肃反扩大化的趋势得到了初步的抑制。同年12月底，周恩来离开上海进入赣西南苏区后，成为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他的主持下，苏区中央局进一步检查了肃反工作问题并作出决议，基本上纠正和结束了赣西南苏区肃AB团的严重错误。

二、闽西苏区肃社会民主党对党的建设的破坏

在赣西南苏区开展肃AB团运动时，闽西苏区也发生了肃社

---

① 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4月17日。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1～312页。

② 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4月17日。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1～312页。

会民主党的错误。早在1929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要在国际上加紧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指示，向各级党组织提出："党在策略上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这一右倾的危险不仅是继续着党内机会主义的残余而复活，他更有现实环境之不可轻视的基础。"① 因此，党"必须特别认清助长党的右倾思想发展的客观条件是改良主义的影响"②，加紧反对"改组派以至第三党的欺骗政策"，这"实是现在时期中的第二个重要任务"③。进而在1930年8月《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又错误地认定："在谭平山的第三党破产之后，邓演达的社会民主党又开始发现了"④，"中国社会民主党所提出的政纲，他与改组派及取消派都完全没有两样"⑤，"社会民主党在中国组成的意义，就是将西欧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搬运到中国来，反对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⑥ 这样，党内的"左"倾领导就把第三党、改组派、取消派笼统地都看成中国的社会民主党，认为它们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这完全是一种主观的臆造和错误的判断，它为闽西苏区的肃社会民主党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当时闽西苏区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外遭国民党军阀、反动民团的军事进攻，内受潜伏在苏区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破坏。为了粉碎敌人的猖狂进攻，巩固革命政权，闽西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12月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巩固苏区，必须肃清反革命"的指示，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由闽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林一株兼任主席，各县也相应成立了肃反委员会，着手开展内部肃反工作，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然而，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在闽西苏区的贯彻推行，不仅使红军军事上连连失利，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严重挫伤了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加之在"猛烈的扩大红军"的口号下，采取命令主义、指派、抽签或抓阄等不正确的办法强迫不自愿的工农去当红军；在"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下，单纯的打富农，甚至把中农当作富农去反对，这就引起了苏区不少群众的反感和不满，出现了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发牢骚、说怪话、悲观消极以及脱队等现象。

对于这种情况，中共闽粤赣边特委和闽西肃反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不是作实事求是的调查和分析，而是以"左"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凭着一些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报告，主观唯心主义地认为在"国民党、团匪加紧进攻中，闽西的改组派、社会民主党及一切反动派也同样的活动"[①]，"第三党派以上杭、永定为多，甚至团书记都是第三党分子"。[②] 根据这种错误的估计和判断，他们认为有必要对闽西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来一番根本改造，彻底肃清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以建立真正的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于是，一场错误的肃反运动就不可避免了。

---

① 《团闽西特委报告》，1931年1月8日。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② 《团闽西特委报告》，1931年1月8日。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1931年初，红新12军召开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会上，当介绍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是第二国际领导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时，吴拙哉等十几位红军指战员因对国际共运缺乏系统知识，呼喊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等错误口号，被旁边的人听到了，报告第100团政委林梅汀，见林不理睬，又向闽西苏维埃政府报告。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就把喊口号的人当作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并由此牵连到团政委林梅汀以及江桂华、张德宗等人。在肃反委员会的严刑审讯下，这些人被屈打成招，诱供出傅柏翠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林梅汀是特委宣传部长，黄洪是特委组织部长，江桂华、张德宗等是特委委员，并胡乱供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主张，就是党中央文件上提到的第三党的改良主义主张，即“二五减租、劳资仲裁、开国民会议”。此外，还供出一大批与他们有关的所谓社会民主党分子。以此为导火线，闽西苏区的肃社会民主党运动便全面开展起来。

1931年2月21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接连发出裁字第1号、第2号通告，号召各级政府集中央全力进行“肃清社会民主党”的斗争。2月27日，在中央代表邓发主持下，召开了中共闽粤赣特委第一次扩大会，错误地肯定了闽西苏区破获了所谓“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强调要运用群众的力量消灭反动政治派别的组织和活动。为了进一步制造声势，发动群众，3月1日在永定虎岗召开了“闽西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代表大会”，有2000人参加。大会设立了以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为主审的革命法庭，对林梅汀等34名“社会民主党”分子进行公审和判决。3月2日，林梅汀等17名所谓的“主犯”被判死刑，当场处决。这是闽西第一次大规模的肃社会民主党分子的行动。3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又把这次公审和判决的经过，用小册子《革命法庭》广为散发，要各级政府仿效。

1931年3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成员到达闽粤边特委

所在地虎岗，随即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确定闽西党组织目前的中心任务之一是肃清社会民主党，自上而下地彻底改造苏维埃。同年4月初，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给闽粤边特委发出指示信，强调"敌人积极从各方面来向苏区红军进攻——普遍的白色恐怖，积极地打入到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等，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肃清内部的——红军中、政府中、党部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站在阶级立场上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①] 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闽粤边特委于5月作出《关于彻底肃清社会民主党、AB团的决议》，号召各地要"以肃反为一切工作的中心"，限令在两个月内肃清社会民主党，这就使闽西苏区肃社会民主党的错误进一步恶性发展。

在4月至8月的肃反高潮中，闽西肃反委员会成为凌驾于闽西苏区各级党政军组织之上的独裁机关，在"肃反"的名义下，集捕人、检察、审判权于一身，独断专行，既没有各级党组织的具体领导，也没有广大群众的监督，任意践踏刚刚建立起来的各种法制。一些道德品质恶劣的人，为达到个人卑鄙的目的，趁机挟嫌报复，诬告陷害，打击面越来越宽。凡是犯过立三路线错误的，或因王明错误路线行不通而采取怀疑消极态度的，或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都在被肃之列。而贫下中农干部则多为参加了什么"十毫子运动"、"食烟大同盟"、"姑娘姐妹团"、"找爱团"、"膳食委员会"等所谓社会民主党外围组织而被逮捕。这就造成干部人人自危，群众的不满和恐慌不断积聚，各地时有发生反抗肃社会民主党的行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1931年5月间的"坑口暴动"和"丰稔事件"。这些反抗的干部群众又被当作"社会民主党"遭到逮捕镇压。

---

① 《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1931年4月4日。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216页。

闽西苏区开展的这场肃社会民主党的运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被肃过半，政府主席张鼎承、闽粤赣临时省委组织部长罗明也被怀疑；新红12军连以上干部半数以上被肃，元气大伤；一大批闽西苏区的创始人，许多具有卓著功劳的优秀党员、群众领袖，坚决革命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被打成"社党分子"横遭逮捕和错杀。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党团组织和政权机构涣散，干部缺乏，严重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降低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并造成反对知识分子的恶劣倾向，从而极大地损害了闽西苏区党的建设及其他各项工作，在国民党军阀、反动民团的加紧进攻下，闽西苏区由原有的48个区减少到22个区。

1931年5月，党中央派卢德光到闽西，任闽粤赣边特委书记，邓发随即去苏区中央局工作。罗明、张鼎承、郭滴人等留守上杭，根据群众的揭发，发现林一株等人利用肃反大权，为非作恶，便以他们是社会民主党的罪名于同年9月处决。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平息公愤和停止肃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恶性发展，但未能有效地纠正这一错误。8月29日，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在获知闽西苏区肃反运动的严重局势后，发出《中央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批评了闽西党内把复杂的肃反工作简单化、把一切问题归罪于社会民主党的破坏而掩饰自身的缺点、实行惩办主义等三项错误，但又认为"社党在闽西和其他地方是存在的"①，强调"上面所指各种错误的缺点其用意决不是要你们减弱与社党斗争，恰恰相反，正是要你们加紧与社党及其他一切反动派的斗争"②。同年11月，闽西代表郭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页。

滴人、张鼎承出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全国"一苏大"，向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汇报了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① 决定立即停止肃社会民主党运动，并平反冤错案，还给了5000多元作为善后救济费。闽西代表回来后，立即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从而开始有效地制止了闽西这场错误的肃反运动。12月中旬，周恩来由上海经汕头进入闽西苏区，目睹闽西肃社会民主党的严重后果，给中央政治局写了报告，强调指出"闽西解决社会党所得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②。根据周恩来的报告，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先后致信闽粤赣临时省委，要求切实遵照中央和中央局指示，坚决纠正肃反工作中的错误。翌年3月，闽粤赣临时省委第二次党代会和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大会先后在长汀召开，对肃社会民主党运动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总结了沉痛的教训，并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组织系统和工作制度，建立了司法制度，稳定了苏区的革命秩序，这就使闽西苏区肃社会民主党的错误基本得到纠正。但由于当时王明"左"倾错误在我党占统治地位，他们对肃社会民主党的错误仅认识到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因此，急风暴雨式的肃社会民主党运动虽趋于尾声，但闽西各地还时有发生破获和审判社会民主党的案件，直到主力红军长征为止。

---

① 张鼎承：《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转引自《闽西革命根据地史》，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第五章

中央苏区的巩固，党的建设进一步展开

第一节 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一、中共中央关于召开苏区党代表大会的构想和指示

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根据中共中央(后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召开的。

193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常委会提出："要使各苏区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乃至全国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都能在红五月中开成，而成立苏区的中央临时政府。"同时，"在各苏区的苏代会前，要开党的代表会议，先通过中央所提出的各种法令草案，然后再提出苏代会，并讨论各苏区的内部工作。"① 在上海的中央3月作出布署，要求各苏区召开党代会和苏代会，同时选出代表赴中央苏区参加

① 《中共关于苏维埃区域红五月运动的工作决议案》(1931年3月21日中央常委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页。

于5月份召开的全国苏代会。这一部署反映了中央的主观愿望，事实上当时处于农村武装斗争的环境，在交通不便，联系受阻的情况下，客观上并不可能如此顺利。实际上中央关于各苏区召开党代会的具体决议（即《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也迟至5月份才作出决定。6月16日，中央在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中，要求各苏区应依照中央3月和5月的指示，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和准备各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以及加紧进行反"围剿"的问题。[①]8月30日，中央又强调指出，中央苏区要有决心使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能在十月革命节所召集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产生出来，而不再延期。[②] 10月间，临时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发出了关于"苏区工作的成绩、错误及目前中心任务"的第四号电报，重申了8月30日指示信的主要内容，指令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应根据8月30日指示信的原则进行工作，通过决议案，交中央批准，并电告党代表大会经过情形。[③] 这个电报更改了原定大会议题，主要强调中央苏区党组织要接受和贯彻执行"国际路线"及中央"左"的路线政策。

中共中央在这个时期这么强调要召开中央苏区党的代表大会，主要是为了讨论和筹备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1931年1月7日），以及四中全会以前，共产国际曾经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建立苏维埃政府，来组织和领导中国革命运动。四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在接受这一指示时，也越来越认识到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一方面是显示出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

① 《中央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193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

② 《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1931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0页。

③ 《中央苏区党的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1页。

政权两个政权的对立，通过苏维埃政府来领导国内战争和发展土地革命；[①] 另一方面是“使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政权的形式中实现和加强起来”[②]。为着建立苏维埃政权，为着实现党对政权的领导，中央认为需要召开苏区党大会，讨论苏维埃各种法令草案，决定各项大政方针。

强调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也是为了改造苏区党的工作，健全党的生活，更好地发挥地方党部的领导作用。在《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中对苏区党的工作有两种看法：一是中央为加紧对苏区党的直接领导而派遣中央代表去设立各苏区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代替或取消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的倾向，比如在鄂豫皖与湘鄂西设立了中央分局，便将其特委取消了。中央认为：“假使各级党部都照这一组织方式去领导工作，则各级党委都可被上级派遣的代表的集体组织所代替了所取消了。”[③] 二是各苏区的党组织党员成分不纯，存在政治上组织上的不正确倾向，因此，中央认为“各苏区党的改造工作，必须有系统地进行”，“各级党部的改造，从支部到省委，都应在国际与中央路线下，定期召集支部全体会，区委，县委，省委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各级党委。”[④]

强调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同时也是为了贯彻共产党国际和四中

---

① 《中央给苏区中央局与红军前委的指示信》(1931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69、370 页。

② 《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1931 年 8 月)，同上书，第 382 页。

③ 《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1931 年 5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68 页。

④ 《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1931 年 5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0、271 页。

全会后"左"倾冒险主义的需要。四中全会后产生的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认为，全党必须坚决肃清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在中央苏区必须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富农路线，坚决贯彻共产国际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点越来越成为中央强调的主要方面。1931 年 8 月间，中共中央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彪回国，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案》及同年 5 月作出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中央随即作出了《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表示要"贯成中央及各级党部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和不折不挠性来实现共产国际的决议到实际工作中去"。王明深知，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一切重大决策问题上必须听命于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他总是不断地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和共产国际的代言人，手持共产国际的"上方宝剑"，来强制推行其"左"倾路线。因此在 8 月 30 日作出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9 月 20 日作出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及 10 月间发出的给苏区中央局的第四号电报等文件中，在肯定中央苏区所取得成绩的同时，着重强调了中央苏区存在的"严重错误"，即还在执行对立三主义的"调和路线"，存在着"右的富农路线"。另一方面，在对形势的分析上则认为当前已经"织成了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的图画"，"很明显的映出了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因此，"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① 总之，是越来越把接受和全面贯彻执行"国际路线"，强制在中央苏区推行"左"的错

①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 年 9 月 2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05～406、411 页。

误方针和政策，放到了主要位置。正是根据中央的第四号指示电报，苏区中央局1931年10月召开会议，确定苏区党大会于1931年11月1日召开，同时确定大会的任务是：讨论目前时局与任务，总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与苏区建设的经验，讨论苏区党的建设问题和全苏大会问题。苏区中央局将上述决定向临时中央作了报告。

王明是由共产国际代表巴维尔·米夫于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强行扶上台的。王明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一跃而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把持中央工作，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排斥和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因此，自然在党内遭到激烈反对。王明很清楚，以他自己的资历和经验，以及拥护他的那些为数不多的中山大学学生，在众多出生入死的中国革命领导人面前，是那么地单薄。因此，他在执掌中央政治局后，除了高举"国际"大旗号令全党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派遣一批干部到全国各地去，执行他的路线，改造各级领导班子，以便他的主张能够在全国各地顺利推行。于是，一个接一个以"四中全会代表团"为名义的中央代表团出发了。夏曦被派往湘鄂西苏区，张国焘、陈昌浩被派往鄂豫皖苏区，派到中央苏区的则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三人团"。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正是在"三人团"主持下召开的。

四中全会代表团于1931年4月到达中央苏区，在宁都县青塘与苏区中央局会合后，即于4月17日召开了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提到要特别注意准备全苏大会问题，并写入决议案，由于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未能具体地进行这一工作。战争胜利后中央局又马上筹划，并决定于8月1日开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通令并用无线电对全工农劳苦群众发出通电，并由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了全苏大会的选举条例。中央局还对全苏大会问题有决议案宣传大纲并有解释全苏大会问题的小册子发表，但后来因各级对于选举工作做得不好，且又面临国民党第二次"围剿"，要有军事行动

了，所以又决定把大会日期改在十月革命节举行。[①]1931年9月中旬，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苏区联成一片，形成了巩固的中央苏区，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移到瑞金，便抓紧做好召开苏区党代表大会和全苏大会的准备工作。

二、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阐述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一幢大祠堂里召开。苏区中央局成员，江西、闽粤赣、赣东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及江西、闽粤赣省委所辖各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共约70人出席了大会，湘东南（即后来的湘赣省）、湘鄂赣两省委代表团，因受敌人阻隔，至11月9日和10日才到达瑞金，因此，未能出席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由中央代表团成员任弼时主持，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了报告。已经发到中央苏区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称"九月指示信"），对大会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五个决议案，即《政治决议案》、《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红军问题决议案》、《苏区工会运动决议案》、《青年团工作决议案》。这些决议案全面贯彻和具体化了中央九月指示信的各项错误观点和主张，将王明"左"倾领导者的一些错误方针政策，开始推行到中央苏区的工作中。

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分为"苏区党的环境与任务"、"苏区党的现状"、"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四个部分，全面论述了苏区党的建设问题，并突出强调了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这个决议以及《政治决议案》等文件对党的建设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主要有如下内容：

---

①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7、378页。

第一，提出了苏区党的任务。《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提出，党“在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是要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之下领导并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保证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这里巩固党本身的组织，坚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最高限度地提高各级党部——从支部起——的积极性，严紧党的纪律，增加党的领导作用，成为最先决最重要的问题”。[①] 这里明确提出了苏区党的两大任务：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和群众组织的领导作用；二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充分调动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增强党的领导作用。

第二，提出了苏区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决议案指出，苏区党的组织工作在四中全会后初步开始了实际转变，“开始走向健全化道路”，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最主要的表现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动员群众的工作。而立三路线的残余，右倾机会主义和实际工作机会主义仍然表现非常浓厚。”[②] 具体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异常的薄弱，忽视巩固无产阶级领导问题；不了解党的领导作用，存在党包办一切的现象，造成政权与群众组织完全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并指出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理论遗毒的表现；支部工作不健全，支部没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不能在群众中起有组织的核心作用，常常做了群众的尾巴；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工作方式很少转变，家长制度、命

① 《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② 《党的建设决议案——中美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令主义、委派制度、派别观念与党内和平主义等还表现得很浓厚，官僚主义腐化的现象，在党内和政权机关中滋长，而党又没有正确的执行纪律；教育工作缺乏，忽视理论，形成事务主义状况；党的发展不及客观发展形势，不注意干部提拔，介绍新党员方式错误；指导机关不健全，上下级关系不密切；党内反革命派别活动仍是一个严重问题，混进了一批豪绅地主富农成分。同时决议案还指出了党内不健全状况的客观上和历史上的原因，即苏区内缺少广大的无产阶级基础，农村落后散漫的小生产意识反映到党内来，国民党"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侵入党内，以及过去党对理论的忽视和立三路线的影响，等等。同时强调，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对国际路线尚缺乏深刻认识，没有实际工作路线的彻底转变，党内缺少思想上及两条战线的斗争，没有充分努力去进行强固党内阶级基础和强固无产阶级任务。①

第三，提出了党的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决议案提出："依据当前革命形势，党的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基于国际的四中全会的精神，来坚决执行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要与过去一切缺点与错误和各种不正确观念作无情的斗争，使党能迅速克服这许多困难，而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使党得到新的工作上的伟大进步。"② 为此，决议案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12条具体措施，主要是坚持明确的阶级路线，强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强固党的阶级基础，建立支部工作，使党坚决的建立在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群众上，使支部

① 参见《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1991年版，第465～469页。

② 参见《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1991年版，第470页。

真正成为党与群众的连环，培养支部在党的政治路线与策略之下独立工作的能力；以及健全各级委员会，改进党的生活，创造党的新干部，加强党的教育训练工作，严紧党的纪律，健全红军中党的组织工作，建立健全的党报，建立党与政权及群众组织的正确领导关系，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密切的党团关系，加强党对团的工作的领导，等等。总之，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在中央苏区贯彻四中全会的"左"倾冒险主义，并通过党的组织工作及党内教育工作加以全面落实。

第四，提出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苏区党大会按照"九月指示信"的精神，把毛泽东在苏区和红军中创造出来的一整套方针策略贬斥为"狭隘的经验论"、"落后的农民意识"、"富农路线"、"游击主义"、"事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等都强调党内要发展广大的思想斗争，反对这一切错误的思想与倾向，要"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并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巩固党的战线，保障国际中央路线的正确执行的。党必须坚决从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消灭党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巩固党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只有坚决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保障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才能执行路线的转变，才能纠正和肃清过去的一切错误，才能完成国际与中央所给我们的全部指示，才能完成革命的重大任务，完成中国革命在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① 这就从根本上反对和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始全面地贯彻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苏区党大会根据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

---

① 《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政治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484、463页。

错误纲领，改造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撤销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重新由项英担任这一职务。改选后的中央局委员有项英、任弼时、毛泽东、朱德、顾作霖、王稼祥、邓发共七人。苏代会以后，又作出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配置，红军部队统一归中革军委指挥。这样，毛泽东失去了在苏区中央局内的党的主要领导职务，也在实际上被取消了红一方面总政委职位，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从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基本上实现了对中央苏区的控制。

苏区党代表大会对中央苏区党的建设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是巨大的，一方面是在形势判断上"左"的认识。《政治决议案》认为：目前国际形势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惊人的伟大胜利，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发展到最高度，世界革命的大风暴不久就要到来，资本主义制度正向死亡的末日走去，而同时，帝国主义正在准备世界大战，特别是反苏联战争这一战争的主要危险更是日益逼近。在中国，政治经济总危机更加深入，反革命统治进一步崩溃，革命条件逐渐成熟，而革命力量的发展，一定能战胜反动统治的无数次进攻，并完成一省和几省革命的首先胜利。在这里既夸大了反动统治的危机，又高估了革命力量的壮大，基于这种分析，会议认为政治形势有利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因此，苏区党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努力去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彻底转变党的路线，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另一个错误集中表现为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如前所述，这次大会对毛泽东及其在苏区和红军工作中创造出来的一整套方针策略进行了一连串的攻击，统统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并强调党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的主要危险——右倾。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指出：在发展根据地、党的建设、扩大红军、土地分配、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会运动等问题上，都必须坚持"明确的阶级路线"，实现阶级路线的彻底转变，保障国际路线执行，实际上，就是要在苏区全面

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并为此进行了组织改造。

苏区党大会虽然很大程度上贯彻了王明“左”倾错误主张，但临时中央仍不满意。1932年4月25日，《红旗周报》第37、38期合刊发表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1932年5月20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对苏区党大会都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指责党大会没有充分贯彻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指示及国际进攻路线，没有严重注意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问题，尤其是两条战线斗争非常薄弱，以反对所谓的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等等。这些文件精神的继续贯彻，也就是“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进一步推行。

苏区党代表大会是中央苏区时期党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在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改造领导机关等方面犯了路线上的错误，给中央苏区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但是，客观地说，这次大会对党的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在健全支部工作，加强党内教育上，克服了当时的不足，提出了一些积极主动的思想，虽然也存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但在工作的推动方面是积极的、有益的。在纠正过去肃反错误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思想。这次大会指出党内斗争的重点指向是“右倾”，并提出要防止肃反简单化、扩大化并以此阻碍甚至代替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错误，要纠正“肃反中心论”这种非常错误、非常有害的思想，要把肃反工作同反对反革命派的思想斗争和群众的教育工作结合起来。基于这一认识，大会虽然认为肃反仍是当前苏区的重要工作，但已降至反“右倾”的次要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肃反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在由闽西苏区赴瑞金途中，考察了闽西肃反工作并作了重要指示，1932年1月初，周恩来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委的工作，随即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作出《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指

出“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提出“须加紧执行肃反工作的检查”，对于“仍不更改其错误的，须予以纪律上的制裁”来彻底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上的错误。[①] 随后，1月25日和2月29日，中央局又分别作出了《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致闽粤赣省委并转省代表大会的信》，批评了闽西和江西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因此，到1932年春，江西苏区乱捕乱杀“AB团”的混乱现象基本制止，闽西苏区肃“社会民主党”的错误也已全面停止，并采取了一些善后措施。

第二节　苏区中央局的健全及对党的建设的领导

一、苏区中央局领导职能的调整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旨在统一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但是由于武装斗争及农村革命根据地交通阻隔等原因，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前，除赣江东岸苏区外，苏区中央局只与湘东南苏区和赣江西岸苏区发生联系，对闽西苏区的联系直到1931年9月间才打通。鉴于这种情况，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向各苏区派去“四中全会代表团”，以改造各地领导班子，同时在各苏区成立中央分局。

1931年5月间，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对苏区中央局的领导职能作了调整，明确提出苏区中央局只是中共中央派出机构，以指导和帮助当地党组织工作。《决议案》指出：“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组织，他只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导和帮助当地党部工作的进行，个人的代表与集体的代表在

---

① 《苏区中央局关于肃反工作决议案》(1932年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7页。

职权上原无分别，他决不能因为中央局是集体的组织便代替了当地最高党部的自己组织”，“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当地党委），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

同时，对中央苏区的管辖范围也作了调整，《决议案》规定：“江西苏区的中央局，他的管辖范围是包括江西省委，闽粤赣省委，湘东南省委，湘鄂赣省委，赣东北省委各苏区；在有些苏区省委（如湘鄂赣、赣东北）还没有与中央局所在地打通以前，中央须派代表去直接指导该区省委工作或直接归中央指导。”这样，按规定，苏区中央局就只负责指导江西省委、闽粤赣省委和湘东南省委（后改为湘赣省委）、湘鄂赣省委及赣东北省委（后改为闽浙赣省委）的工作，而实际上苏区中央局所直辖的先后只有江西、闽粤赣、闽赣、粤赣、赣南5个省委。苏区中央局对这5个省委及所属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领导将在本章第三、四节叙述。

《决议案》对中央局与其所辖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也作了调整。苏区中央局原是直接领导上述各苏区党组织的，《决议案》调整后规定“在上述这些区域的党的代表大会没开以前，中央局得直接指导上述各苏区省委的工作，既开之后，就应产生闽粤赣湘鄂联省的党委会，中央局经过他去领导上述各苏区省委的工作”。同年8月30日在《中央关于中央苏区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又将这个“联省的党委会”改称为“党的中央区委员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介于苏区中央局与苏区各省委之间的一级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央苏区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苏区中央局实际上始终是直接领导各省委的工作。

二、苏区中央局机构的健全与领导成员的变动

苏区中央局成立之初，委员共有9人，但是在苏区的只有项英、毛泽东、朱德3人，其余尚未到任。毛泽东因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朱德兼任总司令部司令职务，都不能过多参与中央局的工作，实际上只有代理书记项英一人主持中央局工作。1931年4月16日，由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抵达中央苏区参加中央局工作，并于次日举行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续会，深刻批评了中央局执行了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并于5月改组中央局，由毛泽东、项英、朱德、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任委员，项英仍任代理书记，任弼时任组织部长，顾作霖任宣传部长，欧阳钦任秘书长，王稼祥任政治保卫处处长。此后，中央局的组织部、宣传部等工作部门开展了工作，7月，出版了中央局机关报《战斗》。

苏区中央局成立后，局机关一直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1931年2月22日移驻宁都黄陂山堂，4月移驻宁都青塘，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5月23日宁都中村战斗结束后，中央局机关随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移驻永丰县龙岗，留住后方，专门负责根据地建设。为了便于指挥反"围剿"战争和红军所到之处地方工作，同时又恢复成立了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后称总前委），委员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谭震林、周以栗、黄公略7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周以栗任组织部长，古柏任宣传部长，郭化若任秘书长。从此时起到苏区党大会止，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和红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实际上都由总前委领导。同年7月苏区中央局由永丰龙冈移驻兴国，8月间又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兴国会合，9月中旬以后移驻瑞金叶坪。

1931年8月3日，《中央关于中央苏区党组织问题的决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顾作霖、邓发、朱德组成苏区

中央局，毛泽东任书记。

1931年11月，苏区党大会后，中央局委员不变，毛泽东因所谓“狭隘经验论”和“右倾机会主义”遭受批判，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重新由项英代理这一职务。

苏区党大会和第一次全国苏代会后，苏区中央局成员除任弼时外，都担任了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中的主要领导工作。于是，1931年11月15日致电中央，请中央另派人来担任中央局书记，并要求中央派人来负责党报和宣传工作。而在此前，1931年4月和6月，负责中共中央安全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特别是向忠发被捕前与周恩来同住一处，周恩来的处境更加危险。鉴于成立苏区中央局时中央就决定周恩来任书记，此时中央局又急切要求派人来加强领导力量，因此，临时中央决定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1931年12月底，周恩来由上海抵达瑞金，正式就任由项英和毛泽东交替代理了近一年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同时，中央局的其他领导成员也作了调整，由任弼时任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顾作霖为宣传部长兼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梁广任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局主任（后委员长为刘少奇）。这一时期，苏区中央局除直接领导中央苏区斗争外，还经常给湘赣和湘鄂赣两省委发出指示，具体指导这两个苏区的斗争。

1932年6月中旬在长汀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①，7月下旬决定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前方军事会议”，周恩来为主席，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决策方

① 红一方面军是1930年9月在第一次攻打长沙后，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领导成立的。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番号。

面军行动布置。留守瑞金的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主持中央局日常工作，由任弼时代理书记，称“后方中央局”，遇有重大问题，前后方中央局成员互相通报情况，共同商定。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共同提议并联名致电，经后方中央局同意，8月8日毛泽东被重新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8、9月间，前方军事会议成员与后方中央局成员在军队行动方针和军事路线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为此，10月上旬在宁都城北的小源召开了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后方中央局成员携带着7月21日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和中央关于军事行动方针的指示电，严厉批评了前方成员尤其是毛泽东的“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①] 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10月12日中央军委发出通令，由周恩来代理总政委一职，毛泽东随后赴长汀疗养。这次受打击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受多次打击中最严重的一次，此后他在中央苏区一直处于被排斥的地位，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再次复职，时间长达2年又3个月。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局，但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未宣布撤销，在向中央苏区党、政、军各级组织行文时，一般仍用苏区中央局名义。

三、苏区中央局对党的建设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领导者，是整个苏维埃运动的领导者，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就成为推动整个革命事业的关键。苏区中央局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和各项革命事业。作为当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苏区

① 《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页。

中央局把党的建设摆上突出位置，组织和落实中央关于苏区党组织建设的决定和精神，并根据中央苏区的实际，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对所辖地区党的建设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等各个方面实施全面的领导。

首先，是对有关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处理。苏区中央局一成立就着眼于赣西南组织的整顿和健全，当时根据中央的精神，撤销了江西省总行委，成立了中共赣西南临时特区委。1931年6月，根据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的新情况，又作出决定，撤销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及其所属各路分委，新成立中共赣东、赣南、赣西3个特委，随后又根据中央精神，将赣西特委划规新成立的中共湘赣省委，而在赣东、赣南苏区分别成立中共赣东、赣南和永吉泰3个特委，这些决定对健全赣西南党组织，有效加强党的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如：苏区中央局成立之时，中央苏区刚刚发生过"富田事变"的严重事件，对此，中央局成立的次日即发出第2号通告《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作出正确的处理，针对赣西南许多县、区党组织不执行这一决议的情况，2月19日中央局又发出第11号通告《纠正各级党组织执行中央局决议的错误》，这些决定对于维护党的团结，坚持民主集中制，执行党的纪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再如对于肃反工作，1932年1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局先后作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致闽粤赣省委并转省代表大会的信》等，这些决议及其他有关措施，有效地制止了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其次，根据党章和中央有关决定，创造性地提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一系列措施，促进党的建设的健康发展。为了规范党的组织建设，加强党员教育管理，1931年2月20日，中央局发出第12号通知，对党员的候补期、党员交纳党费及党的公开与保守党的秘密的关系作出明确规定。1932年6月15日，中央局发出第8号通知，为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就苏区内出版的党内刊物和党员教

育材料发行问题作出明确规定。1933年2月11日，中央局又作出《关于苏区新党员入党手续的决议》，对发展党员工作作出进一步的明确规范。为了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好地领导苏区的革命斗争，1931年2月底，苏区中央局发出第13号通告《关于党的公开问题》，通知各级党部，苏区内党的组织机关全部由秘密转为公开，同时强调，党的组织公开后要注意保守党内秘密，在赤白交界区域的党组织，条件尚未具备时仍采取秘密工作形式。此后，苏区内各级党组织相继公开，这既有利于党组织号召群众、组织群众，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也有利于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接受群众监督，搞好党的建设。为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1932年3月，中央组织局发出通知，要求苏区所有区委和支部都要进行一次改选，同年6月12日，苏区中央局讨论通过了《发展党和改造党的工作大纲》，对中央苏区党组织的发展和改造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从这年起，中央苏区每年都开展一次“支部改造运动”，通过总结检查工作，发现缺点错误，制定整改措施，洗刷不称职支部领导成员，以整顿和健全区委、支部的领导机构，这期间虽然犯有“左”的过火的错误，但对促进支部建设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坚决提拔与培养干部，大批地充实各级各类干部队伍。中央苏区在斗争中深切地认识到了干部队伍对于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创造干部”的宝贵思想，苏区党大会也提出要“创造党的新干部”，即要坚决地提拔干部，认为这是“目前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有计划地组织各种党的、军事、政治以及群众和苏维埃工作的训练班或学校，经常挑选一部分下层积极工农分子去接受培养训练。事实上，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通过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为适应革命事业迅猛发展的需要大胆地提拔了大批表现积极、有工作能力的工农干部，当时中央苏区县、区、乡党政军机关干部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文化水平不高，但革命意志坚定的工农分

子，他们有些还成长为中央部一级或省级党政领导人才，如曾任中央政府土地部代部长的胡海、劳动部部长邓振询、粤赣省苏主席钟世斌、闽赣省委书记赖男祚，及省苏主席杨道明、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江西省苏主席刘启耀等同志，都是由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逐步走上领导岗位的。同时，也着力各类人才的教育培养，如军事方面，1931 年冬，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与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红三军团随营学校合并，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3 年 10 月又进一步扩编为 5 所学校，即红军大学、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地方游击队干部学校，另外，还办有红军无线电学校、红军军医学校等，总计为红军部队培养各类人才万余人，他们中除牺牲者外，后来大多数成为军队中的高级军政人才。《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把创办党报摆在突出位置上加以强调，年底召开的苏区党大会提出："党报是领导全党的斗争，组织广大群众在党的政治主张周围的一种最重要的武器。……建立完善的党报，应看成是党的建立工作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强调"党报的论文对于下级党部应带有指示性的文件"。事实上，苏区中央局于 1931 年 7 月就创办了机关报《战斗》，该报于 1932 年 2 月 14 日更名为《实话》，作为中央局机关刊物在瑞金出版，1932 年 6 月 5 日中央局组织部创办党建理论刊物《党的建设》旬刊，1932 年 2 月 4 日，《实话》和《党的建设》合并为《斗争》旬刊，红军总政治部前后办有《每周宣传纲要》、《政治工作》旬刊、《党的工作》，等等，这些报刊作为党的纲领和党的政策的直接宣传者，常常是抓住每个时期党的中心策略和中心工作开展宣传鼓动或进行理论阐释，而广大党的基层组织则组织读报小组，对各篇文章进行学习交流讨论。这些报刊对指导党的建设、号召党员、团结群众起了重要作用。另外，像《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苏区工人》等大型报刊以及各省、县一级的党政军群机关创办的报刊或油印小报，都从不同角度宣传党的政策，也经常登载一些有关党的建设的文章或消息，对指

导党的建设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五，召集有关会议，对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作出专门布置，或派出代表参加地方和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会议，给予具体的指导。由中共苏区中央局主办的有关党的建设的重要会议有两次，一次是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召开的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政治问题决议案》、《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对中央苏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次是1933年5月召开的闽、赣两省组织会议，中央局组织部长任弼时在会上作了《目前党组织上的中心工作》的重要讲话，对改造和健全支部的组织与工作、加强地方党委的组织与领导以及群众组织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十分具体并具指导作用的布置。会上，还表彰推广了兴国县高兴区黄岭乡模范支部的先进事迹和经验，《斗争》杂志第5期刊登了任弼时同志的部分报告和黄岭乡模范支部的工作报告，全面介绍和推广这次会议的精神，以推进党的组织工作布置的进一步落实。此外，江西、闽粤赣（福建）等省召开党代表大会，中央局也都派出代表，莅临指导。1932年8月13日，瑞金县壁区召开党员大会，讨论当前工作及加强支部建设等问题，时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邓颖超也应邀出席大会，会后，她针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撰写了《瑞金城区党员大会经验与教训》一文，在《党的建设》第四期上发表，以促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以上就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对党的建设的领导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式。应当指出，在苏区中央局成立之际，也正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党中央之时，当年4月份"四中全会代表团"抵达中央苏区，开始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的广泛推进，因此，苏区中央局对党的建设的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必然犯有"左"的错误，在组织建设上必然排挤坚持正确路线，反对"左"倾错误的党员干部，从而损害党的建设。如1933年1月10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要求各省委和红军政治部对干部的

阶级成份进行一次严格审查，将“阶级异己分子”洗刷出干部队伍和党的队伍，从而使许多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党员干部受到不公正待遇。又如：从1932年开始的“支部改选运动”，虽然加强了党支部的建设，但在改选过程中，也出现了无限上纲、夸大错误、乱扣帽子、过火斗争等“左”的错误，影响了一些党员的积极性和支部的建设。但是，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主张在中央苏区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于实行“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也提出了一些推进党的建设的积极而有益的措施，更由于广大党员干部在“左”倾错误的推行中逐渐觉悟过来，而致力于实际地推进党的建设，因而，在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建设还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并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第三节 中央苏区所辖地方党组织的建设

一、中共江西省委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成立当天发出的《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务》第一号通告中提出，苏区党组织要依据全国苏区情况设立6个特区委，3天后即1931年1月17日，在吉安县富田成立了中共赣西南临时特区委，由陈毅任书记，直属苏区中央局领导。当时省行委解散，江西省委尚未成立，因此“赣西南特区委，即等于省委，特区委设东路，南路，西路，北路各分委”。[①] 1931年6月，中共中央在5月间作出的《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的组织决议案》传达到苏区。该决议案要求，各苏区特区委员会改称“省委员会”，按文件精神，赣西南特区委应改设为江西省委，另在湘东南苏区设立湘

①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8页。

东南省。当时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刚胜利，国民党军队虽已退出根据地腹地，但仍在赣州至吉安一线驻有重兵。赣江东西两岸苏区仍未能贯通，设立江西省，成立中共江西省委的条件并未成熟。因此，苏区中央局决定，将赣江以西苏区与湘东南苏区合并，设立湘赣省，成立中共湘赣省委和苏维埃政府，而在赣东和赣南苏区则分别成立中共赣东、赣南和永吉泰特委，等条件成熟时，再在这三个特委之上成立中共江西省委。

1931年9月中旬，中央苏区取得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东南各县区得到了巩固。根据中央决定，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于10月间正式决定在赣东南苏区设立江西省，成立了中共江西临时省委，由任弼时任临时省委书记，蔡畅任组织部长，陈正人任宣传部长，临时省委机关驻兴国。

1931年11月上旬，按苏区中央局决定召开了江西省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江西省委，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不同意任弼时兼任江西省委书记，因此，苏区中央局决定调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委会主席卢德光任江西省委书记。卢德光参加苏区党大会后，回闽粤赣临时省委交接工作并传达大会精神时，即携款叛逃，卢未到职，由陈正人代理省委书记。同年12月底，李富春抵达中央苏区，苏区中央局任命他担任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即专任组织部长，蔡畅任妇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成立后，中共赣东、赣南、永吉泰3个特委即撤销，由省委直接管辖县委或中心县委，最多时，省委管辖22个县委。

1932年初，江西省委由兴国搬到宁都，1933年9月27日至10月4日，在宁都七里坪村召开了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省党组织和千百万工农群众，作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同时，也是为了深入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1933年10月出版的《斗争》第29期还发了《江西省第二次大会代表踊跃加入红军》的通讯。中共中央局代表罗迈出席了

大会并作了政治报告，李富春代表省委作了工作报告，曾山代表省苏作了苏维埃工作报告，肖瑞祥作了经济建设的报告，刘球贤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大会还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会议还总结交流了全省扩大红军和优待红军家属的经验，并表彰了兴国县及一批模范区、乡党组织。大会选举李富春、陈毅、曾山等47人为省执委委员，谢佩兰等9人为省执委候补委员。李富春、陈毅、蔡畅、曾山、刘启耀等11人当选省执委常委，李富春为省委书记。大会根据中央有关决定，增设了省监察委员会，蔡畅当选为书记。1934年9月中旬，李富春调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后随红军长征，即由曾山代理省委书记。

红军主力长征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清剿，省委与所辖各县委的联系被隔断。为此，中共中央分局决定在一些特别重要的游击区设立特委组织，直接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11月在泰和县回龙州村成立了中共公万兴特委，辖公略、万泰、兴国3个县委，次年3月因受国民党军包围遭受重创，特委书记胡海受伤被俘而停止活动。1935年2月，原隶属赣南省委的杨赣特委转移至公、万、兴游击区活动，与江西省委会合，即改隶江西省委，3月间特委机关和游击队在突围途中被国民党军冲散，特委领导人或负伤或牺牲，也停止了活动。

二、中共福建(闽粤赣)省委

1930年9月，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将全国十几个苏维埃区域划为6个特区，以便统一领导，其中以闽西、广东东江和赣南部分县苏区组成为闽粤赣特区，10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将闽西、东江两特委合组为闽粤赣特委，并派遣中央委员邓发前往主持工作。1930年11月初，邓发到达东江苏区大南山，12月上旬抵达闽西，分别主持召开了闽粤赣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成立了以邓发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统一领导闽西、东江、赣南三块

苏维埃区域党的各级组织。后来，东江苏区未能同闽西苏区打通联成一片，闽西与赣南苏区也迟至1931年9月才得以贯通，因此，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实际上取代了中共闽西特委，领导的区域主要是闽西苏区各县及广东饶平、大埔县一部分地区。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成立后，受中共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双重领导，1931年4月正式划由苏区中央局领导。

根据中共中央于1931年5月作出的《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中共闽粤赣边特委于同年6月改为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由邓发任书记，罗明任组织部长，李明光任宣传部长，肖向荣任省委秘书长。邓发于1931年8月底调任中央局委员后，由卢德光继任书记。同年11月上旬由罗明任代理书记，李明光任组织部长，刘晓任宣传部长。省委办有机关报《红旗》。

为了贯彻苏区党大会精神，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临时省委于1931年12下旬召开会议，周恩来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在1932年2月7日召开闽粤赣苏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确定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一)检阅1930年12月第一次党代会以后一年半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二)贯彻苏区党大会的一切决议；(三)成立新省委。[①] 临时省委起草了第二次党代会的决议草案，发给各级党组织征求意见。后来，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又推迟至3月初举行。

1932年3月，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长汀县城召开。苏区中央局代表任弼时出席大会作政治报告，并传达了中央局于2月19日作出的《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及《致闽粤赣省委并转省代表大会的信》。大会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对国内外和闽西的形势作了过分的估量，大会讨论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闽粤赣苏区党的任务》、《党的建设问

① 参见明光：《准备党大会》1932年1月5日，载闽粤赣省委机关报《红旗》第51期。

题决议》、《苏维埃工作决议》等决议案。大会另一项重要议程是选举罗明、张鼎丞、谭震林、李明光、郭滴人为省委常委，罗明任代理书记，刘晓任组织部长，李明光任宣传部长，肖向荣任秘书长。大会遵照苏区中央局决定，将中共闽粤赣省委改称为中共福建省委，但是实际上两个组织名称一直同时并用。

1932年3月中下旬召开了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这表明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成熟。从这以后，在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的领导下，闽西苏区进入了强盛的发展时期。

1933年1月下旬，罗明作为省委驻(上)杭、永(定)、(龙)岩全权代表向留长汀的后方省委先后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关于杭永岩情况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随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致信省委，他们都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并得到省委其他领导人的支持。结果被苏区中央局和刚进入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指斥为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于同年2月15日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责成立刻召集省的临时代表会议。在会议召集之前决定以陈寿昌、刘晓、钟友勋等组成临时常委，同时立刻撤销罗明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的职务。同月24日闽粤赣临时省委作出《对〈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的决议》，决定深刻揭发罗明路线与对罗明路线的自由主义态度，并决定同月28日召集全省临时代表大会。会议如期在汀州召开，大会用谩骂和讽刺的方式对待罗明及其支持者，罗明、张鼎丞、刘晓等被迫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大会改组了省委，由陈寿昌担任省委书记。此后不久，罗明和杨文仲调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刘晓调往江西。6月下旬，陈寿昌又调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苏区中央局任命陈谭秋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1933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中共福建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长汀县城召开，大会继续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点名批判省苏

主席张鼎丞等同志。大会选举陈谭秋、张鼎丞、郭滴人、方方、李坚真为省执委常委，陈谭秋为省委书记，方方为组织部长，郭滴人为宣传部长。

1934年2月初，陈谭秋当选苏维埃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由曾洪易（曾宏毅）接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7月，曾洪易随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行动，中共中央局任命刘少奇为省委书记。同年10月，中央决定刘少奇随红军主力长征，由万永诚接任福建省委书记兼福建省军区政委，党政机关随即转移至长汀西南部与瑞金交接处之四都。1935年3月，四都受国民党军宋希濂部包围，福建省委，福建军区余部随即突入武平，4月上旬从武平折回长汀时，在长汀腊口附近的分水凹陷入敌重围，部队被打垮，万永诚和福建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等壮烈牺牲。至此，福建省委机关全部被破坏。

三、中共闽赣省委

1932年7至10月间，福建军区所属各部分两路向闽西北出击，以实现闽西和闽北苏区的联系，同年9月间为打通赣东北和闽北苏区的联系，赣东北红十军向闽北行动，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也向赣东北和闽北苏区方向进发，成功发动了建宁、黎川、泰宁战役，随后乘胜扩大战果，攻克了邵武、光泽、将乐、顺昌、资溪、金溪，从而打通了中央苏区与赣东北、闽北苏区的联系。为巩固对这一新区域的领导，1933年1月成立了中共建宁中心县委。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认为建黎泰在战略上、地理上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是“中央苏区战略的钥匙，是永远不能放弃的”。[①] 为此，1932年2月5日，苏区中央局决定设立闽赣省，同年4月2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

① 《中央对目前作战计划与任务的指示》（1933年3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页。

第四十次常会在听取邵式平的工作报告之后，认为“闽赣苏区地方广大，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占重要地位”，因此决定将建宁、黎川、泰宁、金溪、资溪、光泽、邵武这一新开辟的苏区与闽北苏区，以及江西信江、抚河之间广大地区划为闽赣省，立即成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以邵式平、顾作霖、万永诚、余泽鸿、毛泽民等25人为委员，邵式平为主席。①

同年5月上旬，闽赣省工农兵临时代表大会在黎川县湖坊召开，会议宣告闽赣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以顾作霖、邵式平、黄道、刘炳龙、刘帮华为常委，顾作霖为书记的中共闽赣省委。1934年1月在六届五中全会期间，顾作霖调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由邵式平兼任省委书记。中共闽赣省委成立时，辖有中共建宁中心县委、闽北分区委、闽中分区委及其所辖各县的党组织。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指挥，同年9月25日，首先向黎川发动进攻，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闽赣省处于中央苏区东北部的前沿地区，因而成了反“围剿”战争的主要战场。由于战争失利，1934年12月，省委和省革委机关率一部分武装陆续由黎川撤至福建境内，迁入建宁县城，同时，由于中共闽北分区委和信抚地区各县委与闽赣省委的联系被隔断，因而重新划归闽浙赣省委领导。1934年5月，建宁失守，闽赣省大部分苏区沦于敌手。中央决定，将原属于福建省委的宁化中心县委及所属的清流、归化（今明溪）、泉上、澎湃县委划归闽赣省委领导，以强固这一地区的防御力量。随之，中共闽赣省委及省苏政府也向南撤退至澎湃县李坑（现属宁化县），8月间又迁入宁化县城。此时，省委领导作了调整，邵式平奉

① 参见：《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次常会》，载《红色中华》第74期，1933年4月29日。

调中央工作，由赖昌祚接任省委书记，杨道明接任省苏主席，彭清泉为军区司令员。红军主力长征后，闽赣省委和省苏、军区一道领导闽赣省红军转入游击战争。1934年11月7日至12月1日，归化、清流、宁化相继被国民党军进占，闽赣苏区各县、县城全部沦陷，12月下旬，中共中央分局决定调赖昌祚任瑞金特委书记，由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调任闽赣省委书记。1935年5月，因游击战争失败，中共闽赣省委遂停止活动。

四、中共粤赣省委

1933年4月间，中央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为使南方战线的军事指挥统一，便于集中力量，开展南方战线的胜利进攻，就以江西军区之三、五两分区合并，改设粤赣军区，以统一于、赣、信、康、会、安、寻、武等县的军事指挥。"①4月24日，粤赣军区总指挥部正式成立，由张云逸任司令员（后由龚楚、何长工先后接任）。同年8月16日，人民委员会第48次常会认为："江西省苏区辖境太大，行政指挥上不便利，同时为着开展南方战线上的战争，克服与驱逐粤桂敌人，向西南发展苏区，深入现有区域的阶级斗争，开发钨矿和发展出入口贸易，有单独在南方设立一个省的必要。"② 会议决定设立粤赣省，下辖会昌、筠岭、于都、安远、寻乌、西江、信康七县。随即成立了以刘晓为书记的中共粤赣临时省委和以钟世斌为主席的粤赣省苏维埃临时政府。

1933年11月4日，在会昌县林岗坝陈屋祠堂召开了中共粤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约四五百人，刘晓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中央局代表罗迈（李维汉）作政治报告，戴元淮、钟世斌、罗屏汉、谢炳煌等分别作了查田运动、苏维埃建设、地方武装和组织问

① 《粤赣军区成立了》，载《红色中华》第76期，1933年5月5日。

② 《人民委员会第48次会议》，同上第106期，1933年8月13日。

题的报告。大会选举罗迈、刘晓、钟世斌等37人为省执委委员，还选举了候补执行委员9人，监察委员会委员9人。会后省执委选举刘晓等7人为常委，刘晓任书记。省委内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白区工作部、妇女工作部和监察委员会等工作机构。

1933年9月，蒋介石开始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国民党军粤军在南线不断向苏区发起进攻，1933年冬至1934年2月，安远和寻乌两县苏区相继失守，4月下旬筠门县又陷落，5月西江县划归中央直接领导，7月下旬，于都、登贤（由信康改称）两县又划归新设立的赣南省。这样，1934年8月以后粤赣省只剩会昌一个县了，省委和省苏的大部领导和工作人员也都转移到赣南省工作。10月，留守的省委书记刘晓和军区司令员何长工奉命随主力红军长征，至此，中共粤赣省委也就不复存在。

中共粤赣省委的成立，加强了对中央苏区南部边区边县的领导，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中共赣南省委的建立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为了更加巩固南线苏区，1934年5月中旬，中央决定在于都设立赣南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即设立赣南动员区，负责于都、登贤、赣县、杨殷四县的扩红动员任务。6月下旬又设立赣南战地委员会，项英为主任，在此基础上7月下旬设立赣南省，仍辖上述四县苏区。

设立赣南省后，随即成立了中共赣南省委。由于反"围剿"战事紧张，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指定了省委组成人员，由钟循仁任书记。省委设有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白区工作部等部门。主力红军长征后，赣南省委随即领导赣南省红军转入游击战争。1934年12月下旬，中央分局决定钟循仁调任闽赣省委书记，由阮啸仙接任赣南省委书记，1935年3月，因游击战争失败，中共赣南省委遂停止活动。

中共苏区中央局1931年1月成立后，前后直接辖有以上五个省委，1932年起还具体指导湘赣和湘鄂赣苏区的斗争，经常给这两个苏区省委发出指示。

另外，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即作出决定，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县为中央直属县，中共瑞金县委由苏区中央局和江西省委双重领导，并以受苏区中央局领导为主。1934年5月，为加强对扩红运动等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原隶属江西省委的长胜、太雷两县委和原隶属粤赣省委的西江县委，改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以上四县委先后成为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直接领导的县委一级党组织。

第四节　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党的组织的发展

一、党的基层组织设置情况

按照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时称党的基本组织）是党的支部。党支部的设置早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党的组织，每每一个乡村，一个支部，开起支部会来简直就是等于家族会议”①，创建中央苏区以后，“支部是以乡为单位，支分部或小组以村为单”②，这就是说，在苏维埃区域基本上是以乡为单位建立党支部，村建立党小组，有些支部由于在其区域或产业中地位之重要，在地方党部的工作上处于影响和推动全部工作的中心地位，因此就建立起中心支部；有些支部因小组党员人数较多（30人以上）

① 杨克敏：《关于湘赣苏区情况的报告》（1929年2月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② 欧阳钦：《中共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同上书，第388页。

或几个小组离支部过远，便在乡支部之下以村为单位或联合几个村小组建立支分部。据闽西特委统计，1930年5月闽西苏区建立乡苏政府557个，建立基层党支部546个。[①] 据江西省委统计，1932年2月底，全省15个县共设1163个乡[②]，另据统计，至同年3月底，14个县共建立998个党支部（其中石城县共有74个乡，党支部未统计）。[③] 综合以上两份统计资料，其中兴国115个乡123个党支部，瑞金78个乡123个党支部，万泰54个乡116个党支部，赣县90个乡96个党支部，宁都117个乡78个党支部，公略68个乡83个党支部，胜利78个乡78个党支部，会昌82个乡66个党支部，永丰76个乡66个党支部，雩都119个乡61个党支部，南广74个乡40个党支部，寻邬34个乡27个党支部，安远48个乡25个党支部，乐安20个乡16个党支部。

红军中党的基层组织，自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后，一直沿用没有改变。红军行军作战，政治工作，军事政治学习，新战士训练等，连队都是一个基本单位，因而，支部建在连上是确保党对军队的领导落到基层实处的组织保障，是红军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正如毛泽东所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④] 1929年9月28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这一建党原则，同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案指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

① 《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情况与各项文件》（1930年7月8日—20日）。

②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1991年版，第454页。

③ 《中共苏区组织统计表》（1932年7月），同上书，第661页。

④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

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① 这一原则后来成为红军中建党的一个基本原则，1931 年 5 月《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也肯定指出：“红军中党的组织，是以连支部为基本单位。”在中央苏区，地方红军、地方游击队等革命武装，也都按这一原则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都单独或联合建立了党支部。苏区的国家工厂企业（主要是军工企业、邮政、合作社、国家银行、造币厂等）也单独建立了党的支部。

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主要做法

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有感于当地生产力极端落后，社会组织几乎是家族组织，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庭会议的状况，毛泽东曾感慨地说：“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② 在中央苏区，随着党的斗争的发展，活动区域的扩大，党员队伍的壮大，这种状况有了极大改观，但如何建设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仍然是一个严峻的课题。古田会议提出了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广大党员，但大量的具体工作则要落实在党支部的工作中和党员的教育管理上。

因此，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高度重视党支部的建设，把支部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摆上党的建设的突出位置。从中央苏区许多党内文件和总结材料可以看出，他们在作出决议，布置工作和检查总结时，都把支部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强

---

①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 年 12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11 页。

② 《井冈山的斗争》（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4 页。

调。当时对党支部的地位作用和加强支部建设的目标任务是十分明确具体的，概括地说，1. 支部是党的组织基础，是贯彻落实党的纲领路线政策的堡垒，因此，“支部须养成在党的策略路线之下的独立工作能力”，“要在群众中活动实现党的策略”，① 否则，“支部工作不健全，任你有很好策略也都无法实现”②。2. 支部是党与群众的连环，党的政治主张，党在每一个时期提出的工作任务如扩红、购买公债、节约粮食、优待红军家属、发展工农业生产等，都要通过支部组织和领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基层支部的工作广泛深入地传播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使之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因此，各级党组织都强调“要使支部真正成为党与群众的连环”③。3. 党支部是基层苏维埃政权、革命武装和群众组织的领导核心。苏区党大会强调“支部必须负起对于政府和周围群众组织——工会、雇工会、贫农团、赤卫队、游击队、反帝同盟、互济会、合作社、俱乐部等——经常的领导责任。努力巩固党在这些群众中政治影响，领导群众的斗争。在没有这些群众组织的地方，就要领导群众建立起来，要坚决反对支部不管或忽视群众工作和把支部看成是单纯的教育机关的倾向”。④ 对于党的基层组织的地位和作

① 《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第二次全省大会党的建设问题决议》(1932 年 3 月 17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56 页。

② 《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1930 年 8 月 25 日)，同上书，第 619 页。

③ 《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1931 年 11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72 页。

④ 《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1931 年 11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72 页。

用，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在1931年6月7日发出的文件中认为："支部是党的组织基础"，"是党的宣传学校"，"是党的生活中心"，"是监督与领导同志工作唯一机关"，"是执行党一切决定的唯一机关"，"是扩大党的组织唯一工具"，"是群众中的核心"，"是干部人材的养成所"。① 红军总政治部也明确指出：红军中的"连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红军中的堡垒"，"红军中的政治机关，必须凭借着支部的组织，进行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②

在加强支部建设中，首先是注重加强支部干事会班子的建设。

按照六大党章规定，支部选举3人或5人组成干事会，在中央苏区各支部由于党员较多，工作面广，都由5人组成干事会，分工为书记、组织、宣传鼓动、妇女工作、青年工作等。为适应土地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1933年5月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召开闽赣两省组织工作会议，决定"支部干事会组织，以后要扩大与改变分工制度，原则上分工要小，每人要负责一项具体工作，并实行个人负责制"，"人数较多的支部，干事会由九人至十一人组成"，"人数较少的干事会，某几项工作可以合并由一人管"。③ 新的干事会组成与分工为：支部书记（管理全盘工作）、副书记（管理支分部与小组）、工会工作干事、军事工作干事、群众宣传鼓动干事、党员教育干事、妇女工作干事、贫农团工作干事、统计调查收党费干事、苏维埃工作干事、青年工作干事。同时，在某几个干事之下，可以组织各种工作委员会，如由各工会党团小组组长来组织工会工作委员会，由俱乐部、列宁小学、宣传队、墙委会等负责人组成宣传鼓动工作委员会等等。由于干事会人数增多，同年8月19日中央组织局又发出指

① 《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关于支部工作的布置》，1931年6月7日。

② 《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问题训令》，1932年9月21日。

③ 任弼时：《目前党组织上的中心工作》（1933年5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4、665页。

示信说,“支委人数过多时,可以设立三个至五个人的常委,负责经常工作的检查与领导”①。新支部干事会的组成与分工,既做到责任明确,各负其责,又吸收更多的党员来参加支部领导工作,健全和加强了支部的领导力量,也有利于培养和锻炼党员干部。

为了健全支部干事会,培养能够独立领导工作的支部委员会,中央苏区各级党部经常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和支部流动训练班。中央组织局要求“每个县委应该举办支书、干事的专门训练班,如支书训练班、组织干事训练班等,使每个干事都受专门的训练,……省委应该帮助每个县委训练出十个到十五个流动班的巡回教员”②。同时还重视支部的改造工作。从1932年起,中央苏区范围内每年开展一次支部改选运动。改造支部的情形,据当时江西省委的一份材料介绍:首先省委作出改选的决定,各县一般都召集各种会议讨论布置改选的工作,区委也召集支书联席会,组织宣传干事联席会等,各支部多数也召集小组长联席会,传达改选支部的意义,讨论改选方法。进入改选阶段,各支部在改选前,召集支干会、小组会,检阅近期工作,准备改选办法和改选要点,同时结合当前工作重点,如1933年改选抓住查田运动,开展积极的党内斗争。③因此,在改选支部工作中洗刷了一批不合格的干部,提拔了一批新

---

① 《中央组织局给苏区各党部的指示信——关于健全地方支部生活的问题》(193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303～304页。

② 《中央组织局给苏区各党部的指示信——关于健全地方支部生活的问题》(193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303～304页。

③ 《党的组织状况——全省代表大会参考材料之四》,(1931年9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1页。

的能力强的工农干部，提高了支部的积极性。应当指出在支部改选中曾出现夸大支部领导同志的缺点的错误，无限上纲，斗争过火等现象，伤害了一些同志，但总的来说，支部改选运动对于加强支部建设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在加强支部建设中，还强调要健全支部生活。在开创中央苏区时期，由于支部以乡为单位，纵横有四五十里，支部大会不容易开，支分部和小组会可以经常开，但讨论问题偏于广泛的一般的问题，对支部自身工作、党员教育训练等问题讨论很少，支部日常工作不能很好建立起来，在群众中的核心作用非常之脆弱。且由于一个支部中能识字的人不过几个，政治水平较低，党的决议案通告等只能达到区委一级，难以深入到支部。红军中支部生活，会议可以开，缴纳党费没有问题，但一般同志的政治水平还低，核心的领导工作非常之弱。[①] 苏区党大会把建立支部工作，改进党的生活，加强党的教育训练工作等问题作为党的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加以强调，并提出“党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提高与党内生活的健全与否是有极密切的关系”。[②] 因此强调应当注意推动党员对党内一切问题的讨论，要注意党的政策上的讨论，使每个党员能够明了当前的斗争任务，同时也推动党内民主化，实行自我批评，以提高党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培养自动工作的能力，养成党内生活的政治化。随着中央苏区的巩固，经过各级党组织的共同努力，党内生活逐步得到健全。1933 年 5 月召开的闽赣两省组织会议上对支部生活作出了更具体的布置：支书和各个干事，应分配出席小组会及支分部会；全

① 参见欧阳钦：《中共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 年 9 月 3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89～390、376 页。

② 《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1931 年 11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73 页。

体干事会至少每十天召开一次，必要时可召集临时会议，在十天中，各主要干事应有一次接头，解决日常事务问题；支部大会每月两次，小组会每月三次，每次支部大会前，干事会必须有很好的准备；支分部应设三人至五人的干事会，五天开会一次，支分部大会每月两次，所属的小组会每月二次；要切实实行党员中的分配工作，检查工作，每个党员除应尽一般党员义务外，还应分配一种经常的工作，以训练党员的工作能力，调动党员的工作积极性；支部要经常讨论并注意支部周围广大群众利益的争取，以此来加强对苏维埃与群众组织的领导；要建立中心支部与模范支部，以此来推进全部工作的改进。① 同年 8 月，中央组织局又发出通知指出：因为党小组生活在一个群众当中的村子里，对于本村群众的生活和情绪非常清楚，因此，“支部的日常工作必须在小组中建立起来”，“支部的日常群众工作要归到每个小组，以小组为基础来健全支部生活”。② 并强调：小组应该每星期开一次会，工作忙时还可以五天一次，以具体讨论村里的每一件群众工作，分配每个同志帮助群众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通过各级党部特别是支部干部会和广大党员的共同努力，支部生活不健全的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变，支部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党员的积极性，团结了广大群众，保证了扩大红军、经济动员等的伟大成功，推动了苏维埃运动广泛深入的开展。

在加强支部建设中，还通过建立中心支部和模范支部，以先进来带动一般和后进支部的工作。1932 年夏，苏区中央局组织部提出，每个区都必须有计划地建立一两个健强的中心支部和模范支

---

① 任弼时：《目前党组织上的中心工作》(1933 年 5 月 7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65～667 页。

② 《中央组织局给苏区各级党部的指示信》(1933 年 8 月 1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99、300 页。

部。同年8月5日出版的《党的建设》第三期，还刊登了小超（邓颖超）文章《什么是中心支部与模范支部》，指导先进支部的建设。1933年5月在闽赣两省组织工作会议上，更进一步提出了每个区应特别努力来建立一两个中心支部与模范支部。8月中央组织局又作出布置，每个区委和支委都要直接去创造一个或二个模范支部或小组，利用模范支部和小组的经验去指导一般和落后的支部，从模范支部和小组征调干部，组织突击队去加强和突击落后支部、小组的工作。同时规定，区委机关支部应正式取消，区委工作人员都编入附近的支部和小组，直接参加支部和小组的工作。按照以上要求，各地都陆续确定和建立了各自的中心支部和模范支部，并在工作指导和人员的配备上予以侧重。同时还利用各种形式对模范支部给予表彰，以扩大影响，全面推广。比如1933年5月闽赣两省组织工作会议上，介绍了兴国县高兴区黄岭乡模范支部的先进事迹和经验，并予以表彰，同时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5期专门介绍和推广了这个支部的事迹和经验。又如1933年12月26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128期，表彰了长汀县松林、杨背、涂坊3个模范党支部，他们在扩红运动中全支部加入红军。1934年8月《红星》第60期专门介绍了红十三团九连党支部的先进事迹，等等。总之，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来推广先进支部的工作经验，推动党支部建设的全面提高。

开展工作竞赛，也是加强支部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在中央苏区，经常组织支部与支部之间的革命竞赛，订立竞赛条约，定期检查评比。竞赛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发展多少党员（成分性别亦要规定），动员多少人当红军。派几个党员到红军学校政治队，派几个人到白区工作或到其他地方工作，支部中要产生多少积极分子等"。[①] 根据各个时期的工作任务，有时还增加优待红军家属，开展

① 《发展党和改造党的工作大纲》，苏区中央局1932年6月12日。

节约运动情况等内容，这些声势浩大的活动，在地方上和红军中都进行，有效地促进了支部的工作。

制定和颁布支部工作条例和规定，也是中央苏区加强党支部建设的一个重要做法。1929年7月13日红四军第三纵队政治部编写了《党员训练大纲——支部工作》，对连支部建设作了比较详细、全面的规定。1932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又编印了《新党员训练大纲》，接着又颁布《中国工农红军中党的连支部及团委暂行工作条例》，同年2月又编印了《支部工作纲要》。随后又颁布了《目前巡视纲要和支部工作报告大纲》，对支部建设提出具体要求。这些文件虽然还不尽完善，但对指导和规范红军中的支部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地方党支部建设、 ，各级地方党部也制定和颁布了有关的规定，1930年8月25日，《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专门对支部建设提出了8条要求，1932年3月17日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第二次全省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从7个方面提出了加强支部建设问题。1931年6月7日制定的《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关于支部工作的布置》，从支部的意义、支部组织的建立、支部工作的内容、支部工作的程序、支委会的分工及其工作、支部的会议、小组组织的意义及小组的工作内容8个方面对支部工作作出了详细的规定。1932年8月19日，发出了《中央组织局给苏区各级党部的指示信——关于健全地方支部生活的问题》，对加强地方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1934年4月10日，中央组织局又颁布了《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对企业支部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规范要求，这些规定和条例对于加强和健全支部建设，效果也是显著的。

三、党员队伍建设

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总体上看，能够严格执行党章规定，结合苏区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坚持党员标准，

来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在红四军，曾经有一度“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资格也拉了进来，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因此党的组织就弄得很差了”。对此，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纠正方法，即“将旧的基础厉行清洗，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同时强调，“今后新分子入党的条件：1. 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 忠实。3. 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 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 不吃鸦片，不赌博。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入党”。[①]在苏区地方，党组织中也对入党条件有明确要求，1930 年 10 月，赣西南特委会上就提出，“在苏维埃区域中发展组织，一定要有严格的条件”，“对党和主义有相当了解，有相当的阶级觉悟，便可入党”。[②] 在严把入口关的同时，也经常清除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党员，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就提出：“党应坚决地把党内一切消极怠工、不听调动、富农自请脱离党、金钱观念重于党、连三月不缴党费、三次不到会、破坏捣乱、昏庸不活动及吸鸦片的分子完全驱逐出党去；同时尽量吸收城市工人、农村贫农及积极活动分子入党，以改造党的成份。”[③] 总之，在中央苏区时期基本上是按照党员条件从严发展党员，从而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当然在一些组织中也存在追求数量，失之于宽的现象，尤其 1932 年、1933 年间“突击入党”，不适合党员队伍发展的规律，这在

①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 年 12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12、813 页。

② 《赣西南会议纪录》（1930 年 10 月 13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33、629 页。

③ 《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1930 年 2 月 28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84 页。

下章将具体述及。

关于入党手续，“六大”党章有原则规定，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规定，介绍人首先要审查被介绍人是否确实具备入党条件，并经过必须的介绍手续。介绍入党后，要详细告诉新党员以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党员应遵守的要点。介绍人对所介绍人应负担相当责任。支委要派人向将要入党的人谈话，考察是否具备入党条件。[①] 根据赣西南特委会议记录，当时介绍党员入党，由支部通过，区委批准。[②] 党员入党都必须经过入党式。当时“党员入党手续，介绍过后召集谈话，在暴动区域内举行入党立誓典礼”[③]，在土地革命初期，党组织还处于秘密或半公开状态时，为了保密，也曾借助绿林组织盟誓形式进行入党宣誓。

关于新党员的候补期，《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规定，劳动者无候补期，非劳动者的候补期 3 个月。六大党章对候补期未作具体规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和 1930 年 7 月全国组织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都强调要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而对产业工人入党不要候补期。1931 年 2 月 20 日，苏区中央局发出《几个组织问题》的第十二号通知，规定：“产业工人，雇农，手工工人入党，没有候补期”，“贫农入党候补期为两个月”，“独立劳动者（即做手艺的）、中农以及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入党候补期为六个月”，“不属于上列三项社会出身者，入党候补期可以按特殊情形延长到一年或两年”。

---

① 《中共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 年 12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13 页。

② 《赣西南会议纪录》（1930 年 10 月 13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26 页。

③ 《江西省委王××同志关于江西组织的谈话》（1928 年 1 月 18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3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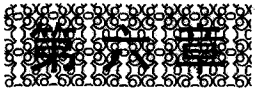
随着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央苏区按照入党条件，严格履行入党手续，大批发展党员，党员队伍得到了大发展，而党员队伍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土地革命的深入。

1929年1月，红四军开始向赣南、闽西游击，在红军的帮助和当地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党员队伍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迅速壮大。1929年5月江西省委统计，赣南党员3000余人，赣西党员2200人。据赣西南特委1930年10月13日会议记有党员3万余人。1931年经历了三次反"围剿"战争，加之肃反"AB团"的严重扩大化，到1931年12月23日苏区江西省委扩大会前统计，党员仅有15000余人，至1932年3月底达23000余人，1933年4月统计，全省党员67904名，红五月又发展17507名，6、7两月再发展12040名，至此全省党员共计97451名。

1929年3月和5月红四军两次入闽，闽西党员在红四军入闽前夕的3月为755人，至5月上旬统计，各县党员总数已达1400人左右，至7月，据岩、永、杭、武、汀5县委统计，党员2300多人。1930年5月，据不完全统计，闽西党员有7756人(不包括特委机关、政府机关及各革命团体的党员数，漳平和武平也只统计一部分)，据估计至7月底全区党员数大致1万左右。由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贯彻执行，至同年10月初党员由7月份的1万名减少至8000多名。1931年，闽西苏区大规模的"肃社党"运动，使党员又由8000人减为1931年11月初的5000人，福建全省至1932年3月党员恢复发展到6800人左右，至1933年6月猛增到20000人。

红四军中的党员队伍，1929年5月有1329名党员，1930年4月为1600多人，红军中的党员数至1932年7月底为9749人。1933年9月统计，"党团员占全体战士45.5%"，"军事指挥员中党团员占55.5%"，以当时全方面军10万人计，党员数应在15000人以上。

综合以上三方面统计，中央苏区全盛时期，即1933年夏秋期间，党员总数已超过13万人，如果再加上中央党政机关及直属单位，其人数还会更多。此时中央苏区共设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省（赣南省1934年7月设立），计有60个县，总人口约为453万（当时号称500万），其中江西、粤赣两省约240万，福建、闽赣两省各约100万，红军约13万，因此，党员人数约占总人口的3%。另据1933年6月20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所记，当时各地党员队伍情况是：湘赣苏区3万人，湘鄂赣苏区5万人，赣东北苏区3万人，湘鄂西苏区28470人，鄂豫皖苏区2万人，全国（含白区）党员总数约为298740人，这样，此时中央苏区党员数约占全国党员总数的44%。



王明"左"倾错误对党的建设的危害

第一节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一、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左"倾错误在苏区全面推行

1931年9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后，在党的白区工作中贯彻推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他们不顾白区国民党统治强大、白色恐怖严重的实情，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在中心城市不断公开组织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致使党的白区工作严重受挫，许多党、团、工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相继被捕，白区党的组织几乎损失殆尽，临时中央也无法继续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从1932年冬起分三批迁入中央苏区。1932年冬，刘少奇先进入中央苏区。翌年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等到达瑞金。在此前后，陈云、李维汉等也先后来到瑞金。临时中央领导成员到达瑞金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左"倾的政治领导，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组成了新的中共中央局。新的中共中央局成员有博古、张闻天、陈云、周恩来、任弼时、项英、毛泽东、刘少奇、顾

作霖、朱德、王稼祥、邓发，其中博古、张闻天等为常委，由博古负总责。中央局设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秘书处、党报委员会等机构，还成立了少共中央局。中央局组织部长任弼时，1933年5月改由李维汉担任；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副部长潘汉年；妇女部部长李坚贞；秘书长先为严重，后由邓颖超接任；党报委员会书记张闻天；少共中央局书记顾作霖，1933年4月改由何克全担任。中共中央局机关设在瑞金下肖区观音山。1933年4月，原设在瑞金叶坪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也迁驻此地，与中共中央局合并办公。

中共中央局成立后，原苏区中央局未宣布撤销，在向中央苏区党政军各级组织行文时，一般仍以苏区中央局名义，有时也用中共中央局名义。但从同年6月起，开始用“中央”或“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文件。1933年7、8月间，在中共中央局内又成立了中共中央组织局，这是一个负责中央局日常领导工作的班子。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成员有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组织局内分工为：李维汉负责组织兼管妇女工作，同时分工联系江西、粤赣、赣南3个省委，但实际上他既不管军队的组织工作，也不管白区和其他苏区的组织工作，只负责联系3个省委；陈云除担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外，兼管白区工作；而张闻天除负责宣传工作和分工联系闽赣、福建两个省委外，还侧重主管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这个机构名义上由李维汉负责，实权却掌握在张闻天手里。中央组织局每一次开会的议程，除组织、宣传外，都是由张闻天提出，会议结论也由他来作，重要问题博古也出席。因此，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局依然是原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性质，主要负责人仍然是博古、张闻天等人，而毛泽东当时虽然名义上是中央政府主席、中央局成员，但实际上已被架空，处于被排斥和打击的地位。这就使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占据了统治地位。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局在取得中央苏区领导权后，就积极推行他们“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他们规定当前党的基本的

总路线是："以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反革命对于革命的进攻"，"坚决执行积极进攻路线来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和对中央区的大举进攻"。①

为了实现这一基本的总路线，他们提出了所谓的"积极进攻路线"，要求全党坚决执行"左"的冒险主义方针，把工农劳苦群众的政治斗争性提到最高限度，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向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最残酷的斗争，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同时他们还制定了不切实际的战略方针，即"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②"左"倾冒险主义的这一套方针、政策和策略，显然是完全违背中央苏区的实情的，因而遭到了苏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红军指战员的不满、抵制和反对。

为了全面贯彻"左"倾政策，"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将矛头对准了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广大干部。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江西省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江西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谢唯俊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古柏，从苏区实际情况出发，在工作中积极贯彻毛泽东关于发展红军和建设根据地的正确主张，抵制和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策略，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代表横遭残酷打击。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根据博古的旨意，在福建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使罗明、张鼎丞、谭震林、郭滴人等一大批党的干部受到错误打击。同年3月，苏区中央局又在江西发动批判邓、毛、谢、古的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的运动，继续打击一大批拥护和贯彻毛泽东正

① 博古：《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斗争》第3期第15页，（1933年2月23日）。

② 博古：《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斗争》第3期第16页，（1933年3月23日）。

确主张的同志。这场错误的党内斗争，实质上是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继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之后，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反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而发动的一场宗派主义的党内斗争。经过这场斗争，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长期斗争历史，敢于公开抵制和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的苏区党政军重要干部，严重破坏了苏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造成党内人心惶惶，政治空气极不正常的局面。这就极大地削弱了苏区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并使王明为代表的各项“左”倾方针政策进一步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推行。

以博古为首的“左”倾领导人在中央苏区发动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同时，还开展了查田运动以贯彻王明的“左”倾土地政策。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决定在全苏区展开大规模的查田运动。当时受到排挤和打击的毛泽东按照中央的决定，具体领导了这一运动。虽然毛泽东在运动中撰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主持制定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反对“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纠正了查田运动中的一些“左”的错误，对王明“左”倾土地政策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但由于这场运动是在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的指导下进行的，他们利用当时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强制推行其“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倾政策，错误指责毛泽东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在全苏“二大”上又免去了毛泽东兼任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以致在查田运动中严重地侵犯了中农利益，过分地打击了地主富农，伤害了一大批对“左”倾土地政策怀疑、抵制的基层干部，影响了苏区的社会安定，从而导致苏区党组织日益脱离群众，给党的建设造成更大的破坏。

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时，正值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紧张时刻。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而且在军事上也强令红军要执行他们"左"倾的军事战略。而毛泽东当时已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撤销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然而，由于毛泽东正确的作战原则在红军中有着深刻的影响，支持毛泽东正确战略方针的周恩来、朱德等仍在红军中担负主要领导责任，他们对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的"左"倾错误指示，不断进行抵制和抗争，坚持执行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从而保证了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伟大胜利。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又调集100万大军，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有50万兵力用于进攻中央苏区。

在中央苏区面临严重威胁的形势下，1934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到会的除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各省委的代表。会议先后听取了博古、陈云、张闻天等所作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三个报告，并相应通过了《中共中央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五中全会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等文件，补选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新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和选举产生了中央党务委员会。改选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是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康生、毛泽东、顾作霖、刘少奇、关向应、邓发、何克全，共17人。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由博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党务委员会为董必武、刘少奇、邓发、林伯渠、邓颖超，董必武任书记。

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不仅没有总结“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的教训，认真研究中央苏区面临的险恶形势，反而变本加厉地提出了一系列“左”的理论和政策，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顶点。

第一，对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了完全错误的“左”的估计，使党的政治路线更加严重地偏离了正确轨道。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无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大肆吹嘘四中全会以来，在“左”倾中央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把中央苏区的创立、红军的扩大、中央政府的建立以及红军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统统算做他们最大的成绩。并不顾敌人第五次“围剿”形势的严峻，盲目地断言：“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① 错误地认定：国民党统治正急剧崩溃，第五次“围剿”是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所作的“绝望的进攻”，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胜谁负”的决战，因此，“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中国走向殖民地道路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② 并据此规定了党在苏区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一切资源，发扬党和群众的积极性到最高限度来扩大和巩固红军”，“在尽可能的短时期内，实现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③

正是由于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作了完全不切实际的错误估计，这就导致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政策继续沿着"左"倾冒险主义的轨道恶性发展。

第二，进一步发展了超越革命阶段的"左"倾观点，继续夸大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强调：党要"加强在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会更加发展资产阶级民主的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到达社会主义革命。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①] 正是在这种急于要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坚决主张要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别，在反帝运动和工作运动中只搞下层统一战线，强调工人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无限制地增加工资，监督甚至接管资本家的工厂，强调在解决和分配土地时"必须坚决执行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依靠贫农、联合中农的明确的政治路线"。[②] 这样，五中全会就把超越革命阶段的"左"倾思想推向了极端。

第三，在反右倾的口号下，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五中全会从对形势的错误估量出发，提出了"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口号，严厉指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苏区党政军领导干部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说他们对革命形势悲观失望，忽视群众的力量，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慌失措，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引导革命到失败的道路。为此，全会号召全党"必须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党与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的实现”。①

这样，五中全会就进一步发展了四中全会以来党内严重存在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一方面使大批敢于抵制和反对“左”倾错误的优秀同志横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受到错误的处理以至诬害，另一方面又轻率地提拔了那些同他们气味相投、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所谓“斗争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这就极大地削弱了苏区党组织的战斗力，严重损害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并进一步助长了党内个人专断和盲目服从的恶劣倾向，给党的建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第四，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继续鼓吹军事上的“进攻路线”，同时接受了李德的“短促突击”的新战术。五中全会否认敌强我弱的前提，不顾第五次反“围剿”前期他们在军事上所造成的被动局面，继续鼓吹军事上的“进攻路线”，反对“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将其斥之为“在敌人进攻面前退却逃跑与悲观失望”。同时由于以博古为首的“左”倾领导人缺乏军事战略决策的能力和指挥红军作战的实践经验，因而对 1933 年 10 月到达中央苏区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言听计从，盲目地接受了李德在会上提出的反对堡垒主义的“短促突击”的新战术，这就在实际上使红军的作战方针由初期的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向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这种单纯防御路线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一步拖向了失败的边缘。

由上所述可见，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它在党的建设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而且最终必然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丧失。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4 页。

第二节　"突击入党"和"唯成分论"

一、突击发展党员，降低党员质量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和全力支持下，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自此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一步发展了李立三"左"倾错误时期突击发展党员的不正常做法。

1931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强调提出：目前整个党的组织发展的情形很难真正顺利去准备领导和进行正在成熟着的革命斗争。因此，现在发展组织的中心任务是彻底肃清立三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在发展组织上的一切障碍与破坏，在党的发展上有一个迅速的转变，把群众斗争一切较好的成分无所畏惧的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把工作重心移到产业中去。为此，他们提出了"突击发展党员"的错误方针和具体方法。其一，是利用纪念日搞征收党员运动——"在一切伟大的革命纪念和敌人进攻的关头要宣传大规模的征收党员运动，号召无产阶级和贫农入党"①。其二，是规定发展党员的指标，把它作为各级党组织工作实绩的主要标准——各级党部应把发展组织的问题当为日常工作中心任务之一，每月关于发展组织的工作，对上级党部要有具体的报告。"在检阅工作时，要把党员数量上的发展与建立产业支部，吸收工人入党一事当作工作成绩主要标准之一。"② "属于产业支部的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242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页。

同志，每人每月至少须介绍一工人入党。”① 其三，是“要在产业支部中发展革命竞赛，在本年五卅时，各级党部要举行发展组织的总检阅”②。其四，是“在苏区内当苏维埃建立的时候，就应该最高度的发展党的组织”③，党向群众开门，使党的组织基础是无产阶级和贫农群众。

为了全面推行这一“突击发展党员”的错误方针，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还频频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坚决执行。1931年4月，中央在对福建目前工作的决议中，就提出要在城市中举行征收党员的运动，两个月内党员人数应由6万余猛增至9万人以上，其中城市工人要占30%。翌年3月，《中央关于红五月运动的决议》中又提出：“在红五月中各地党部必须努力发展党的组织，做征收党员的运动。”④ 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这年5月就决定：“各地党在红五月中，要发展党员一倍。”⑤ 同年6月，苏区中央局在《发展党与改造党的工作大纲》中又明确规定：“在本年十月一号以前，江西苏区要做到发展两万新党员，闽粤赣要发展八千新党员，湘赣、湘鄂赣要发展一倍。”并且具体要求在7月25日到8月1日的一周内，举行一次公开征收党员运动。这样，大规模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页。

突击发展党员便迅速扩展到整个中央苏区。同年7月，中央在给河南省委的指示信中，又要求他们在十月革命节前完成发展党员一倍的任务。接着又给山东、满洲、河北、陕西等省委去信，提出为"纪念十月革命日"，青岛、哈尔滨、沈阳、唐山、天津要"三倍增加党的力量"。

9月中旬，中央又通过决议，要求全党在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节运动中"三倍扩大党的组织"。为了推进这一错误方针的贯彻，中央组织局还发了一个《征收党员运动》提纲，要求各地党组织派人到工厂门口去，趁工人上下班时，举行演讲活动，扩大党的宣传，发展新党员。并严厉规定"凡是不执行这一工作消极怠工的分子，必须给以严重警告，一直到开除党籍为止"。①

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后，变本加厉地强制推行这一错误方针。1933年4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再次决定在红五月中进行"广大的征收党员运动"，要求在一个月内扩大一倍新党员，使女党员增加一倍半以上。

"左"倾错误的"征收党员运动"进一步破坏了中央苏区党的组织建设，各地竞相突击发展党员，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突击入党热潮。当年5月1日，在瑞金开幕的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不到半分钟全体代表便一致举手加入共产党。红军学校5月5日召开的马克思纪念会上，有近500人公开报名加入了共产党。一些地区在红五月征收党员运动中，还提出了"欢迎穷苦工农入党"、"欢迎工人贫农入党"的错误口号，以致在一段时间里，一大批尚未完全符合党员标准，没有严格履行入党手续的工人群众、贫农分子像潮水一般涌进党内。据1933年9月江西省党代表大会反映，下面发展党员的方法是"摆摊子式，动员入党"。有的党员对群

①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建设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众说:“你为什么不加入党,难道你是反动派吗?”还有的党员更提出非常错误的口号,如“每个穷人应该加入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好打路条”,“有介绍信,无论到哪里都有饭吃”。①

这种连续不断大规模突击发展党员的极不正常做法,一方面说明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党内“左”倾领导人对中国工农群众思想觉悟、阶级觉悟的实情以及各级党组织的实际状况并没有真正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对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党的组织建设的客观规律缺乏正确清楚的认识。他们不懂得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而不是工人阶级的一般阶级组织,如果把党降低到工人阶级一般阶级组织,把共产党员降低到普通工农群众的水平,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党;不懂得党的思想建设在党的各项建设中居于首要和基础的地位,如果思想建设没搞好,其他各方面的建设也不可能搞好,而且必然出现不少党员在组织上虽然入了党,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的状况,严重影响党员的质量;不懂得党的组织建设、党的队伍的发展壮大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都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必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违背了这一规律,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盲目胡乱发展党员,其结果只能是抹煞党的先进性,严重削弱党的组织力战斗力。

正因为党的“左”倾领导在中央苏区贯彻推行了这一错误方针,致使苏区党的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损害。例如,据江西省委1933年9月的报告,江西崇仁县“在红五月前确有多少党员,五月发展了多少,县委区委都不晓。近来因敌几次的进扰,连县委所在地的固岗,竟有多少党员也不晓得,因为区委支部没有把党员登记起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677～678页。

来"。[①] 由于党员质量偏差，党组织严重丧失战斗力，以致当这个县有3个区被敌人占领以后，党团的组织就完全散失了。1933年8月《中央组织局给苏区各级党部的指示信》中也不得不承认："党员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还没有达到可能的程度"[②]，支部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教育党员训练干部的工作"[③]，"必须把加强全党理论的武装当作党的基本任务，必要用尽一切方法来提高党内政治水平线"。[④]

二、发展党员搞"左"倾关门主义的"唯成分论"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上一方面推行了"突击发展党员"的错误方针，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发展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内严重存在的片面强调工人成分、排斥知识分子的"唯成分论"的"左"倾错误。在1931年3月通过的《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中就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必须把工作重心移到产业支部中去，多多建立新的产业支部，巩固已有的产业支部，加紧吸收产业工人入党。"紧接着，在1931年5月，又作出了《中央关于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和《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强调提出："在党的发展上，须于最近检阅各地党部对中央决议的执行，务期达到党员社会成份的大转变……把党建立

---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672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675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676页。

在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基础上。”① “苏区和红军内党的组织，首先就要注意党的基础，必须坚决地建立在无产阶级和贫农的群众上。彻底肃清富农分子和一切异己分子。”② “对于干部的问题，必须有最彻底的解决。……造出源源不断的工农干部”③。

为了全面推行这一“唯成分论”的“左”倾关门主义方针，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提出要注重于“领导机关工人化”与“提拔工农干部”两个口号的执行，强调“党要从下而上的改造党的指导机关，要千百倍的努力引进和训练新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中来”。④ “要派遣大批的工人干部去担当红军的指挥员与政治委员”，并把知识分子与地主、富农相提并论，排斥打击党内那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例如，1931 年 2 月，中央通过的《关于鄂豫边特委工作决议》就声称：“在党内的成份上，富农甚至小地主占了不少的数目，党的指导机关大多数是在这些成份和知识分子掌握之中。”⑤

这种认为地主、富农在党的指导机关中数量相当大的估计，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把知识分子与地主、富农相提并论，一律视为阶级的异己分子更是错误。在这种“左”倾错误的建党方针指导下，各地不少党部一方面提出了“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欢迎穷苦工农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80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82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81 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26 页。

⑤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版，第 115 页。

入党"等抹煞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使大批未具备入党条件、缺乏实际工作能力和实践斗争经验的工人、贫农纷纷涌进党内，并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另一方面又鼓吹宣传"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才能加入共产党"，拒绝真正进步的革命知识分子和中农入党，甚至把党内那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干部，当作阶级异己分子和国民党暗探一样看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1 年 4 月中旬，四中全会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随即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通过了《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规定苏区中央局的主要任务是：在党的建设上，坚决的执行改造党的工作，洗刷异己阶级的成分，彻底改造干部，提拔新的真正的工农干部来担任领导工作；在政权建设上，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洗刷地主豪绅的子弟富农流氓等；在军队建设上，改造军事及政治干部，尽量提拔工人来担任领导工作，肃清红军中的 AB 团及其他反动分子。

这个决议的通过，就使王明"左"倾错误的建党方针在中央苏区得到贯彻和推行。根据 1931 年 9 月《赣西南(综合)工作报告》，赣西南苏区到 1930 年 10 月被开除出党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就达 1000 人之多。而且在此之后，赣西南苏区又将清除地主富农出党与错误的肃"AB 团"运动搅在一起，使大批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党员干部遭到错杀，党员数量急剧下降，损失极为严重。然而，在 1931 年 11 月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却依然认定：中央苏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到非常的程度，党内的领导机关大多数仍然操纵在知识分子、中农及独立劳动者手中，甚至还有地主富农暗藏在党内指导机关以

内”①，因此，“在党的发展中，必须特别要执行向工人雇农苦力开门的路线。地主、富农分子完全不能容许入党，对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必须有严格的条件”。②

此后，苏区中央局在所发出的有关文件中，反复强调这个问题。1933年1月苏区中央局作出的《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更严格要求和规定：各级地方党及红军政治部“必须坚决提拔积极坚定的工农干部，特别要坚决培养和提拔工人雇农干部，参加指导机关的工作，以巩固指导机关中无产阶级意识与领导上的坚定性”③，各级地方党部和红军中的党务委员会“必须审查一次党员成份，除开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思想意识和行动与生活上完全无产阶级化，而工作表现积极努力的知识分子外，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必须坚决洗出党外”④，“特别注意吸收工人雇农分子以增强和巩固党内无产阶级的基础”⑤。

由于这一错误建党方针在中央苏区的贯彻推行，不仅使一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积极努力为革命工作的先进分子，被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而且使一大批已经入党并经受了严峻考验，具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和较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40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40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41页。

强工作能力而又出身不好的党员干部，横遭清洗或受到无理的打击和排斥，这就极大地削弱了苏区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给苏区党的建设造成严重的损害。

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左"倾领导推行这种"唯成份论"的"左"倾关门主义建党方针，充分说明他们对如何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一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并没有真正清楚的认识。他们不懂得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毫无疑问，应当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但是，党员的社会出身、党内工人成分的多寡，并不是党的性质的决定因素。决定党的性质的主要是党的指导思想和纲领路线，关键是用什么思想教育和武装党员的问题。只要一个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坚持正确的纲领和路线，即使党内的工人成分不占多数，也可以建设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尤其是在经济文化落后、产业工人极少的广大农村开展革命斗争，为了不断发展壮大党的队伍，增强革命的力量，我们党必然而且应当积极地吸收那些确实具备共产党员条件、忠实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又出身于其他劳动阶级乃至剥削阶级家庭的先进优秀分子加入党的队伍，这既是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也是把马列主义建党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客观要求。

当然，在这种特殊的具体的环境下，为了切实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我们就必须特别强调和落实党的思想建设，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用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武装全党，坚决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切实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而不断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

第三节 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

一、实行错误的党内斗争方针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为了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在组织路线上实行了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为了贯彻推行这一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他们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此作为党内斗争的基本方针。1931 年 2 月，王明抛出《两条路线底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应当是党的一切行动和指导的基础”，要求在党内展开“不调和的无情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肃清那些不可救药和固执己见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31 年 5 月，王明“左”倾中央在《中央关于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中又重申：“必须根据四中全会和国际路线，改造和巩固各级党的领导，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肃清立三路线；与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须做最残酷的斗争。”①

正是根据这一错误的党内斗争方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者，对曾经执行过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同志和一大批反对王明等人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当时，康生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紧跟王明，积极推行这一错误方针，使许多优秀干部遭到无理的打击和迫害。最先受到打击的是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贺昌和犯了所谓“调和主义错误”的瞿秋白。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作决议写文章打击瞿秋白，逼迫瞿秋白三番两次地写强加于他种种罪名的声明书。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地下斗争的何孟雄、林育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83 页。

南、李求实等人都是反立三路线的，只是因为反对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持王明等人的错误做法和王明的"左"倾错误主张，也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横遭打击。在白区工作的刘少奇，也因为1931年秋同王明"左"倾错误作斗争，反对在黄色工会里公开组织赤色反对派，反对盲目举行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主张争取一切愿意与工人合作的同盟者共同斗争，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坚持与爱国民主人士合作，而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典型受到点名批判，并被撤销了中央职工部长兼全总党团书记的职务。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党内斗争方针，很快贯彻到中央苏区。1931年11月，在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他们把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观点和主张诬蔑指责为政治上的"非无产阶级观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实际工作中的"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改选了中央苏区中央局，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指责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正确战略方针是所谓对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消极怠工，不尊重中央的统一领导，是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的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这就进一步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不久，毛泽东就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1933年1月，博古等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后，为了在苏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在政治、军事和组织上全面排斥和打击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同志，便于2月中旬开始在福建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

罗明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1932年冬和1933年春，他在领导闽西上杭、永定、龙岩等边界地区斗争时，根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和闽西的实际情况，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向省委提出了与中央"左"倾错误旨意不同，但却切合闽西苏区斗争实际的正确主张。他提出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闽西革命根据地，我们必须向着敌人薄弱的地方发展；必须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来粉碎敌人的进攻，反对分兵把口、硬打强敌；必须从各地实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反对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的"左"倾做法；必须依照各县区的环境和当地群众斗争力量和情绪以及党的力量去积极组织群众进行艰苦的游击斗争，反对不顾苏区实际，在上面指手划脚、乱发命令。

罗明的这些正确主张，是完全符合闽西苏区斗争实际情况的，也体现了毛泽东历来坚持的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我们工作方针的正确思想原则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方针，在组织上亦无可非议。然而，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却对罗明的正确主张大为恼火，认为这是"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于是在1933年2月中旬在福建开展了一场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错误的党内斗争，其实质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遭到了福建省从上到下许多党员干部的反对和抵制。

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者为了全面贯彻其意旨，便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法，对福建苏区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错误的批判、处罚和撤换。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省委常委张鼎丞、谭震林、郭滴人、刘晓以及团省委书记陈荣、省委土地部长范乐春、省军事部长游瑞轩以及许多县区领导干部都横遭打击和撤职。这就使王明的"左"倾错误在闽西苏区得以完全贯彻，造成了党内恐慌、党群脱节、社会动荡不安等严重后果，使党的干部队伍遭到极可痛心的损失。

继福建反"罗明路线"之后，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又在江

西苏区开展了反邓、毛、谢、古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当时，邓小平是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是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是江西省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兼独立五师师长，古柏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这四位同志都长期跟随毛泽东开辟和建设了中央苏区，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们认为在敌强我弱、强敌占据着中心城市的情况下，必须向敌人力量弱的地方发展，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实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以歼灭敌人；必须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必须从苏区实际出发进行扩大红军、推销公债和收集粮食等工作，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

对于这些正确的主张，"左"倾错误领导者不能接受和容忍，遂于1933年3月在江西开展了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攻击和指责他们"对革命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富农路线"，是"内部已有政纲的反党派别小组织和小集团"等等，几次三番对他们进行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并把这场斗争推行到全省各地。这就给江西苏区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使江西党内一大批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优秀干部遭到错误打击乃至诬害，严重地削弱了该地区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并使王明的"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得到进一步的全面推行。

除福建、江西外，以博古为首的"左"倾领导，还在闽赣省、闽北苏区、粤赣省各地相继开展了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在红军中则开展了反对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为首的"红军中的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错误的党内斗争，一直延续到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敌人大举进攻苏区腹地，才不得不被迫停止。

综观这场长时间错误的党内斗争，严重破坏了党的理论联系

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践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搞得党内人心不安，涣散了党的团结，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因此，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要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就必须坚持发扬党的民主集中制和三大优良作风，就必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坚决反对杜绝那种混淆党内两类矛盾，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否则，就必然会使党的建设、党的事业遭受严重的危害和损失。

二、实行“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

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中就提出：要“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里来，并且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份，以保障党的正确领导”。这就使王明等人实际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从此开始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我党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在会后不久王明抛出的《两条路线底斗争》的小册子中，他又借口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在反对立三路线中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强调要以积极拥护和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在1931年5月1日的《中央关于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又提出：“对于干部的问题，必须有最彻底的解决”[①]，“必须根据四中全会和国际路线，改造和巩固各级党的领导”[②]，各级党组织要规定具体的方法，来引进和培养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紧接着在同年5月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83页。

9日发表的《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中又重申强调："自四中全会后，党的路线上虽有坚决的转变"，但是"新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还没能很好地引进，以致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与右派消极的现象，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①] 而"全党的战斗任务"则是把他们的一套"左"倾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一切实际工作中去。

同年8月27日，王明等人控制的党中央又专门作出《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认为："加紧培养和巩固领导的积极干部在国际和四中全会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这些干部于各级党部的周围，为党的路线而奋斗，成为目前组织上最重要的中心任务之一。"[②] 为此，"需要扩大和巩固党的积极干部……反对破坏和阻碍提拔新干部的任何企图……特别要集中火力反对那种留恋旧干部、害怕引进新干部，以反对干部困难情形投降叹气，不从积极方面想办法求得解决的右倾机会主义"。[③]

由上所述可见，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为了全面贯彻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一方面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法，打击、处罚和撤换一大批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反对他们"左"倾错误的优秀干部，另一方面则实行"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竭力提拔重用那些同他们气味相投，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所谓"斗争干部"、"积极干部"，或只知盲目服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党的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88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页。

各级领导机关。为了贯彻这一“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他们主要采取了两条组织措施：

第一，对地方党组织“加强中央成分”。在1931年1月20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决议》中就指出：为了“最高限度的集中并巩固我们在苏维埃区域斗争的领导”，“必须增加并巩固苏维埃中央的成分”①。这里所谓的增加并巩固“中央的成分”，就是派那些积极拥护、坚决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代表到各苏区去，贯彻推行他们的“左”倾政策。在同年5月通过的《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和《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中又提出：“中央政治局本身对于加强对苏区的领导任务，必须更实际的进行。中央派赴各苏区的中央的组织或中央代表，必须加强他的成分。”② “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③ 这实际上就是把各苏区民主选举的党委置于中央派遣的代表绝对控制之下，使这些中央代表成为地方党的太上皇，执掌各地的大权，以保证“左”倾政策的顺利推行。

第二，建立巡视员制度。1931年5月1日，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通过了《中央关于组织报告的决议》和《中央巡视条例》，强调指出：为着彻底实行全部工作的转变，必须建立完善的巡视制度，来加强对各级党部的领导。并规定：巡视员是“中央对各地党部考查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必须“保证国际和中央路线百分之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88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

百的执行"。为此，巡视员负有加强和改造各地党部的使命，可以严格地检查各地党部的领导成分与领导方式，检查、教育和提拔干部，坚决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和一切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而且他们的工作范围和权力范围不仅是党组织，还包括党领导的一切群众组织。这样，就使巡视员凌驾于地方党组织之上，使他们可以采取政治的、组织的手段，强制推行王明的"左"倾政策。

正是根据这些决议，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从1931年3月开始，有系统地向各根据地和各机关，派遣了所谓中共中央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机关、巡视员或新的领导干部去改造和充实各级党组织。一时之间，"钦差大臣满天飞"。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夏曦到洪湖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曾洪易到赣东北；其他如满洲、顺直、山西、青岛、河南、武汉等地都先后派人去改造和充实。上海、江苏党组织更是改造的重点，改造工作一直深入到工厂企业的基层支部。这些"斗争干部"、"积极干部"在取得各地党组织的领导权后，就卖力地推行王明的"左"倾方针和政策，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大批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的优秀干部，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

例如，在赣南闽西，许多参加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优秀干部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AB团分子"的帽子横遭打击乃至杀害，红十二军连以上干部半数被肃，根据地大大缩小。在鄂豫皖，以张国焘为首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坚决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集中火力打击右倾机会主义，致使以曾中生为书记的鄂豫皖特委受到严厉打击，许多坚持正确主张的好同志被撤销了职务，甚至有的被开除党籍。而且从1931年9月到11月的两个多月里，在张国焘的主持下，就逮捕杀害了干部战士2500多人。在湘鄂西和赣东北，

在夏曦、曾洪易等领导下也进行了大规模"肃反",各有数千人被错误地逮捕或杀害。

因此,历史经验表明,要保证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顺利发展,就必须实行"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在选拔和使用干部上,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并且还要善于培养和爱护干部,只有这样,才能把真正优秀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培养和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反之,如果实行"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结党营私,组织宗派主义小派别,扶植个人势力,只能造成党内极为不正常现象的发生,严重地削弱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给党的建设和革命的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害。

第四节 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民主集中制的破坏

一、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

在中央苏区创建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着重从思想政治上建党的原则,并初步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然而,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领导者占据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绝对化,致使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受到严重的干挠和破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片面强调党内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工人成份,忽视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1931 年 8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在政治路线上,而且要在党的成份上,以及工人在党的

领导机关中所起的作用上，成为无产阶级的党，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和革命得到胜利发展。要大胆地、有步骤地，同时突击式地征收优秀工人入党，这应当成为党的一切支部和委员会的最主要的政治任务。"①

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领导机械地照搬了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强调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党本身，首先要使领导机关与全党成分工人化，培养和提拔成千上万的新干部"②，这充分说明，他们对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缺乏深刻清楚的认识，没有认识到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乃是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决定性因素。相反，他们错误地认为，只有增加党内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工人成分，党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正因为如此，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虽然也一般地提到了党的思想建设的任务，但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尤其是放松了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这就使一部分党员，特别是那些"突击入党"的新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却没有很好解决，以致在革命斗争中无法很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二）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革命经验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严重破坏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虽然也强调党员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但是他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真考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而是照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9页。

搬照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个别结论和词句，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革命的经验奉为金科玉律，加以神圣化和绝对化。

正因为如此，他们错误地指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狭隘经验论”，认为“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而他们自己在写文章、作报告时，尽管能大段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甚至有些篇章背得滚瓜烂熟，并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将这些变成了僵化无用的教条，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吓唬工农干部和天真的青年，打击那些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反对他们“左”倾错误的优秀党员干部。他们虽然在口头上也高喊要“反对官僚主义”，但他们却从来也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深入基层，向干部群众作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而是走到哪里，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作指示、发议论，不是指责，就是批评。“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① 其结果，只能导致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受到严重的破坏，把党引向“左”倾教条主义的泥坑，使中国革命陷入困境，最后连中央苏区也丧失殆尽。

（三）强调在党内展开“不调和的无情的斗争”，百分之百地绝对忠于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总路线，加速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反复强调“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应当是党的一切行动和指导的基础”，要求在党内全面开展“不调和的无情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以此保障党的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性，保证全党“百分之百

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8页。

地绝对忠于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总路线"。而所谓的"共产国际路线"就是主张党在全国范围内以城市为中心的"进攻路线",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以便推翻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人的统治,在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形式的工农革命专政,并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保证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很显然,这是一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它超越了中国革命的客观现实条件,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因而必然遭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对和抵制。

为了使这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能在中央苏区得到顺利的贯彻推行,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就把是否坚决执行这条"左"倾路线,当作党员干部思想觉悟高低的主要标志,在中央苏区内接二连三地开展了所谓的"反右倾斗争",对怀疑、抵制和反对他们"左"倾错误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许多同志,一律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调和路线"等大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混淆敌我矛盾,把党内的思想路线斗争,同错误的肃反结合起来,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致使党的许多优秀领导干部被逮捕和杀害,使党的有生力量遭受了严重的摧残,造成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也使许多新党员和青年干部在严酷的党内斗争面前惊疑不安,不知所从,以致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随声附和,盲目服从。

因此,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党内斗争中,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正确地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党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党的正确路线基础上的团结。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坚持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正确方针。这是我党长期解决党内矛盾的成功经验,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的

重要标志之一。

二、实行独断专行的"家长制"领导和惩办主义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中的具体运用，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组织保证。为了保证党的民主集中制能够得到顺利的贯彻执行，我们就必须科学地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防止和克服个人专制和极端民主化两种错误倾向，就必须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就必须执行严格的纪律。

我们党从诞生时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1927 年 6 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党章中，更明确地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①]1928 年 6 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也强调指出：党必须"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秘密条件下尽可能地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地讨论和集体地决定主要问题；同时反对极端民主主义的倾向"。[②]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又重申强调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加强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中，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③]，"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践经验中才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5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84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7 页。

能产生。"[①] 然而，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虽然在口头上也不断地说要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对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肆意践踏，实行独断专行的"家长制"领导，并以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为借口，强制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和主张，将执行纪律变成了惩办主义。这突出地表现为他们在决策时的主观武断，对不同意见的压制和对持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排斥与打击等方面。

例如：在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不对客观形势作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不征求全党同志的意见，就主观武断地认定："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增长实在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而"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这些省份有首先胜利的可能。党的策略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攻打中心城市，以取得一省或数省的革命首先胜利，形成全国的革命高潮。为此，他们强令红军集中主力去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赣州、吉安、南昌、九江等大中城市，反对毛泽东等同志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创造和总结的游击战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反对"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正确作战方针，强制要求红军不停顿地进攻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消耗战，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终于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在决策筹划和组织实施红军长征时，中央政治局虽然开会进行了讨论，但并未广泛听取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更未广泛征求红军高级将领的意见，仅仅由博古、李德、周恩来所组成的"三人团"主其事，李德成了红军的"太上皇"，而其他政治局成员包括张闻天、毛泽东等在内，都不能与闻，致使红军长征后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

① 《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了大搬家式的行动。部队行军迟缓，大批战斗队成了庞大的后方机构的掩护队，以致在长征初期尤其是突破第四道湘江封锁时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为了实行这种独断专行的“家长制”领导，全面推行他们的“左”倾路线和主张，他们还打着坚决执行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路线的幌子，要求在全党展开“不调和的无情的斗争”，到处挥舞反右倾的大棒打人吓人，把执行纪律变成了惩办主义。

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接着又发动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无情打击了执行正确路线的党和红军的重要干部罗明、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在湘鄂西，又反所谓邓中夏的“右倾路线”；在陕北，反对所谓刘志丹的“右倾路线”；在鄂豫皖，反所谓曾中生、许继慎的“右倾路线”等等。就这样，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千方百计地压制、排斥和打击一大批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反对抵制他们“左”倾错误的优秀党政军领导干部。而且，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这种滥施纪律，搞惩办主义的错误做法，上行下效，愈演愈烈，弥漫全党。

在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就把一些被他们认为“有问题”或所谓“右倾”的同志，如瞿秋白、刘伯坚、阮啸仙、何叔衡、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贺昌、毛泽覃等，统统甩下留在中央苏区。其中瞿秋白、刘伯坚等同志多次要求随红军长征，均遭博古无情拒绝。以后，这些同志中的许多人都壮烈地牺牲在中央苏区这块红土地上。

时任闽赣军区司令员的肖劲光同志，早就对王明“左”倾路线不满，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强敌进攻面前果断地指挥力量极其弱小的部队撤离黎川县城，可“左”倾错误领导者却抓住这一事

件不放，不顾客观事实真相和肖劲光的反复申诉，开除了肖劲光的党籍和军籍，判处他五年徒刑并剥夺其上诉权。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在向省委汇报工作时，建议党委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应有适当分工，使党更多注意领导群众斗争方式的研究，竟被"左"倾错误领导者诬之为"取消党、取消革命"的"取消主义"，被撤销县委书记职务，横遭打击。其他如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长汀县委书记李坚真、武平县委书记陈玉梅和永定、汀东等县委的负责同志，均因所谓"罗明路线"的牵连，或被调动工作，或遭撤职批判。

在历时一年余的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会寻安、永吉泰、宜乐崇等中心县委和石城、于都、永丰、新淦、信丰、崇仁、南广、公略、万泰、吉安、泰和、赣县等县委都被错误地加以"改造"，大批优秀干部被戴上"罗明路线的复活"、"标本的罗明路线"的帽子，遭到无情的打击和诬害。

另据当时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写的《把突击运动期间党内斗争上表现出来的缺点与错误纠正过来》一文所披露：宁化县仅在22天的扩红突击运动期间，开展所谓反机会主义、官僚主义、消极怠工的斗争，共计撤销了33个突击队长、23个突击队员、改选8名乡苏维埃主席和14名代表、3个支部书记。安远县的李继唐在天心区一个会议中就撤销了7名区苏维埃部长，县委每开一次活动分子会议就要打击五六个所谓的"机会主义分子"。万泰县在1934年1月扩红突击运动中，县区干部被撤职或开除党籍的近40人。而国家政治保卫局党总支一次就决定开除19名党员的党籍，另给两名党员以最后警告处分。

总之，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期间，党的民主集中制被肆意践踏，党内斗争、党的纪律被当作整人的"帽子"、打人的"棍子"，从而不仅未能起到教育党员干部，增强党的团结的目的，反而搞得党内人人惶惶不安，严重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干部队伍，涣散了党的团结，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和组织力。

综上所述，王明“左”倾错误对中央苏区党的建设，无论是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其危害都是十分严重的。加上王明“左”倾错误政策和方针（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兵运政策、肃反政策、政权政策以及错误的战略战术和作战方针），造成党和红军战斗力的严重削弱和革命势力的极大孤立，最终只能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惨痛失败和中央苏区的全面丧失。

第七章

中央苏区时期党对红军、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

第一节　党是苏维埃运动的领导者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诞生以来，就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艰巨重任。在马列主义的正确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规模空前的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革命大风暴，基本上推翻了遭受全国人民痛恨的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并唤起了千百万革命人民的觉醒。但是，在大革命的后期，由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右倾领导，推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拒绝接受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全面放弃我党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以至当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时，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终于失败了。

在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育下，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醒悟过来，决定以武装斗争来反抗国民党的统治，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以

推进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总方针，使党大大前进了一步。1927年9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①] "以后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②] 这样，中共就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毅然决定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号，公开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发动和组织广大革命人民开展苏维埃运动。因此，中国共产党也就历史地成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旗手，自然也就成为苏维埃区域的开辟创建者和领导者，成为苏维埃区域中红军、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者，成为苏维埃区域各项建设事业的领导者。

一、中国共产党是苏维埃区域的开辟创建者和领导者

在党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的指引下，从1927年秋到1928年底，我党先后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100多次武装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对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疯狂镇压革命的英勇回击。它极大地扩大了革命的影响，鼓舞了革命人民，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并在全国各地开辟了众多大小不一的苏维埃红色区域。

这样，到1934年，我党先后开辟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页。

央革命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湘赣根据地、广东海陆丰和海南岛根据地、广西左右江根据地、川陕根据地、陕北根据地、湘鄂川黔根据地等。这十几块苏维埃红色区域，分布在10多个省300多个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成为我党保存、积蓄、发展革命力量，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夺取革命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其中，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最大革命根据地，由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合成。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相继占领了赣南的兴国、瑞金、于都、广昌和闽西的长汀、上杭、龙岩、永定等县城，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1930年6月，以红四军为基础，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红十二军（军长伍中豪）合编成红一军团。随后，红二十军（军长曾炳春）、二十二军（军长陈毅）也编入红一军团。同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同年9月，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中央苏区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大时辖有21个县城，250万人口，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遭受严重挫折，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于1934年10月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中央苏区沦丧。

由上可见，中国共产党是苏维埃区域的开辟创建者和领导者。当党的路线正确时，苏区就不断巩固和发展；反之，当党的路线错误时，苏区就不断缩小乃至丧失。因此，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保证革命胜利发展、苏区不断巩固扩大的根本所在和决定因素。

二、党是苏区红军、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的领导者

如前所述，在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及时地正确地制定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先后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100多次武装起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的建党建军学说来指导我军的建设，为我军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确立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提出了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到抗日战争时改为生产)的三大任务，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制订了人民军队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的三大原则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的三大民主制度以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从而有效地克服了红军内部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成功地解决了把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武装建设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在开辟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斗争中，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集中全党的智慧，经过艰苦的探索，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以工农武装割据”为核心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并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出发，不断深刻总结我军作战的经验，逐步形成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以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16字诀等以弱胜强的正确战略战术，保证了红军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然而，对毛泽东的建军思想、革命道路理论和正确的战略战术，党内的“左”倾领导却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操纵，机械照搬照套苏联革命的经验与做法，顽固坚持和推行“城市中心论”，诬蔑攻击毛泽东是“红色山大王”、“一贯右倾”、“狭隘经验论者”，认为“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指责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战术是“军事上的机会

主义”、“胆怯逃跑的游击主义”，并提出了诸如“夺取中心城市”、“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外，不丧失寸土”、“短促突击”等完全违背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的“左”的军事方针和作战原则，最终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丧失了中央苏区。

我党在领导红军坚持革命武装斗争的同时，也担负着对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责任。这一原则，从1927年秋中国苏维埃运动一开始，就已确立，此后始终没有动摇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党在实施对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时也一度出现过“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群不分”、忽视群众团体工作，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问题。

对此，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明确指出：“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权威，政府的权威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① “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② “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③ 针对上述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

①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3页。

②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③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① “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通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②

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些问题在中央苏区也比较普遍地存在。如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刘作抚于1930年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就说：“政府不健全的很多，党团不健全也很多，所以好多事情都由各级党部解决，由政府会议议决通过执行，但有好多政府的事情是党部代替了。”③ 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在1931年9月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说：“苏区一般的自上到下形成一贯的党包办苏维埃工作的错误路线，苏维埃好像是党公开活动的形式，苏维埃工作经常照转党的决定，这样就把政权机关群众意义抹煞了，失却了政府工作能力。”④ 而1932年3月通过的《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第二次全省大会党的建设问题决议》也明确指出：“闽西党不能从组织上来动员群众实现党的政治口号，党包办一切，命令群众的错误很严重。”⑤

对于苏区党存在的上述问题，党中央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强调

---

①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②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③ 《中国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页。

④ 《中国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3页。

⑤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3页。

必须实行“党政分开”，反对“以党代政”，“党群不分”。1928年7月党的“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就深刻指出：“党应预防以党代苏维埃或以苏维埃代党的种种危险。”[①]1929年9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又强调指出：“党不能以任何命令形式直接指导群众组织，只能经过它的党团起领导作用。党可在群众组织中吸收最觉悟的分子入党，而群众组织则应发展在党的范围以外。”[②]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错误取得对全党的统治，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在党内盛行，给苏区党的建设造成极大的危害。但仅就党政关系这个问题而言，当时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原则意见还是基本上正确的。如1931年6月中央给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和10月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前委的指示信中，都反复强调要坚决纠正“党包办政府工作或代替政权作用的现象”，并且指出了纠正“以党代政”的方法和途径。这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任弼时关于这一问题的正确思想和主张之影响，显然是分不开的。

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苏维埃区域的开辟创建者，也是苏区红军、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的领导者。尽管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在实施领导的过程中也有偏差乃至失误，但毫无疑问，党始终处于领导的地位，领导苏区红军和广大革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

三、党是苏区各项建设事业的领导者

党在实施对苏区红军、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的同时，还以极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页。

大的精力领导了苏区的各项建设事业——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这可以从中央苏区各项建设的发展得到充分的说明。

首先是红色政权的建设。中央苏区的红色政权建设，经历了自下而上、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1928年赣南、闽西各地武装暴动后，在我党的领导下，迅即建立了乡、区、县临时性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随后，当广大工农革命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革命局势较稳定后，党又及时领导召开了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进行民主选举，正式成立各级政权机关——苏维埃政府。

1931年11月，为了加强和统一领导各根据地的政权，中华苏维埃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实行议政合一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央革命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雏形。它的组织体系为：(一)中央机关——全国苏维埃大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全国苏维埃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人民委员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设外交、劳动、土地、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卫生、内务、司法等人民委员部。此外还设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工农检查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最高法院、审计委员会。(二)地方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政权分省、县、区、乡(市)四级，其机构设置与中央机关相类似。

这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组织法》、《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工农检查处问题的决议案》、《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红军问题决议案》等。在此之后，又先后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工农检查部组织条例》、《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和裁判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等。这充分说明，在我

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正式建立并日益巩固发展，它为以后的革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其次是经济建设。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巩固苏维埃红色政权，保证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胜利完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进行政权建设的同时，还用极大的精力来从事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使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1933 年 2 月，为了加强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了第 36 次常会，决定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并委任邓子恢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随后不久，在 1933 年 8 月，中央苏区连续召开了南部 17 县经济建设大会和北部 11 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南部 17 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关于《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著名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个报告的重要部分。翌年 1 月，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又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和结论。《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就是这个报告和结论的重要部分之一。在上述报告和结论中，毛泽东不仅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强调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从而为苏区的经济建设奠定了正确的指导思想；而且还从苏区经济状况的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政策，这就是："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

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①

正是在毛泽东提出并坚持的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指导下，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领导广大人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工作，使苏区的经济建设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得到很大的发展，从而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改善了群众生活、巩固了红色政权，还为我们党培养了干部，积累了治国安民的宝贵经验。

再次是文化建设。我党在积极推进苏区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认真自觉地担负起领导开展苏区文化建设的任务。在全国“一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享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为此，党提出了苏区文化教育建设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总方针是：“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② 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③ 为了保证实现这一总方针和中心任务，推进苏区的文化建设，苏维埃中央政府设立了教育部，各县、区、乡设立了文化委员会(后改为教育委员会)，统一领导普通教育、社会教育及出版编辑等业务；并采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等方法，办起各种类型的学校、创造各种崭新的教育组织形式，想尽办法来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保证工农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制度。

---

① 《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② 《毛泽东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页。

③ 《毛泽东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页。

与此同时，为了培养和造就革命干部和各种专门人才，党和政府还创办了各级各类学校，如苏维埃党校、苏维埃大学、初高级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农业学校、中央政治军事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中央红色护士学校以及各种技术学校和短期训练班。1934 年 4 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还制定和颁发了《苏维埃教育法规》，对苏维埃教育的方针、任务、学制、课程、教学原则、授课方法和教育行政都作了明确和具体的规定。

因此，尽管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使中央苏区也实行了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等，超越了苏区的客观实际，但苏区的党和政府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指导下，总的来说是坚持执行了正确的文化教育建设方针和政策，从而使处在革命战争环境而且过去文化大都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在文化教育建设方面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第二节　党对红军的领导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因此，如何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创立和建设一支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就成为我党正确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夺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中央苏区时期党对红军的领导，主要通过如下途径：

一、确立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

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我党不仅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党认识到了直接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1927 年 8 月我党领导的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南昌起义部队这支崭新的人民军队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置于党的领导指挥之下。1927年9月我党又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不仅接受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和指挥，而且根据党的指示断然抛弃了"国民革命军"的名号，定名为"工农革命军"。毛泽东还郑重地对起义部队说明，我们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受挫后，毛泽东率领部队向湘赣边界的南段进军，途中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改编除对部队进行必要的缩编外，最重要的是第一次决定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的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以上建立党委，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并明确规定，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同时还决定废除旧的管理制度，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保证了工农革命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初步基础，使工农革命军成为执行党的革命政治任务的可靠工具。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领部队经过一个月的辗转作战，于10月底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此后，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不断总结人民军队建设的经验。1927年12月底，在砻市召开的大会上，毛泽东明确宣布红军要执行三大任务，即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任务。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经过长途跋涉也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的部队胜利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第四军，又建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边界和军队及政权的最高领导机关，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井冈山的斗争更加发展，在红军中不仅建立了各级党组织，有了党代表制度、

政治工作制度和民主主义制度，而且还有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大批工农战士被吸收入党，一支完全新型的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人民军队茁壮成长起来。1928年11月，毛泽东对此及时加以总结，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强调指出："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① "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② 他还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③ "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④ "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到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⑤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创造的以支部建在连上为核心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经党中央的肯定和推荐，在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中普遍实行，从而使工农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开始了创建中央苏区的伟大斗争。然而，由于红四军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党内军内的绝大部分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

---

①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②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③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④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⑤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身的成份所构成，加上旧军队的影响和红四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一段时间内又有所放松，以致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渐滋长蔓延起来。有些人对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原则和制度感到不习惯，甚至产生了怀疑。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及时地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在红四军党的“七大”召开之前，即将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概括为14种表现，指出四军党内争论的社会历史根源，提出了克服的办法。但是，由于红四军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明确认识和坚决的斗争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在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七大”上，虽然暂时停止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但却未能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主张，毛泽东也未能当选前委书记，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后来，在党中央分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主持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指导下，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同志一起共同努力，于1929年12月成功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古田会议。

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就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这就是：“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① 为了确保红军的性质、宗旨及任务的顺利实现，决议案严肃地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再次重申强调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原则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明确规定：党的各级会议必须将军事计划列入议事日程，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军队中不论担任什么职务的党员均须参加党的会议，向党报告工作。军

①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队中的重大问题，由各级党委讨论决定后交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要编制红军的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这样，古田会议就成功地解决了在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为革命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大力加强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没有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就无法确保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就不能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工作。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就曾指出，黄埔军校的教育，不仅要使学员知道怎样放枪，更要使他们知道枪向什么人放。北伐战争中，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党在北伐军中的政治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1927年8月，我党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在周恩来等同志的领导下，党开始创立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在起义军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建立了党的政治工作机关，并积极开展了军内外的宣传教育工作，教育红军广大指战员要坚决服从党的领导，严肃军纪、爱护人民、奋勇杀敌。

在1929年9月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首创了保证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并能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在此之后，毛泽东把政治教育作为人民军队建设的关键环节。在坚持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不仅在军中各级建立了党的组织，还在连以上的各级设立了党

代表，在军、师、团各级建立了政治工作机关。除政治机关外，还专门建立了宣传队，配置了宣传员，对内对外宣传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毛泽东在1928年11月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就特别指出："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① 为了确保建设一支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还亲自为红军规定了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并在军队内部实行了民主制度，建立了各级士兵委员会，坚决反对和克服由于旧军队的影响红军中一度存在的官长打骂、体罚士兵等军阀主义作风，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同时还制定了正确对待俘虏的四项政策，这也是建立新型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然而，如前所述，在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后，由于党内军内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居多，加上旧军队的影响和红四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有所放松，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渐滋长蔓延起来，对红军应该是怎样一支军队，军队要不要开展政治工作等问题，有一些同志还存在不少的错误认识。对此，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力图加以解决。但由于红四军党的领导机关对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明确认识和坚决的斗争，毛泽东曾一度处于下风，有一段时间还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但他并没有灰心泄气，在继续和错误认识作原则斗争的同时，还对不少同志作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以教育说服持错误观

①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点的同志。后来由于红四军在偏离正确轨道后屡遭挫折，党中央主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又及时地给红四军前委作了正确的指示，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同志一道共同努力，于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决议案，认真总结了红军建军两年来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十分突出地强调了对红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针对红四军内部的单纯军事观点，明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①]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②] 所以，必须"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③]，必须"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④]，这就确立了政治工作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古田会议决议案除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外，还详细规定了对部队进行马列主义及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原则和方法，确定了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发展了红军内部的民主生活，同时对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进行了科学的阐述。这就使党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古田会议后，红军各部队兴起了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热潮。

1930年冬，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在条例的总则中就明确指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就

---

①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②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③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

④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

是要巩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要使红军成为强有力的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在红军中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是党在红军中政治路线及纪律的执行者。”因此，尽管这个条例在一些方面照搬了苏联红军的做法，但它毕竟使红军的政治工作更加制度化、系统化。

1934 年 2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瑞金沙坪召开。这次会议系统总结了我军创建以来的政治工作经验，继承了古田会议的基本精神，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与此同时，会议还强调，红军的一切政治工作应该为着战争，为着红军最大的胜利，为着提高红军指战员的军政素养，反对政治工作脱离作战实际的现象。因此，必须改善政治工作的方法，去掉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刻板的工作方式，将政治工作做得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在会上还明确地提出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① “每个政治工作人员要成为一个战术家”② 的精辟思想，这就在古田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地阐明了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辩证关系。

由于建立和加强了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使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得到具体的落实和体现，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为红军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并十分注意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水平，这就使中央苏区红军迅速成长为一支坚决服从党的领导，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坚强的战斗力的朝气蓬勃的人民军队，从而取得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巩固和发展了中央苏区。

---

① 周恩来：《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红星》第 29 期。

② 朱德：《在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演说词》，《红星》第 28 期。

三、党在红军中建立了严密而健全的组织系统，为实现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首先是政治思想的领导，同时要有组织制度的保证。1929年8月，中共中央在《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首次提出：在新的革命军队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士兵支部”。[①] 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从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期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建立了领导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在前委领导之下，起义部队各军、师都建立了党的委员会，称军委、师委；各团建立了党总支或党支部，有的连队也建立了党的支部。当时规定党组织的任务是“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行动”。[②]

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党中央也任命了领导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在率领工农革命军南进途中，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明确规定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制度，班、排成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以上设党委，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从此，党对军队领导的组织系统初步确立。

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宁冈，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成立后，在军一级设立了党的委员会，称红四军军委，由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同年11月，根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页。

② 《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

据党中央指示，成立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在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红四军各级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营以上设立党委，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由于建立了严密而健全的党的组织系统，确保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使红军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保持了坚强的战斗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四次“进剿”和两次“会剿”。对毛泽东创造的这一以支部建在连上为核心的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制度，周恩来于1929年3月代表党中央作了明确肯定和推荐，随之在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中普遍实行，有力地加强了红军中党组织的建设。

1929年12月，为克服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后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在周恩来的正确指导下，经过毛泽东等同志的共同努力，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胜利召开。古田会议严肃地指出，红四军党组织之松懈和党员质量之差，严重地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为了切实加强红四军中党的组织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为了保证前委对红军的统一领导，还根据中央的指示，撤销了军委组织，但保留了纵队和支队党委（即原来的团委和营委）。军部和纵队部的直属队，分别成立党的委员会，为直属队最高党部。同时决议还规定了新党员入党的五项条件以及各级党部所应开展的工作，以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这样，古田会议就保证了党在红军中建立严密而健全的组织系统，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和组织力，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的核心，促进了红四军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在此前后，中央苏区各红军部队都在军中各级建立了党的组织，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1930年冬，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条例规定取消红军中的党委制，实行政治委员负责制。

这一规定不适当地突出强调了政治委员个人的作用，而否定了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因而受到红军中指战员不同程度的抵制。有些部队虽然取消了党委制，但仍继续实行集体领导的制度。条例还规定，在红军中的军团、军、师、军区及独立军、师政治部内，另设党务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按照党章的规定接收与处罚党员，解决党内纠纷。各级党务委员会可参加同级政治机关召开的会议，以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员的思想状况，协助政治机关做好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红军中的团一级，不设党务委员会，而成立团党总支部委员会，负责全团的党务工作，并指导各连党支部的工作。红军中营一级一般不单独成立党支部，营部的党员就近参加连支部。而红军中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始终没有改变。

这个条例直到1931年春才送达中央苏区，由于反"围剿"战争紧张，条例的一些规定当时未在红军中及时贯彻执行。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以后，成立了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这个条例才在红军部队中正式实行。从总的来看，这个条例使红军的政治工作更加制度化、系统化，并坚持了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这对加强红军的政治思想建设和军中的党组织建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在某些方面机械照搬苏联的做法，特别是取消红军中的党委制，因而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综上所述，在开辟和创建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大力加强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在军队中建立了严密而健全的组织系统，这就充分保证了党对红军的领导，使中国红军茁壮成长为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新型人民军队。

第三节 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

一、党是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心任务也是围绕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巩固政权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党在这一实践中，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创造苏维埃政权的经验，也把这个政权命名为苏维埃政权。党是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这一根本原则，从1927年冬中国苏维埃运动一开始，就已经牢固确立，此后始终没有动摇过。可以说，在中国，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苏维埃运动，也不可能有苏维埃政权的建设。

党的"六大"论及"苏维埃和党的关系"问题时提出："党是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者，应经过党团指导苏维埃"，"党应预先保障其在苏维埃领导机关中的领导作用"，"苏维埃政权之正确的组织，是要以党的坚固的指导为条件的。"① 在这里，就明确地提出了正确处理党和苏维埃政权关系的基本原则：一是党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对苏维埃政权实行领导；二是党的这种领导作用应通过坚强的党团指导来实现。这也就是党作为领导者实施对苏维埃政权领导的基本内容和主要途径。

党如何对苏维埃政权实施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呢？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明确规定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这个俄文译名的正式名称是工农兵代表会议，

① 《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192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08页。

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正式名义是中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政府。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把夺取的政权命名为苏维埃政权，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建立劳动者的国家机关，分配土地衣食于劳动群众，国家权力属于劳动群众。事实上，党的"六大"《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正是这么说的。1928年3月中央通告也曾指出："中央于八七会议提出没收土地，于秋收暴动后提出苏维埃政权。盖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主要的任务是要实行彻底的民权革命，即绝对地没收土地以消灭封建的政治基础，以肃清封建的社会关系。同时，这一任务的完成，必需在政治上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独裁的政权——工农兵的苏维埃。"① 党的"六大"《政治议决案》对此作了更完整准确的表述，指出："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② 推翻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是当前革命的两大任务，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同时吸收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要用武装暴动的方法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苏维埃的工农独裁制，即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同时，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这就使中国革命有非资本主义前途，而有社会主义的前途。在这里，就把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和前途表述得清清楚楚了。

第二，制定和提出苏维埃政权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党在领导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践的过程中，从党中央到当地党部都对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及其政策法律，提出了具体意见。党的"六大"提出的中国革命十大要求，实际上就是苏维埃政府的十大政

---

①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192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

② 《政治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98页。

纲，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也就是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确立苏维埃政权与党和红军关系的基本政策依据。从1930年初开始，中共中央就积极致力于领导和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筹备和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过程中，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更是给予直接的思想政治上的指导，为“一苏”大会起草了宪法大纲草案及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红军问题决议等草案，提供大会讨论通过。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颁发了各项政策、法令、决议，也都是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体现。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党对苏维埃政权实施思想政治上的领导。

勿需讳言，由于党犯了“左”倾错误的影响，苏维埃政府制定的许多政策也包含有不少“左”的倾向，给苏区建设造成严重损失。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苏区建设的成就，更不能因此否定党对苏维埃政权实施思想政治领导的基本原则。相反的，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主张在中央苏区有深刻的影响，也由于“左”倾错误并非一切皆错，尤其是其中多数同志在实践中逐步觉悟过来，艰苦致力于政权建设，因此还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左”倾错误给政权建设造成的损害从反面教训了我们，党对苏维埃政权实施思想政治上的领导，首先是党必须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这个教训应当永远记取。

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决不是党委直接向政权机关发号施令，而只能通过在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党团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和指示，以此来体现党的意志和政治主张。党通过党团实现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主要也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拟定和推荐为群众所信任而有威信的党员到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作，并组成党团。党要领导政权，就有一个党员如何进政权机关的问题，中央对此有一条基本原则，绝对禁止由党部指派的制度，指出：“苏维埃是直接之民众政权，苏维埃的组织必须经过群

众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绝对禁止由党部指派式之组织。”① 此外，中央又提出：“党对于苏维埃委员选举可以拟定名单，但不能直接向群众提出，只有在群众中宣传，使群众自己接受这种意见，选举出来。因此，决定党员被选为委员，必须是在群众中有威信而为群众所信任的分子。”② 党的“六大”提出：“党在各处苏维埃中，均应有党团的组织”，③ 在非党组织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成立党团。”④

第二，党团必须执行党的指示，实现党对政权的领导。党在非党组织中成立党团，“其任务在于非党的组织中，加强党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并监督党员在非党组织中之工作。”⑤ 党对苏维埃的领导作用，就是“经过这些党团，经过党员所发的言论，表示党对苏维埃工作上各种问题的意见”。⑥ 为了预先保障党的这种领导作用得以实现，“六大”又强调提出：苏维埃各机关的党团，“都须绝对执行党的指示，且一切最主要的政策，都由该地党委员会批准。”⑦ 为了保证党团正确有效地开展工作，“六大”党章对党团问题作了专

---

①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1928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3 页。

② 《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1930 年 7 月 22 日全国组织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216～217 页。

③ 《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1927 年 7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08 页。

④ 《中国共产党党章》(1927 年 7 月 10 日)，同上书，第 481 页。

⑤ 《中国共产党党章》(1927 年 7 月 10 日)，同上书，第 481 页。

⑥ 《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1927 年 7 月 10 日)，同上书，第 406 页。

⑦ 《中国共产党党章》(1927 年 7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81 页。

章的规定。1934 年 3 月，中央组织局又颁布了《苏区党团组织与工作条例》，对党团的组织及工作作了更制度化、规范化的明确规定，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党对苏维埃政权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

二、中共中央关于党政关系的构想

党对苏维埃政权领导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始终强调“党政分开”，既反对“以党代政”、“由党包办一切”，也反对“党政不分”或“以政代党”，党的“六大”提出：“党应预防以党代苏维埃或以苏维埃代党的种种危险。”①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及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构想，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条是坚持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一条是坚持党政分开。

关于“党政分开”的问题，中共中央前后有过一系列的论述和指示。

1928 年 6 月 4 日《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说：“党对苏维埃的关系必须经过党团作用，绝对防止党命令苏维埃的毛病。”② 同年 9、10 月间，《中央给润之、湘赣边特委及红四军军长的指示》中又指出：“党应当是苏维埃的思想领导者，应经过党团指导苏维埃的工作，纠正过去党代替苏维埃的错误，同时严防苏维埃代替党的危险。”③

---

① 《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1928 年 7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08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2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79 页。

1929年2月5日，关于闽西斗争问题，《中央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信》中说："群众政权的组织与党的组织没有分开清楚，会使群众对于苏维埃的认识不正确，要以苏维埃是共产党的，不是群众自己的。"① 这年3月27日《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批评了江西苏区存在着的党即苏维埃的倾向，并提出："党必须和苏维埃政府分开，'以党治国'的方法，固属大错，'以党代国'，亦属希奇。我们党与苏维埃政府的正确关系，只有经过党团去指导。"②

1929年9月28日，《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阐述了党与政权、军队的关系，指出："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事(军)队，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以后成立上层政权则组织党团，经过党团指挥之。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权系统，要弄清楚。"③

1930年7月正是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中央的高潮时期，这期间发出的多份文件也仍然强调要"党政分开"，7月22日全国组织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决议案更明确提出："苏维埃是工农群众政权组织，与党绝对不能相混合的，党在政治上是领导苏维埃，但在组织上不能直接指挥和命令苏维埃，党只能运用在苏维埃中的党员起党团作用，实现党的领导，党只能得到群众的邀请，公开派代表参加苏维埃大会，不能直接由自己经常出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86页。

席苏维埃一切会议。”①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错误，但对于党政关系问题，仍然一以贯之地坚持“党政分开”的原则。1930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曾深刻指出：“苏区各级党部与政权的关系，是要经过党团的活动从中起领导作用的。这一工作方式，从中央政府直到乡村苏维埃政府，各级党部都应一致遵守，一致的肃清党代替政府的根本错误。在政府中，要尽量的吸引非党工农群众来参加工作，要使广大群众了解党是党，政权是政权，党在政权中的领导作用，只是司舵的对于全船的作用一样，而保卫和管理这只船的责任还是属于群众自己。”②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错误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这些“左”倾领导者们高举“国际路线”大旗，极力批判“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全面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给苏维埃政权建设造成严重损害，但他们在处理党政关系方面也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党政分开”的基本原则。如1931年6月16日《中央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中说：“过去在地方苏维埃中，党包办政府工作或代替政权作用的现象，必须消灭，……党在政府中应组织有力的党团，并派遣党内有威信而得力的干部到政府中工作，以改正过去将不得力而有问题的党员派到政府中去的错误。”③ 同年8月30日在《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批评了忽视政权作用，党包办一切的倾向，强调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451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

只有“群众中有了明确的政权观念，并且有了真正群众政权的建立，党包办一切的错误才能根本铲除”，只有这样，苏维埃政权才能发挥有力的号召作用。[①]1934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正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登峰造极之时，在《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中仍强调：“各级党部应该动员最好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苏维埃政府工作，加强党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作用。”[②] 这一指令本身及所述内容，充分表明党是通过党团及其党员作用的充分发挥来实现党对政权的领导的，依然贯彻着“党政分开”的原则。

从以上摘引的各个时期党中央关于党政关系的论述来看，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领导苏维埃运动，领导创建苏维埃政权起，虽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几经变换，党的路线几经重大调整，但不论是谁执掌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或其制定的路线正确与否，在处理党政关系方面，有两条基本原则始终没有动摇，那就是坚持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权和坚持党政分开的原则，尽管期间在处理党政关系上有时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这两条基本原则却始终不逾地得到共同坚持，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基本理论原则是正确的和比较成熟的。

三、中央苏区党政关系的状况

如何切实实行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如何正确处理党政关系，这既是一个理论原则问题，也是一个实际工作问题。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确定了正确的理论原则和具体构想，作出了正确的决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0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议和指示，但在贯彻执行过程中，依然存在着执行者的理论认识和政策水平问题，以及各种主观客观条件是否具备的问题。

在中央苏区，党是苏维埃政权思想政治上的领导者这一根本原则，不论是各级党组织还是各级政权都始终自觉地加以坚持，并坚持得较好，各级政权，从中央政权到地方、基层政权，都一致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从而维护了政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性质和政权建设的正确方向，并领导苏区人民进行各项建设事业而取得光辉成就。

但是，在处理党政关系方面却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从总体上说，在中央苏区的最高党政机关——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苏维埃中央政府——之间的党政职能理顺得比较好，而地方和基层却长期存在着十分突出的“以党代政”、“由党包办一切”的现象。

当时中央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项英，“二苏大”后还有张闻天，他们都能从党性原则和理论政策的高度上来自觉处理好党政关系，既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政权工作及政权自身建设，进行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从而既使党的领导权得以坚持和贯彻，又使政权的职能得到充分发挥。比如：为支援前方作战，在党的领导下，中央政府发动、布置和出色完成了扩大红军、参战支前、武装民众、优待红军家属、保证战争经费和给养的供应等大量工作。1932年6月以后，苏区中央局决定红军战费由政府供给，中央政府马上行动，一方面抓开源：发行短期战争公债、加紧征收税款、向群众借谷等；另一方面又抓节流，连续不断地开展大规模的节省运动，并利用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大造舆论：节省办公费、节省伙食费、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战争经费和给养的供应，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又如：围绕战争这个中心抓住经济建设，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深刻阐述

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辩证关系，[①] 还在政策上提出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同时鼓励私人经济发展，[②] 而且还亲自主持了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并作重要报告。为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中央政府组织开展了熬硝盐运动，还成立对外贸易局，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这些举措为中央苏区克服困难，支援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再如：抓政权自身建设，树典型，开展了模范县乡的竞赛活动；抓作风，强调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深入调查研究；抓廉政，严厉揭露查处贪污、浪费现象，尤其项英亲自查处的"于都事件"（于都县苏主席熊仙壁贪污及县委书记刘洪清包庇案）更是震动不小；还有抓法制，抓制度，抓民主选举等等，都有力地推动了苏维埃政权的建设。

以上例举说明一个问题，在中央苏区的最高党政领导机关党政职能关系理顺得比较清楚，"党政分开"的原则基本得到贯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中央政府进行了得力的工作，从而又进一步坚持和维护了党的领导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尝试以政权的形式实现领导权的初始阶段，为党管理国家，治国安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还应该指出的是，这一层的党政关系也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按中共中央原来的构想，政权机关要更多地引进工农分子，这方面就做得不够，从这个意义上说，仍有"党包办政府"之嫌，特别是毛泽东是因为所谓的"富农路线"、"消极防御"而被排挤者，项英也因被认为处理"富田事变"不得法而被免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张闻天担任中央政府主席也有大权旁落、受到排挤之感，由他们负责中央政府工作，这样的人事安排难免有"政府不如党"或"政

① 参见《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6页。

② 参见《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同上书，第134页。

府工作次要"的味道。

从地方和基层来说，党政关系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由党包办一切"的现象就较长时期存在着。

这种现象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很突出，在那里，"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毛泽东分析说："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他还指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①

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央苏区并没有得到解决。在赣西南苏区，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和中央巡视员刘作抚分别于 1930 年 4 月 5 日和 7 月 22 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各级苏维埃的党团不健全，很少党团能起作用，不仅好多事情都由党部决定，交政府会议议决通过执行，而且很多政府的事情党部直接代替了，群众只认识党部而不认识政府，连日常事情都要求来党部决定。②1931 年 9 月赣西南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苏区一般的自上到下形成一贯的党包办苏维埃工作的错误路线，苏维埃好像是党的公开活动的形式，苏维埃工作经常照转党的决定，这样就把政权机关群众意义抹煞了，失却了政府工作能力……而且因为各级党部包办政权的结果，使得各级政府工作系统无法建立，形成各自为政的状态，下

① 《井冈山的斗争》(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3 页。

② 参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11、247 页。

级政府不能经常向上级政府报告，上级政府也就不能指导下级工作。”① 闽西苏区的情形也大致如此。1929 年 7 月中共闽西“一大”总结政权建设时说：“闽西政权机关多系党员包办，因此没有党团之建立，党与政权混在一起。有些地方如大小池等，竟有党命令革委，革委命令党之怪现象。”对此大会强调提出：“党是苏维埃思想上的指导者，共产党并非以党治国”，党“应经过党团作用指导苏维埃并防止党代替苏维埃或苏维埃代替党的倾向。”②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1930 年 8 月 25 日闽西特委又说：“过去群众机关大都很少党团组织，最近虽有但仍是没有作用，不开会，不能实际领导该机关团体的工作。虽有些有开会，但只是在党团内决定，既不报告该级党部审查，又不提出群众机关通告便去执行，始终是党包办了一切。”③ 这里所说的群众机关显然是指政权机关。

1931 年 11 月召开的苏区党大会严重批评了这种现象，尖锐地提出党包办一切的理论是国民党“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理论的遗毒。大会决议案强调：“党对政权及群众组织的正确关系是要经过党团的领导作用来实现党的领导。党绝对没有权力直接命令政权和群众组织。尤其是不应当去包办其一切工作。”这些话虽然提得很重，但也言之切切。决议案还提出：“政府和群众组织，必须真正经过群众选举产生，绝对禁止党来指定委派的制度。党员不必机械的占据这些机关的最大多数，尤其不须要使全体委员都

① 《赣西南的（综合）工作报告》（1931 年 9 月），《中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13 页。

②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政权决议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6、19 页。

③ 《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17 页。

是党员，而以能够保障党的领导为标准。”① 同时又提出了党团发挥领导作用的具体方式和方法。

苏区党大会后“党包办一切”的现象有所好转，但问题依然很突出，另外由于大会的严重批评，有些地方走向另一极端，党对政权放弃不管了。1932 年 5 月，江西省委在总结报告中提出：苏区党大会前党包办一切的作风，“这种风气直到现在还未完全改正。党的包办制度的盛行，一切工作归党，简直党在政府及各群众团体中□□□□□的万能，一切政府和群众团体的问题由党直接解决，因此，苏维埃工作的建立，群众团体的独立工作，简直没有苏维埃和群众团体，只是变成了执行党的命令的机关。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的组织和工作人员都放在党的荷包内的，党可不经过群众路线而自由调动，因此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独立系统的建立就成了具文，苏维埃法令的执行，群众团体上级决议和通告的执行，全视地方党部之负责人为依归。”“另一方面则机械的了解由反对对党的包办而变为党的一切不管而只顾到党的本身工作，以为苏维埃已有上级了，群众团体也有上级了，由上级去直接指导，党不要包办，可以不管了。”② 闽西情况也一样没有多大改变，1932 年 3 月闽粤赣苏区党的“二大”决议案说：“党包办了一切，命令主义代替了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党没有经过党团去领导政府和群众团体，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工作，都由党包办”，“政府和群众团体的负责者，几乎都是党员，没有注意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这些指导工作，而党又时常没有经过群众组织的手续，随便调动党员，更使群众组织及政

① 《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66、479、480 页。

②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 年 5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91、492 页。

权表现涣散不健全。”①

中央苏区地方和基层“以党代政”、“党包办一切”的现象，为什么会长期一直比较严重地存在着，而且尽管已经发现了问题并指出了解决方法，仍然不能得到很好地克服呢？概其主要原因就是，在这块偏僻落后的土地上，工农民主政权尚属“早产儿”，主客观条件并未发育成熟，而此时党领导人民建立政权也仅处于尝试阶段，本身也需要一个经验积累的渐进过程，因此存在种种偏缺和问题就在所难免。具体地说，有如下多方面原因：

1. 从党在赣西南和闽西的斗争历史来看，党组织在这里领导农民闹暴动，打土豪，分田地，赢得了民心，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而苏维埃政权则是党领导人民斗争结出的果实，这就难免形成毛泽东所说的“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权威，政府的权威却差得多”的局面，因而“以党代政”、“党包办一切”现象的存在也就有了群众基础。

2. 从党员干部及广大民众的理论政策和当家作主的意识分析来看，中央苏区地方尤其是基层党员干部大多土生土长，没有受过什么现代教育，他们多数连自己对苏维埃政权也不甚了了，对党团作用、党政分开更是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因此自然也就“没有彻底了解党在政权中和群众中领导作用的如何运用，而贪便宜的留念过去的错误作风，不能艰苦的认真的去建立健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甚至误解党团工作为共产党的青年团工作”；② “有些同志还以为政府委员要引进非同志为形式主义，……不明了党团

① 《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第二次全省大会党的建设问题决议》(1932 年 3 月 17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53 页。

②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29 年 5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92 页。

作用，不明了共产党员根本包办不了政权”；[①] 还有一些人“以为要保障党的领导作用是要由党来包办一切”。[②] 由此可见，这些党员干部对于正确处理党政关系不是不为或有意“包办”，实是一时尚不能为之。党员干部大多是斗争中脱颖而出的优秀分子尚且如此，普通民众千百年来在封建专制的愚民统治之下，一时间更不可能懂得“天上掉下来的”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为何物，因此当“党包办一切”时，他们并没有感到失去什么而要与之斗争并把它夺回。可见，“党包办一切”从党的理论原则来说虽属异常，但在当时当地却有其思想基础。

3. 从当时所处的严峻的战争环境来看，当时苏区是前方天天有战事，后方则“一切为了前线”，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集中和服从必须强化，效率和果断必须加强，统一意志必须形成；久拖不决必须抛弃，这就为“包办”埋下了伏笔。闽西特委在批评“包办”现象时曾说过，“固然政府为我们包办是有许多方便……”，[③] 这真是一语中的。正是由于“包办”能够带来集中统一、提高效率、说办就办等“许多方便”，因此有时即使知道不合原则，也为了方便而顾不了“固然”背后的诸多严重弊端了，可见，以“以党代政”、“党包办一切”也是由于战争环境的客观因素使然。

4. 从干部的使用配备看，事业的发展急需人才与干部人才紧缺，是当时的一对突出矛盾，因此有的干部是一身数任，超负荷地

---

① 《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十四号》(1929 年 11 月 2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 页。

② 《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1931 年 11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66 页。

③ 《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十四号》(1929 年 11 月 2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 页。

紧张工作着，有的因为事业需要而紧急调动，而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又必然需要有红军代表，当兼职或急调干部过多地集中于某一政府机关时，必然造成“以党代政”或“党包办一切”的状况。1930年10月时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执委会常委会委员，军队代表当选的占半数而形成了“秘书包办”即是一例。① 另一方面，当时使用干部和干部的思想认识上也存在不正确倾向，往往是“各级党部多数是好的同志，终不愿意分配到政府里去工作，纵然分配到政府里去工作，都是受处分的，所以及后派好的同志到政府里工作，就觉得受处分”。② 这种现象从上到下都某种程度地存在着，因而必然造成政府机关干部的工作能力相对较弱，并可能造成其自身低人一等的感觉，这更为“以党代政”、“党包办一切”洞开方便之门。

总的来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初创阶段，尽管还存在着种种弊端而不尽如人意，但是，对党来说，她是党学习领导和管理国家，学习治国安民艺术的大学校，其理论和实践为毛泽东思想宝库增添了光辉篇章。对苏区民众来说，他们从土地革命斗争中，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赖以生存的土地；从推翻了剥削制度的新生政权中，第一次感受到了翻身作主人的欢欣；从苏区干部的好作风中，深深体会到了党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友爱。因此，党同人民群众用鲜血和头颅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他们也必然以百倍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也用鲜血来浇灌和保护这个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

① 参见《赣西南特委政权工作报告》(1930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

② 《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同上书上册，第247～248页。

第四节 党对群众组织的领导

一、党对群众组织实施领导的基本情况

群众组织是具有一定共同目的的广大群众，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群众性集体组织。在中央苏区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建立起了众多的群众组织，其中主要的有工会、贫农团、互济会、反帝拥苏同盟等。这些群众组织在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都建立了总部，其下属机构直至在乡村建立了分会、支部或小组，有的还根据其会员所属的行业，建立起了相关的行业分会组织。比如工会，原来在赣南闽西及其各县都建立有总工会，下面有区工会、乡分工会，1931 年 9 月闽西苏区与赣南苏区联成一片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局为加强对苏区工会的领导，于 1932 年 2 月 7 日—13 日在瑞金黄家山召开了福建省工人代表大会和江西省工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两省的职工联合会，其下属分别还有各县职工联合会及产业工会，其中福建省职工联合会这时下辖闽西苏区 7 个县(市)工联会和 7 个产业工会，这些县工联会又逐步建立了区工联会，乡分工会，产业工会也在有关各县建立了分支组织。

当时党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如同对苏维埃政权实施领导一样，主要在思想政治上进行领导，并通过在区一级以上群众组织中建立党团，通过党团作用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在群众组织中得到贯彻执行。党对群众组织的这种领导作用，在上一节的有关文件引文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在非党组织(如职工会，农会，社会团体及文化组织等)之各种代表大会和会议上及机关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成立党团。其任务在于非党组织中，加强党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并监督党员在非党组

织中之工作。”① “六大”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都强调了党必须加强对农民协会、工会等群众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作用，同时又提出党与群众组织是有区别的，党只能通过党团的影响来实现领导作用。对农民群众组织的领导作用，决议案提出：“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密切的联系，与巩固工人阶级与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思想上与组织上的领导，是土地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又说：“党只能经过党团的作用影响农协和苏维埃，而不能直接的命令或指挥群众。”② 对于工会的领导作用，决议案提出：“党对工会的经常不懈的政治的领导，必须和党与工会之间在组织上严格的分工并行的。对工会的领导非经过党团不可，并且只能经过党团，不能再用任何别的领导形式。”③ 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也强调了党与群众组织应建立正确的关系，并提出，党与群众组织在性质上有显然不同的界限，“先锋队的党可以在群众组织中起核心作用，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和领导，而群众组织则须直接接触群众，吸引群众，发动群众，然后才能尽其组织的作用”，“党不能以任何命令形式直接指导群众组织，只能经过他的党团起领导作用。党可在群众组织中吸收最觉悟的分子入党，而群众组织则应发展在党的范围以外。”④ 1930年7月，在李立三“左”倾路线高潮之时，也仍然强调：“党与群众组织要严格划分清楚，党绝对不能代替群众组织，党只能在群众中起党团作用。党团的作用是经过党员在

① 《中国共产党党章》(1928年7月10日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1页。

② 《农民运动决议案》(1928年7月9日)，同上书，第364、465页。

③ 《职工运动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版，第383页。

④ 《组织问题决议案》(1929年6月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

群众中组织的关系实现党的领导，党绝对不能直接指挥和命令群众组织。”[①] 总之，中共中央一贯强调，党在群众组织中通过发挥党团的作用来达到对群众组织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党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原则与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原则大致是一致的，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在行文过程中还常常把党对苏维埃政权和对群众组织的领导作用并列相提，这在上节的引文中就多次出现，可见一斑。

党对群众组织在思想政治上实施领导，主要是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阶段，根据革命斗争实际情况，及时地给群众组织的工作和斗争提出要求、指示方向，而各群众组织则通过团结、教育和组织会员及其所影响的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把党的政治要求和政策主张，化为群众运动的物质力量，得到具体的贯彻落实。可以说，党通过群众组织这个桥梁更全面更充分地达到了密切联系群众，组织动员群众的作用。

以农民运动为例，在赣南闽西的工农武装暴动中，各地的农民协会这一农民群众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和武装广大农民进行坚决斗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暴动成功后，农民协会实际上成了乡村的政权机关，对于维护胜利果实也起了积极作用。但这又出现了一不可忽视的问题，农民协会以政权机关的形式出现，使之作为群众组织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职能就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又可能妨碍新政权的产生，即使产生了也可能隔绝与群众的联系。1928 年 7 月党的“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当乡村开展暴动时，当地党部应以农民协会为基础组织革命委员会这一临时形式的革命政权，而不应以农民协会为政权。革命

① 《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1930 年 7 月 22 日全国组织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9 页。

委员会应吸收农民运动中最坚决的革命领袖参加，并代替农民协会，然后在此基础上成立正式的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执行农民协会的全部工作，而在没有农民协会的地方可以直接成立苏维埃政权。[①] 1929 年 1 月，红四军开始向赣南闽西游击，红军所到之处进一步促进了当地的工农武装斗争，各县都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权，到 1930 年上半年，赣南闽西各县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完全取代了农民协会这一已不合时宜的群众组织。但是，要深化土地革命，又必须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斗争，因此，1931 年以后各地又逐渐组织了贫农团这一新的农民群众组织，并使之成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柱石。贫农团在各乡、村都设有委员会，村以下设小组，贫农团在分配和重新分配土地、没收豪绅地主财产的斗争中，在维护贫农中农的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农民群众有句话叫做“有事就唤贫农团”。贫农团对于帮助红军，配合红军作战，在节省粮食、节省经济、慰劳红军、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等方面，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团结组织农民群众为革命斗争做了大量工作。

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职工运动是全党关注的一个焦点。在中央苏区省县都建立了总工会（1932 年以后称职工联合会），区建立工会，乡村建立工会支部。另外还按行业建立了工会组织，如 1932 年初时，闽西行业工会有纸业工会、木船工会、店员工会、雇农工会、码头（苦力）工会、纺织工会等，这些行业工会也建立有自己的基层组织，如雇农工会在有些乡村都建立了支部。中央苏区的职工运动在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以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主要是维护苏维埃劳动法，改善工人经济待遇，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等，具体来说如签订集体劳动合同，保障工人生活的改善，征收社会保

① 参见《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1928 年 7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09～411 页。

险基金，组织生产合作社，开展失业工人的救济，以及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工作，大力支持扩大红军等。各级工会组织根据党的政治要求，团结工人群众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对于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为党团结和组织工人阶级做出了贡献。

革命互济会主要工作是开展募捐济难，慰劳红军，救济红军家属，救济饥荒等，他们通过阶级同情互济来团结广大劳动群众。反帝拥苏大同盟不仅大力开展政治宣传，而且还经常组织示威游行，如反帝、分土地、成立苏维埃、重要纪念节、庆祝新年、欢迎红军、出征、祝捷、慰劳红军、追悼死难者、追悼阵亡战士、成立各军或团等，都组织举行大规模的游行集会，红旗蔽天，呼声雷动，气氛极为热烈，极大地动员鼓舞了群众。

总之，党通过对群众组织的正确领导，通过群众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极大地号召和组织了广大群众，使千百万人民群众团结到了党的周围。

二、党对共青团和妇女运动的领导

共青团是青年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组织，在革命运动中是党的得力助手。共青团组织吸收青年工农进行共产主义训练，把先进青年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加入革命斗争的队伍，因此，党与共青团的关系和与其他群众组织的关系有着很大的区别。党的“六大”提出：共青团与党的关系是“在党的政治指导之下工作，同时有完全组织上的独立性”①，“在党和青年团的各指导机关中（从支部至中央）均应互派代表，交换发言权同表决权。同样，青年团得以自己团员的数量为比例选派代表出席党的一切代表大会”②。

① 《关于共产青年运动的决议案》（192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28页。

② 《中国共产党党章》（1928年7月10日），同上书，第482页。

1931 年 1 月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2 月即成立了共青团（少共）苏区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顾作霖，就是共青团中央（时任宣传部长）派驻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代表，同时，他又是中共苏区中央局驻少共苏区中央局的代表兼书记。周恩来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少先队中央总队部的党代表。

从闽西来看，党团正确关系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1928 年冬成立了共青团闽西特委，但在一个时期内“虽有共青团特委的组织，其实只是挂个空名”①，实际上党团没有分开，团组织只是在中共闽西特委之下设青年部进行团的工作。

1929 年 9 月，闽西党团分开，共青团闽西特委正式成立，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及少先队总队部和儿童团总部。1930 年 8 月，闽西党团组织合并为闽西总行动委员会，总行委下设青年运动委员会，同年 10 月 15 日又恢复党团组织。1931 年 3 月 21 日，以团苏区中央局名义，作出了改造团闽西特委的决议，团特组织划归少共苏区中央局领导，同年 7 月，少共闽粤赣苏区省委成立，代替了共青团闽西特委。1932 年 6 月，共青团福建省“一大”在长汀召开，成立团省委，仍隶属少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这年 3 月召开的中共闽粤赣（福建）省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提出，党必须肃清一切对青年作用估计不足和对青年团的取消观念，同时要防止团的先锋主义倾向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党团之间并没有按照党章要求建立起正确的关系。决议还提出，党要遵照少共苏区团大会的决议，加强对青年团的政治领导，帮助团实行一切工作的转变，使青年团成为有极广大青年群众所拥护的组织，真正成为

① 《闽西团当前工作的方针》，1929 年 3 月。

党最有力的助手。[①] 这以后，党重视了加强对团的工作的指导，青年团也按照大会的要求，努力发展自己的组织，使团的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成立专门的妇女群众组织，但是，从党和苏维埃政府来说，又是十分重视妇女工作的，党的"六大"专门作出了《妇女运动决议》，提出"党的指导机关必须有女同志参加，劳动妇女群众的工作必须在统一的党的指导之下。党必须在劳动妇女中有作系统的经常的指导，自中央直至支部必须至少一人负妇运之责，或视相当情形组织妇女委员会。在党与青年团、职工会与农会中，指导劳动妇女群众中的工作，要根据党的一致路线，尤不能令妇运工作成孤立的形势或独立的形势"。[②] 这说明，党是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对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强调了党和政府的工作必须有女同志参加，而不论是政权机关各群众组织都必须重视妇女工作，并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妇女工作。

党的"六大"后不久，从中央到省委、特委、县委、区委都设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或妇女部，支部设有妇女干事。工会、共青团、贫农团等群众团体中也设有妇女委员会或妇女部。

闽西地方党组织从 1928 年冬至 1929 年春，就开始强调要做好妇女工作，1929 年 7 月中共闽西"一大"作出了《关于妇女问题决议案》。1930 年 2 月，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妇女运动问题决议案明确提出："各乡有单独组织劳动妇女会的必要。"3 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公布《苏维埃政府组织法案》，规定

---

① 参见《中共闽粤赣省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党的建设问题决议》(1932 年 3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59 页。

② 《妇女运动决议》(1928 年 7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34～435 页。

各级苏维埃组织系统、权力机关系统均设立妇女委员会，办事机关系统设立妇女部，并规定妇委人员配备为：闽西政府5人，县政府3～5人，区政府1人。[①] 5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妇女部在龙岩召集各县妇女代表举行第一次妇女联席会议，通过《对妇女工作的详细规定》的决议，“决定如妇女群众已经起来参加工作的地方，不需组织，但妇女尚未起来参加革命的地方，可用劳动妇女会的名义来活动来团结妇女参加斗争——但这是暂时的组织，而非永久的组织。苏维埃中应设妇女部，其组织上与文化裁判等各部相同。”

在赣西南苏区，1930年夏赣西南党团特委联合发出第2号通告，决定党、团及苏维埃的妇女机关合而为一，成立各级妇女工作委员会，设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内成为其工作部门之一，但党内仍保留设妇委书记。1931年3月，又决议恢复各群众团体内部的妇女工作机构，1932年初各乡还建立了妇女代表会议，领导妇女工作，推动妇女解放运动。

1932年4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成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直属各级苏维埃执委主席团。1932年10月1日和1933年2月7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中央关于检查妇女工作的决议》和《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工作的决定》，强调要加强妇女工作，重视女工代表大会。对于中央苏区，中央又作出决定要求设立女工农妇代表会议，其任务是传达妇女群众的要求，然后提交给各级苏维埃政府主席团讨论决定。中共区委妇女部长和乡支部妇女干事，分别为区、乡妇女代表会指导员，每村有一女工农妇代表会主任，由各村的主任及一个妇女指导员组成乡的女工农妇代表会的主席团，负责指导其工作。

---

① 参见：《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30年3月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59页。

由于各级党组织充分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指导妇女工作，使中央苏区的广大劳动妇女通过反封建束缚，争自由平等，获得了极大的进步和解放，妇女群众在革命战争中，如担架、运输、宣传、慰劳、侦探、编草鞋、干农活等工作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表现了劳动妇女的革命力量。以才溪乡为例，1932 年 10 月，在乡代表会议的选举中，当选女代表占 30%，补选以后至 1933 年 10 月，女代表占了 60%。1933 年 11 月的选举中，上才溪当选女代表占 60%，下才溪则占了 65%。当时才溪乡 88%的青壮年男子参加了红军，耕田种地主要靠女子，1933 年底，上才溪女子能用牛的约 300 人，能莳田的有 60 多人，而暴动前这 300 人则仅约 30 人能用牛。[①] 劳动妇女挑起青壮年男子的活儿，而且还积极参政议政，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正是党领导下妇女运动所取得的成绩。

① 《才溪乡调查》(1933 年 11 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36、343 页。

第八章

毛泽东等对党的建设的贡献

第一节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建党思想

毛泽东是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主要缔造者和主要领导者。他在开辟创建中央苏区的斗争中，把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与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斗争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方法。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开辟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同时也使党的工作重心开始逐渐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偏辟的农村环境长期坚持革命斗争，必然会有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先进分子涌入党内，使党的成分发生很大变化。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带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这就使党的建设面临新的问题和新的困难。所以毛泽东在1928年11月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就强调指出：党内和红军内都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

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① 如何解决这一党的建设的新课题？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明确提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② 然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周恩来等少数同志以外，都片面地认为要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建设的影响，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党内工人成分的数量，因而只是反复强调尽量吸收产业工人和农村的雇工——农村无产阶级入党，而忽视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自1929年1月进军赣南闽西以来，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不断滋长蔓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红四军"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的路线教育"。③ 这给红四军党的建设造成了危害，削弱了党在红军中领导作用的发挥，降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同时也影响了红四军本身的发展。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红四军党的"七大"未能达到这一目的。后来，在周恩来主持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指导下，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同志一起共同努力，在1929年12月于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成功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古田会议。

①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②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③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突出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详细分析了红四军党内种种错误思想的根源，确立了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的原则。为了确保这一原则的实现，他要求红四军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经常地对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

这一建党原则的确立，在我党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成功地解决了党处在农村环境和农民出身党员在党内占大多数的情况下，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从而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宝库。

二、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

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不仅决定党的整个工作，也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因为党的建设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党的政治路线所规定的目标，因此党的建设必须围绕着如何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在实现党的政治路线过程中进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始终高度重视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把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党的建设密切联系起来。在1927年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上，他就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和土地革命四个方面尖锐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深刻剖析了党的指导机关推行错误政治路线给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为这次会议正确制定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总方针做出了突出贡献。

当1927年11月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第一次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毛泽东就进行了坚决的批评和斗争。他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明确地提出了“共产党人从

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① 的精辟论断，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及其道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论述，从而领导党和红军突破了“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巩固发展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又坚决抵制了“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② 的“左”倾政策，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四面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巍然屹立，成为中国革命战略任务伟大转变的起点。

当 1930 年 6 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取得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强令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时，毛泽东虽然在组织上服从了中央的决定，但在实际执行时却对“左”倾错误进行了巧妙的抵制和斗争。在久攻长沙不克的不利情况下，挥师南下，攻占了敌人守备较薄弱的吉安等十几个县城，开拓了赣西南和湘东的广大地区。在 1930 年 10 月和 12 月召开的两次会议上，毛泽东不仅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说服教育了一部分受“左”倾错误影响较深的同志，为红军确立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保证了后来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而且在尚未获知六届三中全会批评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精神的情况下，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求实精神和勇气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批判。

1931 年 1 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再次统治全党。1933 年 1 月，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排斥和打击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致使王明“左”倾错误在苏区得到全面的贯彻推行。对此，毛泽东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

---

① 《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7 页。

②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8 页。

顾个人的荣辱得失，既坚持原则，又注意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韧不懈的抵制和斗争，最终通过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批判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危机中挽救了党和红军，使中国革命由危转安，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党的政治路线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党的建设就不可能搞好，就必然会削弱和损害党的战斗力和组织力，导致革命的挫折和失败。

三、认真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党的组织建设是党坚持和贯彻执行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根本保证。要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完成党的历史任务，就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组织上和行动上高度统一，团结一致的先进队伍。因此，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切实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毛泽东在领导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中，对党的组织建设一直给予高度重视。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就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工农革命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初步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这一以支部建在连上为核心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经党中央肯定和推荐，在各革命根据地中普通实行，使我军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方面，毛泽东不仅十分注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使党的基层支部成为基层苏维埃政权、革命武装和群众团体的领导核心，而且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建党中既要大胆吸收贫苦农民入党，又必须严格执行党章规定，坚持党员标准，以确保党员质量，从组织上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

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他又郑重地提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因此，应努力去改

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针对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决议案》规定了五个条件作为以后新分子入党的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对于不够党员条件的，他强调提出，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除出党。在党内政治生活方面，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既要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反对家长制作风和一言堂，又要严格党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的观点。

为了切实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明确规定：党的领导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和群众生活的实际情况，并据此制定正确的指导路线，采取适当的方法迅速地传达下去；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要认真学习讨论上级机关的指示，以求彻底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少数服从多数，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这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方面，毛泽东深刻总结建党以来干部政策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强调党的干部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积极肯干，不谋私利；在选拔和使用干部上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坚持“才德兼备”的基本原则。

正是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指导帮助下，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坚持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干部”，锻炼提高干部，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能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具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适应了革命斗争迅速发展的客观需要。

四、注重加强以三大作风为核心的党风建设

党的作风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党内生活中和党群关系上的生

动表现，是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在实际行动中的具体体现。早在党的创建初期，毛泽东就提出必须树立一种新作风。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运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科学分析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领导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中，把马列主义关于党风建设的思想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中，逐步确立了以三大作风为核心的党的作风建设。

首先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因此，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

1930 年 5 月，他又针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该文深刻批判了党内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阐述了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上级指示的正确态度，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① 的著名论断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② 的科学命题。同时他对于调查的内容和方法，也提出了很深刻很全面的意见，这就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而毛泽东本人在这方面率先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先后在宁岗、永新、寻乌、兴国、东塘、木口村、长冈乡、才溪乡等地作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还亲自为红

① 《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9 页。

② 《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5 页。

军政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制定了详细的社会调查大纲，甚至亲自动手设计各种调查表格，交代调查中准确填写的注意事项。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中央苏区兴起了调查研究的热潮，促进了苏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其次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1933年8月的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和翌年1月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先后作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报告和结论。在这些讲话中，毛泽东联系中央苏区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实际，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他精辟地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共产党人关心群众生活，密切同群众的关系，这是关系到能不能广泛动员群众完成革命任务，保证革命事业发展的大问题。因此，党和苏维埃政府都必须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足点，相信和依靠群众，去夺取革命的胜利。同时他还提出了实行群众路线的正确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以先进带动落后，使先进更前进，落后赶先进。正因为中央苏区的党和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教导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注意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从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再次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红四军党组织于1929年7月编印的《党员训练大纲》中就有专门一节规定应"怎样批评同志"，对批评的作用、方法、态度、范围以及被批评者的态度等问题都作了比较详细具体的阐述。在后来古田会议决议案等著作中，毛泽东又深刻地论述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意义及基本方法。他认为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增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强调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庸俗化，要注意政治，要坚决反对非组织观念，决不允许利用批评去作

个人攻击的工具，涣散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样就使苏区党内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认识又提高了一步，使党的这一优良作风进一步为苏区党组织和红军所掌握，并日益制度化和科学化。

五、正确开展党内斗争

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攸关和革命成败的大问题。但是，党的团结只能是在马列主义和正确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因此，要巩固和发展党的团结，必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对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案等著作中就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强调指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①

在明确地指出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重要意义的同时，毛泽东还对党内斗争的目的、方针和方法作了科学的阐述。他认为："批评的目的是增强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个人攻击的工具。"② 所以，党内斗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强全党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党的正确路线基础上的团结。而党内斗争的基本方法，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唯一正确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纠正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解决党内的矛盾时，就采取了这一方针。在遵义会议后特别是到了延安整风运动时，他更加深刻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方针，并且创造了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党的路线方针

---

①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②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政策和党的历史的教育以及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修养的教育的整风形式，使全党更加自觉地坚持这一正确的方针。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积极开展党内正常的思想斗争的时候，还时时注意既坚持原则，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做到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达到最佳的效果。例如：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与红四军党内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对一些重大问题发生原则争论，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接受。会议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也未能当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一方面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对争论的原则问题没有退让，另一方面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落选一事，泰然处之，不予计较，耐心地等待这些同志的认识转变。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重要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并帮助闽西特委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来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教育以及周恩来的正确指示和陈毅的努力，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终于为红四军广大党员干部所接受，并成功地召开了古田会议，使红四军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同样，在与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的斗争过程中，毛泽东虽屡受排斥和打击，但他始终坚持做到既坚持原则，积极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又注意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和革命实践的教育，终于使全党逐步摆脱了“左”倾错误的羁绊，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在正确路线还是错误路线占主导地位时，在进行党内斗争时都要注意做到既坚持斗争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有时在斗争中进行一定的妥协甚至忍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党内的意见分歧与斗争，不单是靠原则性的争论和斗争来解决，往往还要靠政治生活本身的发展，靠党与广大群众有了切身的体验之后才能得到顺利彻底的解决。

第二节　周恩来对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贡献

周恩来自1925年1月党的"四大"担任中央军委书记以来，就开始进入中央领导机构。1927年7月，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他又成为五常委之一。同年11月在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1928年7月党的"六大"以后，常委分工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在后来的几年中，虽然他还未到达中央苏区，但却始终密切注视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和党的建设，苏区中央局就是他提议并指导组建的，从而统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组织的领导。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他以很大的精力从事党务工作和党的建设理论研究，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

在思想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这是建设坚强的马列主义政党的首要条件。然而，如前所述，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形式主义的错误倾向，即认为要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唯一的方法是大量引进无产阶级成分，而忽视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针对党的建设的这一偏颇，周恩来从两个方面作了深刻的分析和阐述。

第一，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加强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周恩来在1928年11月为中央起草的《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中就明确指出：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化，党内还存在着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确还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

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的同志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之下一致奋斗。

为此，他详细列举了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十种表现，郑重地提出了克服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四条措施：即强固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政治的水平线；党员的职业化；支部生活的改进等。他还强调指出：必须"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出路"。①

在1929年9月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他又再次强调指出：红军中和党内所以会出现各种错误思想，"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落，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② 周恩来的这一思想无疑为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确立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的原则起了重要的指导保证作用。

第二，坚决批判了"左"倾唯成分论，反对形而上学地过分强调领导机关的工人化和排斥打击知识分子干部。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严重存在着片面强调工人成分，排斥打击知识分子党员和干部的"左"倾错误。周恩来坚决批判了这种"左"倾唯成分论倾向，精辟地指出："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许多同志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造成了党内

① 《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12页。

② 《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41页。

的工学界限，增加党内的纠纷。”① “引进工农分子是改造党的重要方法。但许多党部执行起来，又陷于形式主义的错误。只是机械地找些工人分子进来，而不加以积极的教育，或则机械地规定指导机关中工人成分的比例……这种引进工农分子的方法，是毫无意义的。”② 周恩来所阐述的这一思想，不仅纠正了我党在如何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偏差，而且初步奠定了党的正确知识分子政策的基础。

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党组织遭到严重的摧残。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周恩来作为分管党的组织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整顿几乎被打散的党组织，使全国的党组织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他从客观实际出发，确立了党在白区的工作方法、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坚决反对白区工作的“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白区党组织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同时他还针对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地方和基层党组织削弱涣散的实情，反复强调要加强地方党部和基层支部建设，使党的基层组织成为党的基础、群众的核心，使党员成为群众的领导者。

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中，周恩来还全面科学地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批判了在这一问题上的两种错误倾向。首先，他深刻论述了扩大党内民主的必要性，反对独断专行的家长制领导。在1928年11月发表的《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周恩来就提出：“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

① 《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② 《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

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①] 他认为，要克服这种旧的组织观念，就必须发展党内的政治讨论，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

在1930年10月他为中央起草的第96号通告更进一步强调指出：“家长制度的统治，抑制了党的自我批评……使布尔塞维克党的生活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官僚机关，使党的领导走上一错再错的覆辙；——这是目前党内最严重的危机！”[②] 为此，他提出，必须发展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而反对抑制与恐惧自我批评，必须坚决执行党内民主化而不妨碍秘密条件，这样，才能冲破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委派制度。周恩来作为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一，提出要扩大党内民主，反对家长制领导，这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无疑是极为有益的。

其次，在强调发展党内民主生活的同时，周恩来还深刻批判了党内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强调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他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一文中就深刻阐明了极端民主化倾向的严重危害，认为“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③] 在1929年5月发表的《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中，他又精辟地指出：“党内民主的扩大，应该是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这种扩大决不是无条件超越原则，扩展极端化。”[④] 同年9月，由他主持审定给红四军前委的指

① 《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78～479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④ 周恩来：《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1929年5月16日。

示信中又明确提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采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做极端民主化的掩护。"①

在这年11月他所起草的《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中，更进一步科学地阐述了马列主义关于民主自由的观点，指出：第一，任何民主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实行的，党内民主的扩大，应该得到客观环境的许可；第二，当时，党内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尤其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正在激化，党内民主必须与这种环境适应；第三，我们不是民主主义者，更不是要求极端民主的无政府主义者。即如列宁所说的，民主主义不是我们的目的，只不过是我们的手段。因此，决不能片面追求极端的民主自由。周恩来上述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精辟论断，对于我党克服在这一问题上的"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正确开展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了"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认为革命已经灭亡，提出了取消主义的主张；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陈独秀右倾取消主义的愤慨，以及对中国革命长期性、艰巨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党内也迅速滋长蔓延着"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对党内的这两种错误倾向，周恩来都作了深刻的批判和坚决的斗争。

首先，他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强调指出：对革命斗争动摇消极，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是一种堕落的倾向。"其实革命每天都在向前发展，只要我们能够深刻地去了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解群众的情绪，便可以引导我们走向积极的道路。”① 为此，他要求全党对于以陈独秀为首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取消革命的主张和活动，“除了组织上的制裁之外，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很重要的武器！”②

其次，周恩来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也作了深刻的批判和坚决的斗争。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统治全党时，周恩来就明确提出，在反对“剩余的机会主义的遗毒”的同时，也要坚决迅速扫除“表面上革命的盲动主义”，并反复强调发动暴动必须考虑到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必须做好周密的准备，不能不顾一切地蛮干，玩弄暴动。

对于李立三搞“左”倾冒险主义，周恩来一开始就表示反对，他们之间在对形势分析、党的策略和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论，并被李立三指责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暴露了“右倾的危险”。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在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作斗争时，还深刻批判了当时党内浓厚存在的“左”比右好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明确指出：“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③ 在深刻地批判了党内“左”右倾错误的同时，周恩来还对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反对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个关系到党的战斗力、凝聚力、生命力的重大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他精辟地指出：“反机

① 《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1 页。

② 《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7 页。

③ 《关于武汉工作问题》，《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2 页。

会主义主要的是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有些同志竟专门攻击个人，因此而放松了对于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仿佛某几个人如果打倒了，机会主义便可肃清。殊不知机会主义的来源很深，决不是排除了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诚然，党对于那些有系统的执迷不悟的机会主义分子，只有尽情驱逐，才能坚固本身壁垒；但是主要在批判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至于因私人感情而借题发挥，那更是一种政客式的行为，这是与无产阶级的党绝对不相容的。"①

周恩来这一关于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反对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的思想，给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必须把革命的坚定性与批判的科学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于党内"左"右倾错误，一方面要坚决进行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以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另一方面又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加以分析批判，着重分析犯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思想根源以及阶级根源，从而达到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巩固发展党的团结统一的目的。

四、提出了党对红军和政权及群众组织实行领导的正确原则和方法

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工作。北伐战争中，我党在北伐军中的政治工作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又有了新的发展。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直接指挥的新型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党开始创立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在起义军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建立了党的政治机关。在1929年9月著

① 《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第一次在班排建立党的小组，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同时规定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这样就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又明确提出："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①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②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科学阐述了党对政权领导的正确原则，精辟地指出："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③

然而，当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自 1929 年 1 月进军赣南闽西以后，由于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旧式军队的影响，加上经验不足，一些同志包括领导干部对毛泽东的这些正确主张缺乏认识，甚至产生了怀疑和抵触情绪。他们不习惯于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重视政治工作，强调"司令部对外"和军官权威，错误认为"自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家长制"，主张事无巨细均应交下级讨论决定，前委和各级党的领导不应事先提出计划和方案。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严重地影响了红四军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在 1929 年 6 月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因此而未能当选前委书记，会后即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同年 9 月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往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

---

①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4 页。

②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5～66 页。

③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3 页。

当时党中央主管军事工作的是周恩来同志。他在认真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汇报后，即委托陈毅起草并亲自审定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在这封指示信中，周恩来提出了党对红军和政权实行领导的正确原则和方法，强调要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和维护领导核心的团结统一。

首先，周恩来重申强调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明确指出，红军由党的前委指挥，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军队中的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

其次，周恩来科学地论述了党领导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正确方式，深刻地指出：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不通，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行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红军对于苏维埃政权应帮助群众去建立并扶助其工作之发展，一切地方政治问题应与地方党部开联席会议决定。

再次，周恩来坚决维护和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朱德对红四军的领导，要求切实加强党内和军内的团结。他代表中央郑重地提出：前委和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应该团结一致，要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毛泽东、朱德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这必须使红军全体指战员了解和接受。

在1928年7月周恩来为党的“六大”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中，则严肃地批评了党的指导机关脱离群众、命令群众的包办代替的错误做法，强调指出，应消灭旧的命令群众强迫罢工的工

作方法，要坚决的执行说服群众领导群众的实际工作。党对群众团体实行领导，不能包办代替。“党在群众中组织上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城市与乡村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于党的周围及党的口号领导之下。”① 因此，“凡在非党的劳动群众组织及其机关中，共产党籍分子必须组织党团以进行积极的党团工作。”党团只有以极大的努力切实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才能无微不至的拥护劳动群众本身的利益，才能将目前斗争任务与工农群众斗争最终目的相联贯起来，然后党的影响才能更易获得。”②

周恩来上述关于正确处理党与红军、党与政权机关、党与群众团体关系的思想，对我党克服“党管一切”、“以党代军”、“党政不分”、“党群不分”的错误做法，实现党对军队、政权和群众团体的正确领导，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去夺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节 张闻天与中央苏区党的建设

张闻天于1931年2月从苏联回国后，即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1月，他随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后，在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局任常委、宣传部长等职，并被分工负责政府工作。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的大部分时间里，张闻天一直是“左”倾错误圈子里的重要人物，曾积极宣传和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给中国共产党建设带来有害的影响。这是客观存在、不容回避的。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79页。

但是，实践是最好的导师，“左”倾冒险主义的到处碰壁，实际工作的不断受挫，党内许多同志的不满和抵制，促使张闻天在进入中央苏区前就提出了一些反对“左”倾错误的正确主张。在此期间，他曾先后撰文批评“左”倾的土地政策、宣传文艺政策以及关门主义和军事冒险，并在1932年10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突破当时奉为神圣的“右倾是主要危险”的固定公式，第一次明确地将反对“左”倾作为一个突出的严重问题提了出来。这表明，当时张闻天虽然在总体上还未认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实质和严重危害，但在革命实践教育下，对“左”倾错误已经有所认识。特别是他到中央苏区后，亲身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更广泛地接触了群众和实际，并逐渐加深了与毛泽东等同志的交往和了解，这使他对“左”倾错误的危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逐步从“左”倾错误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最后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育下，终于在遵义会议上完全站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为结束王明“左”倾错误对全党的统治，确立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从危机中挽救党和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因此，对于张闻天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关于党的建设的正确思想及其影响，我们也应当给予科学的考察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肯定。

一、加强改善党的领导，实行新的领导方式

1933年2月至8月，张闻天先后发表了3篇题为《关于新的领导方式》的文章，针对当时苏区党的领导工作中存在的个人包办一切、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等现象，对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党群关系作了比较系统深刻的阐述，提出了不少可贵的思想。

第一，健全领导机关，实行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原则。针对当时苏区党和政府以及群众团体领导机关中普遍存在的个人包办一切、缺乏集体领导的不正常现象，张闻天作了尖锐的批评和科学

的阐述。他明确指出：没有集体领导只有个人领导，就容易产生包办一切、命令主义和应付敷衍的极不好现象。而“新的领导方式，决不是取消领导，而是在加强领导。要加强领导首先必须把一切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集体内讨论、决定，然后负责执行”。①

为了改变这种不良现象，张闻天建议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作部门必须迅速健全起来，加强业务工作指导；同时，省委县委都要设立巡视委员会，配备10个至几十个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巡视员。这样，既可以帮助领导者了解下情，指导基层的工作，还可以迅速培养训练大批干部。张闻天这一关于健全领导机关和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它对于我党克服“左”倾错误统治下盛行的个人专断、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都是积极和有益的。

第二，加强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建设，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在1933年8月，张闻天发表了《二苏大会的改选与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一文。在文章中，他尖锐地指出，在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对发展民主这一根本问题的无知与错误的理解，一些同志只看到工农民主专政的权力方面，而看不到民主的方面。为此，他提出了“发展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的任务，认为苏维埃民主的中心任务是在吸收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政权，教育他们管理自己的国家，使群众学会运用罢免权、改选权等权力。同时他还认真分析和严肃批评了党内对苏维埃工作的两种错误倾向——即党直接下命令给苏维埃或根本不理苏维埃的工作，强调指出这两种错误倾向实际上都是对于苏维埃的取消倾向，并提出了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原则，那就是应该“经过（不是代替也不是命令）苏维埃，经过群众的政权机关，

① 《关于新的领导方式（一）》，载《斗争》第2期（1933年2月14日），署名洛甫。

来实现党的领导作用”。[①] 张闻天关于加强苏维埃民主建设和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思想与主张，可以说与毛泽东、周恩来在这一问题上的科学论述是基本一致的。

第三，领导机关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况，给予基层具体的指导和切实的帮助。张闻天在提出健全领导机关，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原则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提出，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对于工作不能只作一般的布置，只知背诵党的决议，而不给被领导者以具体的指导，不告诉下级如何去执行任务，不给下面的同志解决在执行任务中所遇到的困难。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同这种现象作最坚决的斗争。而要实施具体的指导，就要求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实际斗争中去掌握第一手情况，熟悉了解下层的情形，而且要多听在基层工作的同志的意见。

为此，他积极主张省、县、区委的委员都要以抓好一个中心支部为基点，通过亲自动手，典型示范，取得经验，指导全面。同时在实施领导的过程中，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不仅要给下级提出任务、要求和办法，还要切实帮助基层同志解决粮食、食盐等生活、生产中遇到的困难，使基层同志感到温暖，以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张闻天作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局的重要领导人和党内分管政府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能及时地郑重地提出这些正确的意见，无疑对改进苏区党和政府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工作状况具有积极的影响。

第四，深刻阐发了党的群众路线与正确的领导方式，并带头身体力行。张闻天强调指出，我们党所以能够领导群众去完成党所提出的正确任务，是因为党有着正确的理论和策略，党的每一决定和口号都是为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我们一定要克服脱离群众

① 《二苏大会的改选活动与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载《斗争》第21期（1933年8月12日），署名洛甫。

的、命令群众的、官僚主义的旧的领导方法，实行同群众在一起的、说服群众的、领导群众的新的布尔塞维克的领导方式。而“细致的耐烦的去说服群众，正确的去代表群众的意识，负责的谨慎的去领导群众，这就是我们新领导方式的主要内容”。①

那么，怎样做到这一点呢？他认为，一是要学会做活泼的具体的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并在实际上来解决群众中所发生的许多困难问题，帮助群众用自己的经验了解党的政策，执行党的任务；二是虚心向群众学习，通过学习研究群众为了实现党的策略和口号所创造的非常丰富的新的方法与形式来更好地领导群众；三是坚决克服那种以为党是高于一切的，党只能命令群众，党不必注意群众的意见，党员有享受各种自私自利的特权的错误观点，党有错误就要承认错误，并根据群众的利益和意见修改自己的政策；四是小心谨慎地去领导群众，使党的策略带有更多的弹性，以便能够灵活地运用到各种实际环境中去，容纳和发挥群众最大限度的创造性。

张闻天上述关于党的群众路线与领导方式的正确思想和主张，尽管在“左”倾错误统治下，很难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全面贯彻，但他自己却带头身体力行，不仅与群众同甘同苦，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亲自参加“礼拜六义务劳动”，帮助红军家属砍柴，而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力纠正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等恶劣作风。例如：1934 年 2 月，万泰县发生群众逃跑事件，张闻天立即写去指示信，严肃批评该县领导在扩红和征粮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摊派与强迫命令，一些工作人员对付群众的唯一办法就是坐禁闭、罚苦工，强调这才是造成群众逃跑的主要原因。

---

① 《关于新的领导方式(三)》，载《斗争》第 20 期(1933 年 8 月 5 日)，署名洛甫。

二、在实际斗争中逐步挣脱“左”的桎梏，深刻批判极左主义

在参与领导中央苏区斗争的实践中，张闻天一方面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受着“左”倾思想的禁锢，另一方面又从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左”倾错误对苏区各项工作的严重危害，从而在经济、文化教育和政治军事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比较正确的意见和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

在经济上，他通过科学分析和考察苏区的六种经济成分及其地位作用，明确提出了发展生产，鼓励商品流通，反对“左”的劳动政策的方针，强调对私人资本主义要实行“利用、限制、竞争、斗争”的正确政策。

在文化教育上，他撰写了《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①]一文。在文章中，他既批评了那种将革命战争与文化教育对立起来的“取消文化教育”的观点，也批评了那种将苏区的文化教育降低到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看法。他还特别着重论述了利用旧知识分子的“绝对必要”，对党内“吃知识分子”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抨击，要求对这种“左”的倾向必须立刻纠正。并提出对知识分子不但应该尽量地“用”，而且还可给他们“优待”，对于那些特别努力工作的分子，还可以给他们“奖励”。对于干部教育，张闻天也十分重视，他曾亲自兼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规定了切实的办学方针和教学内容，而且多次到该校讲演和系统授课。

在政治军事上，他不仅批评了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纠正肃反中的错误，而且在上层统一战线、福建事变、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策略等许多问题上同“左”倾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的分歧与矛盾日益加深与尖锐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左”倾中央对他的不满和排斥。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

① 载《斗争》第26期(1933年9月15日)，署名洛甫。

不久召开的全苏二大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这就使他的主要工作从党中央完全转移到了政府工作方面。

这一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变动，若仅从表面上看，似乎张闻天得到了更大的重用，但身处矛盾之中的他却明显地感觉到，这是博古等人通过这种人事变动，一方面用他来取代毛泽东，把毛泽东进一步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又让他去管日常行政工作，实质上是把他从党中央实际的领导核心中排挤出去。对于博古等人运用一箭双雕的办法对他进行巧妙的排挤，张闻天十分不满，这进一步促使他越来越深入地去反思王明"左"倾路线的正确与否，越来越感到必须在党内开展反对"左"倾思想的斗争。

1934 年 6 月，张闻天经过长期认真的思考，写出了《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① 一文，这是他自觉地、比较全面深刻地反对极左政策的代表作。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尖锐地抨击党内广泛流行的"'左'比右好"的错误观点，明确提出了反对小资产阶级极左主义的任务。

张闻天首先指出："在我们苏区党内，存在着这样的观点，就是'左'倾总比右倾好些，而且事实上也常常表现出对付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总比对付'左'倾的同志更严厉些，甚至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可以完全不受到批评与纪律制裁。"他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倾向，因为"这种错误倾向，实际上帮助了极左主义的发展，使极左主义在目前战争形势紧张的条件下更增加了它的危险性"。而如果我们党不坚决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与一时的狂放的革命性"，"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是不可能的"。为此，他要求每一个革命同志了解"极左主义是机会主义另一种形式的表现"，是"反对党与苏维埃的整体利益的"。他坚定地提出：不要惧怕"左"倾

① 载《斗争》第 67 期(1934 年 7 月 10)，署名洛甫。

革命家的威吓，要最尖锐地提出同这种极左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极端必要。他认为："不敢反对极左主义或对于极左主义表现容忍与姑息的同志，不能称为布尔什维克。"

由此可见，虽然张闻天当时还不得不重复"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主要危险"的论调，但实际上已跳出了这种反倾向斗争的框框，逐步站到了反王明"左"倾错误的一边。

第二，深刻阐明了小资产阶级极左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历史背景，科学分析了极左主义在党的各项工作中的表现及其严重危害。

张闻天精辟地指出："这种极左主义，正是小资产阶级与农民思想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在我们苏区内，由于经济落后，由于小生产的农民占着人口的绝对多数，甚至在我们党内，农民出身的党员也占着多数，所以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特性，也常常不断地在党内反映出来。在革命紧张时期，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常常容易走到发狂，走到极端的革命性，但一受到挫折，立刻就走到灰心屈服与张惶失措。"

在深刻地阐明了极左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历史背景的同时，张闻天还以大量的篇幅具体分析了极左主义的表现和危害。首先，他指出：极左主义首先在党内思想斗争中表现出来。"他们把每一个所犯的错误，不论是原则性的或是非原则性的，大的或是小的，初次犯的或是屡次犯的，都叫做机会主义或是两面派机会主义，都来向他们斗争，都来撤销他们的工作，或是开除党籍，公审以至扣留。"他认为，"这种倾向的发展会造成党内的恶劣的不正常的现象，并且会使党的组织解体。"

其次，他提出极左主义在苏区的检举运动中也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极左主义者对革命队伍中每一个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不加分析，一律称之为阶级异己分子而予以洗刷，并且不问情节，轻易地给同志扣上"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的帽子而扣留公审。

他严肃地指出，这种极左的做法“显然会模糊检举的目标”，是脱离现实地想把每一个红色战士、每一个苏维埃工作人员变成理想的布尔什维克，或是变成为禁欲主义的清教徒。这实际上是忘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而把党变成为宗教派别。

再次，他认为，在对待地主富农的政策上，极左主义也有充分的暴露。这主要表现为“在某些地方，赤色恐怖变成了乱捉乱杀”，甚至“要求把全苏区的地主富农，不分大小都捉起来，一律杀尽”。他尖锐地指出：“这种疯狂，不但不能加强我们对于革命战争的力量，而且会给自己造成一些新的困难。”他还具体分析了各地在捉杀地富、将地富编入劳役队和征发没收地富粮食三方面极“左”错误的做法，要求全党“立刻消灭在地主富农问题上最近发生的‘左’倾错误”。

此外，张闻天还提出，极左主义在苏维埃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查田运动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都给苏区斗争带来了严重损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极左主义者经常以反对特务混入苏区、反对投机买卖为口实，不必要的没收商人输出或输入的商品，禁止商人的来往与自由贸易，实际上等于帮助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

由上所述可见，尽管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对王明“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性还认识得不够全面，同时只分析了“左”倾错误产生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历史背景，这说明他对王明等人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绝对化的“左”倾教条主义仍然缺乏深刻清醒的认识，但是，他毕竟明确尖锐地提出了反对极左主义的任务，并且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这在当时“左”倾狂热弥漫苏区，统治全党的严重时刻，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此前后，张闻天目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最终不得不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对王明的“左”倾军事路线也日益产生怀疑和不满，在广昌战役失败后的中央军委会上，他就同博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认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在红军长

征前夕，他又撰写了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战争是长期的战争，必须依照当时的环境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尤其是退却、缩短战线、转移地区的方式，以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争取胜利。

与此同时，随着他与毛泽东交往的日益增多和密切，他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才干不断加深了解，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日益认同和赞佩，终于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挺身而出，与王稼祥等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同志一道，同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展开了尖锐的思想斗争，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最紧迫而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为结束王明"左"倾错误在全党的统治，从危机中挽救党和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的重要贡献。

第四节　任弼时关于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论述

任弼时自1924年秋由苏联回到上海后，就参加了共青团中央的工作，先后担任团中央的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和书记。直至1928年春，他一直在团中央担负主要领导工作。1928年6月党的"六大"期间，他未赴莫斯科参加大会，留守上海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在此期间，他曾代表中央致信毛泽东、朱德等前委诸同志，对农村的武装割据和红四军的行动、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党的建设诸方面提出许多正确意见，并决定组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从而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的领导地位。

1928年冬至1930年冬，他先后任江苏、湖北省委书记。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弼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2月，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弼时和项英、毛泽东、王稼祥等一起组成苏区中央局常委。但此时，他还未到达中央苏区。同年4月，为解

决中央苏区发生的“富田事变”，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三人由中央指派组成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中央局驻地——江西省宁都县青塘。从此，他参加了苏区中央局的实际领导工作，先是担任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1932年起又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局，任弼时又成为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直至1933年5月，他才离开中央苏区，前往湘赣苏区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

在中央苏区工作的两年时间里，身为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任弼时，主要负责指导苏区党的建设。在此期间，他虽然也执行过王明的“左”倾路线，对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作了错误的指责和批评，在苏区党的建设工作中还曾不适当地突击发展党员和推行“左”倾“唯成分论”等等，但与此同时，他运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经验指导中央苏区党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为苏区党的建设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积累了宝贵丰富的经验。对此，我们也应当给予认真的考察和科学的总结。

一、整顿和建立健全中央苏区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机构

在任弼时到达中央苏区前，苏区中央局组织部虽已建立，但无人负责，更未开展工作。自任弼时担任组织部长以后，组织部的工作才正式开展起来。1931年6月以后，在任弼时的具体组织下，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央的决议，迅速调整了赣西苏区党的领导机构，撤销了赣西南区特委及其所属各路分委，先后成立了赣东、赣南、永吉泰三个特委，直接受苏区中央局领导。10月，他又领导成立了中共江西临时省委，并亲自兼任书记。同年11月和翌年3月，任弼时又先后亲自指导江西和闽赣（福建）两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正式建立并健全了两个省的省委领导机构。

1932年春以后，苏区中央局组织部的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不仅创办了党建理论刊物《党的建设》，刊载指导党的基层组织

建设的文章，而且着重抓了建立健全县级党的领导机构的建设，使之进一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从1932年春起，为便于加强领导，各省还成立了中心县委（或分区委、市委），由中心县委直接指导所辖各县的工作。

1933年3月，中共中央局组织部召开闽赣两省组织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问题。作为中央局组织部长的任弼时在会上作了《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的报告，对改造和健强地方党部与支部的组织和工作，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总之，在任弼时的精心指导和组织下，中央苏区各省、县、区地方党部的建设都得到加强，这就在组织上保证了苏区革命斗争和各项工作的胜利开展。

二、创造新的工作方式与作风

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各省、县、区以至基层支部去检查工作。每当发现问题，就和大家一起去研究，共同解决。当时一些地区的党组织存在这样的问题，如缺乏集体领导，书记说了算；不能很好地开展各部门的工作，部长实际上变成了巡视员；不能认真地实行党的民主，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对于这些问题，有的同志不以为然，还有的同志认为是老问题，提出来也不一定能解决。

任弼时经过详细调查研究之后，严肃地提出，这是关系到党的组织和领导是否健全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为了加强地方党委的领导，他强调指出：第一，要建立集体领导；第二，要建立巡视制度；第三，要建立各部工作；第四，要加强党内民主。为此，他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同志，都必须亲身到群众中了解和指导工作，只有一刻不放松地去检查和督促每个组织、每项工作，才能提高党员的积极性，推动整个工作的进步，才能从新的实践经验中创造出新的工作方式和作风。

而任弼时就是我党这种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方式与作风的很好体现者。他开展工作、处理问题总是十分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倾听各种意见，全面地进行分析。因而，尽管他在这一时期也执行过王明的“左”倾路线，一度认为毛泽东有“右倾”思想，犯了“狭隘经验论”的错误，但从革命实践中却逐渐感到一些极“左”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如他参加组织召开的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意见，把毛泽东排斥于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事后，他就认识到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对于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全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所搞的一系列“左”的政策，他更是有不同看法。例如在开展党内斗争问题上，任弼时坚决反对“左”倾中央混淆党内两类矛盾，把党内的思想路线斗争，同错误的肃反结合起来，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他认为，干部即使犯了严重错误，也不应该一棍子打死，应当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主要是帮助教育问题。他强调指出，在肃反中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乱杀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批准。

正是因为他被临时中央认为贯彻极“左”路线不力，而被免去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到湘赣边区任省委书记。当他于1933年5月来到湘赣边区后，就到处走访，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坚决有效地制止了原湘赣省委主要领导人陈洪时、刘士杰等人抓人杀人的极左做法，使王首道、张启龙以及甘泗琪等许多同志，得以从“左”倾路线的打击下解放出来。这样，在任弼时的主持领导下，湘赣边区党的组织工作、军事工作、土地革命、经济建设、政权建设都很快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三、注重加强党在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

任弼时在1928年夏留守上海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曾为中央起草并发出了《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和秘密工作》的第

47号通告，较好地解决了白区党组织在秘密条件下的建设问题。1931年4月他来到中央苏区后，通过深入考察和分析研究，清楚地认识到，苏区的党组织与白区的党组织所处的环境不同，要完成的任务不同，因而党的建设重点和方法也不相同。

为此，任弼时把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经验与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实情相结合，和中央苏区的全体党员一起，在实践中对这一全新的课题不断进行探索。由他主持起草并在1931年11月苏区第一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就深刻地指出："在苏维埃区域以内，是已经推翻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实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和保卫及发展这一政权的工农红军。"① 因此，"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共产党是公开存在的政党。他在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是要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之下领导并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保证党对政权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② 这就明确地提出了苏区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如何加强自身建设以保证党的任务顺利完成的重大课题。

1932年一年间，他着重抓了对这个决议案的贯彻落实。翌年3月，任弼时又主持召开了闽赣两省组织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两年来苏区党的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着重阐述了苏区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任弼时关于这方面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必须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对苏维埃政权、对群众团体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4～465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4～465页。

和对工农红军的领导作用，正确处理党与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和红军的关系。

任弼时强调指出：共产党是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担负着正确领导革命的责任。然而过去党对政府工作、群众团体和军队建设注意不够，领导不力。因此，“这就要纠正过去党的组织部只管党本身组织上问题的狭隘的错误观念。”① “今后，组织部不仅要统计党员的数量成分，更要注意党组织工作上各方面的问题，如发展趋势，支部工作，工会、贫农团、青年团及其他群众团体和苏维埃政权方面的组织上的工作。”② 在明确地阐述了党必须充分发挥对苏维埃政权、群众团体和工农红军的绝对领导的同时，任弼时在《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还进一步强调指出，保障党的领导作用，绝对不是由共产党专政来包办一切，党包办一切的理论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遗毒。党对政权及群众的正确关系是要经过党团的领导作用来实现党的领导。党在红军中应当切实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与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红军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中央局对全军党的工作指导亦须经过总政治部。

第二，健强地方党部的组织与领导，切实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任弼时通过细致地考察苏区各级党部的工作状况和工作作风，明确指出，目前地方党部存在的问题，一是集体领导未建立；二是还没有真正建立巡视制度；三是各部工作未建立；四是党内民主化的运用不广泛。针对上述问题，他提出，以后省县区领导机关必须立刻形成集体的组织和领导，要保障各部各委工作的建立。一切

---

① 《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6 页。

② 《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6 页。

重要问题都应经过正式会议讨论解决。同时要真正建立巡视制度，这是帮助各级委员会建立集体领导的必要条件。巡视员除传达上级的决议外，要能帮助下面来具体执行决议，解决困难的问题；要注意发挥下层群众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而不是去代替他们；要考查各级党部的领导方式，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的领导方法。而且要推广党内民主化，一切问题要发动党员详细讨论，决定以后，便须传达下层去坚决执行。在组织上应改变委派制度，并要按期来改选支部与各级党部，按时开代表会议，但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是不能容许的。

第三，改造和健强支部组织与工作，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任弼时对这一工作特别重视。他深刻地指出："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与群众的连环，党的一切决议，必须经过支部执行。过去支部不能起应有的作用，是党不能广泛地组织、动员、武装和领导群众来参加当前的战争的主要原因。因此，建立健全的支部工作，是党在组织工作中最中心的战斗任务。"① 他还提出："支部的改造，应要求得适合斗争条件与需要，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建立支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以巩固党的领导。"② 为此，任弼时花了大量的精力，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苏区党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适当扩大支部干事会人数，改变支书包办一切；明确支部干事的分工与职责，消灭过去支部同志只是挂个党员不做工作，甚至不到会的严重现象；支部要经常讨论并注意支部周围广大群众利益的争取，加强对苏维埃组织与群众组织的领导；建立中心支部与模范支部，来推动全部支部工作的改进等许多正确的意见和措施。

---

① 《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1 页。

② 《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1 页。

此外，他还指导建立健全了各种支部生活制度。在任弼时的领导下，从1932年起，中央组织部着重抓了支部和区委的整顿改造，同时抓了中心支部和模范支部的建立，总结和推广了兴国高兴区黄岭乡支部工作的经验。这样，就使苏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得到了有力的加强，促进了各方面的工作。

第四，必须加强党的教育训练工作，努力创造党的新干部。任弼时在《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明确指出，党内教育工作的目的，主要的是要实际斗争与理论问题能够很好地联系起来。因此，既要防止忽视政治和理论教育的倾向，又要防止一切离开实际斗争的空谈主义和一切夸大狂。这就要求我们在这些教育工作和思想斗争中，必须要很灵活的联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政纲及目前任务，以达到提高党员政治理论水平的效果。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问题的教育，还须要注意有系统的进行，特别是对党的干部更加需要。

在明确地论述了加强党的教育训练工作的重要性和基本要求的同时，任弼时还强调指出，坚决提拔干部训练干部，是目前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对于干部，除开在实际工作训练外，还须要有计划地组织各种党的、军事、政治以及群众和苏维埃工作的训练班或学校，训练的方式与材料都须要有很实际的充分的选择与准备。为此，他对各级党组织提出培养训练干部的明确而又严格的要求，并于1932年春亲自创办了苏区中央局党校，自己兼任党校校长。苏区中央局组织部还与红军总政治部合办政治教导队，培养训练干部。经过苏区各级党组织的艰苦努力，中央苏区培养干部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大批普通的红军战士和贫苦工农，通过参加各种类型的训练班和干部学校以及实际工作的锻练考验，迅速成长为能治党治国治军的有用人才。

第四，严紧党的纪律，反对官僚腐化现象。由于在苏维埃区域以内，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公开存在的执政党，许多党员成为各级政

权机关和红军及群众团体的领导者，工作和生活的条件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不加强对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不加强党的纪律的教育，党内的官僚腐化现象就极易发生并滋长蔓延。

任弼时及时地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在各政权机关红军及各种群众组织中，多半是党员担负着最重要的工作。为要保障这些同志真正成为群众中的模范者，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党必须严格的执行纪律。下级党部与党员对于上级党的决议，应负绝对执行的责任，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于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比非党之工农分子受更严厉的革命纪律制裁，这尤其是在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中更加重要。党应当加紧反对官僚腐化贪污等现象的口号，防止那些现象滋长。"①

他还提出，在严密党的纪律当中，必须防止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产生，即因为感情的关系而放松纪律的执行或采用机械的过分施行纪律的惩办制度。对于新提拔的干部和新党员，他认为，党必须有特别教育工作，以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正因为我党郑重地严肃地提出了严紧党的纪律，反对官僚腐化现象的口号和方针，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及时地敲响了警钟，并严惩了一些蜕化变质、贪污腐化的党员干部，这对中央苏区各级党员干部能正确地对待人民给予的权力，形成群众交口称赞的"苏区干部好作风"，无疑是极有帮助的。

由上所述可见，任弼时对中央苏区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和措施，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它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页。

第九章

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

第一节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

一、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十分落后，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现代工业的产业工人数量很少，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处于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其主要参加者是农民，因此，党组织发展的基础也就是农民，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中说，“在党员成份上，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这就必然给党内带来浓厚的农民意识等小资产阶级意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在起草这份文件第四部分中，列举了种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及其危害性，并提出“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要“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党的政治水平线”，“同时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员理论水平”，并指出“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

的出路”。[①] 这就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出发，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紧迫任务。

对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就提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②] 在开创中央苏区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更深切地体验到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与当时及其后党内多数同志也是在党内占主导思想的，强调增加党内工人成分的数量来增强党的无产阶级意识的认识不同，而是突出强调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中央苏区地处赣南闽西偏僻农村，交通不便，社会封闭，经济文化落后，党在这一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革命的参加者和党员发展的主要对象必然是农民。1929年5月，红四军共有党员1329人，成分是工人311人，农民626人，小商人106人，学生192人，其他95人，工人只占23%强，农民占了47%。[③]1930年4月，红四军党员发展到1600多人，其成分为工人300多，知识分子200多，小商人等200多，农民900多，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占80%多。[④]闽西苏区党员成分，据1930年7

① 《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1928年11月)，《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3页。

② 《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③ 《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6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85页。

④ 《红军第四军状况》(1929年7月至1930年4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4页。

月统计，党的成分80%是农民。[①] 1930年10月赣西南党员成分统计，农民则占至80%，知识分子及商人占10%，工人仅占10%。[②] 当时，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广泛吸收产业工人入党，农村中雇工和手工业工人也作为工人成分计算，但工人党员比例仍然占少数，以后情形也大致如此。比如：1933年4月江西全省统计，工人雇工苦力占全体党员23%弱，1933年5月发展党员突击运动月中，苏区中央局提出扩大一倍党员，新党员中工人成分要占30%的要求，江西省委根据13个县红五月发展结果统计，在新发展14949名党员中，工人雇工苦力4182名，仅占28%弱，而贫农、中农、知识分子、小商人等占了72%强。6、7两月8个县发展新党员12040名的成分统计，工人雇工苦力则只占15%强，贫农、中农、知识分子、小商人等则占近85%。[③] 可见，即使在苏区中央局一再强调扩大党员中工人成分比例的情况下，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仍占绝大多数。实际上，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处社会环境的客观反映和必然结果。

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土地革命战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农民成为战争的主力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但是，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又必然使农民意识和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反映到党内来。如第三章所述，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地妨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地方党的组织也是如此，中共闽西特委

---

① 《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1930年7月8—2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8页。

② 《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题》(1930年10月1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6页。

③ 《党的组织状况——全省代表大会参考材料之四》，同上书，第674、676页。

1930年2月28日在第二次特委扩大会议上，分析党内思想状况时就提出："目前党内农民成份太多，分子复杂，农民意识支配了一切。地方主义、保守观念、封建思想、家庭观念、享乐主义、金钱主义、不拿枪等现象无奇不有。"① 赣西南党组织的情况也一样，"党的基础建立在农民基础上面，小资产阶级的意识非常浓厚，农民意识笼罩一切"。②

毛泽东在开创中央苏区斗争中长期思考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存在的状况、产生原因以及解决办法，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的建党原则。这一原则在以后的建党实践中得到了广泛深入的贯彻，这与当时中央多数领导同志片面地把增加党内工人成分，强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作为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唯一途径不同，而是把马列主义建党原则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从而成功地探索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如何建设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二、加紧党内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

古田会议提出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在中央苏区得到了深入的贯彻执行，特别是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以后，中央苏区进入巩固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更是广泛地开展起来。苏区党大会强调了党的教育训练工作，并提出"党内教育工作，主要的是要实际斗争与理论问题能够很好的联系起来"。一方面，党的重要决议和文件，尤其是斗争中一切经验和教训要整理起

---

① 《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1930年2月2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2页。

② 《赣西南特委(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9月28日)，同上书，第327页。

来，作为一种实际教育的材料，传达到党员群众中去，引起同志的讨论。另一方面，要“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工作：在这些教育工作和思想斗争中，必须要很灵活地联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政纲及目前的任务，以达到提高党员政治理论水平的效果”。[①] 大会还提出了党的基本理论教育的具体办法：(一)要组织读报班，读党报册子和决议案，并提出问题讨论。(二)在支部大会或特别召集干部会议上，作浅显的政治和理论问题报告。(三)组织各种问题研究会。(四)出版各种问题简明的小册子并收集和编订其他材料供给党员作研究的参考。(五)各种训练班要注意训练提高同志政治理论水平。(六)能识字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自己看读基本的书籍，党应收集并翻印这类书籍。这次大会虽然在指导思想上犯有“左”的错误，但大会提出的加强党内教育训练工作的基本原则及方法途径则是有益的，对中央苏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训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十分重要，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情形来说，更显得十分迫切。中央苏区处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包围封锁之中，要读到马列著作十分困难，当时只要打下一座城市都注意收集书籍报刊。1932 年 4 月，红军打下漳州时，就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的书籍送到总政治部，其中有一些马列著作，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毛泽东得到这些著作后如获至宝，反复研读，受益匪浅，还把它送与彭德怀

① 《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1931 年 7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75、476 页。

阅读。[①] 为适应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需要，在印刷条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中央出版局还出版发行了一大批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论"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概论》等。同时，有关学校和单位还组织力量翻印编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教育读本，如《党的建设讲义》、《社会进化简史》、《苏维埃政权》等。另外还创办了许多刊物，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建设的基本常识及先进典型，并刊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等。这些书刊的出版发行，为学习研究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央苏区极端重视干部队伍的培养建设及对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始时，红四军前委一再请求中央派军事、政治人才来，由于土地革命斗争蓬勃发展，中央也感到干部人才紧缺，要求各地重视干部人才的培养教育，甚至能向中央输送干部。事实上，中央苏区始终重视干部队伍的培养建设，在斗争实践中提出了"创造干部"的宝贵思想，注意在实践中锻炼提高干部素质，大胆提拔政治过硬、有工作能力的人才进领导机关，同时举办各类型的干部训练班和培训学校，后来还创办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中央党校等学校，这些训练班和学校，除了讲授专业课程外，都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比如中央党校专职教员成仿吾、冯雪峰讲马克思主义政治常识，其他兼职教员董必武讲苏维埃建设，刘少奇、陈云讲工人运动，李维汉讲党的建设等，罗明被撤销福建省委代理书

① 逄先知：《毛泽东读马列著作》，载《毛泽东读书写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5 页。又参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83 页。

记后调中央党校任教务主任也教党的建设课程。[①] 另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如毛泽东、张闻天等也经常向干部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讲。1933 年 4 月和 6 月，中共中央局机关和中共江西省委机关还分别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及分会。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的学习、教育和研究，始终贯穿于中央苏区干部队伍的培养和党的思想建设的过程中。

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也始终抓得很紧。一方面是注意适应党内教育的要求，组织力量编印大量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党员训练教材。如 1929 年 7 月红四军第三纵队政治部为适应红军中支部工作需要编写了《党员训练大纲——支部工作》，内容包括党的组织原则、支部的意义、支部的组织与党员、支委会的组织与责任、怎样开会、怎样批评同志、怎样介绍同志、宣传须知等 20 个问题。1932 年 1 月红军总政治部又编印了《新党员训练大纲》，内容分为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的纪律和共产党员的任务五个部分。红军大学训育部也翻印了《党的建设讲义》一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共产党建设的理论。这些文件和书籍对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通过多种形式训练班教育党员。关于党员的教育训练，开始时红军抓得较好，据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 1931 年 9 月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中一般政治教育，平时每日都有政治课，由政治委员领导，遇有纪念节或特殊事件即召集大会，有时也发动士兵群众参加实际的群众工作，但地方党的组织则由于训练的材料很少，尤其是每个支部中能识字的不过几人，因此党的教育训练工作很缺乏。苏区党大会强调了要加强党的教育训练工作，同时，强调对新党员必须有特别的教育与训练。要求要适量分配以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85 页。

具体可能胜任的工作，使之受实际工作的训练，同时要开展个别谈话式的和集体的——组织新党员训练的教育方法，使之在入党后能尽快了解地党的基本知识。具体的办法，就是经常举办各种短训班和支部流动训练班。1933 年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组织局专门就党内教育计划问题致信各级党部，要求县委举办流动训练班，以训练区一级干部和一部分主要支部书记，并培养支部流动训练班的教员，该文件还具体规定了县委和支部的流动训练班的授课内容和授课时数。同月 19 日中央组织局再就健全地方支部生活的问题致信各级党部，强调除开从日常支部生活去教育同志外，必须建立有系统的训练班的教育工作，每个县委应该举办支部干事的专门训练班，同时对于一般党员也应该切实举办流动训练班，使每个党员都受到基本的党内教育。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尽管所处的环境残酷，工作十分紧张，但都经常举办各种训练班，教育训练支部工作骨干和广大党员，许多普通党员和基层干部原来都是没有文化，不懂理论的贫苦工人、农民、士兵，通过学习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大大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有许多同志在革命斗争中逐步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有一些还成长为党和红军的中高级领导干部。

三、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实现党的思想政治领导

重视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是我党的一大传统和优势。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每隔一个时期都要专门研究宣传工作，提出相应的内容和口号，发出决议，作出具体布置。1931 年 4 月 21 日，中央专门作出了《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决议提出：苏区各中央局都要有健全的宣传部，统一领导苏区内一切宣传鼓动工作；要创办党的和苏维埃的机关报，及当地小报和乡村壁报，并组织读报小组，宣传党纲、党的政策、苏维埃政策及各种中心工作；要编辑出版各种通俗册子，作反帝拥苏、土地革

命等的宣传与鼓动；要成立党校，培养党、苏维埃与工会的干部；要利用公开会议与群众大会以及欢送红军各种纪念节和春耕秋收等一切机会做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红军兵士也是宣传员鼓动员，要对俘虏兵特别是白军士兵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在苏区内要做公开的共产主义宣传及国际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发展俱乐部、游艺会、晚会等工作，并开展革命竞赛、模范队等运动；还要经常派人到邻近白区做宣传鼓动工作等等。① 这个决议虽然在指导思想上犯有"左"的错误，但是所提出的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22条具体措施，基本上是正确的，有很多是总结和反映了各苏区这方面的经验，这些措施在中央苏区宣传鼓动的实际工作中也大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行。

在中央苏区，红四军向赣南闽西游击时，所到之处，张贴布告，刷写标语，呼喊口号，散发传单，召集群众大会，深入发动群众，以简明的语言，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政策主张和红军的宗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时红军每一机关如连部、卫生队等均有5个宣传兵，因此红军每到达一个县城只要3个小时，宣传工作可以普遍，许多地方群众说："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②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九大"全面总结了红四军政治工作经验，对"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的问题"、"优待伤病兵的问题"及"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等都有专节加以分析总结，对加强红军政治工作提出了数十种对策措施，这些方法措施被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广泛采用，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进一步充实发展。

---

① 参见《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决议》(1934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220页。

②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1929年9月1日)，同上书第5册，第763页。

宣传鼓动工作包括宣传工作和鼓动工作，在红军中称作政治工作，在地方也称作政治思想工作。这一工作是教育人、鼓舞人、培养人的工作，也是发动群众、动员群众、瓦解敌人的工作，目的是使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口号和政策主张为工农群众所了解，所拥护，达到深入人心，并使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这些口号和政策而坚决斗争。

宣传鼓动工作就其形式而言，丰富多彩，多种多样，主要包括文字宣传、口头宣传和形象宣传。

文字宣传形式有：张贴布告、宣言，刷写标语、口号，散发传单，编辑歌谣，出版各类报纸、刊物、图书等等。

张贴布告、刷写标语、散发传单，是红军沿途行军的基本宣传手段，如1929年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时沿途张贴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短短557个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却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说得清清楚楚。至于标语，主要是用石灰刷写于墙壁显眼之处，要求"写字要正楷，以愈大愈好，要用梯子写得高，使反动派不能随便涂抹"，[①] 迄今那些村镇仍然到处可以见到当年红军宣传兵留下的标语及部队的番号，这些布告、标语鲜明醒目，宣传效果十分强烈。有时红军也直接向敌军官兵写信或邮寄宣传品进行宣传，另外还有将标语、口号写在竹片、木板上，顺江飘流，以扩大宣传效果。编辑红色歌谣，言简意赅，生动流畅，既宣传了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又鞭鞑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中央苏区歌谣流行，仅以有文字依据收集而成的《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选集》，就收入536首之多。

创办出版各种报纸刊物和革命书籍，更是深入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形式。当时中共中央一再强调各地党部要创办报刊，加强宣

①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63页。

传工作，要与一切忽视报刊组织作用的倾向作斗争，苏区党大会也强调要创办健全的党报，反对忽视党报作用的倾向。[①] 当时，从中央局到各省、县一级的党政军群领导机关，都创办了大量报刊，连同各种油印的、传单式的小报，据不完全统计，达到一百几十种之多，另外，各机关、连队、乡村、工厂等也办有壁报、宣传栏等。此外，在中央苏区还成立了中央出版局、红旗出版社和中央印刷厂等出版印刷机构，采用石印、油印、铅印等多种形式，出版了大量的政治理论图文和文化教育书籍及各类宣传小册子。这些报刊和图书，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有力的宣传了党和苏维埃的纲领、路线、政策及各项中心任务，宣传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了苏区的火热斗争、建设成就和军民的精神风貌，有效地发挥了教育作用。

口头宣传的主要形式有：个别交谈、喊话、演讲等。当时红军游击到达一个城镇，红军宣传兵都要手持红旗串大街小巷、进酒店茶馆作个别宣传或按户宣传，然后召集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大会、宣判大会进行演讲宣传、报告动员，向群众传播革命道理，这是苏区常用的宣传形式。对红军的宣传鼓动，休整时有，宿营时有，行军作战时也有。休整时早晚列队呼口号，组织战士读报小组，召开战斗经验总结会，每天上一堂政治课、一堂文化课。行军时宣传员就一路鼓动："快到山顶了"，"上了山就是胜利"，在没有敌情时，就以部、科、班等为单位赛歌，有时搞到留声机在山顶上放唱片，鼓励大家向前跑。作战时更有战前动员、战场鼓动、战后总结，鼓舞战士们顽强作战，英勇杀敌，轻伤不下火线。对白军也开展宣传，主要形式有阵地喊话，有时也组织阵地演戏，让敌军官兵来看，以此进行政治瓦解，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对待俘虏不仅有

① 《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8～479页。

严格的纪律，而且还组织他们开欢迎会、诉苦会，提高他们的觉悟，愿留下的，就参加红军一起干革命；要回去的，还开欢送会，发给路费，有的被抓回敌军，无形中就帮助红军做了宣传工作。此外，还选派得力党员打入敌军内部，开展秘密工作，发展党的组织，进行革命宣传，待条件成熟时策划起义，1931 年 12 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就是典型例子。

形象宣传主要形式有：军事检阅、文艺晚会、绘画漫画、运动会等，寓宣传于娱乐之中。当时红军学校一般每 3 个月办一期，每期毕业和开学典礼，照例都在瑞金召开有党、政、军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参加的大会，会后都举行相当盛大的军事检阅，另外，召开大型会议如"二苏大"期间也有阅军活动，这些都能以壮观的场面、昂扬的气势，鼓舞人心，鼓舞斗志。文艺方面也开展得很活跃，当时红军连队设有俱乐部，1931 年冬红军学校成立了"八一"剧团，1932 年 9 月正式成立了工农剧社，1934 年初还创办高尔基戏剧学校，设有话剧、舞蹈、歌咏等专业班。每逢纪念节和重大庆祝活动都举办文艺晚会，节目有话剧、歌舞、相声、双簧等。当时中央苏区有赵品三、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石联星等艺术家，他们创作了《来学习吧》、《你是哪个部队》、《谁的世界》等大批革命话剧，时任红一军团十一师政委、军团保卫局局长的罗瑞卿同志亲自参与编辑和演出了《活捉张辉瓒》、《杀上庐山》、《庐山雪》、《谁养活谁》等剧目。《活捉张辉瓒》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连夜编排，第二天祝捷大会上就登台演出（罗瑞卿饰演蒋介石），受到热烈欢迎，俘虏们则更是惊奇不已。《庐山雪》的演出，当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等都登台自己演自己，罗瑞卿还是扮演蒋介石，[①] 这种主要领导放下架子，亲自登台亮相，宣传和激励效果是

① 参见穆静、冰如：《罗瑞卿大将》，海燕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4～156 页。

毫无疑问的。至于绘画漫画,《红色中华》、《红星》等报刊常登有美术作品,还专门出版有《红星画报》、《运动画报》等美术刊物,另外,在显眼的墙壁上到处都绘有一幅幅、一组组的宣传画、漫画,这些宣传效果也十分强烈。

宣传鼓动工作就其队伍而言,既有专业宣传人员,也有群众性的宣传人员,可以说,在中央苏区,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人人都做宣传工作,人人都是宣传员,确实是组织起了强大的群众性的宣传工作队伍。

以地方来说,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到支部的宣传鼓动干事,从文化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各县、区、乡的宣传队员,都是专门选拔的优秀分子组成的专业宣传人员。另外,中央苏区所有的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干部,上至党政军的领导人,下至乡村普通党员、一般工作干部,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和革命道理,他们以阶级觉悟、政治理论和实际行动出色地进行宣传,都是党的出色的宣传工作者。

再看看红军,在政治部下设有宣传部,直至连队都配有宣传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既要在军队内做宣传教育鼓动工作,也要向群众、向敌军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工作。同时,红军的全体指战员也都要做宣传工作。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就向工农红军提出了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在实际斗争创造了"集中以打击敌人,分兵以发动群众"的经验,通过分兵发动群众的实践锻炼,广大指战员不仅成了英勇杀敌的战士,也成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行家里手,也都是党的出色的宣传工作者。

聂荣臻同志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从1932年3月起一直担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他在总结中央苏区时期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时,谈了七点深刻的体会,概其要点:

1. 用革命理论武装红军，依靠广大指战员的政治思想、斗争信念和阶级觉悟，知道为何而战，造成压倒敌人的士气；

2. 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直接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士气兴衰的大事情；

3. 做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依靠党团支部，发动全体干部和党团员来参加，而且，干部和党团员一定要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才能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才能把政治工作做好；

4. 必须从政治上物质生活上关心群众，越是在困难时刻，越要注意关心群众的疾苦；

5. 提高部队的文化教养，发展革命竞赛，培养与发扬部队革命英雄主义的荣誉感；

6. 一切政治工作必须为着前线的胜利，武装斗争是当时党的中心工作，这也就是说政治思想工作必须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

7. 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干部必须经常注意发现好的干部苗子，推荐选拔干部、培养干部。①

总之，中央苏区时期，在党的建设中，正因为抓住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而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才使在农村环境的武装斗争中，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党员成份绝对多数的情况下，使党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党始终注意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加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从而使苏区干部军民始终保持崇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地斗争，展开了波澜壮阔的苏维埃运动。这期间，尽管党内一度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挫折，但是，从总体来说，它并没有改变党的指导思想，而且还从正

① 参见《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3～212 页。

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使更多的共产党人逐渐的更加自觉地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这一阶段与过去相比，由于我们党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由于党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因而才能够进行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①

第二节 坚持民主集中制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一、注意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根本的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内容，1927 年 6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紧急情况下适应党的斗争的需要修改了党章，将民主集中制原则正式写进了党章，“六大”党章对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了更具体的阐述和规定。

按照党章的规定，也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一个基本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成员必须由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六大党章对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的第一项规定即是，“下级党部与高级党部由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及全国大会选举之”，同时又规定了例外情况“特定指导机关”：“在秘密环境之下，于必要时，党的下级机关得由上级机关指定，且经上级机关之批准，得指定新委员加入党部委员会。”1931 年 11 月苏区党大会以前，中央苏区尚处于创建

① 参见：《〈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 年 10 月 4 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11 页。

过程中，党组织或是处于秘密状态，或是处于紧张的反“围剿”战争环境，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和领导成员的产生，在条件允许时，采用选举制，在情况特殊时，就采用任命制，有时任命制与选举制相结合。例如：红四军前委是1928年11月根据同年中央六月来信精神指定，召开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的，体现了任命制与选举制相结合，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红四军“七大”，前委委员改由选举产生，同年12月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及次年2月召开的“二七”联席会议产生的红四军前委都由选举产生。1930年8月23日成立的红一方面总前委，是由红一、三军团前委共同协商产生的。中共闽西临时特委1928年7月成立和次年3月恢复时，都是遵照福建省委的指示，特委书记也由省委指定。1929年7月中共闽西“一大”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闽西特委，次年7月“二大”改选了特委领导机关。1930年底成立的中共闽粤赣边特委（次年5月改为闽粤赣省委）也是由党代会正式选举产生的。中共赣南特委自1927年10月成立，至1930年2月“二七”联席会议止，特委几经破坏，特委书记或因被捕牺牲，或因工作调动，前后换了8名，其中有2次由党代会选举产生。中共赣西特委1927年10月成立，几经变故，于1928年6月恢复，次年3月召开党代会，改组了特委，9月又举行二次全会，再行改组特委。1930年2月，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军五、六军军委在吉安陂头召开联席会议（即“二七”联席会议），决定中共赣西、赣南和湘赣边特委合并，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委，同年3月下旬召开了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赣西南特委领导机关和领导成员，8月召开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按照“立三路线”改组特委，10月将赣西南党、团特委合并，成立江西省总行委，1931年1月总行委撤销后，成立中共赣西南临时特区委，由苏区中央局指定领导成员。1931年5月《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在谈到苏区中央局与地方党组织关系时提出，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

一般地都要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同年 11 月初召开的苏区党大会更明确提出："要适当的推行党内民主化来消灭委派制度的残余"，"一般的情形，以后地方党委员会和红军各级的党务委员会的产生，非在特别情况下，均须由党大会或代表会议产生，经上级党部批准。"① 大会同时强调，民主化的推行要依据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要防止一切极端民主化和超越组织的政治自由的倾向。从这以后，中央苏区进入巩固发展的阶段，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非在特殊情形之下，一般都由选举产生。当然，以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党内民主还体现在一个领导集体能够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作出重要决定时能够充分酝酿，反复协商，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要克服非组织意识，纠正少数不服从多数的现象，其方法是："(1)会议上要使到会人尽量发表意见，明了对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调和敷衍下去。一次不能解决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期于得到明晰的结论。(2)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应在党的第一次会失败之后，下一次会议未开之前，必须拥护多数的决议，除在下一次会议得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②

毛泽东在领导开创中央苏区的斗争中，一切重大决策都是通过以上原则作出决定的。比如：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的建党原则和建军纲领。此前红四军党内泛滥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在毛泽东与朱德之间对建党建军问题出现较严重的分歧和争论，红四

---

① 《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1931 年 11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73、474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 年 12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04 页。

军党的“七大”后，前委及时向中央寄送了“七大”的决议及有关文件，并派陈毅专程赴上海向中央作口头和书面的详细报告，中央先后发出了“八月来信”和“九月来信”，特别是收到“九月来信”后，红四军领导深入学习领会，陈毅还致信中央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随即在长汀召开前委会议，决定以一个月时间休整，并贯彻中央“九月来信”，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在军事、政治与党务方面作全面的整顿。接着在连城新泉进行了为期10天的政治军事整训，同时在党内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在党内作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为大会准备各项决议。正是由于能够充分酝酿，集思广益，特别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主要领导同志在政治上达到一致，才有了古田会议这一伟大决议，正确地确立了建党原则和建军纲领。

再如“诱敌深入”这一反“围剿”战略方针的确立。1930年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撤离攻打长沙以后，围绕着是先攻打中心城市，还是先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以包围中心城市的问题，出现了激烈争论，为此先后在袁州、峡江、太平圩等地召开总前委会议讨论军事行动方针，会上虽然有分歧甚至还很尖锐，但毛泽东等同志采取耐心说服的办法，争取了多数，并在行动上终止了北上南昌、九江的计划，从而实质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关于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方针的执行。至10月底又在新余县罗坊园前村召开了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当时奉调入赣的国民党军队，已从北部、西部构成了以南昌为核心的对红一方面军的半包围圈。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退却到根据地内，依靠苏区人民击破“围剿”，但是，红三军团一些干部持反对意见，有的主张主动出击，在赣江西岸挫败敌人“围剿”；有的主张一、三军团分布在赣江东、西两岸夹击敌人；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诱敌深入”会给苏区人民造成危害，也极力反对。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朱德、彭德怀、周以粟、黄公略等同志支持毛泽东的主

张，也一道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特别是彭德怀为说服三军团干部做了大量工作，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于10月30日作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次日即发布了退却令，从而奠定了以后几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总之，毛泽东在主持红四军前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期间，经常召开前委和总前委会议，凡属重大方针政策及战略策略问题，大都由集体讨论作出决定，有时还召开扩大会议和联席会议，吸收军内更多的同志或红军所到之处地方党组织的同志参加，广泛听取意见，共同商讨问题，即使出现分歧乃至激烈争论，也是采用耐心说服的办法来求得认识提高和行动一致，因此，从总体上说，比较自觉地实行了集体领导的制度。

当然，中央苏区也有一些领导机关由于各种原因集体领导方面做得较差，党委会议不能经常召开，党委工作有时是书记一人唱独脚戏，1930年初赣西南特委即属这种情况①，此间闽西特委也因常委不健全(5人缺3人)不能开会，阻碍工作很大②。1931年秋冬卢德光任闽粤赣省委书记时，"没有经常开会讨论工作，多由书记或秘书个人包办"，"书记专政的现象，表现特别严重"。③苏区中央局刚成立的头几个月，毛泽东、朱德各负重要职责，无暇过问，组织部、宣传部也只是无人负责的空名，实际上只有项英一人看守，虽

① 参见《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3页。

② 参见《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1930年2月28日)，同上书，第587页。

③ 参见《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第二次全省大会党的建设问题》(1932年3月1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3页。

然在项英主持下较好地处理和解决了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但就党的领导制度来说，则是不正常的。

苏区党大会批评了这种指导机关不健全，一切工作多半是集中在书记一人身上，缺少集体领导和巡视工作的不正常现象，强调要健全党的各级委员会。大会指出："要最高限度提高这些党部的积极性和实际工作的效能。各级委员会必须有经常科学的分工建立各部的工作。要消灭一人包办一切的手工业家长式的工作方式，取消秘书长制度。要肃清党内的一切不经过正当组织上的超越组织的只信仰个人的现象。"① 1933 年 5 月，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任弼时在闽赣两省组织会议上，又强调了要建立集体领导，他说："以后省县区领导机关必须立刻的形成集体的组织和领导，要保障各部各委工作的建立，一切重要问题都应经过正式会议讨论解决，不仅各级委员会的常委要订出每月会议的主要议程，按期开会讨论，就是各级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也需按期召集，消灭过去除常委委员参加工作，其他委员只是挂名而不召集会议的现象。"②

苏区党大会后，党的集体领导从某些方面来说有所加强，但随着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路线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集体领导制度又被破坏了。

二、反对极端民主化，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党内生活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是民生和集中的辩证统一。我们说中央苏区时期注意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这并不是说党内民

---

① 《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1931 年 11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72 页。

② 任弼时：《目前党组织上的中心工作》(1933 年 5 月 7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67～668 页。

主已经很健全，很完备，这只是相对而言，只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一些党组织及其领导成员尽可能地发扬了党内民主。实际上，当时党处于农村环境，又处于战争和秘密工作时期(1931 年 3 月以前，中央苏区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党组织都处于秘密状态，此后仍有部分党组织属于秘密的)，在这种条件下，充分的党内民主并不具备客观条件，虽然如前所述尽可能地发扬了民主，但实质上更多的则是强调集中，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这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完全是必要的。

党中央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为适应秘密斗争的需要，就强调全党要强化集中。“八七”会议批评各省委犯了不集权化的错误，指出：“现时秘密状态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但是集权制度不应当变成消灭党内的民权主义。”① “六大”党章还特别强调了对党的决议的“无条件的执行”，党章指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应无条件的执行，即或某一部分的党员或几个地方党组织不同意于该项决议时，亦应无条件的执行。”② 为贯彻执行“六大”决议，1928 年 11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体同志书》指出：要坚决肃清当前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③

中央苏区党内生活中极端民主化现象也时有发生。例如：1929 年春吉安东固区委擅自“宣布特委十一罪状”，削弱指导机关的权

① 《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5 页。

② 《中国共产党党章》(1928 年 7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70 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 页。

威，破坏党的严密组织及集中指导的原则。[①] 闽西党组织也曾一度出现“党的组织太松，纪律破产”的现象，主要表现有：同志散漫，不服从组织分配，泄漏秘密，讨厌开会，不交党费；各处负责的及政府工作的同志多数不参加支部会，其他同志也不敢批评；同志有相互包庇，朋比为奸的现象等。[②] 在红四军党内，也有一些人主张“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党内生活存在非组织意识，即非少数服从多数，党内批评变成攻击个人，一部分党员特殊化，不过组织生活；甚至出现前委作出决定得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一极端民主化的现象。这些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意识，造成了党内纠纷，削弱了领导机关的集中和权威，尤其是红四军前委白砂扩大会议和红四军党的“七大”出现的严重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这些事实更充分说明了反对极端民主化，强化集中意识的重要和迫切。

红四军党内出现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929 年接连发来了“八月来信”、“九月来信”，特别是“九月来信”强调了“集权制问题”，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③]

根据“九月来信”精神写成的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案，更是强调要根本肃清极端民主化的思想。一方面，“是从理论上扫除极

---

① 《江西省委通告》(1929 年 6 月 17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37 页。

② 《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1930 年 2 月 28 日)，同上书，第 581 页。

③ 《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指示信》(1929 年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86 页。

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斗争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必然的走到革命的失败，同时亦就是帮助了统治阶级反革命寿命的延长。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小农生产及城市小资本）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根本不相容的，客观上实在是反革命思想的一种。具有这种思想的人，若不努力纠正，任他发展下去，必然的要走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

另一方面，“是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 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白下级机关的情况，及群众生活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社会来源。

3. 党的各级机关决定事情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便须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及党员群众，其方法就是开活动分子会，或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查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及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他执行的办法。”①

古田会议以后，红四军党内采取种种措施肃清了极端民主化的思想，在组织上，在领导工作中，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着重强化

①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803～804页。

了集中，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从而保证了指导机关的权威，巩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高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

同时，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也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和古田会议的精神，开展了反对极端民主化的斗争。中共赣西南特委在纠正极端民主化现象的过程中，“一方面把党的政策交组织讨论，一方面指出极端化之破坏组织的反革命性，一方面下层组织负责人选举产生，一方面在会议上指出某些犯了此一毛病的同志的工作之错误，交党员批评，经过一个形式上的纠正，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已渐次减少，而努力于政治观念的斗争了。”①

1930年12月，中央苏区发生了富田事变的严重事件，1931年1月16日，即苏区中央局成立的次日即发出第2号通告《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作出正确处理。但是，当时赣西南许多县、区党组织却违背中央局决议，依然在文件上写着“AB团取消派富田暴动”，或只以富田事变来肯定“某某是AB团取消派”，此外还有许多党部及党员个人对富田事变发宣言，发通电，这是党内从未有过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2月19日苏区中央局又发出第11号通告，指出：“某个党员关涉到某一问题或接受处罚时，则只有向党作申明书，申述他个人对这一问题的意见。若因党内问题发宣言发通电，这是波尔什维克党内所绝对不允许的。”通告还强调：“民主集中，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决议，统一党的宣传和工作，这是波尔什维克的党组织精神。因此下级党部绝对不允许有离开党的决议的言论和行动。至于下级党部不同意上级决议时，除一方面仍然执行上级的决议外，他方面可以将意见提向上级党部，在未得到上级决定时，依然要执行上级的决议。这是波尔什维克党最低限度的组织原则，因为这样才能有党的一致，党的领导，才能使党的正确决议普

① 《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1页。

遍的实现，才能巩固党在革命中领导力量。”①

总之，在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各级党组织既反对了极端民主化，又注意充分发扬民主，同时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又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高了党的战斗力，领导和推动了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的深入发展。当然，中央苏区时期在这方面也有深刻的教训，既犯有过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更有“左”倾领导者的专断统治，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肆意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最终摧毁了中央苏区，被迫长征。

三、严紧党的纪律，严格地执行纪律

中国共产党是根据党的纲领，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整体，加强纪律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对党的纪律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从党的“二大”制定第一部党章到“六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每部党章都把党的纪律作为专门的一章加以规定。1928 年 7 月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严格的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不执行上级党部的决议和犯了党内认为有错误的其他过失，应由相当的党部予以纪律上的处分。”② 党章规定了纪律处分的具体方式，对犯有错误的党组织的处分为：指责、指定临时委员会、解散组织和党员重新登记。对党员个人的处分为：各种形式的指责、警告、公开的指责、临时取消其党的重要工作、予以相当时间的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同时规定，纪律处分由党员大会或各级党部执行，各级委员会可以成立特别委员会以预先

① 《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十一号——纠正各级党部执行中央局决议的错误》(1931 年 2 月 19 日)。

② 《中国共产党党章》(1928 年 7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80 页。

审查违犯党纪的问题，开除党籍则由支部党员大会通过，经党的上级委员会批准，方发生效力。

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在党的纪律建设中，曾经历了一段曲折过程。与曾经一度出现极端民主化现象一样，中央苏区党内生活也曾出现纪律松驰，执纪不严，甚至"纪律破产"的现象。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案指出：红四军党内"一般的纪律松懈，特别在负担重要工作没有人代替的情况，对他所犯错误，往往敷衍下去，不执行纪律。对一人如此，对他人亦不得不如此，因此把纪律一般的放松了"。对此，决议案强调：今后要"严格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①] 闽西党组织1930年曾出现"党的组织太松，纪律破产"的现象。红四军党的"九大"以后，各地在强化集中指导的同时，也强化了严格执行纪律。但是，在严格执纪的过程中又出现另外一种偏向，即犯有惩办主义的错误，有的不分所犯错误的性质与程度，就予以开除党籍，有的甚至处死。比如对江西省委派往赣西的巡视员江汉波开除党籍的处分。江汉波在1930年2月"二七"联席会议前后，反对攻打吉安及没收一切土地平分，在建立新编第六军、成立赣西苏维埃政府及湘赣边特委与赣西特委合并等问题上也持反对意见，联席会议决定开除其党籍，同年4月4日红四军前委在其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江汉波尽管犯有错误，但工作意见分歧和思想认识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党内充分讨论和思想斗争来解决，或给以党内严重处分亦可，开除党籍显然失之过重。"二七"联席会议还决定处决"四大党官"（郭士俊、罗万、刘秀启、郭象贤），他们都是赣西地方武装或党组织的负责人，他们有的主张"反对抗租抗债"，"同志的租债不准抗"，还请求上级批准其

①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12、813页。

"保护同志的产业"的决议，有的主张"收的土地要分配同志"，甚至有要取消"雇农工会"的，结果被以地主富农分子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犯判处死刑，对此，"群众党员均大多数生疑"，"在解决四大党官后，好多同志调不动工作，因一调工作即怀疑自己有错误是受处分，还有一原因是各级党部都没有说服精神，同时又是加紧富农斗争的时期，把开除的反动富农来枪决"，一时间在赣西南造成了"党内的赤色恐怖"①。闽西一些党组织也程度不同地有此现象，"不能运用纪律，只晓得用惩办法，致纪律失却效用，有些地方还造成党内恐慌、负责同志开口便说要枪毙、开除。"②

但是，在这期间中共闽西特委对傅柏翠的处理则是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纪律。傅柏翠1928年领导蛟洋暴动时，不接受上杭县委立即领导农民烧田契的意见，1929年7月在中共闽西"一大"上受到批评，他拒不接受，以后又在上杭古蛟区实行"公田与共家制度"，影响土地革命进行，再次受到特委的批评，此后他便借故长期在家，一再拒绝党组织分配的工作，也拒不参加党的会议。为了纠正他的错误和维护党的纪律，特委第一、三、五次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并于1930年4月27日致信其本人，希望他改正错误，同年10月特委又作出留党察看处分，12月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成立后，见于他的分裂行动，作出决议开除傅柏翠党籍，撤销他担任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可以说，对傅柏翠的批评处理，既维护了党的纪律，也给了他本人改正错误的机会，同时也教育了同志。至于后来派红军围攻其家乡古蛟区，迫使傅柏翠拥兵自守，最后脱离了革命队伍，以后"肃社会民主党"时，又把他当作"社民

① 参见：《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6页。

② 《中共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1930年2月28日)，同上书，第581～582页。

党"的首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①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各级党组织在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中提出，既要严格执行纪律，又要防止惩办制度，要把执行纪律同教育同志，自觉维护纪律结合起来。闽西特委提出："执行铁的纪律是布尔什维克党组织重要原则之一。这里应注意的：第一，执行党的纪律要站在教育同志观点上不可专以惩办制度。第二，纠正过去只有上级党部才能执行纪律的错误，党纪要在支部中执行。第三，坚决地洗刷动摇、腐化、怠工等不坚决分子出党。"② 1930 年 10 月 13 日，赣西南特委召开组织问题会议，会上有的同志说："党的纪律，一定要执行教育，一定要使同志了解而自动的执行。同时要以这一同志的错误来教育全党，党过去杀一千多 AB 团，内中一定含有许多可以教育过来的。"有的说："纪律问题不仅是处罚，一定要有教育的意义，若用红色恐怖则群众不是反抗，便是消极害怕，打屁股更是农民意识的反映。"有的说："党内斗争问题，要在斗争中来教育同志，防止过去洗党开除的危险，注意教育问题。"有的提出："党没有杀人纪律。"③ 这些从深刻的经验教训中提高的认识，对于正确的执行纪律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

1931 年 11 月，苏区党大会也提出，必须严紧党的纪律，防止忽视纪律和惩办制度的不正确倾向。大会指出："严格执行党的铁

---

① 傅柏翠脱离革命队伍后，曾接受国民党委任的（上）杭、（龙）岩、连（城）边界保安总队队长职务。中央红军长征后，为保存实力，他同红军游击队保持一些关系，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1949 年 5 月，率所部 3000 余人起义，重新回到革命队伍。

② 《闽西特委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1930 年 8 月 25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21 页。

③ 《赣西南会议纪录——关于组织问题》（1930 年 10 月 13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31、632、633 页。

的纪律，是严密并巩固党的组织，提高党在群众中威信的方法。现在在各级政权机关红军及各种群众组织中，多半是党员担负着最重要的工作。为要保障这些同志真正成为群众中的模范者，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党必须严格的执行纪律。”“在严密党的纪律当中，必须防止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产生。第一种，就是假借说服，要防止惩办制度，或是因为感情关系而放松纪律的执行，以致走到根本忽视党的纪律。第二种就是完全不用说服的精神，采用机械的或过分的施行纪律的惩办制度，这种惩办制度的结果，是足以妨碍干部的培养，减弱党员积极性发展的。”① 这次大会以后，中央苏区党的纪律建设走上了更加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党的纪律建设中，各级党组织还提出执行纪律必须同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相结合。1931 年冬，中共红四军军委提出：在讨论对党员的纪律处分时，“被处罚的同志一定要他到会，并且首先由他说明事实的经过，才来讨论与决定。同时在未决定之先，应准其尽量申辩，以便引起一般同志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同时还提出：要“反对对特殊化党员纪律的让步”，对“被处罚的同志，要经常注意他的个别教育与实际工作的分配和检阅”。② 当时红军中规定：对一般同志的警告处分，由支部决定；严重警告经团委（总支）作最后决定；留党察看须经党委决定；开除党籍须经军团党委决定。而且无论何种处分，都得由犯错误党员所在支部整理材料，提出处理意见，然后逐级报告。地方党组织对党员的处分，也有相应的手续和程序规定。1933 年 9 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决议规定：支部对所属的党员，区委对所属的支部或党员个人，认为有处分之必要时须决定

① 《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央苏区代表大会通过》（1931 年 11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77～478 页。

② 中共红四军军委《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1931 年冬。

其处分，不服者得分别向区委、县监察委员会上诉，区委或支部收到申明不服处分的意见，无论是口头或书面的，即须转送县监察委员会。支部决议开除党员的党籍时，须遵守党章规定报区委批准，区委仍须附具批准理由，报告县监察委员会备案。①

加强监督，也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了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的发生，1933 年 9 月党中央作出决议，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并规定其职责为："在以布尔塞维克的精神，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正确的执行铁的纪律，保证党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监视党章和党决议的实行，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② 中央苏区对党的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一直以来就有党的组织监督、群众监督，在政府方面，有工农检查部、审查委员会等专门机关的监督，《红色中华》等报刊经常以大量篇幅宣传颂扬廉洁、节俭模范，曝光鞭鞑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违纪行为，开展了有效的舆论监督，对加强党的建设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 1932 年春起，红军中师以上设立了党务委员会，承担党内监察的职责，1933 年冬以后，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央苏区所辖省委、县委都相继成立了监察委员会，1934 年 1 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成立了中央党务委员会。这样，党的各级纪律监察机构便逐步建立健全起来，有利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可惜的是，这时王明"左"倾路线在

---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1933 年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41 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1933 年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40 页。

中央苏区的统治也达到了高潮，党的铁的纪律只能为其推行“左”倾错误路线服务，终至断送了中央苏区。

第三节 密切联系群众 讲究工作方法

一、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

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我们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941年毛泽东在谈到“关于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个问题时指出，“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①] 可以说，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得到最广泛的发挥和全面深入的运用，首先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央苏区的斗争实践中。

在中央苏区激烈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党首先深切地认识到了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依靠人民群众蕴涵的伟大力量，开展了大规模的人民战争。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共产党员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参谋部，每个共产党员对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深刻，随时都要叨念“争取群众”。[②]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更深刻地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

---

①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2页。

② 转引自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载《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够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大革命时期相比，我们党在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方面，无论从理论上或实践上，也无论从广度上或深度上，都取得了极大的飞跃，围绕着革命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展经济，扩大红军，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真正是党密切联系群众，开展了一场广泛的人民革命战争。

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也就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党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就是从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入手，来打破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民群众翻身作主人，使人民群众从党的政治纲领中，从获得的切身利益中体会到了党是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从而坚定地跟党走，积极投身到保卫自己胜利果实的革命战争中去。反映和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奋不顾身，艰苦奋斗，这正是党能够密切地联系群众的根本所在。

党密切联系群众，还从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着手。毛泽东在领导创建人民军队时，曾经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根本点就是以坚持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密切红军与群众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红军艰难奋战，所以能得到苏区群众广泛的拥护，不断发展壮大，其中重要一点也正是严格坚持了群众的纪律，切实维护群众的具体利益。比如：1929 年 2 月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时，途经瑞金县大柏地，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许多群众都跑上山去了，当时红军手中没钱，吃了老百姓的东西就写下借条，答应到时候再

①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 年 1 月 27 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6、139 页。

还。同年5、6月间，红军从闽西回到大柏地，毛泽东说：我们上次在这里打战借了老百姓很多东西，这次一定要偿还。于是，分头向群众作宣传，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然后由群众自报，报多少偿还多少，大柏地群众高兴地说："从来没有听见过军队还钱给群众的事"，"红军真好！"这样，我们就进一步争取了广大人民群众。① 据当时红军宣传员张志辉回忆，当时红军到了敌占区，一方面是进行社会调查，召开群众大会讲清穷人是受地主老财压迫剥削而受苦，共产党领导穷人翻身，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另一方面是靠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事实来打破国民党的反动欺骗宣传，教育了群众。当时宣传员还有一件具体事情，部队宿营走了以后，宣传员就检查：门板上了没有？稻草是否捆好送好了？地扫干净了没有？老百姓有没有受到损失？菜盆碗筷是否少了？少了就赔钱。② 在中央苏区的斗争中，正是共产党和红军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广大干部，通过点点滴滴的具体行动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使得人民群众坚定地跟党走，建立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还要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③ 他还说，这决不是有些同志认为的是"右"倾，相反的，如果不能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经济得不到发展，工农生活就不能改良，这势必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个基本路线，影响到扩大红军及动员群众参加

① 宋裕和、肖克：《大柏地战斗前后的情况》、《向赣南、闽西进军和第一次反"围剿"》，载《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131页。

② 张志辉：《回忆红军的宣传工作》，同上书，第209～211页。

③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革命战争的工作。因此，他又说："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① 可以说，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既是党为之奋斗的目标要求，也是密切联系群众，巩固工农联盟，为革命战争打下坚实物质基础的客观需要。

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同时还要关心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② 事实正是这样，当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遇到困难时，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就领导农民解决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帮助群众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耕田队、互济会以及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以便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克服具体困难。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表扬的兴国长冈乡和上杭才溪乡苏维埃干部，就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模范。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特别是他所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生动详细地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对于红军家属则更给予优待，帮助克服具体困难。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发出优待红军家属的号召，党和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礼拜六、礼拜日就轮流帮助红军家属做工，

①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②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具体到砍柴、割草、挑塘泥、下肥料、犁耙田等，时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还亲自帮助红军家属砍柴。[①] 由于党和政府切实关心群众，因此也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爱戴，群众发自内心地说："共产党真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正是由于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利益，苏区人民群众也才真心实意地拥护苏维埃。每当苏维埃政府为筹措经费发行公债时，苏区群众就踊跃认购，1933 年底为争取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央政府号召每月节省二十至三十万经费，生活艰苦的苏区广大群众也积极响应，造成热烈运动，仅自动退还公债、退还借谷票，就达一百万元以上。[②] 据毛泽东当时调查，长冈乡每百名青壮年男子有 80 个当红军，才溪乡每百名青壮年男子有 88 个当红军。[③] 另据统计，当时赣南苏区总人口约 220 万，其中青壮年男子 50～60 万，但前后参加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的就达 30 余万人，为革命牺牲者 108200 余人，其中兴国县苏区总人口 23 万余人，革命烈士就有 2300 余人；瑞金县总人口 24 万人，革命烈士有 17200 余人。这就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同时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真心实意拥护的必然结果。

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勤俭节约，反贪倡廉，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创一等，这是中央苏区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的基本作风。

1929 年 1 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游击，在敌人轮

---

① 参见《红色中华》第 161 期，1934 年 3 月 13 日。

② 《节省经济与开展反浪费斗争》，《红色中华》第 132 期社论，1933 年 12 月 5 日。

③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7 页。

班追堵，天天急行军，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未化，困苦不堪的条件下，红军仍一边打战，一边做群众工作，一边打土豪筹款，行军40天至东固休整时，红军由出发时的3360人，只少了60名。[①] 陈毅对此评论说：红军"仍能一致团结奋勇直前无怨言，从未发生叛变逃跑等事，足以此打破集团军事行动之空前纪录"。[②] 可见，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一支能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队伍。第二次反围剿时，红军经济上发生困难，部队动员有钱的官兵捐钱，有个炊事员捐了上百块银洋，时任三十四师副官处处长兼教导队政委的赖毅同志捐献了打仗时得到的一枚金戒指。当时，毛泽东同志提出，没有钱机关就不发办公费，没有粮就向老百姓借，没有饭吃就吃两餐，锅巴用来煮稀饭。这一主张传达到支部，为广大指战员们所接受和拥护。大家自己砍柴烧，扒竹笋、拣田螺、抓泥鳅当菜吃；晚上办公点松光；为节约用纸，一张纸先用铅笔写，后用墨笔写，正面不能写了就翻过背面写。[③] 红军就是以这种不畏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英勇作战，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红军是这样，地方党组织也是这样。1928年夏秋，赣南特委和于都县委驻在富堂坳村，为防止敌人袭击，他们白天在厕所楼上办公，晚上就住在山坳或山窝的水塘边鱼棚里，过着"天当房，地当

---

① 刘型：《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载《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118页。

②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55页。

③ 赖毅：《从井冈山到赣南》，载《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床”的艰苦生活，但忠于革命却矢志不移。[①]1929年初，中共安远县委罗贵波、杜承瑜、魏宗周等人，靠砍柴烧炭卖维持生活，秘密开展工作，红四军来时，他们还派代表前往迎接，并向毛泽东、朱德通报敌人尾随合击的紧急敌情。同年2月间，彭德怀率红五军攻占安远县城，他们与红五军接上头并汇报情况，彭德怀当即命令拿出收缴的二三十两鸦片烟和二百元现洋作工作经费，杜承瑜只拿了鸦片烟却退还二百元，他说：“砍柴烧炭卖，可以勉强维持生活，现洋留着给你们作军费，鸦片烟卖掉之后，买个油印机和救济几个死难同志的家属。”几十年后忆起，彭德怀仍然感叹：“他们的艰苦卓绝，真是令人感动。”[②] 这就是在困难面前仍然挺直腰杆的苏区党员干部的精神风貌。

中央苏区地处经济落后的赣南闽西偏僻山区，又处于战争年代，生活自然十分艰苦，特别是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造成了苏区粮食、布匹紧缺，食盐、药材匮乏。当时粮食紧缺，为了支援前方作战，党政机关的生活就比野战部队和群众更艰苦，经常是一天吃两顿饭，而且还是半饱半饥，工作到近午或深夜肚子饿得发慌就以水充饥，又继续工作。布匹匮乏，衣着单薄，寒冬腊月常常难以御寒，睡觉只能和衣而卧。食盐紧缺，当时苏区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因此，大家只好用香干、萝卜水、醋坛水、辣椒干代替食盐煮菜，或者收集老墙土、地脚泥放在锅里熬制出又苦又涩的硝盐。1934年以后开展了熬硝盐运动，每个村办上几个盐场，每个盐场一月也只能熬出四五斤盐，吃盐的艰难可想而知。药

---

① 叶辉瑞：《记赣南特委在步前二、三事》，载《回忆中央苏共》，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

②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126页。又参见罗贵波：《赣南初期革命活动的点滴回忆》，载《回忆中央苏区》，第26～27页。

材更是缺乏，伤员只能用光洋封伤口，用南瓜瓤敷伤口，拿被单消毒后剪开作敷料，许多伤员因此而造成严重感染，不得不截肢，甚至死亡。第三次反"围剿"以后，国民党更是采用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经济上更加残酷封锁，无论白天、黑夜，或水上、陆地，都有巡逻兵、流动哨，暗探四处活动，还实行保甲连环，对群众严密控制，到处张贴布告，严禁商人与苏区通商，对盐、布则实行专卖，对西药材控制更加严格，如食盐规定每人每月只供六两（十六两为一斤），抓住私运盐、布、西药材的人，轻者没收物资，剃眉毛，罚苦役二三年，重者则以通"匪"杀头示众。①

国民党加紧经济封锁，军事"围剿"，在苏区周围建立起一条纵深260里的封锁网，妄图消灭红军，摧毁中央苏区，但是，中央苏区的党员干部同军民一道，依靠昂扬的革命斗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众志成城，克服了困难，战胜了困难，开辟和巩固了中央苏区。

当时，苏区的党员干部战士都把一腔热血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大家都没有薪金（外籍战士有适当补助，1933年底为节俭经费也自请不发），只有少量的伙食尾子。为了克服困难，节俭经费，1932年2月17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帮助红军战争，实现节俭经费运动》的通令，要求各级政府立即开展节俭经济、制止浪费运动，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红军长征。1933年冬以后，国民党加紧第五次"围剿"和经济封锁，苏区经济越加困难，节约粮食，节省经费，更是形成广泛热烈的运动，当时《红色中华》每期都有大量开展节省运动的报道，既大力宣传节省经济的模范，也大量曝光浪费的事例。"一切为了前线"，"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这是中央苏区提出的响亮口号。为了实现节约，支援前线，中央机关成立了"中央政府节约经济委员会总会"，一些地

① 参见王贤选、何三荀：《中央苏区反经济封锁的片断回忆》，载《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8～389页。

方成立了分会，许多当地苏区干部都自带大米办公，甚至连伙食费也不要公家发，各机关自己开辟菜园子。为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1933年底，中央政府号召每月节省二十至三十万元经费，12月2日第131期《红色中华》发出《本报号召苏区革命群众实践六项节省规约》：(一)每天节省一个铜片；(二)不进馆子不吃小食；(三)节省办公经费百分之三十；(四)普遍建立节省箱；(五)每伙食单位建立一个菜园；(六)残酷的开展对一切浪费的官僚主义者的斗争。中央政府和《红色中华》报社号召发出后，各级机关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纷纷响应。苏区群众自动退还公债和借谷票达到一百万元；红军指战员节省伙食和零用，外籍战士请求不发红军公款钱；江西贫农团号召会员节省一角或二角；江西有些县苏工作人员自带伙食一月或二月。[①] 中央政府各部热烈讨论并一致通过了《红色中华》六项节省规约，还提出了节省的具体办法，如每月只吃九分钱伙食，不办公时三人用一盏灯看书报，利用油印废纸来起草文件，凡不需写小字的都用差等笔，等等。上杭县苏全体工作人员热烈响应号召，一致决定每人每天节省一个铜片，并讨论自己种菜，不吃零星东西，不吃酒不吃烟等。才溪苏区委及各机关团体提出开展一切节省，反对一切浪费，集中一切经济，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并要求要增建菜园子使完全不买菜吃，全体工作人员自带五天伙食和不发五天伙食尾子，把节省的伙食费用以优待红军家属。[②] 在前段时期节省经济的基础上，1934年3月13日，《红色中华》又发出号召：“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并提出了九条具体的节省办法，陈云、博古、邓颖超、罗迈、陆定一等23位从白区到苏区工作的同志联名致信《红色中华》：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战，不要公家发热天衣服，留给新战士穿。中央各部也纷纷登

① 参见《红色中华》第132期，1931年12月5日。

② 参见《红色中华》第139期，1934年1月1日。

报响应：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米，油菜钱由4分减至3分，不要公家发夏衣……据中央审计委员会检查，中央各部三月份实际开支，比二月份节省2962.66元，约减少50%。①

中央苏区民众传唱着一首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是苏区民众发自肺腑的对苏区干部好作风的颂扬。在中央苏区艰苦的斗争中，由于广大党员干部具有牢固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坚定的为人民翻身解放的革命信念，由于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由于建立了一整套精干、高效的党政机关，也由于有一套专门机关铁面无私的检查监督和舆论阵地公正的批评督促，从而有效地确保了苏区干部的优良作风，使得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廉洁奉公，无私奉献在中央苏区蔚为风气。

三、深入调查研究，讲究工作方法

要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要团结和动员千百万群众，要解决问题，完成各个时期的每一项工作任务，不仅要有正确的路线和策略，还要注意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讲究工作方法与完成工作任务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讲究工作方法是解决矛盾的重要前提，是完成任务的途径和手段。在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因为广大党员干部能够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因而使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取得了伟大胜利，也因为一度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盛行，而最终断送了中央苏区。

关于讲究工作方法与完成工作任务的关系，毛泽东曾作过精辟的阐述，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

① 《红色中华》，第175期，1934年4月14日。

只是瞎说一顿。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其他如查田工作、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区边工作，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①

深入调查研究，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这就是毛泽东一贯强调和倡导的工作方法，也是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普遍倡导和厉行的工作方法。

从广义上说，调查研究也是一种工作方法。针对党内存在着浓厚的教条主义思想，以及把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和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的状况，1930 年 5 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原题为《调查工作》，1964 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取名现题目），从认识路线、思想路线的高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工作方法的角度来分析，文章批评了许多巡视员、领导者和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的现象，并说"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文章提出，正确的方法是，要解决问题，甚至是解决困难问题，那就迈开你的双脚，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或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这样，"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或者说，"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因此说，"调查就是

①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 年 1 月 27 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9～140 页。

解决问题。”① 毛泽东不仅倡导调查研究，而且总是利用战争和各种繁忙工作的空隙时间，进行大量的调查，在中央苏区时期，他所作的有记载的农村调查就有：1930 年 5 月初的寻乌调查、10 月的兴国调查、11 月上旬的东塘村等地的调查、11 月下旬的木口村调查、1933 年 11 月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调查研究使毛泽东获益匪浅，他后来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而对于“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② 通过长冈乡、才溪乡调查，毛泽东以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很忙，没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认为搞经济建设是“右倾”的观点，他说：“这样大数量地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像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③ 他还说：“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④ 毛泽东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当时曾被少数“左倾”教条主义者讥为“狭隘经验论”，对此，1941 年他说：“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

① 《反对本本主义》(1930 年 5 月)，《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0 页。

② 《关于农村调查》(1941 年 9 月 13 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2、23 页。

③ 《才溪乡调查》(1931 年 11 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42 页。

④ 《长冈乡调查》(1931 年 11 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87 页。

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① 因此，他大力强调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毛泽东亲自深入调查研究，也极力推动党内的调查研究工作。1929 年 7 月，他在上杭县苏家坡养病时，指导了中共闽西“一大”的工作。7 月 10 日各县代表已到会，但毛泽东发现到会代表对实际情况并不明了，他指示代表回去从事一星期的各项调查，内容包括土地、政治、党务、群众武装与政治组织、物价、洋货侵入与工农业破产等，由于全面掌握了实际情况，使大会制定出了比较正确的政治路线，有力推动了闽西革命斗争。② 1930 年，毛泽东还为红四军政治机关制定了详细的“社会调查提纲”，用红、绿、黄纸印成小本子，每个宣传员人手一册，具体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各细致的项目。③

调查研究是一种工作方法，确切地说，它还只是为解决问题，完成任务提供了一把钥匙，对于具体的工作仍然还需具体的工作方法。1933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 17 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的长篇报告讲话中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运动，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的领导方式不对，不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使我们各项工作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不

---

①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序言二》(1941 年 3 月 17 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7 页。

②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情形》(1929 年 7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2 页。

③ 吴德华：《关于“社会调查提纲”的回忆》，载《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7 页。

能在今年秋冬和明年春夏完成中央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整个计划。”[①] 同时，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具体工作方法，这里虽然主要就经济建设而言，但抽去其具体内容仍具有普遍意义。这些方法是：第一，从组织上动员群众。各级领导同志要把各项工作经常放在议事日程上去讨论，去督促，去检查；要领导和推动群众团体去发动组织群众；要召开群众大会做具体的宣传。第二，动员群众的方式，要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做一切动员工作，就是说，要采取群众化的方式，要反对官僚主义。第三，要把在斗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群众，涌现出来的无数干部组织起来，训练起来，送到各项工作的第一线上去。第四，要围绕和服务于中心任务，把各项工作全面推开，抓实抓好，这样做好了，胜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

1934 年 1 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表扬了兴国、上杭、长汀、永定、瑞金等一批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模范单位，他还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会上，毛泽东还把长冈乡、才溪乡两个模范乡的先进事迹印成小册子，分送大家作为学习材料。他要求，“大会以后，我们一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先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从这些阵地出发

①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 年 8 月 12 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3～124 页。

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①

总之，在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事业而艰苦奋斗，注意工作方法，密切联系群众，因而培养了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血肉联系，形成了任何反革命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奠定了党走胜利的光明之途。

①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141页。

后 记

本书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央苏区历史研究”课题成果之一。其写作酝酿于1995年底。当时，福建省龙岩地区（今龙岩市）老区建设办公室主任马先富同志提出编写一套全面反映中央苏区历史的专著，这个计划得到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孔永松教授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蒋伯英教授的赞同。随后成立了由中共龙岩地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龙岩地区行署老区办、财政局、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龙岩军分区和厦门大学、福建省委党校等单位的有关同志组成的编委会。经协商决定，由孔永松教授负责组织撰写《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史》三本专著；由蒋伯英教授负责组织撰写《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中央苏区军事史》、《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三本专著。这套专著由孔永松、蒋伯英、马先富三位同志担任主编。

1996年3月和1997年4月，编委会在龙岩先后召开了两次工作会议，在编写的指导思想和有关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在编写过程中，本课题组于1997年9月和1998年3月先后向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申报福建省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第一期）和1998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经专家评审，均获准立项。

本书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具体执笔情况是：杨小冬撰写第一章、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第八章；罗长祥撰写第五章、第七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第九章；陈世奎撰写导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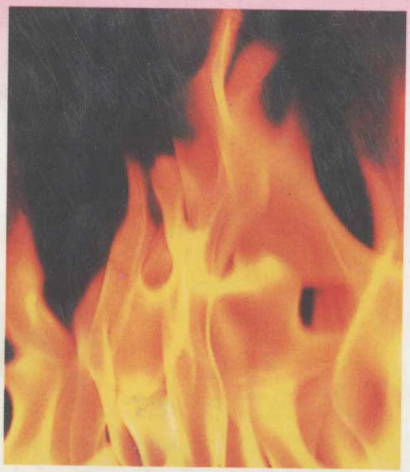
二章、第三章。初稿完成后，蒋伯英教授审改了部分书稿，孔永松教授和马先富等同志进行了审议，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设性意见。

本书的写作出版，得到了福建省财政厅、中共龙岩市委和龙岩市政府的支持；在我们的研究编写工作中，刘思勉、曾平、廖文熹、赖金华等同志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孙骏炜同志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科研处给予了热情的关心和支持；本书的出版还得到厦门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深挚的谢忱。

作 者

1999 年 5 月于福建省委党校

ZHONGYANG SUQU DANGDE JIANSHE SHI



● 责任编辑:徐长春

● 装帧设计:魏献忠

ISBN 7-5615-1535-9

9 787561 515358 >

ISBN 7-5615-1535-9/K • 251

定价:(全套6册)145.00元